

茅盾选集 第三卷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这是一个闷热的下午，这是一个暴风雨的先驱的闷热的下午！我看见穿着艳冶夏装的太太们，晃着满意的红喷喷大面孔的绅士们；我看见“太太们的乐园”依旧大开着门欢迎它的主顾；我只看见街角上有不多几个短衣人在那里切切议论。

一切都很自然，很满意，很平静，——除了那边切切议论的几个短衣人。

谁肯相信半小时前就在这高耸云霄的“太太们的乐园”旁曾演过空前的悲壮热烈的活剧？有万千“争自由”的旗帜飞舞，有万千“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震荡，有多少勇敢的青年洒他们的热血要把这块灰色的土地染红！谁还记得在这里竟曾向密集的群众开放排枪！谁还记得先进的文明人曾卸下了假面具露出一露他们的狠毒丑恶的本相！忘了，一切都忘了；可爱的驯良的大量的市民们绅士们体面商人们早把一切都忘了！

那边路旁不知是什么商铺的门槛旁，斜躺着几块碎玻璃片带着枪伤。我看见一个纤腰长裙金黄头发的妇人踮着那碎玻璃，姗姗地走过，嘴角上还浮出一个浅笑。我又看见一个鬓戴粉红绢花的少女倚在大肚子绅士的臂膊上也踮着那些碎玻璃走过，两人交换一个了解的微笑。

呵！可怜的碎玻璃片呀！可敬的枪弹的牺牲品呀！我向你敬礼！你是今天争自由而死的战士以外唯一的被牺牲者么？争自由的战士呀！你们为了他们而牺牲的，许也只受到他们微微的一笑和这些碎玻璃片一样罢？微笑！”恶意的微笑！卑怯的微笑！永不能忘却的微笑！我觉得我是站在荒凉的沙漠里，只有这放大的微笑在我眼前晃；我惘惘然拾取了一片碎玻璃，我吻它，迸出了一句话道：“既然一切医院都拒绝我去向受伤的死的战士敬礼，我就对你——和死者伤者同命运的你，致敬礼罢！”我捧着这碎片狂吻。

忽地有极漂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响道：“他们简直疯了！他们想拚着头颅撞开地狱的铁门么？”我陡的转过身去，我看见一位翘着八字须的先生（许是什么博士罢）正斜着眼睛看我。他，好生面熟；我努力要记起他的姓名来。他又冲着我的面孔说道：“我不是说地狱门不应该打开，我是觉得犯不着撞碎头颅去打开——而况即使拚了头颅未必打得开。难道我们没有别的和平的方法么？而况这很有过激化的嫌疑么？我们是爱和平的民族，总该用文明手段呀。实在最好是祈祷上苍，转移人心于冥冥之中。再不然，我们有的是东方精神文明，区区肉体上的屈辱何必计较——哈，你想不起我是谁么？”

实在抱歉，我听了这一番话，更想不起他是谁了，我只有向他鞠躬，便离开了他。

然而他那番话，还在我耳旁作怪地嗡嗡地响；我又恍惚觉得他的身体放大了，很顽强地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去路；又看见他幻化为数千百，在人丛里乱钻；终于我看见街上熙熙攘攘往来的，都是他的化身了，而张牙舞爪的吃人的怪兽却高踞在他们头上狞笑！突然幻象全消，现出一片真景来：那边站满“华人”的水泥行人道上，跳上一匹马，驮了一个黄发碧眼的武装的人，提着木棍不分皂白乱打。棍子碰着皮肉的回音使我听去好像是：“难道我们没有别的和平的方法么？……我们有的是东方精神文明，区区肉体上的

屈辱何必计较！”和平方法呀！这未尝不是一个好名词。可惜对于无条件被人打被人杀的人们不配！挨打挨杀的人们嘴里的和平方法有什么意义？人家不来同你和平，你有什么办法呢？和平方法是势力相等的办交涉时的漂亮话，出之于破打破杀者的嘴里是何等卑怯无耻呀！人家何尝把你当作平等的人。爱谈和平方法的先生们呀，你们脸是黄的，发是黑的，鼻梁是平的，人家看来你总是一个劣等民族，只有人家高兴给你和平，没有你开口要求的份儿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信奉这条教义的谩骂默德的子孙们现在终于又挺起身子了！这才有开口向人家讲和平办法的资格呵！像我们现在呢，也只有一个办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甘心少，也不要多！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两句话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回旋；我在人丛里忿怒地推挤，我想找几个人来讨论我的新信仰。忽然疏疏落落的下起雨来了，暮色已经围抱着这都市，街上行人也渐渐稀少了。我转入一条小弄，雨下得更密了。路灯在雨中放着安静的冷光。这还是一个闷热的黄昏，这使我满载着郁怒的心更加烦躁。风挟着细雨吹到我脸上，稍感着些凉快；但是随风送来的一种特别声浪忽地又使我的热血在颞颥部血管里乱跳；这是一阵歌吹声，竹牌声，哗笑声！他们离流血的地点不过百步，距流血的时间不过一小时，竟然歌吹作乐呵！我的心抖了，我开始诅咒这都市，这污秽无耻的都市，这虎狼在上而豕鹿在下的都市！我祈求热血来洗刷这一切的强横暴虐，同时也洗刷这卑贱无耻呀！

雨点更粗更密了，风力也似乎劲了些：这许就是闷热后必然有的暴风雨的先遣队罢？

1925年5月30夜于上海。

“暴风雨”——五月三十一日

昨晚延留到今晨的密雨，趁着晓风，打扑人脸越发有劲。C和S一早起来，已接到“十二点钟出发，齐集N马路”的命令。昨日下午的惨剧，昨夜的噩梦，仅仅三小时许的睡眠，都不但不曾萎缩了他们的精神，反而使他们加倍的坚决勇敢。不久，G和H也来了，四人便开始了热烈的谈论。

后来，话也说完了，时候也不早了，他们预备出去。G说：“我们今天都不带伞，也不穿雨衣；还要少穿衣服，准备着枪弹下热的难受。”

“今天未必再吃枪弹了；倒须预备受自来水的注射，”S微笑着说，“湿透了的衣服是会发散血管里的热度的，所以还是穿了雨衣去的好。”

S的提议立刻被多数否决，大家还是不带伞也不穿雨衣，行无所事的出发了；各人脸上有一种好奇的踊跃的喜气，眼光里射出坚决的意志。这是勇敢的战士第一次临阵时所有的一种表情。

他们四个到了N马路时，S百货公司的大钟正指着十二点三十分。N马路两旁的行人道上已经攒聚着一堆一堆的青年学生和短衣的工人。那时雨下得好大，他们都站在雨里直淋。G、H等四人沿马路往东走了百余步，看见二三小队的女学生正散开来到各店铺内演讲；G、H他们也立刻加入这项工作。

他们刚要走进第十三家商铺去讲演的时候，忽然“吉令令……”的铃声在马路中间乱响，四五辆脚踏车从西向东驰去，一路散放小传单，成百的在湿风中飞舞。这是命令！这是聚集的向令！这是出发的命令！立刻攒聚在行人道上的青年们都活动起来；从横街里小弄里出来一队一队的学生和工人部分布在N马路；“援助工人”，“援救被捕学生”，“收回租界”，“取消印刷附律”，“打倒帝国主义”……等的揭帖和小传单都开始散发并且粘贴在沿马路商铺的玻璃窗上；每一个街角，每一家大商店前，都有人在那里演讲，都有一群市民攒聚着听；口号的呼声，此起彼应，压倒了隆隆的电车声。长且阔的N马路立刻塞满了演讲者，听众，和散传单人。

有好几起的“三道头”和“印捕”拔出手枪擎起木棍来驱逐群众，撕去揭帖；但是刚赶走了面前的一群，身后的空间早又填满了群众，刚撕去了一张揭帖向前走了几步，第二张揭帖早又端端正正的贴在原处。冷酷的武力不能浇灭群众的沸腾的热血！昨日的炮火已把市民的血烧到沸滚！

自来水向密集的群众注射了！但是有什么用？“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像春雷似的从四面起来，盖过了一切的声音。W百货公司屋顶花园的高塔上忽然撒下无数的传单来，趁风力送得很远；鼓掌声和欢呼声陡的起来欢迎。沿马路每家商店楼上的窗洞里都有人头攒动，阳台上也挤满了人，都鼓掌，高喊，和马路中的群众呼应。

这个时候，将近三点钟，沿N马路商店的玻璃窗上早一色贴满了各种的揭帖和传单，讲演亦已停止，满街飞舞的是传单，震荡远近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C、S等四人此时站在S公司的门前跟着狂呼。在一个呼声过去之后，擎着手枪努目拟人的“三道头”，印捕，华捕，又冲到群众面前示威；马路里暂时沉寂一下子，但是即有一个尖音破主而起，大家忽然看见一位女学生站在马路中间——离刚刚过去的示威队不及一丈——高喊那些口

号，两旁的群众立刻齐声应和，那一种慷慨热烈的气概即使是铁汉见了也要心抖。C推着S道：“这是密司蒋，密司蒋！”

脚踏车队又传布命令：“包围总商会！”于是N马路上的学生工人群众都向北而去，让负有“维持治安”责任的巡捕执行他们的“职务”，布起防线来。热烈的空气移到总商去去了！那里有总商会的先生们正在一个小阁内静静的开会。

“持重老成”的先生们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是可恼的探报一道一道的传来：大队的学生像潮水似的涌进来了，总商会被他们占领了！他们在戏台前开会演说了！女学生们把守一重一重的门户，只准进不准出去！他们誓言“不宣布罢市，死也不出去”了！

“老成持重”的先生们侧耳听：好威武的呼噪声呵！好热烈的鼓掌声呵！忽然又寂静无声。这是个可怖的神秘的寂静！这是暗示将有大大鼓噪的寂静！果然呼声夹掌声轰然而起，似乎那小阁子也震动得岌岌颤抖。呼声的怒涛里跳出浮出“请总商会会长出来答复！派代表去请！”的白沫来，在小阁子里也隐约可以辨得清。

热烈的空气终于冲进了冷静的高高的小阁子里。F先生像受了“城下之盟”似的对众宣布了“同意罢市”。在万众欢呼“明天罢市！”的呼声里，女学生的防线撤了，群众也渐渐散去了，那已是又一个黄昏。多么可纪念的一个黄昏！

严霜下的梦

七八岁以至十一二，大概是最会做梦最多梦的时代罢？梦中得了久慕而下的玩具；梦中居然离开了大人們的注意的眼光，畅畅快地弄水弄火；梦中到了民间传说里的神仙之居，满攵了好玩的好吃的。当母亲铺好了温暖的被窝，我们孩子勇敢地钻进了以后，嗅着那股奇特的旧綢的气味，刚合上了眼皮，一些红的、绿的、紫的、橙黄的、金碧的、银灰的，圆体和三角体，各自不歇地在颤动，在扩大，在收小，在漂浮的，便争先恐后地挤进我们孩子的闭台的眼睑；这大概就是梦的接引使者罢？从这些活动的虹桥，我们孩子便进了梦境；于是便真实地享受了梦国的自由的乐趣。

大人們可就不能这么常有便宜的梦了。在大人們，夜是白天勤劳后的休息；当四肢发酸，神经麻木，软倒在枕头上以后，总是无端的便失了知觉，直到七八小时以后，苏生的精力再机械地唤醒他，方才揉了揉睡眠，再奔赴生活的前程。大人們是没有梦的！即使有了梦，那也不过是白天忧劳苦闷的利息，徒增醒后的惊悸，像一篇好的悲剧，夸大地描出了悲哀的组织，使你更能意识到而已。即使有了可乐意的好梦，那又还不是睡谷的恶意的孩子们来嘲笑你的现实生活里的失意？来给你一个强烈的对比，使你更能意识到生活的愁苦？

能够真心地如实地享乐梦中的快活的，恐怕只有七八岁以

至十一二的孩子罢？在大人們，谁也没有这等廉价的享乐罢？说是尹氏的役夫曾经真心地如实地享受过梦的快乐来，大概只不过是伪《列子》杂收的一段古人的寓言罢哩。在我尖锐的理性，总不肯让我跌进了玄之又玄的国境，让幻想的抚摸来安慰了现实的伤痕。我总觉得，梦，不是来挖深我的创痛，就是来嘲笑我的失意；所以我是梦的仇人，我不愿意晚上再由梦来打搅我的可怜的休息。

但是惯会揶揄人们的顽固的梦，终于光顾了；我连得了几个梦。

——步哨放的多么远！可爱的步哨呵：我们似曾相识。你们和风雨操场周围的荷枪守卫者，许就是亲兄弟？是的，你们是。再看呀！那穿了整齐的制服，紧捏着长木棍子的小英雄，够多么可爱！我看见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面孔，男的和女的，穿便衣的和穿军装的，短衣的和长褂的：脸上都耀着十分的喜气，像许多小太阳。我听见许多方言的急口的说话，我不尽懂得，可是我明白——真的，我从心底里明白他们的意义。

——可不是？我又听得悲壮的歌声，激昂的军乐、狂欢的呼喊，春雷似的鼓掌，沉痛的演说。

——我看见了庄严，看见了美妙，看见了热烈；而且，该是一切好梦里应有的事罢，我看见未来的憧憬凝结而成为现实。

——我的陶醉的心，猛击着我的胸膈。呀！这不客气的小东西，竟跳出了咽喉关，即使我的两排白灿灿的牙齿是那么壁垒森严，也阻不住这猩红的一团！它飞出去了，挂在空间。而且，这分明是荒唐的梦了，我看见许多心都从各人的嘴唇边飞出来，都挂在空间，连结成为红的热的动的一片；而且，我又见这一片上显出字迹来。

——我空着腔子，努力想看明白这些字迹；头是最先看见：“中国民族革命的发展”。尾巴也映进了我的眼帘：“世界革命的三大柱石”。可是中段，却很模糊了；我继续努力辨识，忽然，轰！屋梁凭空掉下来。好像我也

大叫了一声；可是，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已消灭！

我的脸，像受人批了一掌；意识回到我身上；我听得了扑扑的翅膀声，我知道又是那不名誉的蝙蝠把它的灰色的似是而非的翼子扇了我的脸。

“呋！”我不自觉的喊出来。然后，静寂又回复了统治；我只听得那小东西的翅膀在凝冻的空气中无目的地乱扑。窗缝中透进了寒光，我知道这是肃杀的严霜的光，我翻了个身、又沉沉地负气似的睡着了。

——好血腥呀，天在雨血！这不是宋王皮囊里的牛羊狗血，是真正老牌的人血。是男子颈间的血，女人的割破的乳房的血，小孩子心肝的血。血，血！天开了窟窿似的在下血！青绿的原野，染成了绛赤。我撩起了衣据急走，我想逃避这还是温热的血。

——然后，我又看见了火。这不是 Nero 烧罗马引起他的诗兴的火，这是地狱的火；这是 Surtr 烧毁了空陆冥三界的火！轰轰的火往卷上天空，太阳骇成了淡黄脸，苍穹涨红着无可奈何似的在那里挺捱。高高的山岩，熔成了半固定质，像饧糖似的软摊开来，填平了地面上的一切坎坷。而我，我也被胶结在这坦荡荡的硬壳下。

“呋！”

冷空气中震颤着我这一声喊。寒光从窗缝中透进来，我知道这还是别人家瓦上的严霜的光亮，这不是天明的曙光；我不管事似的又翻了个身，又沉沉的负气似的睡着了。

——玫瑰色的灯光，射在雪白的臂膊上；轻纱下面，颤动着温软的乳房，嫩红的乳头像两粒诱人馋吻的樱桃。细白米一样的齿缝间淌出 sirens 的迷魂的音乐。可爱的 Valkyrs，刚从血泊里回来的 Valkyrs，依旧是那样美妙！三四辈少年，围坐着谈论些什么；他们的眼睛闪出坚决的牺牲的光。像一个旁观者，我完全迷乱了。我猜不透他们是准备赴结婚的礼堂呢，抑是赴坟墓？可是他们都高兴地谈着我所不大明白的话。

——“到明天……”

——“到明天，我们不是死，就是跳舞了！”

——我突然明白了；同时，我的心房也突然缩紧了；死不是我的事，跳舞有我的份儿么？像小孩子牵住了母亲的衣裙要求带赴一个宴会似的，我攀住了一只臂膊。我祈求，我自讼。我哭泣了！但是，没有了热的活的臂膊，却是焦黑的发散着烂肉臭味的什么了——我该说是一条从烈火里掣出来的断腿罢？我觉得有一股铅浪，从我的心里滚到脑壳。我听见女子的歇司底里的喊叫，我仿佛看见许多狼，张开了利锯样的尖嘴，在撕碎美丽的身体。我听得愤怒的呻吟。我听得饱足了兽欲的灰色东西的狂笑。

我惊悸地抱着被窝一跳；又是什么都没有了。

Nero 英语。即尼禄（NeroClaudiusCaesar37—68），古罗马皇帝。以暴虐、放荡闻名。公元六四年罗马城大火，传说他有唆使纵火的嫌疑。

Surtr 英语。即北欧神话中的火焰巨人苏尔体尔。冰雪是北欧人的大敌。传说苏尔体尔有一发亮的大刀，常结北方来的冰山以致命的刺击。北欧神话中还说陆、海、冥三界分别为神奥定（Odin）、费利（Vili）和凡（Ve）所主宰。

Sirens 英语。古希腊传说中半身是人半身是鸟的海妖，常以美妙的歌声诱杀过路的海员。

Valkyrs 英语。北欧神话中神的十二个侍女之一，其职责是飞临战场上空、选择那些应阵亡者和引导他们的英灵赴奥定神的殿堂宴饮。

呵，还是梦！恶意的揶揄人的梦呵！寒光更强烈的从窗缝里探进头来，嘲笑似的落在我脸上；霜华一定是更浓重了，但是什么时候天才亮呀？什么时候，Aurora 的可爱的手指来赶走凶残的噩梦的统治呀？

1928 年 1 月 12 日于荷叶地。

叩门

答，答，答！

我从梦中跳醒来。

——有谁在叩我的门？我迷惘地这么想。我侧耳静听，声音没有了。头上的电灯洒一些淡黄的光在我的惺松的脸上。纸窗和帐子依然是那么沉静。

我翻了个身，朦胧地又将入梦，突然那声音又将我唤醒。在答，答的小响外，这次我又听得了呼——呼——的巨声。是北风的怒吼罢？抑是“人”的觉醒？我不能决定。但是我的血沸腾。我似乎已经飞出了房间，跨在北风的颈上，蹇然驱驰于长空！

然而巨声却又模糊了，低微了，消失了；蜕化下来的只是一段寂寞的虚空。

——只因为是虚空，所以才有那样的巨声呢！我哑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

我睁大了眼，紧裹在沉思中。许多面孔，错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许多人声，嘈杂地在我耳边争讼。蓦地一切都寂灭了，依然是那答，答，答的小声从窗边传来，像有人在叩门。

“是谁呢？有什么事？”

我不耐烦地呼喊了。但是没有回音。

我捻灭了电灯。窗外是青色的天空闪耀着几点寒星。这样的夜半，该不会有什么人来叩门，我想；而且果真是有什么人呀，那也一定是妄人：这样唤醒了人，却没有回音。

但是打断了我的感想，现在门外是殷殷然有些像雷鸣。自然不是蚊雷。蚊子的确还有，可是躲在暗角里，早失却了成雷的气势。我也明知道不是真雷，那在目前也还是太早。我在被窝内翻了个身，把左耳朵贴在枕头上，心里疑惑这殷殷然的声音只是我的耳朵的自鸣。然而忽地，又是——

答，答，答！

这第三次的叩声，在冷空气中扩散开来，格外的响，颇带些凄厉的气氛。我无论如何再耐不住了，我跳起身来，拉开了门往外望。

什么也没有。镰刀形的月亮在门前池中送出冷冷的微光，池畔的一排樱树，裸露在凝冻了的空气中，轻轻地颤着。

什么也没有，只一条黑狗爬在门口，侧着头，像是在那里偷听什么，现在是很害羞似的垂了头，慢慢地挨到檐前的地板下，把嘴巴藏在毛茸茸的颈间，缩做了一堆。

我暂时可怜这灰色的畜生，虽然一个忿忿的怒斥掠过我的脑膜：

是你这工于吠声吠影的东西，丑人作怪似的惊醒了人，却只给人们一个空虚！

卖豆腐的哨子

早上醒来的时候，听得卖豆腐的哨子在窗外呜呜地吹。

每次这哨子声引起了我不不少的怅惘。

并不是它那低叹暗泣似的声调在诱发我的漂泊者的乡愁；不是呢，像我这样的 outcast，没有了故乡，也没有了祖国，所谓“乡愁”之类的优雅的情绪，轻易不会兜上我的心头。

也不是它那类乎军笳然而已颇小规模悲壮的颤音，使我联想到另一方面的烟云似的过去；也不是呢，过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

所以我这怅惘是难言的。然而每次我听到这呜呜的声音，我总抑不住胸间那股回荡起伏的怅惘的滋味。

昨夜我在夜市上，也感到了同样酸辣的滋味。

每次我到夜市，看见那些用一张席片挡住了潮湿的泥土，就这么着货物和人一同挤在上面，冒着寒风在嚷嚷然叫卖的衣衫褴褛的小贩子，我总是感得了说不出的怅惘的心情。说是在怜悯他们么？我知道怜悯是褻渎的。那末，说是在同情于他们罢？我又觉得太轻。我心底里钦佩他们那种求生存的忠实的手段和态度，然而，亦未始不以为那是太拙笨。我从他们那雄辩似的“夸卖”声中感得了他们的心的哀诉。我仿佛看见他们吁出的热气在天空中凝集为一片灰色的云。

可是他们没有呜呜的哨子。没有这像是闷在瓮中，像是透过了重压而挣扎出来的地下的声音，作为他们的生活的象征。

呜呜的声音震破了冻凝的空气在我窗前过主了。我倾耳静听，我似乎已经从这单调的呜呜中读出了无数文字。

我猛然推开幃子，遥望屋后的天空。我看见了些什么呢？我只看见满天花白茫茫的愁雾。

雾

雾遮没了正对着后窗的一带山峰。

我还不知道这些山峰叫什么名儿。我来此的第一夜就看见那最高的一座山的顶巅像钻石装成的宝冕似的灯火。那时我的房里还没有电灯，每晚上在暗中默坐，凝望这半空的一片光明，使我记起了儿时所读的童话。实在的呢，这排列得很整齐的依稀分为三层的火球，衬着黑黢黢的山峰的背景，无论如何，是会引起非人间的缥缈的思想的。

但在白天看来，却就平凡得很。并排的五六个山峰，差不多高低，就只最西的一峰戴着一簇房子，其余的仅只有树；中间最大的一峰竟还有濯濯地一大块，像是癞子头上的疮疤。

现在那照例的晨雾把什么都遮没了；就是稍远的电线杆也躲得毫无踪影。

渐渐地太阳光从浓雾中钻出来了。那也是可怜的太阳呢！光是那样的淡弱。随后它也躲开，让白茫茫的浓雾吞噬了一切，包围了大地。

我诅咒这抹煞一切的雾！

我自然也讨厌寒风和冰雪。但和雾比较起来，我是宁愿后者呵！寒风和冰雪的天气能够杀人，但也刺激人们活动起来奋斗。雾，雾呀，只使你苦闷，使你颓唐阑珊，像陷在烂泥淖中，满心想挣扎，可是无从着力呢！

傍午的时候，雾变成了牛毛雨，像帘子似的老是挂在窗前。两三丈以外，便只见一片烟云——依然遮抹一切，只不是雾样的罢了。没有风。门前池中的残荷梗时时忽然急剧地动摇起来，接着便有红鲤鱼的活泼泼的跳跃划破了死一样平静的水面。

我不知道红鲤鱼的轨外行动是不是为了不堪沉闷的压迫？在我呢，既然没有杲杲的太阳，便宁愿有疾风大雨，很不耐这愁雾的后身的牛毛雨老是像帘子一样挂在窗前。

1928年11月14日。

虹

不知在什么时候，金红色的太阳光已经铺满了北面的一带山峰。但我的窗前依然洒着绵绵的细雨。

早先已经听人说过这里的天气不很好。敢就是指这样的一边耀着阳光，一边却落着泥人的细雨？光景是多少像故乡的黄梅时节呀！出太阳，又下雨。

但前晚是有过浓霜的了。气温是华氏表四十度。

无论如何，太阳光是欢迎的。我坐在南窗下看 NEvréinoff 的剧本。看这本书，已经是第三次了；可是对于那个象征了顾问和援助者，并且另有五个人物代表他的多方面的人格的剧中主人公 Paraclete，我还是不知道应该憎呢或是爱？

这不是也很像今天这出太阳又下雨的天气么？

我放下书，凝眸遥瞩东面的披着斜阳的金衣的山峰，我的思想跑得远远的。我觉得这山顶的几簇白房屋就仿佛是中古时代的堡垒；那里面的主人应该是全身裹着铁片的骑士和轻盈婀娜的美人。

欧洲的骑士样的武士，岂不是曾在这里横行过一世？百余年前，这群山环抱的故都，岂不是一定曾有些挥着十八贯的铁棒的壮士？岂不是余风流沫尚像地下泉似的激荡着这个近代化的散文的都市？

低下头去，我浸入于缥缈的沉思中了。

当我再抬头时，咄！分明的一道彩虹划破了蔚蓝的晚空。什么时候它出来，我不知道；但现在它像一座长桥，宛宛地从东面山顶的白房屋后面，跨到北面的一个较高的青翠的山峰。呵，你虹！古代希腊人说你是渡了麦丘立到冥国内索回春之女神，你是美丽的希望的象征！

但虹一样的希望也太使人伤心。

于是我又恍惚看见穿了锁子铠，戴着铁面具的骑士涌现在这半空的彩桥上；他是要找他曾经发过誓矢忠不二的“贵夫人”呢？还是要扫除人间的不平？抑或他就是狐假虎威的“鹰骑士”？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书桌上的电灯突然放光，我从幻想中抽身。

像中世纪骑士那样站在虹的桥上，高揭着什么怪好听的旗号，而实在只是出风头，或竟是待价而沽，这样的新式的骑士，在“新黑暗时代”的今日，大概是不会少有的罢？

红叶

朋友们说起看红叶，都很高兴。

红叶只是红了的枫叶，原来极平凡，但此间人当作珍奇，所以秋天看红叶竟成为时髦的胜事。如果说春季是樱花的，那么，秋季便该是红叶的了。你不到郊外，只在热闹的马路上走，也随处可以见到这“幸运儿”的红叶：十月中，咖啡馆里早已装饰着人工的枫树，女侍者的粉颊正和蜡纸的透明的假红叶掩映成趣；点心店的大玻璃窗橱中也总有一枝两枝的人造红时横卧在鹅黄色或是翠绿色的糕饼上；那边如果有一家“秋季大卖出”的商铺，那么，耀眼的红光更会使你的眼睛发花。“幸运儿”的红叶呵，你简直是秋季的时令神。

在微雨的一天，我们十分高兴地到郊外的一处名胜去看红叶。

并不是怎样出奇的山，也不见得有多少高。青翠中点缀着一簇一簇的红光，便是吸引游人的全部风景。山径颇陡峻，幸而有石级；一边是谷，缓缓地流过一道浅涧；到了山顶俯视，这浅涧便像银带子一般晶明。

山顶是一片平场。出奇的是并没有一棵枫树，却只有个卖假红叶的小摊子。一排芦席棚分隔成二十多小间，便是某酒馆的“雅座”，这时差不多快满座了。我们也占据了一间，并没有红叶看，光瞧着对面的绿丛丛的高山峰。

两个喝得满脸通红的游客，挽着臂在泥地上婆娑跳舞，另一个吹口琴，呜呜地响着，听去是“悲哀”的调子。忽而他们都哈哈笑起来；是这样的响，在我们这边也觉得震耳。

芦席棚边有人摆着小摊子卖白泥烧的小圆片，形状很像二寸径的碟子；游客们买来用力掷向天空，这白色的小圆片在青翠色的背景前飞了起来，到不能再高时，便如白燕子似的斜掠下来（这是因为受了风），有时成为波纹，成为弧形，似乎还是簌簌地颤动着，约莫有半分钟，然后失落在谷内的丰草中；也有坠在浅涧里的，那就见银光一闪——你不妨说这便是水的欢迎。

早就下着的雨，现在是渐渐大了。游客们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减少了许多。山顶的广场（那就是游览的中心）便显得很寂静，芦棚下的“雅座”里只有猩红的毡子很整齐地躺着，时间大概是午后三时左右。

我们下山时雨已经很大；路旁成堆的落叶此时经了雨濯，便洗出绛红的颜色来，似乎要与那些尚留在枝头的同伴们比一比谁是更“赤”。

“到山顶吃饭喝酒，掷白泥的小圆片，然后回去：这便叫做看红叶。谁曾在都市的大街上看见人造红叶的盛况的，总不会料到看红叶原来只是如此这般一回事！”

我在路旁拾起几片红叶的时候，忍不住这样想。

速写一

沿浴池的水面，伸出五个人头。

因为浴池是圆的，所以差不多是等距离地排列着的五个人头便构成了半规形的“步哨线”，正对着浴池的白石池壁一旁的冷水龙头。这是个擦得耀眼的紫铜质的大家伙，虽然关着嘴，可是那转柄的节缝中却蚩蚩地飞进出两道银线一样的细水，斜射上去约有半尺高，然后乱纷纷地落下来，像是些极细的珠子。

五岁光景的一对女孩子就坐在这个冷水龙头旁边的白石池壁上，正对着我们五个人头。水蒸气把她们俩的脸儿熏得红喷喷地，头上的水打湿了的短发是墨黑黑地，肥胖的小身体又是白生生地。她们俩像是孪生的姊妹。坐在左边的一个的肥白的小手里拿着个橙黄色透明体的肥皂盒子；她就用这小小的东西舀水来浇自己的胸脯。右边的一个呢，捧了一条和她的身体差不多长短的手巾，在她的两股中间揉摩。

虽是这么幼小的两个，却已有大人的风度，然而多么妩媚。

这样想着，我侧过脸去看我左边的一个人头。这是满腮长着黑森森的胡子根的中年汉子的强壮的头。他挺起了眼睛往上瞧，似乎颇有心事。

我再向右边看。最近的一个正把滴水的毛巾盖在脸上，很艰辛地喘气。再过去是三角脸的青年，将后颈枕在浴池的石壁上，似乎已经入睡。更过去是一张肥胖的圆脸，毫无表情地浮在水面，很像个足球。

忽然那边的矿泉水池里豁刺刺一片水响，冒出个黄脸大汉来，胸前有一丛黑毛。他晃着头，似乎想出来却又蹲了下去。

大概是惊异着那边还有人，两个小女孩子都转过头去了。拿肥皂盒的一个的小脸儿正受着冷水龙头逃出来的水珠。她似乎觉得有些痒罢，她慢慢地举起手来搔了几下，便又很正经地舀起水来浇胸脯。

1929年2月6日。

速写二

水声很单调地响着，琅琅地似乎有回音。浓雾一般的水蒸气挂在白垩的穹窿形屋顶下，又是入睡似的静定。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浴场中只剩下我一个人。

坐在池子边的木板上，我慢慢地用浸透了肥皂沫的手巾摩擦身体。离开我的眼睛约莫有两尺远近，便是那靠着墙壁的长方形的温水槽，现在也明晃晃地像一面大镜子。

可是我不能看见我自己的影。我的三十度角投射的眼光却看见了那水槽的通到隔壁浴场的同样大小的镜平的水面。

这样在隔断了两个浴场中间却依然有这地下泉似的贯通彼此的温水槽呢！而现在，却又是映见两方的镜子。我想起故乡民间传说里的跨立在阴阳界上的那面神秘的镜子来了。岂不是一半映出阴间的事而又一半映出阳间的事，正仿佛等于这个温水槽的临时的明镜？

我赞美这个民间传说的奇瑰的想象，我悠悠然推索这个民间传说的现实的张本。我下意识地更将头放低些，却翻起眼珠注视这沟通两世界的新的阴阳镜。

蓦地一个人形印在我的眼里了。只是个后身。然而腰部的曲线却多么分明地映写在这个水的明镜！如果我是有一个失去了的此世间的恋人的呀，我怕要一定无疑地以为阳间的我此时正站在阴阳镜前面看见了在冥国的她的情影！

一种热烈的异样的情绪抓住了我。那是痴妄的，然而同时也是圣洁的，虔诚的。

然后，正和传说中神秘的镜子同样地一闪，美丽的腰肢蓦地消失了；泼刺一声，挽着个小木盆的美丽的白手臂在镜平的水面一沉，又缩了上去。温水槽里起了晕状的波动。传说的梦幻的世界破灭了，依然是现实的俗场，依然是浓雾一般的蒸气弥漫在四壁间入睡似的静定。

1929年2月17日。

樱花

往常只听人艳说樱花。但要从那些“艳说”中抽绎出樱花的面目，却始终失败。

我们这一伙中间，只有一位Y君见过而且见惯樱花，但可惜他又不是善于绘声影的李大嫂，所以几次从他的嘴里也没听出樱花的色相。

门前池畔有一排树。在寒风冻雨中只剩着一身赤裸裸的枝条。它没有梧桐那样的癞皮，也不是桃树的骨相，自然不是枫——因为枫叶照眼红的时候，它已经零落了。它的一身皮，在风雪的严威下也还是光滑而且滋润，有一圈一圈淡灰色的箍纹发亮。

因为记得从没见过这样的树，便假想它莫就是樱花树罢！

终于暖的春又来了。报纸上已有“岚山观花”的广告，马路上电车站旁每见有市外电车的彩绘广告牌，也是以观花为号召。自然这花便是所谓樱花了。天皇定于某日在某宫开“赏樱会”，赐宴多少外宾，多少贵族，多少买业界巨子，多少国会议员，这样的新闻，也接连着登载了几天了。然而我始终还没见到一朵的樱花。据说时间还没有到，报上消息，谓全日本只有东京上野公园内一枝樱花树初初在那里“笑”。

在烟雾样的春雨里，忽然有一天抬头望窗外，蓦地看见池西畔的一枝树开放着一些淡红的丛花了。我要说是“丛花”；因为是这样的密集，而且又没有半张叶子。无疑地这就是樱花。

过了一二天，池畔的一排樱花树都蓓蕾了，首先开花的那一株已经称艳得像一片云霞。到此时我方才构成了我的樱花概念是：比梅花要大，没有桃花那样红，伞形的密集地一层一层缀满了枝条，并没有绿叶子在旁边衬映。

我似乎有些失望：原来不是怎样出奇的东西，只不过闹烘烘地惹眼罢了。然而又想到如果在青山绿水间夹着一大片樱花林，那该有异样的景象罢！于是又觉得岚山是不能不一去了。

李大嫂在国内时听过她的朋友周先生夸说岚山如何如何的好。我们也常听得几位说：“岚山是可以去去的。”于是在一个上好的晴天，我们都到岚山去了。新京阪急行车里的拥挤增加了我们几分幻想。有许多游客都背着大瓶的酒，摇摇晃晃地在车子里就唱着很像是梦呓又像是悲呻的日本歌。

一片樱花林展开在眼前的时候、似乎也有些兴奋罢？游客是那么多！他们是一堆堆地坐在花下喝酒，唱歌，笑。什么果子皮，空酒瓶，“辨当”的木片盒，杂乱地丢在他们身旁。太阳光颇有些威力了，黄尘又使人窒息，摩肩撞腿似的走路也不舒服，刚下车来远远地眺望时那一股兴奋就冷却下去了。如果是借花来吸点野外新鲜空气呀，那么，这样满是尘土的空气，未必有什么好处罢？——我忍不住这样想。

山边有宽阔的湖泊一样的水。大大小小的游船也不少。我们雇了一条大的，在指定的水路中来回走了两趟。回程是挨着山脚走，看见有一条小船蜗牛似的贴在山壁的一块突出的岩石下，船里人很悠闲地吹着口琴。烦渴中喝了水那样的快感立刻凝成一句话，在我心头掠过：岚山毕竟还不差，只是何必樱花节呵！

归途中，我的结论是：这秾艳的云霞一片的樱花只宜远观，不堪谛视，很特性地表示着不过是一种东洋货罢了。

1929年5月15日。

冥屋

小时候在家乡，常常喜欢看东邻的纸扎店糊“阴屋”以及“船，桥，库”一类的东西。那纸扎店的老板戴了阔铜边的老花眼镜，一面工作一面和那些靠在他柜台前捧着水烟袋的闲人谈天说地，那态度是非常潇洒。他用他那熟练的手指头折一根蔑，捞一朵浆糊，或是裁一张纸，都是那样从容不迫，很有艺术家的风度。

两天或三天，他糊成一座“阴屋”。那不过三尺见方，两尺高。但是有正厅，有边厢，有楼，有庭园；庭园有花坛，有树木。一切都很精致，很完备。厅里的字画，他都请教了镇上的画师和书家。这实在算得一件“艺术品”了。手工业生产制度下的“艺术品”！

它的代价是一块几毛钱。

去年十月间，有一家亲戚的老太太“还寿经”。我去“拜揖”，盘桓了差不多一整天。我于是看见了大都市上海的纸扎店用了怎样的方法糊“阴屋”以及“船，桥，库”了！亲戚家所定的这些“冥器”，共值洋四百余元；“那是多么繁重的工作！”——我心里这么想。可是这么大的工程还得当天现做，当天现烧。并且离烧化前四小时，工程方才开始。女眷们惊讶那纸扎店怎么赶得及，然而事实上恰恰赶及那预定的烧化时间。纸扎店老板的精密估计很可以佩服。

我是看着这工程开始，看着它完成；用了和儿时同样的兴味看着。

这仍然是手工业，是手艺；毫不假用机械；可是那工程的进行，在组织上，方法上，都是道地的现代工业化！结果，这是商品；四百余元的代价！

工程就在做佛事的那个大寺的院子里开始。动员了大小十来个人，作战似的三小时的紧张！“船”是和我们镇上河里的船一样大，“桥”也和镇上的小桥差不多，“阴屋”简直是上海式的三楼三底，不过没有那么高。这样的大工程，从扎架到装璜，一气呵成，三小时的紧张！什么都是当场现做，除了“阴屋”里的纸糊家具和摆设。十来个人的总动员有精密的分工，紧张连系的动作，比起我在儿时所见那故乡的纸扎店老板捞一朵浆糊，谈一句闲天，那种悠游从容的态度来，当真有天壤之差！“艺术制作”的兴趣，当然没有了；这十几位上海式的“阴屋”工程师只是机械地制作着。一忽儿以后，所有这些船，桥，库，阴屋，都烧化了；而曾以三小时的作战精神制成了它们的“工程师”，仍旧用了同样的作战的紧张帮忙着烧化。

和这些同时烧化的，据说还有半张冥土的房契（留下的半张要到将来那时候再烧）。

时代的印痕也烙在这些封建的迷信的仪式上。

1932年11月8日。

作者原注：还寿经为了表示儿子的孝心，在父母寿辰时（大概是五十以后逢十的寿辰）请和尚念经，叫做“还寿经”，这是嘉兴、湖州一带的风俗。

秋 的 公 园

上海的秋 的 公园有它特殊的意义；它是都市式高速度恋爱的旧战场！

淡青色的天空。几抹白云，瓷砖似的发亮。洋梧桐雕叶了，草茵泛黄。夏季里恋爱速成科的都市摩登男女双双来此凭吊他们那恋爱的旧战场。秋光快老了，情人们的心田也染着这苍凉的秋光！他们仍然携手双双，然而已不过是凭吊旧战场罢了！

春是萌芽，夏是蓬勃，秋是结实；然而也就是衰落！感情意识上颓废没落的都市摩登男女跳不出这甜酸苦辣的天罗地网。

常试欲找出上海的公园在恋爱课堂以外的意义或价值来。不幸是屡次失败。公园是卖门票的，而衣衫不整齐的人们且被拒绝“买”票。短衫朋友即使持有长期游园券，也被拒绝进去，因为照章不能冒用。所以除了外国妇孺（他们是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的）。中国人的游园长客便是摩登男女，公园是他们恋爱课堂之一（或者可以说是他们的户外恋爱课堂，他们还有许多户内恋爱课堂，例如电影院），正像“大世界”之类的游戏场是上海另一班男女的恋爱课堂。

一般的上海小市民似乎并不感到新鲜空气，绿草，树荫，鸟啼……等等的自然界景物的需要。他们也有偶然去游公园的，这才是真正的“游园”；匆匆地到处兜一个圈子，动物园去看一下，呀！连老虎狮子都没有，扫兴！他们就匆匆地走了。每天午后可以看到的在草茵上款款散步，在树荫椅上绵绵絮语的长客，我敢说什九是恋爱中的俊侣，几乎没有例外。

春是萌芽，夏是蓬勃，秋是结实，也就是衰落的前奏曲；过了秋，公园中将少见那些俊侣的游踪了，渐渐地渐渐地没有了。

然则明年春草再发的时候，夏绿再浓的时候呢？

自然摩登男女双双的情影又将平添公园的热闹，可已经不是（而且在某一意义上几乎完全不是）去年的人儿了。去年的人儿或者已经情变，或者已经生了孩子，公园对于他们失了意义了。经过了情变的男或女自然仍得来，可已不是“旧”的继续而是“新”的开始；他们的心情又已不同。很美满而生了孩子的，也许仍得来来，可已不是去年那个味儿了。

只有一年之秋 的 公园是上海摩登男女值得徘徊依恋的地方。他们中间的恋情也许有的已在低落，也许有的已到浓极而将老，可是他们携手双双这时间，确是他们生活之波的惟一的激荡。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凭吊恋爱的旧战场！

这是都市式高速度恋爱必然的过程，为恋爱而恋爱者必然的过程；感伤主义诗人们的绝妙诗材！上海的摩登男女呀，祝福你们，珍重，珍重，珍重这刹那千金的秋光！感伤主义的诗人们呀！努力，努力，努力歌咏这感情之波动罢！

因为这样的诗材，将来就要没有；这样的风光不会久长！

1932年11月8日。

光明到来的时候

—

“朋友！这，这是什么哟！我好像看见一点什么了！红的，绿的，黄的，小小的，圆圆的，尖角的，在那里跳！跳！”

“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你在那里做梦！”

“不是梦！你说，怎么会是梦呢？我咬我的指头，我觉得痛！朋友，这又来了：红的，绿的，小小的，在那里飘浮，在那里跳跃！”

“那么，一定是你的眼花！我们小时候一闭了眼睛就会看见一些眼花；五彩的光圈，五彩的线条，旋转，舞蹈！我们做了大人以后就没有这些眼花了。你比我年青些，也许你还有——”

“年青些？哈哈！”

“笑什么！你还能够笑？”

“呵呵，我笑了么？因为我又看见那些小小的活跃的东西了！红的，绿的！这回比刚才更加乡了！一点也不含糊，更加多了！更加活跃！”

“全是梦话，全是幻想！你还有心情说梦话，唉！”

“当真你一点也不见么？这是可怜的！朋友，你到我这边来，就看见了！朋友，这是我的手。你扶着我的手过来罢！朋友，当心跌交！脚底下有坑！朋友！这是我的手，我的臂膊！你的呢？你的呢？”

“你的手多么热呀！”

“我全身的血都沸滚了哟！你想想，一向是无穷无尽的黑暗，坟墓一样，而现在我看见了有一些活跃的东西，彩色的东西了！……喔唷唷！你踩了我的脚！哎！这毛茸茸的就是你的头么？哈哈，你抱住了我么？我们紧紧地抱着罢！……现在，你看，这不是么？红的，绿的！呵呵！”

“可是我眼前仍旧一片黑暗，黑暗！”

“这就怪了！——哦，不要动！是我的手哟，你不要怕！这是你的脸么？这么着，不要动！你朝前看呀！朝前看呀！”

“哈哈，我也看见了！当真！”

“可不是红的，绿的，蚊子一样的，在那里飞舞么？”

“是呀！像一支军队，它们跳跃着拥上前来呀！呵呵！它们像从天上来！它们排成一直线来，没有一点弯曲！多么美丽！多么活跃！多么勇敢呀！”

“而且它们不退缩！往前冲，往前冲！哈哈！二个碰在一处了！变成大一些的一个了！又分开了！仍然往前冲，往前冲！喂，朋友，你猜来这是什么？……怎么你不说话？你睡着了么？嘿！你会在这些美丽的活跃的现象面前睡觉！”

“胡说！我在这里想，我在这里想呀！”

“又是想了！空想家！”

“不要吵！我在这里研究呀！”

“又是研究了；研究系！”

“不要吵，行么？这是一个现象，总得研究！我要研究它是不是我们那视官的幻觉！是不是就像我们小时候那眼花，我要研究它！我们不能随便轻信，随便盲动，随便上当！”

“你这怀疑派！难道你觉得那黑暗还不够久长么？”

“不要吵！研究出来了：这是一道光！”

“一道光！暖？”

“不错，一道光！穿破了这黑暗的一道光！外边天亮了，而我们这黑暗的古老的建筑也有了裂缝了！”

“有了裂缝么？”

“是呀！这古老的坚牢的坟墓早已应该崩坍，早已有了裂缝，而现在，外边的光明钻进这裂缝来了！”

“哈哈！”

“哈哈！你还讥笑研究的态度么？”

“可是光知道了有什么用？”

“知道了就会发生行动！智慧产生信仰，信仰产主力量！”

“呵呵，那么我们来罢！我们打破这牢狱！打破这黑暗的笼！这是我的手，我的拳头！你的呢，你的呢？哦——在这里了！我们打呀！我们冲呀！好呀！蓬蓬！朋友，再用力！蓬蓬！呀！你怎么？”

“我的手痛了！喔唷唷！腻忒忒的东西！我相信那就是血！我已经受伤！”

“咄！你一说，当真我也觉得有点儿痛！我这也是血罢！然而朋友，不要畏缩，不要灰心！你想想，外边已经天亮，而且光明像一支枪，像一支尖头的槲，已经打进了我们这黑暗的笼！”

“对呀！那么一条细光就已经很美丽，外边的全是光明的世界不知道美丽到怎样了！呀呀！我想着了就快活到全身发抖！”

“可是我痛得全身发抖！一点力都没有了！这黑暗的笼还是很坚固！呀！红的绿的更加多了！它们跳跃，跳跃！”

“我也是一点力都没有了！可是我们的力量本不在拳头而在头脑！”

“现在却需要拳头！”

“可是我要休息一下。那裂缝总是愈裂愈大，我们且等待一下，到时机成熟再动手罢！呀呀！多么美丽，这一道光！然而还只得指头粗细那么一道！”

“哎！我手脚都软了！不知道是为的疲倦呢，还是为的快乐！我也只好歇一下。朋友，你不想大声叫一下么？我们大声叫呀！多么美丽！光明在前面不远了！朋友，我们拥抱罢！我们要唱一支歌，欢迎光明的来到！”

二

“不知道又经过多少时候了。怎么还没听得外边有响动！”

“我闷得慌！”

“可不是！我的心头就像有许多蚂蚁历历落落的在那里爬！”

想到外边的世界已经放光明，我就觉得这里的黑暗更加不可耐了！先前怎么会忍耐得下去，想来真奇怪！”

“然而你不要性急，馒头已经吃到豆沙边了！你看！一道道的的光，更加多了！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了！哈哈，这光线的网！”

多么美丽，是奇观呀！你看！这些光线都比刚才又粗了些了！喂喂，你把你的脸放到那条顶粗的光线里让我看一看罢！我们好久没有看见你我的脸了！也许我们彼此要不认得了！现在，再移近些！喔呵！我看见了，看清楚！你的脸多么苍白！就同死人一样！哎，你试笑一笑！多久我没有看见人们的笑容了！呸！你这笑不自然，不美丽！可怜的孩子，你连怎样笑都忘记

了罢？你这怪丑恶的笑脸怎么好到外边那光明的世界！你用这样的笑脸去欢迎光明，那是天大的罪过呀！”

“可是你呢？你也把脸放到这顶粗的光线里让我看一看罢！”

“你会比我好些么！来，来，来！这里！这里！这里……”

“我相信我还不至于十分走样！”

“咄！别吹牛！哈哈，你还像个人么！满脸的胡子了！还有，——你别动！你不要逃，你有一对红镶边的眼睛！你简直像个猴子！”

“胡说！”

“可惜没有一面镜子给你自己照一照！”

“这也用得到大惊小怪么？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人总不免有点走样！我比你年纪大些，经过的苦难比你多，可是我的经验也就比你丰富了！哎！先前我们那一伙，最早的寻求光明的同志，现在只剩了我一个，怎么我能够不老呀！”

“就是我一辈子，也只剩了个我！前些时还听得他们在那边坑里呻吟，现在好久没听到，想来都死了！咄，这杀人的黑暗！”

“可是也快完结了！”

“对了！那个坑！那个杀人的坑！我比你早出世，那时候，这里还没有现在那么黑暗，我看见过那坑的险恶！坑边是刀山，坑底是成万的毒蛇！——呵！你看呀！这一条光恰就射到那坑边上了！那白森森的就是枯骨，那一闪一闪发着红光的的就是毒蛇的眼睛罢！呵！你再跟着那一道光看过去哟！那是什么？哦哦，那是吊人的木架子，那是砍头的大刀罢！呀呀，我现在又看见了这一切，再要我多住一刻当真不行！”

“可不是！看见的危险比不看见的更加可怕！我的心实突地跳！我怕它会一下里爆裂了！朋友，不要再朝下边看了。我们朝上面看罢！不要回忆那些过去的，我们想想那未来的罢！朋友，你总该知道外边的光明世界是怎么一个景象？”

“咳，可怜的孩子，你真是太幼稚了！”

“可是也不能怪我！刚刚我懂一点事！黑暗就包围了我！况且书本子早就被他们烧光了，严密的文化封锁！”

“哦哦，不错！那么，让我来想一想。哦，书本子上说——”

“怎么！你也只是书本子上看来的么？”

“噢！不晓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孩子！除了书本子，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根据呀！噯！我记得书本子上说过——总而言之，是一个全善全美的世界，乐园，天堂！”

“说下去呀！我等着你再说下去呀！你说得具体一点儿，不要太抽象！”

“真是麻烦的孩子！那么，你听着！噯，从哪儿说起呢？一部二十四史！呵，有了，你用心听着！大概是什么神话上说过。从前世界上有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候，人类不分你我，共同生活，没有贪鄙奸诈；面包生在树上，河里就是牛奶；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平等，自由，幸福！处处是琼楼贝阙，鸟语花香！这样的黄金时代，古已有之，而现在回来了，就是那外边的光明世界。”

“啧啧！那才是人的生活！就在外边么？我不耐烦了！”

“呵！你要耐烦点！不是已经试过了么，我们的拳头不中用！”

“可是我现在全都知道了，我就耐不住；我想我一定得闷出病来罢。”

“ 唷唷，快了！你不看见这里纵横四射全是一道一道的光么？哈！又多了几条了，五条，六条，七条！哈，这黑暗的老屋子全是些裂罅了！快了！”

“ 哈！不要响！那是什么声音？听得么？听得么！”

“ 呵，当真！那好像是风罢，呼——呼——的！”

“ 而且那轰隆隆的，一定是雷！呵，风！雷！”

“ 而且还有雨呢！你听！那一片擂鼓似的声音！”

“ 这是少有的大风雷雨！我的耳朵也震聋了！”

“ 我们说话也听不清了！呵，这是翻天覆地的大风雷雨！等我想一想：历史上说的洪水时期也许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 喂！喂！你说的什么红，红？我一点也听不清楚！”

“ 不好了！地在我们脚底下震动！我想这是火山爆发！呵！这一声！”

“ 呵！地震！雷吼！我还看见了电火！”

“ 呵——喔——……”

“ 怎么！你发疯？你扑在地下干什么？呀呀！看那边，那边！一派亮光！一派火！我们右边没有那牢墙了！哈哈！自由！光明！可是，咦，怎么的，我的眼睛——”

“ 让我来看！火，火，火！啊哟！哪里来的针刺了我的眼睛！”

“ 天哪！怎么我睁不开眼睛！我要去欢迎光明呀，怎么我的眼睛——”

“ 而且我也是一样的病！”

“ 你说，快说！什么病？啊哟！风吹得我全身发抖！有什么东西烫着我的皮肤！而且我的眼睛还是痛，很痛！”

“ 呃……”

“ 怎么！这是你么？你抱住了我干什么？你拖我走？你拉我到哪里去呀？天哪！我的眼睛！我怕是不行了！……你拖我到哪里去呀？你，你，你！……”

三

“ 现在没有声音了。”

“ 那蓬蓬地响着的又是什么？”

“ 那光景就是大火！烧毁了一切的大火！”

“ 也要烧到我们这里来罢？”

“ 光景是要来的！”

“ 那么我要去看一看，我要离开这半黑暗的该诅咒的墙角！”

“ 但是你不怕那边太强烈的光线刺痛了你的眼睛么？”

“ 我不怕！就是瞎了眼睛，我也要去！为了寻求光明，即使瞎了眼睛也值得！”

“ 但是那边并不是真的光明！那边的是地狱里喷发出来的孽火！那边一点也不像我从前所读的书本子上那些话！”

“ 你难道能够断定你的书本子一定不错！书本子是死的，书本子不能预言了一切变化！我一定要走了！你也一块儿去罢！”

“ 你的眼睛就能够睁开来么？我的是不行！在这里，我还觉得眼皮上麻辣辣地有点刺痛！”

“ 我也有一点儿。但是我想来那是一定不可免的过程。你想想我们在黑

暗中多久了，骤然跑到强烈的光明下，眼睛总要睁不开！总要觉得痛！忍过这一会儿就好了！”

“可是我不愿意。并且我读过的书本子只许给我自由，快乐，没有说过先得受痛苦！先要给人痛苦的，那就不是理想的极乐世界！”

“那么我一个人走了！”

“不行！你不能一个人走！你一定要年长的人给你引路！”

“我不要谁来引路！我会走自己的路！”

“但是你丢我一个人在这里未免太残酷！”

“那我没有别的办法。”

“你竟说没有别的办法？”

“那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你最好再等一下。那边的大火会把你烧做灰！”

“我就想到大火里去锻炼一下。”

“你这是不知高低的话！”

“哈，哈，哈！……呵，雷又响了！这风！呀，呀，明友，快走，快走！这墙也要倒下来了！我扶着你罢！呀——”

“哼，哼，可是我当真不行了！……我的心好像已经爆破了，我的眼睛也盲了！……这变动！天翻地覆的变动！我相信这一定不是好的正气的变动！……书本上从没说过……我当真不行了！我不能动了！我快就要死了！”

“但是朋友，你得努力，你得振作！我抱你起来罢？”

“不成！……”

“呀呀！你的脸，你的嘴唇，全都冷下去了，冷下去了！让我来试一试看，还有没有气息？呀——可是，这墙当真就要倒了！火，火也就要烧过来了！哈！来罢！烧毁了旧世界的一切渣滓！来罢！我要在火里洗一个澡！”

1932年11月26日。

老乡绅

“要是并没有所谓上帝，我们就得创造他一个！”

——福祿特尔

朋友！这是真桩实事，发生在×省×县×乡！

那一天早上，东方红日初升，空气清爽。夜来有过阵头雨，街上青石板的凹陷处还是一个一个的水潭。积世老乡绅×老穿了件“结衫”，站在自己家门前的石阶上。一手捋着胡子，仰脸看天空的浮云，悠然自得，便是上八洞的神仙也不及他老人家清闲纳福。

他老人家有一点古怪脾气；喜欢信口开河撒一点儿不伤脾胃的小谎。他哄得人家相信了，自家躲在旁边暗笑；他说这是顶好的延年秘诀。他是一位幽默家。

这一天早上，他正在看天空的浮云，正正经经并没想到要撒谎的时候，忽然迎面来了一位忘年交，恭恭敬敬拱着手喊道：

“×老！早呵！听说昨夜那个响雷劈开了东乡外的一株老槐树，哎，就是×桥边那株老槐树！”

×桥么？那是离镇有六里路的一座三洞大桥！突然×老的眼珠一翻，不假思索地脱口回答道：

“这就对了！原来那孽畜的老窠竟在×桥的大槐树底下！”

忘年交愕然看着×老的淡黄面孔，摸不着头脑。但是×老道貌岸然地自言自语接下去了：

“哦！×桥到螺蛳滩，少说也有三十里路，这孽畜遭了雷火。还能够窜去那么远，厉害哟厉害！”

忘年交现在听出眉目来了，赶快问道：

“×老！那老槐树底下躲着妖精么？”

“可不是！昨夜雷雨过后，螺蛳滩那边从天上掉落一条大蟒蛇来，身体比吊桶还粗，头像栲栳，死在田里，总有半亩地那么大；正不知道这孽畜从哪里来，却原来×桥边的老槐树是它的老家！小儿是常到×桥去的，惭愧得很，侥幸没有膏了它的馋吻。今儿它既然遭了天条，倒要走螺蛳滩一趟去看看明白。”

“对呀，对呀！可是二十多里路，这样大热天，不是玩的！”

忘年交一边说，一边拱手，就走开了。×老直望到不见了这位朋友的影子，这才回味过来似的独自哈哈笑着，也回进家内去了。

到了午后，×老把这件事完全忘记了；照例踱到茶馆去的时候，他听得满茶馆纷纷谈论着螺蛳滩有一条极大的死蟒蛇。×老这才想起了今天早上弄的小狡狴，就忍住了笑，在旁边听他们讲。可是他渐渐收住了笑容，正正经经用心在听了。人家讲的多么细到！并且其中满头大汗的一位据说是刚去看了来的呀！

“原来是真的么？”×老捋着胡子肚里想。他疑惑自己早上对那忘年交说的一番话确是有来历的了，他不相信自己会撒下那样一个谎了。

于是在听完了以后，×老第一个站起来说道：

“今天早上我也听说有这回事，我还以为是谣言哪！既然是真的，那倒不能不去看一下。”

许多茶客都哄然附和。一群人拥出了那茶馆，就向镇西螺蛳滩那条路走去，x老是赶在前头的第一个。

“现代化”的话

朋友，假如你不厌烦器，喜欢出来走走的话，有几处地方你不可不看。上海的“东头”，杨树浦那一带，你喜欢么？想来你一定喜欢的！那边有许多纱厂，——中国轻工业的要塞。没有熟人，你只好望那些巍峨的厂门而兴叹。想来你总可以找到一个熟人罢？那么，中国棉纱大王的领土就许你进去了。可是得先夫照你：你要忍耐，因为有几分钟的不舒服。因为那边的空气里全是棉花的纤维，大一点像鹅毛样的飞絮有时竟会一片一片扑到你脸上身上，粘住了不肯去；是的，那边的空气浓厚些，你一下里会觉得闷，怪胀似的。但是不过几分钟罢了。你立刻会惯。并且想来你一念及每天十二小时在那样空气中作工的，也和你一样是人，你自然会仰脸行一次深呼吸，一点也不觉得什么了。

你将被引进了弹松“花衣”的工场。许多黝黑晶亮，蹲着的巨人似的机器，伸长了粗胳膊——直径二尺的粗铁管——就同手携手似的组成了工作的一列；它们从下面的帘形滚板上（那你就说是“嘴”罢，为的那许多木条构成的滚板实在太像了牙齿，）吞进了压得紧紧的“花衣”，于是通过了它们的肚子，消化，——唷，该说是扯松罢，于是又通过了它们的胳膊，送到另一位“巨人”的肚子里；这也于的同样工作——扯松，但一定是高级的工作，因为后来就看见它的一个斗形嘴巴里吐出那些“花衣”来了，那已经松松的，一看就叫你感得软绵绵，而且颜色也同雪一样白。

这些扯松了的“花衣”像雪块似的落下来，落进一个地洞去了。朋友，也许你当真认作一个洞罢？然而不然。洞是洞，不过洞下又是黑铁管的粗胳膊，“花衣”从这胳膊又运到另一个“巨人”的肚子里了。你要看个究竟，你得走到下层的机器间。

说来也许你不肯相信，下层机器间里的“巨人”们就好像专同上层机器间里的伙伴“憋气”似的。好好儿弹得又松又白的“花衣”到它们肚子里不知道怎样一来，就从官们屁股里拉下，早又压得紧紧的，而且变成了一张毡似的，卷在一根铁棒上了。它们的扁屁股眼儿只管拉，拉，那铁棒只管卷，卷，到后来就像大筒的卷筒纸似的肥得很了，于是走来了一位工人，截断了那拉不完的“扁屎”，就那么连铁棒抱起来，搁到磅秤上过磅。

这时你的“熟人”也许会告诉你，这是“花衣”变成棉纱的第一步手续（严格说，就是第二步），以后就要将这些卷筒纸样的棉毡拉成“棉条”了。

专拉“棉条”的钢巨人可就没有粗胳膊。个儿也小些。它们不很吵闹，那卷筒形的棉毡装在上面，慢慢地展开来，就同卷筒纸在印刷机上相仿；可是这专拉“棉条”的钢巨人有一把大钢梳，把那棉毡一梳一梳的又弄碎了，弄碎了就经过它的肚子，消化做浓雾似的喷出来，——朋友，请你想像我用的这个“雾”字；你用什么字好呢？实在可说是棉的瀑布，可是没有瀑布那样势头和厚实；那是稀薄的松松的，恰像雾，——然后这“雾”又经过了或者被吸进了一个巧妙的部分，变做了手指那么粗的又白又嫩的“棉条”。这也是自动的拉出来，自动的装进了一个红漆的长圆铁筒。

以后，这些“棉条”尚须经过又一组的机器（那是小得多，看样子就觉得它们是前面所说的那班钢巨人的少爷），六根并一根，抽成了较细然而较结实的一种“棉条”。于是再经过了吵闹得很利害的“小姐”式的一组机器，纺成了“粗纱”，——这有普通麻绳那么粗。由粗纱再纺成细纱。担任这一

工作的机器，是十足的摩登小姐式了，顶会吵闹。它们一列车有四百个锭子；这些小家伙本来声音不大，可是它们成千成万打伙儿闹起来，那声音就可怕；你对话，喊破了喉咙也听不见。粗纱间和细纱间里要许多女工伺候着；她们是整天没厚坐的。她们要“接纱头”，她们要把“罗拉”上的棉絮拭去，她们管理锭子。前面说过的钢巨人却只要很少的几个人伺候，而且大都是男工。

朋友，也许你早就在什么洋行的样子间大玻璃窗前看见过那些成排的静静地站着的纺车罢？这都是供给我们中国人来开发中国，建设中国的。并且如果你到纱厂里看过，走出厂门来松一口气的时候，也许就幻想到中国是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路而且民族资本主义已经确立，——至少像印度似的。

一句话来包括你的感想，朋友，你是相信中国是在步步地“现代化”！

不错呀！十年前的上海和现在很不相同。现在上海被大烟囱包围着。假使你从上海的“东头”转到“西头”，你就看见曹家渡一带也是纱厂林立，不过那是日本人的资本罢了。你再到南市，到闸北，到浦东，你到处看见大烟囱了。尤其是闸北。大大小小的丝厂一和大大小小的各部门的工业，例如电料，洋伞，热水瓶，橡胶，搪瓷，几乎可说色色俱全，就像乡下的“露天毛坑”一样，到处可见。你进了南京路的国货商场，就觉得日用品都有“国产”的了。呵，阿，中国是在步步地“现代化”呵！

不错，中国在一部一步“现代化”，或是“工业化”，我也可以相信的；因为不但中国人自家开工厂，外国人也来开。拿纱厂来说罢，全中国共有纱厂一百二十八家，去年开工纱锭四百四十九万三千三百余枚，比前年增加了二十六万五千余枚；在这总数中，属于中国资本家的纱锭，计三百五十二万三千三百余，比前年增加了十四万一千七百多枚，属于日本资本家的，却也有二百七十八万七千余枚，比前年也增加了十万多枚。然而出品呢，去年中国纱厂对日商纱厂只成了一百四十二万七千包对八十万零五千包之比！再讲到原料呢，朋友，你的“熟人”自会告诉你，灵宝花衣怎样不行，只能搀用，因此他们是仰给于美棉的！新近成立的五千万美金大借款，据说就是专购美国的棉麦，救济中国的纺织工业的。这也可见中国将更被“开发”，而且“利用”了外资！

但是朋友，咱们是不“谈”政治的，咱们仍旧讲讲“上海景致”罢。要是你觉得看了大烟囱还不够，我劝你上三马路，北京路，宁波路，还有外滩；那边是中国的金融枢纽。你踱进了中央、中国或是交通，——这三家大银行，也许你会看到一件事觉得奇怪；那就是在一处的铜栏杆后面有些办事人老拿着一叠小小的不过半寸阔寸把长的花纸片很快的数着数着。你一定惊赞他们手法的纯熟。而且你也许会看见（要是在月底）铜栏杆外挤着人手，又都是拿了那些小小的花纸片，一束或者竟是一厚叠。朋友，这些小小的花纸片就是公债库券的息票或本息票，因为政府发行的公债库券已经有十一万万了。朋友，也许你因此会想到中国国民的储蓄能力毕竟不弱罢？那么，你最好再去观光一次上海的公债市场，在那边，每天成交在千万以上；满脸流汗的投机者，总在“百万翁”和“穷光蛋”这两者之间翻筋斗。在那边，“做交易”的冲锋似的呐喊，“空头”的大胆，“多头”的魄力，操纵的奇妙，都叫乡下土财主瞪大了眼睛莫名其妙。内地的金钱逃到上海来了，而在现代式的操

“罗拉”英语 roller 的音译。意即滚轴、卷轴、卷筒。

纵下，不知道有多少乡下土财主压得粉碎，于是逃到上海来的金钱又这样“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了。不用说，资金集中，“财阀”造成，也是中国的“现代化”的征象！

朋友，你喜欢乐一下么？那就有现代化的各种娱乐随你去挑选。你要是爱细腰粉腿，就有跳舞场。或是你只要看看电影。好呀，大大小小的电影院都育！新开幕的“大光明”，据说是东亚第一的现代化。现代式的建筑，现代式的装璜；一百多尺高的灯塔，远远地就领导你的路向；三个喷水泉喷射五色的花雨；最新科学发明的冷气和热气的装置，最新式的发音机，没有回声的软砖，二千个舒服的座位；而且开映的将是最近欧美现代生活的影片！

并且请你千万不要忘记“大光明”左近就有建筑中的二十二层的四行储蓄会大厦。这是上海建筑现代化的代表。

所以谁说中国没有“进步”，不是盲目，就是丧心病狂。

朋友，再说内地农村罢。现在大家都嚷着农村经济破产。但是破产尽管破产，现代化仍是步步地在进行呀！这个，你不到农村去看，也可以知道。这几年来，公路建成了不少，乡下人也有眼福看见汽车了；跟着交通的发达，向来鄙塞，洋货和钞票不大进得去的地方也就流通无阻了；生活程度也慢慢跟着高了；生活程度高，又是“现代化”的显著征象。还有，跟着交通的发达，大都市里的时髦风气也很快地灌进内地去了；剪发，长旗袍，女大衣，廉价的人造丝织品，国产电影，一齐都来了。都市和乡镇现在正起了交流作用，乡镇的金钱流到都市，而都市的“现代”风气的装饰和娱乐流到乡镇。然而我的朋友，最好你到农村里住上几十月。那时你就知道农村之急速地“现代化”，竟出乎你的意料。譬如从前乡下人的劳力还可以在就地零碎出卖：大地主收了几百石的租米，需要很多短工来打白，现在则机器碾米厂到处有的是，工作又快，工钱又便宜，乡下人的劳力就没有人请教。从前戽水用人工，逢到大水年成，乡下人自己收成无望，也还可以出卖劳力给大地主，混他个把月的食粮，现在则“洋水车”把他们排除了。这些还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经营的大农场也在有些地方出现了！从前高利贷者的兼并土地还不过是“蚕食”，现在农村资本主义的手腕则是“鲸吞”了。从前乡下人就怕年成不好，现在则年成好了更恐慌，因为米价有大资本家操纵而一切捐税都须折钱完纳呀！这加速了农村的土地集中，而土地集中就是最显著的农村“现代化”’。

所以，朋友，我再说一句：谁以为中国没有“进步”，不是盲目，就是丧心病狂！

香市

“清明”过后，我们镇上照例有所谓“香市”，首尾大约半个月。

赶“香市”的群众，主要是农民。“香市”的地点，在社庙。从前农村还是“桃源”的时候，这“香市”就是农村的“狂欢节”。因为从“清明”到“谷雨”这二十天内，风暖日丽，正是“行乐”的时令，并且又是“蚕忙”的前夜，所以到“香市”来的农民一半是祈神赐福（蚕花什四分），一半也是预酬蚕节的辛苦劳作。所谓“借佛游春”是也。

于是“香市”中主要的节目无非是“吃”和“玩”。临时的茶棚，戏法场，弄缸弄髻，走绳索，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线戏，髦儿戏，西洋镜，——将社庙前五六十亩地的大广场挤得满满的。庙里的主人公是百草梨膏糖，花纸，各式各样泥的纸的金属的玩具，灿如繁星的“烛山”，熏得眼睛流泪的檀香烟，木拜垫上成排的磕头者。庙里庙外，人声和锣鼓声，还有孩子们手里的小喇叭、哨子的声音，混合成一片骚音，三里路外也听得见。

我幼时所见的“香市”，就是这样热闹的。在这“香市”中，我不但赏鉴了所谓“国技”，我还认识了老虎，豹，猴子，穿山甲。所以“香市”也是儿童们的狂欢节。

“革命”以后，据说为的要“破除迷信”，接连有两年不准举行“香市”。社庙的左屋被“公安分局”借去做了衙门，而庙前广场的一角也筑了篱笆，据说将造公园。社庙的左偏殿上又有什么“蚕种改良所”的招牌。

然而从去年起，这“迷信”的香市忽又准许举行了。于是我又得机会重温儿时的旧梦，我很高兴地同三位堂妹子（她们运气不好，出世以来没有见过像样的热闹的香市），赶那香市去。

天气虽然很好，“市面”却很不好。社庙前虽然比平日多了许多人，但那空气似乎很阴惨。居然有锣鼓的声音。可是那声音单调。庙前的乌尤潭一泓清水依然如昔，可是潭后那座戏台却坍塌了，屋椽子像瘦人的肋骨似的暴露在“光风化日”之下。一切都不像我儿时所见的香市了！

那么姑且到惟一的锣鼓响的地方去看一看罢。我以为这锣鼓响的是什么变把戏的，一定也是瘪三式的玩意了。然而出乎意料，这是“南洋武术班”，上海的《良友画报》六十二期揭载的“卧钉床”的大力士就是其中的一员。那不是无名的“江湖班”。然而他们只售票价十六枚铜元。

看客却也很少，不满二百（我进去的时候，大概只有五六十）。武术班的人们好像有点失望，但仍认真地表演了预告中的五六套：马戏，穿剑门，穿火门，走铅丝，大力士……他们说：“今天第一回，人少，可是把式不敢马虎，——”他们三条船上男女老小总共有到三十个！

在我看来，这所谓“南洋武术班”的几套把式比起从前“香市”里的打拳头卖膏药的玩意来，委实是好看得多了。要是放在十多年前，怕不是挤得满场没个空隙儿么？但是今天第一天也只得二百来看客。往常“香市”的主角——农民，今天差不多看不见。

后来我知道，镇上的小商人是重兴这“香市”的主动者；他们想借此吸引游客“振兴”市面，他们打算从农民的干瘪的袋里榨出几文来。可是他们这计划失败了！

乡村杂景

人到了乡下便像压紧的弹簧骤然放松了似的。

从矮小的窗洞望出去，天是好像大了许多，松喷喷的白云在深蓝色的天幕上轻轻飘着；大地伸展着无边的“夏绿”，好像更加平坦；远处有一簇树，矮矮地蹲在绿野中，却并不显得孤独；反射着太阳光的小河，靠着那些树旁边弯弯地去了。有一座小石桥，桥下泊着一条“赤膊船”。

在乡下，人就觉得“大自然”停老朋友似的嘻开着笑嘴老在你门外徘徊——不，老实是“排闼直入”，蹲在你案头了。

住在都市的时候到公园里去走走，你也可以看见蓝天，白云，绿树，你也会暂时觉得这天，这云、这树，比起三层楼窗洞里所见的天的一角，云的一抹，树的尖顶确实是更近于“自然”；那时候，你也会暂时感到“大自然”张开了两臂在拥抱你了。但不知怎地，总也时时会感得这都市公园内所见的“大自然”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好像是“人工的”，——比方说，就像《红楼梦》大观园里“稻香村”的田园风光是“人工的”一般。

生长在农村，但在都市里长大，并且在都市里饱尝了“人间味”，我自信我染着若干都市人的气质；我每每感到都市人的气质是一个弱点，总想摆脱，却怎地也摆脱不下；然而到了乡村住下，静思默念，我又觉得自己的血液里原来还保留着乡村的“泥土气息”。

可以说有点爱乡村罢？

不错，有一点。并不是把乡村当作不动下变的“世外桃源”所以我爱。也不是因为都市“丑恶”。都市美和机械美我都赞美的。我爱的，是乡村的浓郁的“泥土气息”。不像都市那样歇斯底列，神经衰弱，乡村是沉着的，执拗的，起步虽慢可是坚定的，——而这，我称之为“泥土气息”。

让我们再回到农村的风景罢——

这里，绿油油的田野中间又有发亮的铁轨，从东方天边来，笔直的向西去，远得很，远得很；就好像是巨灵神在绿野里划的一条墨线。每天早晚两次，机关车拖着一长列的车厢，像爬虫似的在这里走过。说像爬虫，可一点也不过分冤枉了这家伙。你在大都市车站的月台上，听得“嗒”——的一声歇斯底列的口笛，立刻满月台的人像鬼迷了似的乱推乱撞，而于是，在隆隆的震响中，“这家伙”喘着大气冲来了，那时你觉得它快得很，又莽撞得很，可不是？然而在辽阔的田野中，凭着短窗远远地看去，它就像爬虫，怪妩媚的爬着，爬着，直到天边看不见，混失在绿野中。

晚间，这家伙按着钟点经过时，在夏夜的薄光下，就像是一条身上有磷光的黑虫，爬得更慢了，你会代替它心焦。

还有那天空的“铁鸟”，一天也有一次飞过。像一个尖嘴姑娘似的，还没见她的身影儿就听得她那吵闹的骚音，飞的不很高，翅膀和尾巴看去都很分明。它来的时候总在上午，乡下人的平屋顶刚刚袅起了白色的炊烟。戴着大箬笠穿了铁甲似的“蒲包衣”，在田里工作的乡下人偶然也翘头望一会儿，一点表情都没有。他们当然不会须受那“铁鸟”的好处，而且他们现在也还没吃过这“铁鸟”的亏。他们对于它淡漠得很，正像他们对于那“爬虫”。

他们憎恨的，倒是那小河里的实在可怜相的小火轮。这应该说是一“伙”

了，因为有烧煤的小火轮，也有柴油轮，——乡下人叫做“洋油轮船”，每天经过这小河，相隔二三小时就听得那小石桥边有吱吱的汽管叫声。这小火轮的一家门，放在大都市的码头上，准也看它们不起。可是在乡下，它们就是恶霸。它们轧轧地经过那条小河的时候总要卷起两道浪头，泼刺刺地冲打那两岸的泥土。这所谓“浪头”，自然么小可怜，不过半尺许高而已，可是它们一天几次冲打那泥岸，已经够使岸那边的稻田感受威胁。大水的年头儿，河水快与岸平，小火轮一过，河水就会灌进田里。就在这一点，乡下人和小火轮及其堂兄弟柴油轮成了对头。

小石桥迤西的河道更加窄些，轮船到石桥口就要叫一声，仿佛官府喝道似的。而且你站在那石桥上就会看见小轮屁股后那两道白浪泛到齐岸半寸。要是那小轮是烧煤的，那它沿路还要撒下许多黑屎，把河床一点一点填高淤塞，逢到大水大旱年成就要了这一带的乡下人的命。乡下人憎恨小火轮不是盲目的没有理由的。

沿着铁轨来的“爬虫”怎样像蚊子的尖针似的嘴巴吮吸了农村的血，乡下人是理解不到的；天空的“铁鸟”目前和乡村是无害亦无利；剩下来，只有小火轮一家门直接害了乡下人，就好比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他们也知道对付那水里的“土劣”的方法是开浚河道，但开河要抽捐，纳捐是老百姓的本分，河的开不开却是官府的事。

刚才我不是说小石桥西首的河身特别窄么？在内地，往往隔开一个山头或是一条河就另是一个世界。这里的河身那么一窄，情形也就不同了。那边出产“土强盗”。这也是非常可怜相的“土强盗”，没有枪，只有锄头和菜刀。可是他们却有一个“军师”。这“军师”又不是活人，而是一尊小小的泥菩萨。

这些“土强盗”不过十来人一帮。他们每逢要“开市”，大家就围住了这位泥菩萨军师磕头膜拜，嘴里念着他们的“经”，有时还敲“法器”，跟和尚的“法器”一样。末了，“土强盗”伙里的一位，——他是那泥菩萨军师的“代言人”，——就宣言“今晚上到东南方有利”，于是大家就到东南方。“代言人”负了那泥菩萨到一家乡下人的门前，说“是了”，他的同伴们就动手。这份被光顾的人家照例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也不会有， “土强盗”自然也知道；他们的目的是绑票。住在都市里的人一听说“绑票”就会想到那是一辆汽车，车里跳下四五人，都有手枪，疾风似的攫住了目的物就闪电似的走了。可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乡下“土”绑票却完全不同。他们从容得很。他们还有“仪式”。他们一进了“泥菩萨军师”所指定的人家，那位负着泥菩萨的“代言人”就站在门角里，脸对着墙，立刻把菩萨解下来供在墙角，一面念佛，一面拜，不敢有半分钟的停顿。直到同伴们已经绑得了人，然后他再把泥菩萨负在背上，仍然一路念佛跟着回去。

第二天，假使被绑的人家筹得了两块钱，就可以把肉票赎回。

据说这一宗派的“土”绑匪发源于温台，可是现在似乎别处也有了。而他们也有他们的“哲学”。他们说，偷一条牛还不如绑一个人便当。牛使牛性的时候，怎地鞭打也不肯走，人却不会那么顽强抵抗。

真是多么可怜相，然而妩媚的绑匪呵？

作者原注：此处所谓“温台”，指浙江省旧温州府和台州府的辖区。

冬天

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颇不同罢。一般的说来，则为“游春”，“消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了，总之，诗人们对于“冬”好像不大怀好感，于“秋”则已“悲”了。更何况“秋”后的“冬”！

所以诗人在冬夜，只台围炉话旧，这就有点近于“蛰伏”了。幸而冬天有雪，给诗人们添了诗料。甚而至于踏雪寻梅，此时的诗人俨然又是活动家。不过梅花开放的时候，其实“冬”已过完，早又是“春”了。

我不是诗人，对于一年四季无所偏憎。但寒暑数十易而后。我也渐渐辨出了四季的味道。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

因为冬天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给我三种不同的印象。

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弄得我动作迟笨，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谢“冬”了。

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从没见过整片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细曲得像狗毛一样的草皮，枯黄了时更加难看，不用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可以放起火来烧的。在乡下，可不同了。照例到了冬天。野外全是灰黄色的枯草，又高又密，脚踏下去簌簌地响，有时没到你的腿弯上。是这样的草——大草地，就可以放火烧。我们都脱了长衣，划一根火柴，那满地的枯草就毕剥毕剥烧起来了。狂风着地卷去，那些草就像发狂似的腾腾地叫着，夹着白烟一片红火焰就像一个大舌头似的会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舐光。有时我们站在上风头，那就跟着火头跑；有时故意站在下风，看着那烈焰像潮水样涌过来，涌过来，于是我们大声笑着嚷着在火焰中间跳，一转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于是我们就又追上去送它。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屠的棺木或者骨殖鬣，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我们就来一个“包抄”，扑到火线里一阵滚，收熄了我们放的火。这时候我们便感到了克服敌人那样的快乐。

二十以后成了“都市人”，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这时我对于冬，理应无憎亦无爱了罢，可是冬天却开始给我一点好印象。二十几岁的我是只要睡眠四个钟头就够了的，我照例五点钟一定醒了；这时候。被窝是暖烘烘的，人是神清气爽的，而又大家都在黑甜乡，静得很，没有声音来打扰我，这时候，躲在那里让思想像野马一般飞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够了时，顶天亮起身，我仿佛已经背着人，不声不响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也感得一种愉快。那时候，我把“冬”和春夏秋比较起来，觉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她不像春天那样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样使得我上床的时候弄堂里还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在我起身以前却又是满弄堂的洗马桶的声音，直没有片刻的安静，而也不同于秋天。秋天是苍蝇蚊虫的世界，而也是疟病光顾我的季节呵！

然而对于“冬”有恶感，则始于最近。拥着热被窝让思想跑野马那样的事，已经不高兴再做了，而又没有草地给我主“放野火”。何况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

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

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的统治这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命运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

“春”要来的时候，一定先有“冬”。冷罢，更加冷罢，你这吓人的冬！

上海大年夜

在上海混了十多年，总没见识过阴历大年夜的上海风光。什么缘故，我自己也想不起来了；大概不外乎“天下雨”，“人懒”。“事忙”：这三桩。

去年，——民国二十二年，岁在癸酉，公历一千九百三十三年，恰逢到我“有闲”而又“天好”，而又是小病了一星期后想走动，于是在“大年夜”的前三天就时常说“今年一定要出去看看了。”

天气是上好的。自从十八日（当然是废历）夜里落过几点雨，一直就晴了下来。是所谓“废历”的十八日，我担保不会弄错。因为就在这一天，我到亲戚家里去“吃年夜饭”。这天很暖和，我料不到亲戚家里还开着“水汀”，毫无准备的就去了，结果是脱下皮袍尚且满头大汗。当时有一位乡亲对我说：“天气太暖和了，冬行春令，——春令！总得下一场腊雪才好！”

似乎天从人愿，第二天当真冷了些。可是这以后，每天一个好太阳把这“上海市”晒得一天暖似一天；到废历的“大年夜”的“前夕”，简直是“上坟时节”的气候了。

而这几天里，公债库券的市价也在天天涨上去，正和寒暑表的水银柱一般。

“大年夜”那天的上午，听得生意场中一个朋友说：“南京路的商店，至少有四五十家过不了年关，单是房租，就欠了半年多，房东方面要求巡捕房发封，还没解决。”

“这就是报纸上常见的所谓‘市面衰落’那一句的实例么？”我心里这样想。然而翻开“停刊期内”各报的“号外”来看，只有满幅的电影院大广告搜尽了所有的夸大，刺激，诱惑的字眼在那里斗法。

从前见过店铺倒闭的景象也在我眼前闪了一闪。肩挨着肩的商店的行列中忽然有一家紧闭着栅门，就像那多眼的大街上瞎了一只眼；小红纸写着八个字的，是“清理账目，暂停营业”；密密麻麻横七竖八贴满了的，是客户的“飞票”；而最最触目的是地方官厅的封条，——一个很大的横十字。

难道繁华的南京路上就将出现四五十只这么怪相的瞎眼？于是我更加觉得应该去看看“大年夜”的上海。

晚上九点钟，我们一行五个人出发了。天气可真是“理想的”。虽然天快黑的时候落过几点牛毛雨，此时可就连风也没有，不怕冷的人简直可以穿夹。

刚刚走出弄堂门，三四辆人力车就包围了来，每个车夫都像老主顾似的把车杠一放，拍了拍车上坐垫，乱嚷着“这里来呀！”我们倒犹豫起来了。我们本来不打算坐人力车。可是人力车的后备队又早闻声来了，又是三四辆飞到了我们跟前。而且似乎每一个暗角里都有人力车埋伏着，都在急急出动了。人力车的圆阵老老实实将我们一行五个包围了！

“先坐了黄包车，穿过××街，到××路口再坐电车，怎样？”

我向同伴们提议了。

“××路口么？一只八开！”车夫之一说。

“两百钱！”我们一面说，一面准备“突围”。

“一只八开！年三十，马马虎虎罢。”

这是所谓“情商”的口吻了。而且双方的距离不过三四个铜子。于是在双方的“马马虎虎”的声音中，坐的坐上，拉的也就开步。

拉我的那个车夫例外地不是江北口音。他一面跑，一面说道：

“年景不好……往年的大年夜，你要雇车也雇不到。……哪里会像今年那样转弯角上总有几部空车子等生意呢。”

说着就到了个转角，我留神细看，果然有几辆空车子，车夫们都伸长了“觅食”的颈脖。

“往年年底一天做多少生意？”我大声问了。其实我很不必大声。因为这条××街的进口冷清清的并没为的是“大年夜”而特别热闹。

“哦——打仗的上一年么？随便拉拉，也有个块把钱进账……”

“那么，今年呢？”

“运气好，还有块把钱；不好，五六毛。……五六毛钱，派什么用场？……你看，年底了，洋价倒涨到二千八百呀！”

“哦——”我应了这么一声，眼看着路旁的一家烟兑店，心里却想起邻舍的×太太来了。这位太太万事都精明，一个月前，洋价二千七的时候，她就兑进了大批的铜子，因为经验告诉她，每逢年底，洋价一定要缩：可是今年她这小小的“投机事业”失败了，今天早上我还听得她在那里骂烟兑店“混账”。

“年景不好！”拉我的车夫又叹气似的说：“一天拉五六毛，净剩下来一双空手，过年东西只好一点也不买。……不像是过年了！”

××路已经在前面了。我们一行五人的当先第一辆车子已经停下来了。我付钱的时候，留神看了看拉我的那车夫一眼。他是二十多岁精壮的小伙子，并不是那些拉不动的“老枪”，然而他在这年底一天也只拉得五六毛钱么？

站在××路口，我又回望那短短的××街。一家剃头店似乎生意还好。我立刻想到我已经有二十多天没曾理发。可是我的眼光随即被剃头店隔壁的南货店吸住了。天哪，“大年夜”南货店不出生意，真怪！然而也不足怪。像这样小小的南货店，自然只能伺候中下级社会的主顾，可是刚才拉我的车夫不是说“过年东两只好一点也不买”么？

“总而言之，××街里没有大年夜。”

坐在电车里，我这样想。同时我又盼望“大年夜”是在南京路、福州路一带。

十字路口，电车停住了。交通灯的红光射在我们脸上。这里不是站头，然而电车例外的停得很长久。

“一部汽车，两部汽车，……电车，三部汽车，四部，五部。……”

我身边的两个孩子，脸贴在车窗玻璃上，这样数着横在前面的马路上经过的车辆。

我也转脸望着窗外，然而交通灯光转了绿色，我们坐的电车动了。哦！哦！从我们的电车身边有一辆汽车“突进”了，接着又是一辆，接着是一串，威风凛凛地追逐前进，我们的电车落后了。我凝眸远眺。前面半空中是三公司大厦高塔上的霓虹电光，是戳破了黑暗天空的三个尖角，而那长蛇形的汽车阵，正向那尖角里钻。然而这样的景象只保留了一刹那。三公司大厦渐曳渐近了。血管一样的霓虹电管把那庞大建筑的轮廓描画出来

“你数清么？几部？”

孩子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这不是问我，然而我转眼看着这两个争论中的孩子了。忽然有一条原则被我发现了：今夜所见坐车的人好像只有两个阶级，不是挤在电车或公共汽车里，就是舒舒服服坐了黑牌或白牌的汽车，

很少人力车！也许不独今夜如此罢？在“车”字门中，这个中间的小布尔乔亚气味的人力车的命运大概是向着没落的罢？

我们在南京路浙江路口下了电车。

于是在“水门汀”上，红色的自来水龙头旁边，我们开了小小的会议。

“到哪里去好？四马路怎样？”

这是两位太太的提议。她们要到四马路的目的是看野鸡；因为好像听得一位老上海说过，“大年夜”里，妓女们都装扮了陈列在马路口。至于四马路之必有野鸡，而且其数很多，却是太太们从小在乡下听熟了的。

可是两个孩子却坚持要去看电影。

这当儿，我的一票可以决定局势。我主张先看电影后看野鸡。因为电影院“大年夜”最后一次的开映是十一点钟。看过了电影大概四马路之类还有野鸡。

于是我们就走贵州路，打算到新光大戏院去。

我不能不说所谓“大年夜”者也许就在这条短短的狭狭的贵州路上；而且以后觉得确是在这里。人是拥挤的，有戴了鸭舌头帽子的男人，更有许多穿着绀色的廉价人造丝织品的年青女子；也有汽车开过，慢慢地爬似的，啾啾地好像哀求。两个孩子拖着我快跑，（恐怕赶不上影戏，）可是两位太太只在后边叫“慢走”。原来她们发见了这条路上走的或是站着的浓妆年青女子就是野鸡。

也许是的。因为鸭舌头帽子的男人掷了许多的“攒炮”，拍拍地都在那些浓妆的青年女子的脚边响出来，而她们并不生气。不但不生气，还是欢迎的。“愈响愈发”：是她们的迷信。

我们终于到了新光大戏院的门口。上一场还没散，戏院门里门外挤满了人。

而且这些人大部手里有票子。

两位太太站在马路旁边望着那戏院门口皱眉头。就是那勇敢的男孩子，（他在学校里“打强盗山”是出名勇敢的，）也把疑问的眼光看着我的面孔。

“就近还有几家影戏院，也许不很挤。”

我这样说着，征求伙伴们的同意。

但是假使片子不好呢？大些的孩子，一个很像大人的女孩子，眼光里有了这样的迟疑。“不管它！反正我们是来趁热闹的。借电影院坐坐，混到一点多钟，好到泥城桥一带去看兜喜神方的时髦女人。”

又是我的意见。然而两个孩子大大反对。不过这一回，他们是少数了，而且他们又怕多延捱了时间，“两头勿着实”，于是只好跟着我走。

到了北京大戏院。照样密密的人层。而且似乎比新光大戏院的现象更加汹汹然可畏。转到那新开幕的金城。隔着马路一望，我们中间那位男孩子先叫起“好了”来了。走到戏院门口，我们都忍不住一股的高兴。这戏院还是“平时状态”。但是，一问，可糟了！原来这金城大戏院没有“大年夜”的，夜戏就只九点半那一场，此时已经闭幕。

看表上是十一点差十分。

“到哪里去好呢？”——大家脸上又是这个问号了。也许新光今夜最后一场是十一点半开映罢？那么，还赶得及。新光近！

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定要看影戏。孩子们是当真要看的，而我们三个大人呢，还是想借此混过一两个钟点，预备看看“大年夜”的上海后半夜的

风光而已。

然而又到了新光了。十一点正，前场还没散，门里门外依然挤满了人，也许多了些。这次我们是奋勇进攻了。五个人是一个长蛇阵。好容易挤了进去，望得见卖票处了，忽然又有些绅士太太们却往外边挤；一面喊道：“票子卖完了。卖完了！”我疑心这是骗人的。为什么戏院当局不挂“客满”的牌子？我不能再“绅士气”了。我挤开了几位拦路的时髦女郎，直到卖票处前面，我们的长蛇阵也中断了。卖票员只对我摇手。

好容易又挤了出来，到得马路上时，我忍不住叹口气说：

“虽然‘大年夜’不在××街的小小南货店里，可确是在每家影戏院里！”

以后我们的行程是四马路了。意外地不是“大年夜”样的，也没看见多少艳妆的野鸡之类。“攒炮”声音更少。

两个孩子是非常扫兴了。于是“打吗啡针”：每人三个汽球。

我们最后的希望是看看南京路上有没有封皮的怪相“瞎眼睛”。

然而也没有。

十二点光景挤进了南京路的虹庙。这是我的主张。可是逛过了浴佛节的静安寺的两个孩子大大不满意。“没有静安寺那样大”，是他们的批评。他们怎么会知道我是出来找“大年夜”的，而“大年夜”确也是在这座庙里！

后来我知道过不了年关的商店有五百多家。债权人请法院去封门。要是一封，那未免有碍“大上海”的观瞻，所以法院倒做了和事老。然而调解也等不及，干脆关上大门贴出“清理账目”的铺子也就有二百几十家了。南京路上有一家六十多年的老店也是其中之一。

“你猜猜。南京路的铺子有几家是赚钱的？——哈哈，说是只有两家半！那两家是三阳南货店和五芳斋糕团点心店。那半家呢，听说是冠生园。”

回家的路上碰见一位乡亲，他这样对我说。

乡亲这番话，我怎么能够不相信？并且我敢断定复杂的“大上海”市面无论怎样“不景气”，但有几项生意是不受影响的，例如我们刚去随喜了来的虹庙。并且我又确实知道沪西某大佛寺的大小厅堂乃至“方丈室”早已破施主们排日定完；这半年里头，想在那大佛寺里“做道场”，简直非有大面子不行的！

到家的时候，里内一个广东人家正放鞭炮，那是很长的一串，挑在竹竿上。我们站在里门口看去，只见一条火龙，渐缩渐短。等放过了我们走进去，依旧是冷清清的弄堂，不过满地碎红，堆得有寸许厚。

1934年2月28日。

我曾经穿过怎样的紧鞋子

我在小学校的时候，最喜欢绘画。教我们绘画的先生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国画家。他的专门本领是画“尊容”，我的曾祖的《行乐图》就是他画的，大家都说像得很。他教我们临摹《芥子园画谱》，于是我们都买了一部石印的《芥子园画谱》。他说：“临完了一部《芥子园画谱》，不论是梅兰竹菊，山水，翎鸟、全有了门径。”

他从不自己动手画，他只批改我们的画稿；他认为不对的地方，就赏一红杠，大书“再临一次”。

后来进了中学校，那里的图画教师也是国画家，年纪也有点老了。不过他并不是“尊容专家”。他的教授法就不同了。他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先画了一幅，一面画，一面叫我们跟着临摹；他说：“画画儿最要紧的诀窍是用笔的先后，所以我要当场一笔一笔现画，要你们跟着一笔一笔现临；记好我落笔的先后哪！”有时他特别“卖力”，画好了那幅“示范”的画儿以后，还拣那中间的困难点出来，在黑板的一角另画一幅“放大”，好比影片中的“特写。”

这位先生真是又和气又热心，我到现在还想念他。不用说，他从前大概也曾在《芥子园画谱》之类用过苦功，但他居然不把《芥子园画谱》原封不动掷给我们，却换着花样来教我们，在那时候已经十分难得了。

然而那时候我对于绘画的热心比起小学校时代来，却差得多了。原因大概很多，而最大的原因是忙于看小说。课余时间全部消费在旧小说上头，绘画不过在上课的时候应个景儿罢。国文教师称赞我的文思开展，但又不满意地说：“有点小说调子，应该力戒！”这位国文教师是“孝廉公”，又是我的“父执”，他对于我好像很关切似的，他知道我的看小说是家里大人允许的，他就对我说：“你的老人家这个主张，我就不以为然。看看小说，原也使得，小说中也有好文章，不过总得等到你的文章立定了格局，然后再看小说，就没有流弊了。”过一会儿，他又摸着下巴说：“多读读《庄子》和韩文罢！”

我那时自然很尊重这位老师的意见，但是小学校时代专临《芥子园画谱》那样的滋味又回来了。从前临《芥子园画谱》的时候，开头个把月倒还兴味不差，——先生只叫我临摹某一幅，而我却把那画谱从头到底看了一遍，“欣然若有所得”；后来一部画谱看厌了，先生还是指定了那几幅叫我“再临一次”。又一次，我就感到异常乏味了。而这位老画师的用意却也和那位“孝廉公”

的国文教师一样：要我先立定了格局！《庄子》之类，自然远不及小说来得有趣，但假使当时有人指定了某小说要我读，而且一定要读到我“立定了格局”，我想我对于小说也要厌恶了罢？再者，多看了小说，就不知不觉间会沾上“小说调子”，但假使指定了要我去临摹某一部小说的“调子”，恐怕看小说也将成为苦事了罢？

不过从前的老先生就要人穿这样的“紧鞋子”。幸而不久就来了“辛亥革命”，老先生们喟然于“世变”之巨，也就一切都“看穿”些，于是我也不再逢到好意的指导叫我穿那种“紧鞋子”了。说起来，这也未始不是“革命”之赐。

雷雨前

清早起来，就走到那座小石桥上。摸一摸桥石，竟像还带点热。昨天整天里没有一丝儿风。晚快边响了一阵子干雷，也没有风，这一夜就闷得比白天还厉害。天快亮的时候，这桥上还有两三个人躺着，也许就是他们把这些石头又困得热烘烘。

满天里张着个灰色的幔。看不见太阳。然而太阳的威力好像透过那灰色的幔，直逼着你头顶。

河里连一滴水也没有了，河中心的泥土也裂成乌龟壳似的。田里呢，早就像开了无数的小沟，——有两尺多阔的，你能说不像沟么？那些苍白色的泥土，干硬得就跟水门汀差不多。好像它们过了一夜工夫还不曾把白天吸下去的热气吐完，这时它们那些扁长的嘴巴里似乎有白烟一样的东西往上冒。

站在桥上的人就同浑身的毛孔全都闭住，心口泛淘淘，像要呕出什么来。

这一天上午，天空老张着那灰色的幔，没有一点点漏洞，也没有动一动。也许幔外边有的是风，但我们罩在这幔里的，把鸡毛从桥头抛下去，也没见它飘飘扬扬踱方步。就跟住在抽出了空气的大筒里似的，人张开两臂用力行一次深呼吸，可是吸进来只是热辣辣的一股闷气。

汗呢，只管钻出来，钻出来，可是胶水一样，胶得你浑身不爽快，像结了一层壳。

午后三点钟光景，人像快要干死的鱼，张开了一张嘴，忽然天空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条缝！不折不扣一条缝！像明晃晃的刀口在这幔上划过。然而划过了，幔又台拢，跟没有划过的时候一样，透不进一丝儿风。一会儿，长空一闪，又是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次缝。然而中什么用？

像有一只巨人的手拿着明晃晃的大刀在外边想挑破那灰色的幔，像是这巨人已在咆哮发怒越来越紧了，一闪一闪满天空瞥过那大刀的光亮，隆隆隆，幔外边来了巨人的愤怒的吼声！

猛地地闪光和吼声都没有了，还是一张密不通风的灰色的幔！

空气比以前加倍闷！那幔比以前加倍厚！天加倍黑！

你会猜想这时那幔外边的巨人在揩着汗，歇一口气；你断得定他还要进攻。你焦躁地等着，等着那挑破灰色幔的大刀的一闪电光，那隆隆隆的怒吼声。

可是你等着，等着，却等来了苍蝇。它们从龌龊的地方飞出来，嗡嗡嗡的，绕住你，钉你的涂一层胶似的皮肤。戴红顶子像个大员模样的金苍蝇刚从粪坑里吃饱了来，专拣你的鼻子尖上蹲。

也等来了蚊子。哼哼哼地，像老和尚念经，或者老秀才读古文。苍蝇给你传染病，蚊子却老实要喝你的血呢！

你跳起来拿着蒲扇乱扑，可是赶走了这一边的，那一边又是一大群乘隙进攻。你大声叫喊，它们只回答你个哼哼哼，嗡嗡嗡！

外边树梢头的蝉儿却在那里唱高调：“要死哟！要死哟！”

你汗也流尽了，嘴里干得像烧，你手里也软了，你会觉得世界末日也不会比这再坏！

然而猛可地电光一闪，照得屋角里都雪亮。幔外边的巨人一下子把那灰色的幔扯得粉碎了！轰隆隆，轰隆隆，他胜利地叫着。胡——胡——挡在幔外边整整两天的风开足了超高速度扑来了！蝉儿噤声，苍蝇逃走，蚊子躲起来，人身上像剥落了一层壳那么一爽。

霍！霍！霍！巨人的刀光在长空飞舞。

轰隆隆，轰隆隆，再急些！再响些吧！

让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

人造丝

那一年的秋天，我到乡下去养病。在“内河小火轮”中，忽然有人隔着个江北小贩的五香豆的提篮跟我拉手；这手的中指套着一个很大的金戒指，刻有两个西文字母：HB。

“哈，哈，不认识么？”

我的眼光从戒指移到那人的脸上时，那人就笑着说。

一边说，一边他就把江北小贩的五香豆提篮推开些，咯吱一响，就坐在我身旁边的另一只旧藤椅里。他这小胖子，少说也有二百磅呢！

“记得不记得？××小学里的干瘪风菱？……”

他又大声说，说完又笑，脸上的肥肉也笑得一跳一跳的。

哦，哦，我记起来了，可是怎么怨得我不认识呢？从前的“干瘪风菱”现在变成了“浸胖油炸桧！”——这是从前我们小学校里另一个同学的绰号。当时他们是一对，提起了这一位、总要带到那一位的。

然而我依然想不起这位老朋友的姓名了。这也不要紧，总之，我们是二十年前的老同学，打架打惯了的。二十多年没见面呢！我们的话是三日三夜也讲不完的。可是这位老朋友似乎很晓得我的情形，说不了几句话，他就装出福尔摩斯的神气来，突然问道：

“回乡下去养病，是不是？打算往多少天呢？”

我一怔。难道我的病甚至于看得出来么？天天见面的朋友倒说我不像是有病的呢！老朋友瞧着我那呆怔怔的神气，却得意极了，双手一拍，笑了又笑，翘起大拇指，点着自己的鼻子说道：

“你看！我到外国那几年，到底学了点东西回来！我会侦探了！”

“嗯嗯——可是你刚才说，要办养蜂场罢，你为什么不挂牌子做个东方福尔摩斯？”我也笑了起来。

不料老朋友把眉毛一皱，望着我，用鼻音回答道：

“不行！福尔摩斯的本事现在也不行！现在一张支票就抵得过十个福尔摩斯！”

“然而我还是佩服你！”

“呵呵，那就很好。不过我的本事还是养蜂养鸡。说到我这一点侦探手段，见笑得很，一杯咖啡换来的。昨天我碰到了你的表兄，随便谈谈，知道你也是今天回乡下去，去养病。要不然，我怎么能够一上船就认识你？哈哈，——这一点小秘密就值一杯咖啡。”

我回想一想。也笑了。

往后，我们又渐渐谈到蜂呀鸡呀的上头，老朋友伸手在脸上一抹，很正经的样子，扳着手指头说道：

“喂，喂，我数给你听。我出去第一年学医。这是依照我老人家的意思。学了半年，我就知道我这毛躁脾气，跟医不对。看见报上说，上海一地的西医就有干多，我一想更不得劲儿；等到我学成了时，恐怕就有两千多了，要我跟两千多人抢饭吃，我是一定会失败的。我就改学缫丝。这也是很自然的一回事。你知道我老人家有点丝厂股子。可是糟糕！我还没有学好，老人家丝厂关门，欠了一屁股的债，还写了封哀的美敦书给我，着我赶快回国找个事做。喂，朋友，这不是把我急死么？于是我一面就跟老人家信来信去开谈判，一面赶快换行业。那时只要快，不拘什么学一点回来，算是我没有白跑

一趟欧洲。这一换，就换到了养蜂养鸡。三个月前我回来了，一看，才知道我不应该不学医！”

老朋友说到这里，就鼓起了腮巴，一股劲儿看着我，好像要等我证明他的“不该不学医”。等了一会儿，我总不作声，总也是学他的样子看着他，他就吐一口气，自己来说明道：

“为什么呀？中国是病夫之国咯！我的半年的同学里，有几位已经挂了牌子，生意蛮好。可是我跟他们同学的半年里，课堂上难得看见他们的尊容！”

“哎，哎，事情就是难以预料。不过你打算办一个蜂场什么的，光景不会不成功罢？”我只好这么安慰他。

“难说，难说！……我把我的计划跟几位世交谈过，他们都不置可否。事后听得他们对旁人说：养养蜜蜂，也要到外国去学么？唉，朋友！”

这位老朋友第一次叹口气，歪着头，不出声了，大拇指拨动他中指上的挺大的金戒指，旋了一转，又旋一转。

这当儿，两位穿得红红绿绿的时髦女人从我们前面走过去，一会儿又走回来，背朝着我们，站在那里唧唧啾啾说话。

我的老朋友一面仍在旋弄他那戒指，一面很注意地打量那两位背面的“美人”。他忽然小声儿自言自语的说：

“我顶后悔的，是我学过将近三年的缫丝。”

他转过脸来看了我一眼，似乎问我懂不懂他这句话的意思。我自己以为懂得，点一下头；然而老朋友却看透了我的心思似的赶快摇着头自己补充道：

“并不是后悔我白花了三年心血。不是这个！是后悔我多了那么一点知识，就给我十倍百倍的痛苦！”

“哦？——”我真弄糊涂了。

“喏喏，”老朋友苦笑一下，“我会分辨蚕丝跟人造丝了。哪怕是蚕丝夹人造丝的什么绸，什么绉，我看了一眼，至多是上手来捏一把，就知道那里头搀的人造丝有多少。哼，我回来三个月，每天看见女人们身上花花绿绿时髦的衣料、每次看见，我就想到了——”

“就想到了你老人家的丝厂关门了？”我忍不住凑了一句，却不料老朋友大不以为然，摇着手急口说下去道：

“不，不，——我是想到了人造丝怎样制的，我觉得那些香喷喷的女人身上只是一股火药气！”

“什么？你说是火药气！”我也吃惊的大声说。

我们的话语一定被前面的那两位女人听得清清楚楚了，她们不约而同，转过半张脸来，朝我们白了一眼，就手拉手的走开了我们这边。这在我的老朋友看来，好像是绝大的侮辱；他咬紧了牙齿似的念了一个外国字，然后把嘴巴冲着我的耳朵叫道：

“不错，是火药气！制人造丝的第一步手续跟制无烟火药是一样的！原料也是一样的！”

这小胖子的嗓子本来就粗，这会儿他又冲着我的耳朵，我只觉得耳朵里轰轰轰的，“人造丝，……无烟火药……一样！”轰轰轰还没有完，我又听得这老朋友似乎又加了一句道：“打仗的时候，人造丝厂就改成了火药局哩！”

到这时，我也明白为什么这位老朋友说是“痛苦”了。他学得的知识只使他知道中国人人身上有人造丝，而且人造丝还有火药气，无怪他反复说：

“顶后悔的，是我学过将近三年的缫丝！”

现在又是许久不见这位老朋友了，也不知道他又跑到了哪里去；不过我每逢看见人造丝织品的时候，总想到他，而且也嗅到了他所说的“火药气”！而且，最重要的，这些人造丝都是进口货——东洋货！

戽水

就说是 A 村罢。这是个二三十人家的小村。南方江浙的“天堂”区域照例很少（简直可以说没有）百来份人家以上的大村。可是 A 村的人出门半里远，——这就是说，绕过一条小“浜”，或者穿过五六亩大的一片田，或是经过一两个坟地，他就到了另一个同样的小村。假如你同意的话，我们就叫它 B 村。假如 B 村的地位在 A 村东边，那么西边，南边，北边，还有 C 村，D 村，E 村等等，都是十来分钟就可以走到的，用一句文言，就是“鸡犬之声相闻”。

可是我们现在到这一群小村里，却听不到鸡犬之声。狗这种东西，喜欢吃点儿荤腥；最不摆架子的狗也得吃白饭拌肉骨头。枯叶或是青草之类，狗们是不屑一嗅的。两年多前，这一带村庄里的狗早就挨不过那种清苦生活，另找主人去了。这也是它们聪明见机。要不，饿肚子的村里人会杀了它们来当一顿的。

至于鸡呢，有的；春末夏初，稻场上啾啾的乱跑，全不过拳头大小，浑身还是绒毛，可是已经会用爪子爬泥，找出小虫儿来充饥。然而等不到它们“喔喔”啼的时候，村里人就带它们上镇里去换钱来买米。人可不像鸡，靠泥里的小虫子是活不了的。所以近年来这一带的村庄里，永远只见啾啾的小鸡，没有邻村听得到的喔喔高啼的大鸡。

这一带村庄，现在到处是水车的声音。

A 村和 B 村中间隔着一条小河。从“端阳”那时候起，小河的两岸就排满了水车，远望去活像一条蜈蚣。这长长的水车的行列，不分昼夜，在那里咕噜咕噜地叫。而这叫声，又可以分做三个不同的时期：

最初那五六天，水车就像精壮的小伙子似的，它那“杭育，杭育”的喊声里带点儿轻松的笑意。水车的尾巴浸着浅绿色的河水，辘辘地从上滚下去的叶子板格格地憨笑似的一边跟小河亲一下嘴，一边就喝了满满的一口，即刻又辘辘地滚上去，高兴得嘻嘻哈哈地把水吐了出来，马上又辘辘地再滚了下去。小河也温柔地微笑，河面漾满了一圈一圈的笑涡。

然而小河也渐渐瘦了。水车的尾巴接长了一节，它也不像个精壮的小伙子，却像个瘦长的痨病鬼了。叶子板很费力似的喀喀地滚响、滚到这瘦的小河里，抢夺了半口水，有时半口还不到，再喀喀地挣扎着上来，没有到顶，（这里是水车的嘴巴），太阳已经把带泥的板边晒成灰白色了。小河也是满脸土色，再也笑不出来，却吐着叹息的泡沫。

这样过了两天，水车的尾巴就不得不再接长一节。可是，像一个气管支炎的老头子，它咳得那么响，却是干咳。叶子板因为是三节了，滚得更加慢，更加吃力，轧轧的响声也是干燥的，听了叫人牙齿发酸。水车上的人，半点钟换一班。他们汗也流完了，腿也麻木了，用了可惊的坚强的意志，要从这干瘪的小河榨出些浓痰似的泥浆来！轧轧轧，喀喀喀，远远近近的无数水车愤怒地悲哀地喊着。

这样又是一天，小河像逃走了似的从地面上隐去。河心里的泥开始起皱纹，像老年人的脸：水车也都噤口，满身污泥，一排一排，朝着满天星斗的夏天的夜。

稻场上，这时例外地人声杂乱。A 村和 B 村的人在商量一个新的办法。

那条小河的西头、是一个小小的浜，那已是C村的地界。靠着浜边，是C村人的桑地，倘使在这一片桑地上开一道沟出去，就可以把外边塘河里的水引到浜里，再引到小河从浜到塘河，路倒不远，半里的一小半；为难的，这是一片桑地，而且是C村人的。然而要得水，只有这一条路呀！A村和B村的人就决定去跟那片桑地的主人们商量，借这么三四尺阔的地面开一道沟出来；要是坏了桑树；他们两村的人照样赔还。

他们的可惊的坚强的意志终于把这道沟开成了。然而塘河里的水也浅得多了，不用人工，不会流到那新开成的沟。这当儿，农民的可惊的坚强的意志再来一次表现。A村和B村的人下了个总动员！新开沟跟塘河接头那地方立刻挖起一口四五丈见方的蓄水池来，沿那池口，排得紧紧的，是七八架水车，都是三节的尾巴，像有力的长臂膊，伸到河心水深的地点，车上全是拚命的壮丁，发疯似地踏着，叶子板汨汨地狂叫！这是人们对旱天的最后的决战！

蓄水池满了，那灰绿色的浑水渐渐地流进那四尺多阔的沟口，倒好像很急似的；然而进了沟就一点一点慢下来了，终于通过了那不算短的沟，到了浜，再到了那小河的干枯的河床，那水就看不出是在流，倒好像从泥里渗出来似的。小河两岸的水车头，这时早又站好了人，眼望着河心。有几个小孩在河滩上跑来跑去，不时大声报告道：“水满一点了！”“一个手指头那么深了！”忽然一声胡哨，像是预定的号令，水车头那些人都应着发声喊，无数的脚都动了，水车急响着枯枯枯的干燥的叫号。但是水车的最下的一个叶子板刚刚能够舐着水，却不能喝起水来，——小半口也不行。叶子板滚了一转，湿漉漉地，可是戛不起水！

“叫他们外边塘河边的人再用点劲呀！”有人这么喊着。这喊声，一递一递传过去，驿马似的报到塘河上。”用劲呀！”塘河上那七八架水车上的人齐声叫了一下。他们的酸重的腿儿一齐绞出最后的力气，他们脸上的肌肉绷紧到起棱了。蓄水池泼刺刺泼刺刺地翻滚着白色的水花。从他灌进沟口的水哗哗地发叫。然而通过了那沟，到得小河时，那水又是死洋洋没点气势了。小河里的水是在多起来，然而是要用了最精密的仪器才能知道它半点钟内究竟多起了若干。河中心那一泓水始终不能有两个指头那么深！

因为水通过那半里的一小半那条沟的时候，至少有一小半是被沿路的太干燥的泥土截留去了。因为那个干了的小浜也有半亩田那么大，也是燥渴得不肯放水白白过去的呀！

天快黑的时候，小河两岸跟塘水边的水车又一齐停止了。A村和B村的人板着青里泛紫的面孔，瞪出了火红的眼睛，大家对看着，说不出话。C村的人望望自己田里，又望望那塘河，也是一脸的忧愁。他们懂得很明白：虽然他们的田靠近塘河地位好，可是再过几天，塘河的水也戛不上来了，他们跟A村B村的人还不是一样完了么？

于是在明亮的星光下，A村和B村的人再聚在稻场上商量的时候，C村的人也加入了。有一点是大家都明白的：尽管他们三村的人联合一致，可是单靠那简陋的旧式水车，无论如何救不活他们的稻。“算算要多少钱，雇一架洋水车？”终于耐不住，大家都这么说了。大家早已有这一策放在心里，——做梦做到那怪可爱的洋水车，也不止一次了，然而直到此时方才说出来，就因为雇用洋水车得花钱，而且价钱不小。照往年的规矩说，洋水车灌满五

六亩大的一片田要三块到四块的大洋。村里人谁也出不起这大的价钱。但现在是在“火烧眉毛”，只要洋水车肯做账，将来怎样挖肉补疮地去还这笔债，只好暂且不管。

塘河上不时有洋水车经过，要找它不难。趁晚上好亮的星光，就派了人去守候罢。几个精力特别好，铁一样的小伙子，都在稻场上等候消息。他们躺在泥地上，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谈。他们从洋水车谈到镇上的事。正谈着镇上要“打醮求雨”，塘河上守候洋水车的人们回来了。这里躺着的几位不约而同跳了起来问道：“守着了么？什么价钱？”

“他妈妈的！不肯照老规矩了。说是要照钟点算。三块钱一点钟，田里满不满，他们不管。还要一半的现钱！”

“呀，呀，呀，该死的没良心的，趁火打劫来了！”

大家都叫起来。他们自然懂得洋水车上的人为什么要照钟点算。在这大旱天把塘河里的水老远地抽到田里，要把田灌足，自然比往年难些，——不，洋水车会比往年少赚几个钱，所以换章程要照钟点算！

洋水车也许能救旱，可是这样的好东西，村里人没“福”消受。

又过了五六天，这一带村庄的水车全变做哑子了。小港里全已干成石硬，大的塘河也瘦小到只剩三四尺阔，稍为大一点儿的船就过不去了。这时候，村里人就被强迫着在稻场上“偷懒”。

他们法子都想尽了，现在他们只有把倔强求生的意志换一个方面去发泄。大约静默了三天以后，这一带村庄里忽然喧嚷着另一种声音了；这是锣鼓，这是呐喊。开头是A村和C村的人把塘河东边桥头小庙里的土地神像（这是一座不能移动的泥像，但村里人立意要动它，有什么办不到！）抬出来在村里走了一转，没有香烛，也没有人磕头（老太婆磕头磕到一半，就被喝住了），村里人敲着锣鼓，发狂似的呐喊，拖着那位土地老爷在干裂的田里走，未了，就把神像放在田里，在火样的太阳底下。“你也尝尝这滋味罢！”村里人潮水一样的叫喊。

第二天、呆在田里的土地老爷就有了伴。B村E村以及别的邻村都去把他们小庙里的泥像抬出来要他们“尝尝滋味”了，土地老爷抬完了以后，这一带五六个村庄就联合起来，把三五里路外什么庙里的大小神像全都抬出来“游街”，全放在田里跟土地做伴。“不下雨，不抬你们回去！”村里人威胁似的说。

泥像在毒太阳下面晒起了裂纹，泥的袍褂一片一片掉下来。敲着锣鼓的村里人见了，就很痛快似的发喊。“神”不能给他们“风调雨顺”，“神”不能做得像个“神”的时候，他们对于“神”的报复是可怕的！

告示贴在空的土地庙的墙上。村里人也不管告示上说的是什么话。他们的可惊的坚强的意志这时只注定了一点：责罚那些不管事的土地老爷。说是“迷信”，原也算得迷信，可是跟城里人的打醮求雨意味各别！村里人跟旱天奋斗了一个月积下来的一腔怒气现在都呵在那些“神”的身上了，要不是无水可戽，他们决不会想到抬出“土地”来，——他们也没有这闲工夫；而在他们既已责罚了“神”以后，他们那一腔怒气又要换一方面去发泄了。不过这是后事，不在话下。

1934年9月8日。

谈月亮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跟月亮的感情很不好。我也在月亮底下走过，我只觉得那月亮的冷森森的白光，反而把凹凸不平的地面幻比为一片模糊虚伪的光滑，引人去上当；我只觉得那月亮的好像温情似的淡光，反而把黑暗潜藏着的一切丑相幻化为神秘的美，叫人忘记了提防。

月亮是一个大骗子，我这样想。

我也曾对着弯弯的新月仔细看望。我从没觉得这残缺的一钩儿有什么美；我也照着“诗人”们的说法，把这弯弯的月牙儿比作美人的眉毛，可是愈比愈不像，我倒看出来，这一钩的冷光正好像是一把磨的锋利的杀人的钢刀。

我又常常望着一轮满月。我见过她装腔作势地往浮云中间躲，我也见过她像一个白痴人的脸孔，只管冷冷地呆木地朝着我瞧；什么“广寒宫”，什么“嫦娥”，——这一类缥缈的神话，我永远联想不起来，可只觉得她是一个死了的东西，然而她偏不肯安分，她偏要“借光”来欺骗漫漫长夜中的人们，使他们沉醉于空虚的满足，神秘的幻想。

月亮是温情主义的假光明！我这么想。

呵呵，我记起来了；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使得我第一次不信任这月亮。那时我不过六七岁，那时我对于月亮无爱亦无憎，有一次月夜，我同邻舍的老头子在街上玩。先是我们走，看月亮也跟着走；随后我们就各人说出他所见的月亮有多么大。“像饭碗口”，是我说的。然而邻家老头子却说“不对”，他看来是有洗脸盆那样子。

“不会差得那么多的！”我不相信，定住了眼睛看，愈看愈觉得至多不过是“饭碗口”。

“你比我矮，自然看去小了呢。”老头子笑嘻嘻说。

于是我立刻去搬一个凳子来，站上去，一比，跟老头子差不多高了，然而我头顶的月亮还只有“饭碗口”的大小。我要求老头子抱我起来，我骑在他的肩头，我比他高了，再看看月亮，还是原来那样的“饭碗口”。

“你骗人哪！”我作势要揪老头儿的小辫子。

“嗯嗯，那是——你爬高了不中用的。年纪大一岁，月亮也大一些，你活到我的年纪，包你看去有洗脸盆那样大。”老头子还是笑嘻嘻。

我觉得失败了，跑回家去问我的祖父。仰起头来望着月亮，我的祖父摸着胡子笑着说：“哦哦，就跟我的脸盆差不多。”在我家里，祖父的洗脸盆是顶大的。于是我相信我自己是完全失败了。在许多事情上都被家里人用一句“你还小哩！”来剥夺了权利的我，于是就感到月亮也那么“欺小”，真正岂有此理。月亮在那时就跟我有了仇。

呵呵，我又记起来了；曾经看见过这么一件事，使得我知道月亮虽则未必“欺小”，却很能使人变得脆弱了似的，这件事，离开我同邻舍老头子比月亮大小的时候也总有十多年了。那时我跟月亮又回到了无恩无仇的光景。那时也正是中秋快近，忽然有从“狭的笼”里逃出来的一对儿，到了我的寓处。大家都是卯角之交，我得尽东道之谊。而且我还得居间办理“善后”。我依着他们俩铁硬的口气，用我自己出名，写了信给双方的父母。——我的世交前辈，表示了这件事恐怕已经不能够照“老辈”的意思挽回。信发出的

下一天就是所谓“中秋”，早起还落雨，偏偏晚上是好月亮，一片云也没有。我们正谈着“善后”事情，忽然发现了那个“她”不在我们一块儿。自然是最关心“她”的那个“他”先上楼去看去。等过好半晌，两个都不下来，我也只好上楼看一看到底为了什么。一看可把我弄糊涂了！男的躺在床上叹气，女的坐在窗前，仰起了脸，一边望着天空，一边抹眼泪。

“哎，怎么了？两口子斗气？说给我来评评。”我不会想到另有别的问题。

“不是呀！——”男的回答，却又不说去。

我于是走到女的面前，看定了她，——凭着小时也是捉迷藏的伙伴，我这样面对面朝她看是不算莽撞的。

“我想——昨天那封信太激烈了一点。”女的开口了，依旧望着那冷清清的月亮，眼角还噙着泪珠。“还是，我想，还是我回家去当面跟爸爸妈妈办交涉，——慢慢儿解决，将来他跟我爸爸妈妈也有见面之余地。”

我耳朵里轰的响了一声。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使得这个昨天还是嘴巴铁硬的女人现在忽又变计。但是男的此时从床上说过一句来道：

“她已经写信告诉家里，说明天就回去呢！”

这可把我骇了一跳。糟糕！我昨天全权代表似的写出两封信，今天却就取消了我的资格；那不是应着家乡人们一句话：什么都是我好管闲事闹出来的。那时我的脸色一定难看得很，女的也一定看到我心里，她很抱歉似的亲热地叫道：“x哥，我会对他们说，昨天那封信是我的意思叫你那样写的！”

“那个，只好随它去；反正我的多事是早已出名的。”我苦笑着说，钉住了女的面孔。月亮光照在她脸上，这脸现在有几分“放心了”的神气；忽然她低了头，手捂住了脸，就像闷在瓮里似的声音说：“我撇不下妈妈。今天是中秋，往常在家里妈给我……”

我不愿意再听下去。我全都明白了，是这月亮，水样的猫一样的月光勾起了这位女人的想家的心，把她变得脆弱些。

从那一次以后，我仿佛懂得一点关于月亮的“哲理”。我觉得我们向来有的一些关于月亮的文学好像几乎全是幽怨的，恬退隐逸的，或者缥缈游仙的。跟月亮特别有感情的，好像就是高山里的隐士，深闺里的怨妇，求仙的道士。他们借月亮发了牢骚，又从月亮得到了自欺的安慰，又从月亮想像出“广寒宫”的缥缈神秘。读几句书的人，平时不知不觉间熏染了这种月亮的“教育”，临到紧要关头，就会发生影响。

原始人也曾在月亮身上做“文章”，——就是关于月亮的神话。然而原始人的月亮文学只限于月亮本身的变动；月何以东升西没，何以有缺有圆有蚀，原始人都给了非科学的解释。至多亦不过想像月亮是太阳的老婆，或者是姊妹，或者是人间的“英雄”逃上天去罢了。而且他们从不把月亮看成幽怨闲适缥缈的对象。不，现代澳洲的土人反而从月亮的圆缺创造了奋斗的故事。这跟我们以前的文人在月亮有圆缺上头悟出恬淡知足的处世哲学相比起来，差得多么远呀！

把月亮的“哲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也许只有我们中国罢？不但骚人雅士美女见了月亮，便会感发出许多的幽思离愁，扭捏缠绵到不成话；便是暗鸣叱咤的马上英雄也被写成了在月亮的魔光下只有悲凉，只有感伤。这一种“完备”的月亮“教育”会使“狭的笼”里逃出来的人也触景生情地想到

再回去，并且我很怀疑那个邻舍老头子所谓“年纪大一岁，月亮也大一些”的说头未必竟是他的信口开河，而也许有什么深厚的月亮的“哲理”根据罢！从那一次以后，我渐渐觉得月亮可怕。

我每每想：也许我们中国古来文人发挥的月亮“文化”，并不是全然主观的；月亮确是那么一个会迷人会麻醉人的家伙。

星夜使你恐怖，但也激发了你的勇气。只有月夜，说是没有光明么？明明有的。然而这冷凄凄的光既不能使五谷生长，甚至不能晒干衣裳；然而这光够使你看见五个指头却不够辨别稍远一点的地面的坎坷。你朝远处看，你只见白茫茫的一片，消弭了一切轮廓。你变做“短视”了。你的心上会遮起了一层神秘的迷迷胡胡的苟安的雾。

人在暴风雨中也许要战栗，但人的精神，不会松懈，只有紧张；人撑着破伞，或者破伞也没有，那就挺起胸膛，大踏步，咬紧了牙关，冲那风雨的阵，人在这里，磨炼他的奋斗力量。然而清淡的月亮像一杯安神的药，一粒微甜的糖，你在她的魔术下，脚步会自然而然放松了，你嘴角上会闪出似笑非笑的影子，你说不定会向青草地下一躺，眯着眼睛望天空，乱麻麻地不知想到哪里去了。

自然界现象对于人的情绪有种种不同的感应，我以为月亮引起的感应多半是消极。而把这一点畸形发挥得“透彻”的，恐怕就是我们中国的月亮文学。当然也有并不借月亮发牢骚，并不从月亮得了自欺的安慰，并不从月亮想像出神秘缥缈的仙境，但这只限于未尝受过我们的月亮文学影响的“粗人”罢！

我们需要“粗人”眼中的月亮；我又每每这么想。

1934年中秋后。

黄昏

海是深绿色的，说不上光滑；排了队的小浪开正步走，数不清有多少，喊着口令“一，二——一”似的，朝喇叭口的海塘来了。挤到沙滩边，破渐！——队伍解散，喷着忿怒的白沫。然后一排又赶着扑上来了。

三只五只的白鸥轻轻地掠过，翅膀扑着波浪，——一点一点躁怒起来的波浪。

风在掌号。冲锋号！小波浪跳跃着，每一个像个大眼睛，闪射着金光。满海全是金眼睛，全在跳跃。海塘下空隆隆地腾起了喊杀。

而这些海的跳跃着的金眼睛重重叠叠一排接一排，一排怒似一排，一排比一排浓溢着血色的赤，连到天边，成为绀金色的一抹。这上头，半轮火红的夕阳！

半边天烧红了，重甸甸地压在夕阳的光头上。

忿怒地挣扎的夕阳似乎在说：

——哦，哦！我已经尽了今天的历史的使命，我已经走完了今天的路程了！现在，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到了，是我的死期到了！哦，哦！却也是我的新生期快开始了！明天，从海的那一头，我将威武地升起来，给你们光明，给你们温暖，给你们快乐！

呼~~~呼~~~

风带着永远不会死的太阳的宣言到全世界。高的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汪洋的太平洋，阴郁的古老的小村落，银的白光冻凝了的都市，——一切，一切，夕阳都喷上了一口血焰！

两点三点白鸥划破了渐变为赭色的天空。

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

像忽然融化了似的，海的无数跳跃着的金眼睛摊平为暗绿的大面孔。

远处有悲壮的笳声。

夜的黑幕沉重地将落未落。

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一次的风，忽然又回来了；这回是打着鼓似的：勃仑仑，勃仑仑！不，不单是风，有雷！风挟着雷声！

海又动荡，波浪跳起来，轰！轰！

在夜的海上，大风雨来了！

沙滩上的足迹

他，独自一个，在这黄昏的沙滩上彳亍。

什么都看不分明了，仅可辨认，那白茫茫的知道是沙滩，那黑魆魆的是酝酿着暴风雨的海。

远处有一点光明，知道是灯塔。

他，用心火来照亮了路，可也不能远，只这么三二尺地面，他小心地走着，走着。

猛可地，天空瞥过了锯齿形的闪电。他看见不远的前面有黑簇簇的一团，呵呵，这是“夜的国”么，还是妖魔的堡垒？

他又看见离身丈把路的沙上，是满满的纵横重叠的足迹。

哈哈，有了！赶快！他狂喜地跳着，想踏上那些该是过去人的足迹。

他浑身一使劲，迸出个更大些的心火来。

他伛着腰，辨认那纵横重叠的足迹，用他的微弱的心火的光焰。

咄！但是他吃惊地叫了起来。

这纵横重叠的，分明是禽兽的足迹。大的，小的，新的，旧的，延展着，延展着，不知有几多远。而他，孤零零站在这兽迹的大海中间。

他惘然站着，失却了本来的勇气；心头的火光更加微弱，黄苍苍地像一个毛月亮，更不能照他一步两步远。

于是抱着头，他坐在沙上。

他坐着，他想等到天亮；他相信：这纵横重叠的鸟兽的足迹中，一定也有一些是人的足迹，可以引上康庄大道，达到有光明温暖的人的处所的足迹，只要耐守到天明，就可以辨认出来。

他耐心地等着，抱着头，连远处的灯塔也不望它一眼。他相信，在恐怖的黑夜中，耐心等候是不错的。然而，然而——

隆隆地，他听得了叫他汗毛直竖的怪响了。这不是雷鸣，也不是海啸，他猛一抬头，他看见无数青面獠牙的夜叉从海边的黑浪里涌出来，夜叉们一手是钢刀，一手是人的黑心炼成的金元宝，慌慌张张在找觅牺牲品。

他又看见跟在夜叉背后的，是妖娆的人鱼，披散了长发，高耸着一对浑圆的乳峰，坐在海滩的鹅卵石上，唱迷人的歌曲。

他闭了眼，心里这才想到等候也不是办法；他跳了起来，用最后的一分力，把心火再旺起来，打算找路走。可是——那边黑簇簇的一团这时闪闪烁烁飞出几点光来，飞出的更多了！光点儿结成球了，结成线条了，终于青闪闪地排成了四个大字：光明之路！

呵！哦！他得救地喊了一声。

这当儿，天空又撒下了锯齿形的闪电。是锯齿形！直要把这昏黑的天锯成了两半。在电光下，他看得明明白白，那边是一些七分像人的鬼怪，手里都有一根长家伙，怕就是人身上的什么骨头，尖端吐出青绿的鬼火，是这鬼火排成了好看的字。

在电光下，他又分明看到地下重重叠叠的足迹中确也有些人样的足迹，有的已经被踏乱，有的却还清楚，像是新的。

他的心一跳，心好像放大了一倍，从心里射出来的光也明亮得多了；他看见脚下的足迹中间还有些虽则外形颇像人类但确是什么只穿着人的靴子的妖魔的足印，而且他又看见旁边有小小的孩子们的脚印。有些天真的孩子上

过当！

然而他也在重重叠叠的兽迹和冒充人类的什么妖怪的足印下，发见了被埋藏的真的人的足迹。而这些脚迹向着同一的方向，愈去愈密。

他觉得愈加有把握了，等天亮再走的念头打消得精光，靠着心火的照明，在纵横杂乱的脚迹中他小心地辨认着真的人的足印，坚定地前进！

天窗

乡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开直，光线和空气都有了。

碰着大风大雨，或者北风虎虎地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关起来，屋子里就黑的地洞里似的。

于是乡下人在屋面开一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叫做天窗。

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然而大人们偏就不许，“到屋里来呀！”孩子们跟着木板窗的关闭也就被关在地洞似的屋里了；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

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雨脚在那里卜落卜落跳，你会看见带子似的闪电一瞥；你想像到这雨，这风，这雷，这电，怎样猛烈地扫荡了这世界，你想像它们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实感到的要大这么十倍百倍。小小的天窗会使你的想像锐利起来！

晚上，当你被逼着上床去“休息”的时候，也许你还忘不了月光下的草地河滩，你偷偷地从帐子里伸出头来，你仰起了脸，这时候，小小的天窗义是你唯一的慰藉！

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的一粒星，一朵云，想像到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掠过的一条黑影想像到这也许是灰色的蝙蝠，也许是会唱的夜莺，也许是恶霸似的猫头鹰，——总之，美丽的神奇的世界的一切，立刻会在你的想像中展开。

啊唷唷！这小小一方的空白是神奇的！它会使你看见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想不起来的宇宙的秘密；它会使你想到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永远不会联想到的种种事件！

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得感谢的。因为活泼会想的孩子们会知道怎样从“无”中看出“有”，从“虚”中看出“实”，比任凭他看到的更真切，更阔达，更复杂，更确实！

阿四的故事

他们都叫他“阿四”。

乡里顽皮的孩子都会唱一只从“阿大”到“阿九”的歌儿。

为什么就没有唱到“阿十”呢？那是谁也不得知。但总之，唱到“阿四”那一段最讨气。他最初听见了瞪着眼睛，后来只好一听见就逃走。

这是牵连着“阿四”的那一段歌词：

“阿四，阿四，屁股上生颗痣。娘看看怕势势，爷看看割脱来拜利市。”

于是他恨着人家叫他“阿四”，也恨着自己为什么偏偏是“阿四”。

然而阿四他的故事并不是就此完了的。

正月里，他淌着清鼻涕跟在娘背后到镇上人家讨年糕头。

二月里，他披着破夹袄跟在娘背后到河边摸螺蛳，到地里摘野菜挑马兰头。

三月里，娘忙了，他可乐了；他跑到爷管的租田东边那家镇上老爷的大坟地上玩去：他拾着了半枯的松球儿，也拾着了人家的断线鹞子，也看镇上的老爷太太小姐们穿得花绿绿地来上坟，照例他可以得一提粽子。

三月是阿四快乐的日子。他在爷光着背脊背着毒太阳落田的时候就盼望下一个三月；他在北风虎虎地叫，缩紧了肩膀躲在通风的屋角里，用小拳头发狠地揉着他的咕咕响的空肚子的时候，也偷偷地想着快要到来的三月。他盼过了一个，又盼第二个，一来一去，他也居然长成了十一二岁。

也许他竟有十二岁了，但是猴子似的。爷管的租田东边那镇上大户人家的坟地上的小松树还比他长得快些。上过了坟，大户人家那个红喷喷胖圆脸的老爷总叫他的爷，阿四的爷，往松树墩上挑泥。

阿四的身上却从来不“加泥”，所以那一年大热，他就病得半死。他是喝了那绿油油浓痰似的脏水起病的，浑身滚烫，张开眼不认识人。爷娘也不理他；好生生的人还愁饿死呢，管得了一个病小子？然而阿四居然不死。热退了，心头明白些的时候，他听得爷叹气朝娘说：“死了倒干净！”

到桂花开的时候，阿四会爬到廊檐下晒太阳了。就像一条狗似的，他爬进爬出，永远没有人注意看他一眼的；人们，他的爷娘也在内，闹烘烘地从这家嚷到那家，像有天大的正经事。阿四虚弱的身体没有力气听，一听了只是耳朵里轰轰地；也没有力气看，看上两三分钟眼前就是一片乱金星。他只是垂着头靠在廊前的角里，做梦似地乱想些不相干的事。

他想到了大哥。他曾经有一个大哥，可是记不清哪一年被拉伕的拉了去，从此就没有了。他又想到他的二姊。他还有点记得起二姊的面孔。他知道二姊卖在镇里做丫头。二姊也许还有粥吃，——一想到吃，他就觉得自己肚子里要东西，可是他只咽了一口唾沫，乱七八糟再想下去。他的乏力的眼看见了他的河里捞起来浮肿了的三哥！他是人家雇了去赶黄鸭掉在河里死的。那时候，他，阿四，不过八九岁；那时候，爷哭，娘也哭；那时候，爷不说“死了倒干净”呢！

于是阿四就觉得有一团东西从心口涌上来，塞住在喉头。他暂时什么想念都没有，像昏去了似的。

也不知过去了多少时光，阿四的昏迷的神经忽然嗅到了一股香味。他的精神吊起来了，睁眼一看，稻场上是许多人，都拿着锄头铁耙。“阿四！”他又听得叫，是娘的声音。他这才又看见娘伛了腰站在他面前，手里是一只

碗，那香气就从碗里来的。这是很厚的粥汤！是真正的粥汤，跟往日的不同！

阿四可不知道这一碗粥汤的历史。他不知道这是他的村里还有他的邻里几百人拚性命去换来的。他不知道这是抢来的，差一点他的爷娘吃着了枪子。他万万想不到这里头也有血的。他咕咕几口就吞了下去。

然而这就使得他的耳朵灵些。轰轰轰的声音少了些，他仿佛听得有人喊道：“镇上他们守得好，他们祖宗的坟都在我们乡下呀！”

坟么？阿四忽然又忘不了他的“快乐的三月”了。然而他的爷的声音又打断了他的思想。爷说：“坟里还有值钱的东西呢！”接着就用手指着东方。阿四知道这是指那个他常常去玩的坟了。他觉得有点高兴，似也好像有点难过；可是他的高兴或难过算得什么，他听得稻场上的人们蓦地一声喊，像半天空打下个焦雷，他的虚弱的身体就又有发慌，眼前又是一片乱金星，耳朵里又是轰轰轰。

等到他再能看能听的时候，稻场上已经没有人了，从东方却来了杭育杭育的喊声，还夹杂着听不清的嚷叫。像有鬼附在身上，他爬了几步，他爬到稻场的东头，他看见了：他的爷和村里人站在那坟墩上举高了锄头。

他呆呆地望着，不懂得爷和村里人干些什么；他也不想要懂得。

可是随后他到底懂了。忽然他那“快乐的三月”又在他心上一闪——不，简直像是踹了他一脚，他渺渺茫茫起了这样的感想：明年三月里没有人来上坟了，他得不到一提粽子了。

正这么想着，忽然听得那边一声轰天的欢呼，几十人像一个人似的欢呼了一下；他不由的也站了起来，也笑了一笑，但是腿一软，他又跌在地上。他躺在那里，有意无意地听着，也有意无意地想着。他觉得是有什么一个东西在他心头隐隐现现，像同他捉迷藏；末了，他好像捉住了那东西，瘦脸上淡淡一笑，自言自语地说：“谁稀罕那几只粽子！”

1934年11月13日。

小三

谁要是在马路旁边碰到小三，不把他当作绅士看，——哦，倘使你以为绅士也者，一定得手拿司的克，那么，就把他当作公子身份的挂名大学生也好。总而言之，准要是瞥眼一看就知道这小三者不过是黄公馆的所谓“三小子”，这才怪了！

倮，倮，倮，那边他来了：小巧的圆圆的元宝脸，亮晃晃一头黑发从中间分开，就同黄公馆里的叭儿狗阿花的“博士头”差不多；阿花这头，据黄公馆的清客胡某的考证，是少见的，从狗鼻子朝上，到狗头顶，那么一道白线，笔直笔直，两边伏伏贴贴朝左右分开的两片儿黑毛，顶高明的理发匠恐怕也妆扮不出这样一个名贵的头罢，然而小三居然像得差不多了，何况他还穿了黄少爷上身过一次的洋服，还登着旧货铺里买来的来路货皮靴。

这当儿，请你千万不要忘记看表；也许你没有表，请你千万辛苦些，赶快跑到近旁的铺子里看看挂在那里的钟。约莫是八点三十分罢？不错，一定是八点三十分或四十分。小三出现在这条街上，一定是这个时辰。这是个好时辰：吃公事饭的上衙门，康白度 上写字间，或者，少爷上学堂，都是差不多这个时辰。

从前，就是三个月以前，你想在这时辰发见小三挺胸凸肚囊囊地从那边走来，那也是怪事。从前，要是你定想看看他那跟阿花差不多们“博士头”，你得走到那边黄公馆的大铁门口。乌油的铁门很高很大，一点缝都没有，你只能看见门下离地一寸光景那扁长的空间不时有两只老牛皮的黑靴子移来移去；你认得这老牛皮的黑靴子同马路上巡捕脚上的，是堂兄弟、你知道这不是小三的；但是，你从铁门面前走了过去，你看看门下的老牛皮黑靴子，你再走回来，猛一抬头，嘿——你会吓了一跳，铁门旁边石头墙上有这么个尺把来长，半尺阔的小洞儿，嵌在这洞里的，是一个人头，两只乌溜溜的眼睛钉住你！

这人头，就是著名的小三的。它老是嵌在那长方形的小小的墙洞里。他有一只比猎狗还灵些的耳朵，墙外的脚步声刚刚近来，他那跟阿花差不多的头就立刻嵌在那岗位里，瞪大了乌溜溜的眼珠儿。那时候，他的职衔是号房里的“三小子”。

那时候，这左近一带的人们从没见过整个的小三，除了他那阿花式的头。因而最近这个头忽然装在脖子上出来走走，而且还有挺起的胸脯，凸出的肚子，你想，这一带的人们该是如何惊奇？他们指指点点悄悄地议论道：

“嘿！小三发迹了！我跟你赌，他要不是什么科员，定是什么委！”

有时小三也听到，就回头去看看自己的脚跟，也看看地上的自己的影子，然后眼朝着天，囊囊囊地走了去。

过了十点钟，这一带的马路上就不会再看见这个“新发迹”的人了。他在那里办公了。他的办公处就是黄公馆的大厨房。他这时也换了工作衣。大司务刚刚从小菜场回来，把两条大鲫鱼扔在小三跟前，嘴里含着一个铜钱似的喊道：

“小三！今天仔细点！昨天那鱼里还有这么个把刺，害得我 吃排头呢！今天是晚饭才用到，你慢慢地用心拔，剩一根，仔细你的皮！”

小三是照例侧着头听，像阿花似的。他先刮去了鱼鳞，很小心地从鱼背上剖开，摘去了肚杂，再使出软硬功来，把鱼身剖成两半片，可以平摊在盘子里，却又不能将鱼肚皮割断。都弄好了，就放到蒸笼里去蒸。小三知道应该蒸多少时候。他这算法才发明了不多几天。他用一块布揩擦那大大小小六七把镊子，擦完了，鱼也蒸得恰到好处。

怎么一来，这差使会派到小三头上呢？这在黄公馆的“家乘”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三个月前，卫生顾问葛大夫说黄老爷和黄太太还有少爷小姐们都应得常吃鲫鱼。呵，鲫鱼是卫生的么？叫大司务餐餐饭得用鲫鱼。然而糟糕，小少爷怕刺，老爷太太也以为鱼有刺是太那个的。太太身边的老妈子上了个条陈，叫大司务拔掉了鱼刺再做上来。

大司务可为难了。不敢说办不到，只好请老爷派一个人专管拔刺。老爷摸着胡子，心里想派谁好呢，这倒要个有耐心的人才行；忽然老爷看见了那阿花了，从阿花那出色的头就想到了老是嵌在大门边墙洞里的小三的头，老爷拍一下大腿叫道：

“得了！”就派号房里的小三！他倒像是还有点耐心。”

是老爷亲口派的，小三觉得很有面子。

但是老爷又吩咐：不准把鱼皮弄破，叫人看得出拔过刺，老爷这道卫生菜也要请请客人。而且要是鱼皮弄碎了、像猫嚼过似的，老爷看着也要作呕，吃不下嘴。

这，你可就明白了，为什么小三有大大小小六七把镊子。

擦过了最后一把弯头的镊子，小三就把鱼取出蒸笼，从鱼的剖面小心地拔出一根一根的刺。现在他接手这新差使已经三个多月了，他已经有把握，不留一根顶细的隐在鱼尾部的刺。

大司务很巧妙地把鱼翻一个身，浇上了鲜汤，端到席面，果然是好好一盘鱼，一点破相都没有。

所以现在上午八点三十分或四十分光景，老爷太太还在床上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小三打扮得很整齐在这一带的马路上挺起了胸脯凸出了肚子。谁要是猜到他是黄公馆大厨房里的助手，那才是怪事！

喂喂喂，你看他从那里回来了，他走过那长方形的墙洞时。还忍不住瞧了一眼呢！洞里现在是换了一个头了，而我们的的小三却大大方方掀了电铃，让巡捕开门放他进去当他的新差使。

1934年10月19日。

旧账簿

去年有一位乡先辈发愿修“志”。我们那里本来有一部旧志，是乾隆年间一位在我乡做官的人修的。他是外路人，而且“公余”纂修，心力不专，当然不免有些不尽不备。但这是我乡第一部“志”。

这一回，要补修了，经费呢，不用说，那位乡先辈独力担任；可是他老先生事情忙得很，只能在体裁方面总其成，在稿子的最后决定时下一判断，事实上的调查搜辑以及初稿的编辑，他都委托了几个朋友。

是在体例的厘订时，他老先生最费苦心。他披览各地新修的县志镇志，参考它们的体例；他又尽可能的和各“志”的纂修者当面讨论；他为此请过十几次的客。

有一次请客，主要的“贵宾”是一位道貌岸然，长胡子的金老先生。他是我们邻镇的老辈，他修过他自己家乡的“志”，——一部在近来新修的志书中要算顶完备的镇志。他有许多好意见。记得其中之一是他以为“镇志”中也可有“赋税”一门，备载历年赋税之轻重，而“物价”一项，虽未便专立一门，却应在有关各门中特别注意；例如在“农产”，顶好能够调查了历来农产物价格之涨落，列为详表，在“工业”门，亦复如此。

老先生的意见，没有人不赞成。但是怎样找到那些材料呢？这是个问题。老先生捻须微笑道：“这儿，几十年的旧账簿就有用处。”

从那一顿饭以后，我常常想起了我小时看见的我家后楼上一木箱的陈年旧账簿。这些旧账簿，不晓得以何因缘，一直保存下来，十岁时的我，还常常去翻那些厚本子的后边的空白纸页，撕下来做算草。但现在，我可以断定，这一木箱的陈年旧账簿早已没有了。是烧了呢，或是“换了糖”？我记不清。总之，在二十年前，它们的命运早已告终。而我也早已忘记我家曾经有过那么一份不值钱的“古董”。

现在经那位金老先生一句话，我就宛然记得那一厚本一厚本的旧账簿不但供给过我的算草稿，还被我搬来搬去当作垫脚砖，当我要找书橱顶上一格的木板旧小说的时候；那时候，我想不到这些“垫脚砖”就是——不，应该说不是我家“家乘”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镇志”的一部分。

实在的，要晓得我们祖父的祖父曾经怎样生活着，最能告诉我们真实消息的，恐怕无过于陈年的旧账簿！

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也无非是一种“陈年旧账簿”。但可惜这上头，“虚账”和“花账”太多！

我们又知道我们读这所谓“历史”的陈年旧账簿得有“眼光”。不但得有“眼光”，而且也得有正确的“读法”。正像那位金老先生有他的对于“陈年旧账簿”的正确的“看法”一样。

在这里，我就想起了我所认识的一位乡亲对于他家的一叠“陈年旧账簿”的态度。

这一位乡亲，现在是颇潦倒了，但从前，他家也着实过得去，证据就在他家有几十年的“陈年旧账簿”，——等身高的一叠儿。他的父亲把亲手写的最后一本账簿放在祖传的那一堆儿的顶上，郑重地移交给他，——那还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他呢，从老子手里接收了那“宝贝”以后，也每年加上一本新的，厚厚的一本儿。那时候，他也着实过得去。可是近几年来就不同了。证据就在他近年来亲手写的账簿愈来愈薄，前年他叹气对人说：“只有五十

张纸了！”说不定他今年的账簿只要二十张纸。

然而他对于“陈年旧账簿”的态度一贯的没有改变。

不，——应该说，他的境遇愈窘则他对于他那祖传的“陈年旧账簿”的一贯的态度就更加坚决更加顽强。例如：三五年前他还没十分潦倒的时候，听得人家谈起了张家讨媳妇花多少，李家嫁女儿花多少，他还不过轻轻一笑道：“从前我们祖老太爷办五姑姑喜事的时候，也用到了李家那个数目，先严大婚，花的比张家还要多些：这都有旧账簿可查！然而你不要忘记，那时候油条只卖三文钱一根！”从前年起，他就不能够那么轻轻一笑了事了。前天大年夜，米店的伙计在他家里坐索十三元八角的米账的时候，他就满脸青筋直爆，发疯似的跳进跳出嚷道：“说是宕过了年，灯节边一定付清，你不相信么？你不相信我么？我们家，祖上传来旧账簿一叠，你去看看，哪一年不是动千动万的大进出！我肯赖掉你这十三元八角么？笑话，笑话！”他当真捧了一大堆的“陈年旧账簿”出来叫那米店伙计“亲自过目”。据说，那一个大年夜他就恭恭敬敬温读了那些“陈年旧账簿”一夜。他感激得掉下眼泪来，只喃喃地自言自语着：“祖上哪一年不是动千动万的进出……镇上那些暴发户谁家拿得出这样一大堆的旧账簿！哦，拿得出这样一大堆的几十年的旧账簿的人家，算来就只有三家：东街赵老伯，南街钱二哥，本街就只有我了！”他在他那祖传的“陈年旧账簿”中找得了自傲的确信。过去的“黄金时代”的温诵把他现在的“潦倒的痛疮”轻轻地揉得怪舒贴。

这是对于“陈年旧账簿”的一种“看法”。而这种“看法”对于那位乡亲的效用好像还不只是“挡债”，还不只是使他“精神上胜利”，揉平了现实的“潦倒的痛疮”。这种“看法”、据说还使他能够“心广体胖”，随遇而安。例如他的大少爷当小学教员，每月薪水十八元，年青人不知好歹，每每要在老头子跟前吐那些更没有别的地方让他吐的“牢骚”；这当儿，做老子的就要“翻着旧账簿”说：“十八元一月，一年也有二百元呢；从前你的爹爹还是优贡呢，东街赵老伯家的祖老太爷请他去做西席，一年才一百二十呀！你不相信，查旧账簿！祖上亲笔写得有哪！”

这当儿，我的乡亲就忘记了他那“旧账簿”也写着油条是三文钱一根！

虽然照这位乡亲精密的计算，我们家乡只有三家人家“该得起”几十年的“陈年旧账簿”，但是我以为未必确实。差不多家家都有过“旧账簿”，所成问题者，年代久远的程度罢了。自然，像那位乡亲似的“宝贝”着而且“迷信”着“旧账簿”，——甚至还夸耀着他有“那么一叠的旧账簿”的，实在很多；可是并不宝爱“旧账簿”，拿来当柴烧或者换了糖的，恐怕也不少。只是能够像上面说过的那位金老先生似的懂得“旧账簿”的真正用处的，却实在少得很呵！

又有人说，那位乡亲对“旧账簿”的看法还是那位跟他一样有祖传一大叠“旧账簿”的东街“赵老伯”教导成的，虽然“赵老伯”自家的“新账簿”却一年一年加厚，——他自家并不每事“查旧账”而是自有他的“新账”。

不过，这一层“传说”，我没有详细调查过，只好作为“悬案”了。

1935年1月20日“查旧账”之时。

狂欢的解剖

从前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十三世纪那时候，有些青年人——大都是那时候几个新兴商业都市新设的太学校的学生，是很会寻快乐的。流传到现在，有一本《放浪者的歌》，算得是“黑暗时代”这班狂欢者的写真。

《放浪者的歌》里收有一篇题为《于是我们快乐了》的长歌，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且生活着罢，快活地生活着，
当我们还是年青的时候；
一旦青春成了过去，而且
潦倒的暮年也走到尽头，
那我们就要长眠在黄土荒丘！

朋友，也许你要问：这班生在“黑暗时代”的年青人有什么可以快乐的？他们寻快乐的对象又是什么呢？这个，哦，说来也好像很不高明，他们那时原没有什么可以快乐的，不过他们觉得犯不着不快乐，于是他们就快乐了，他们的快乐的对象就是美的肉体，（现世的象征，）——比之“红玫瑰是太红而白玫瑰又太白”的面孔，“闪闪地笑着……亮着”像黑夜的明星似的眼睛，“迷人的酥胸”，“胜过珊瑚梗的朱唇”。

一句话，他们什么也不顾，狂热地要求享有现实世界的美丽。然而他们不是颓废。他们跟他们以前的罗马人的纵乐，所谓罗马人的颓废，本质上是不同的；他们跟他们以后的十九世纪末年的要求强烈刺激，所谓世纪末的颓废，出发点也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要求享乐现世，是当时束缚麻醉人心的基督教“出世”思想的反动，他们唾弃了什么未来的天堂，——渺茫无稽的身后的“幸福”，他们只要求生活得舒服些，像一个人应该有的舒服生活下去。他们很知道，当他们的眼光只望着“未来的天堂”的时候，那几千个封建诸侯把这世界弄得简直不像人住的。如果有什么“地狱”的话，这“现世”就是！他们不稀罕死后的“天堂”，他们却渴求消灭这“现世”的活地狱；他们的寻求快乐是站在这样一个积极的出发点上的。

他们的“放浪的歌”是“心的觉醒”。而这“心的觉醒”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他们是趁了十字军过后商业活动的涨潮起来的“暴发户”，他们看得清楚，他们已经是一些商业都市里的主人公，而且应该是唯一的主人公。他们这种“自信”，这种“有前途”的自觉，就使得他们的要求快乐跟罗马帝国衰落时代的有钱人的纵乐完全不同，那时罗马的有钱人感得大难将到而又无可挽救，于是“今日有酒今日醉”了；他们也和十九世纪的“世纪末的颓废”完全不同，十九世纪末的“颓废”跟“罗马人的颓废”倒有几分相似。

所谓“狂欢”也者，于是也有性质不同的两种：向上的健康的有自信的朝气蓬勃的作乐，以及没落的没有前途的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纵乐。前者是“暴发户”的意识，后者是“破落户”的心情。

这后一意味的“狂欢”我们也在“世界危机”前夜的今年新年里看到了。据路透社的电讯，今年欧美各国“庆祝新年”的热烈比往年“进步”得多。华盛顿，纽约，罗马，巴黎这些大都市，半夜里各教堂的钟一齐响，各工厂的汽笛一齐叫，报告一九三五年“开幕”了；几千万的人在这些大都市的街

上来往，香槟酒突然增加了消耗的数量，……真所谓满世界“太平景象”。然而同时路透社的电讯却又报告了日本通告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美国也通过了扩充军备的预算，二次世界大战的“闹场锣鼓”是愈打愈急了。在两边电讯的对照下，我们明明看见了“今日有酒今日醉”那种心情支配着“今日”还能买“酒”的人们在新年狂欢一下。

我记起阳历除夕“百乐门”的情形来了。约莫是十二时半罢，忽然音乐停止。跳舞的人们都一下站住，全场的电灯一下都熄灭。全场是一片黑，一片肃静，一分钟，两分钟，突然一抹红光，巨大的“1935”四个电光字！满场的掌声和欢呼雷一样的震动，于是电灯又统统亮了，音乐增加了疯狂，人们的跳舞欢笑也增加了疯狂。我也被这“狂欢”的空气噎住了，然而我听去那喇叭的声音，那混杂的笑声，宛然是哭，是不辨哭笑的神经失了主宰的号响！

我又记起废历年的前后来了。这一个“年关”比往年困难得多，半个月里倒闭的商店有几十，除夕上一天，又倒闭了两家大钱庄，可是“狂欢”的气势也比往年“浓厚”得多。下午二点钟，几乎所有的旅馆全告了客满。并不是上海忽然多了大批的旅客，原来是上海人开了房间作乐。除夕下午市场上突然流行的谣言——日本海军陆战队要求保安队缴械的消息，似乎也不能阻止一般市民疯狂地寻求快乐；不，也许因此他们更需要发狂地乐一下。影戏院有半夜十二时的加映一场，有新年五日内每日上午的加映一场，然而还嫌座位太少。似乎全市的人只要袋里还有几个钱娱乐的，哪怕是他背上有千斤的债，都出动来寻强烈刺激的快乐。在他们脸上的笑纹中（这纹，在没有强笑的时候就分明是愁纹，是哭纹），我分明读出了这样的意思：“今天不知明天事，有快乐能享的时候，且享一下罢，因为明天你也许死了！”

而这种“有一天，乐一天”的心理并不限于大都市的上海呵！废历新年初六以后的报纸一边登着各地的年关难过的恐慌，一边也就报告了“新年热闹”的胜过了往年。“越穷是越不知道省俭呵！”这样慨叹着。不错，从不穷而到穷，明明看见没有前途的“破落户”，是不会“省俭”的，他们是“得过且过”；现在还没“穷”，然而恐怖着“明天”的“不可知”的人们，也是不肯“省俭”的，他们是“有一天，乐一天”！例外的只有生来就穷的人，饿肚子的人，他们跟发疯的“狂欢”生不出关系。

我又记起废历元旦瞥见的一幕了。那是在“一二八”火烧了的废墟上，一队短衣的人们拿着钢叉，关刀，红樱枪，带一个彩绘的布狮子。他们不是卖艺的，他们是什么国术团的团员，有一面旗子。我看见他们一边走，一边舞他们的布狮子，一边兴高采烈地笑着叫着。我觉得他们的笑是“除夕”晚上以及“元旦”这一日我所听到的无数笑声中唯一的例外。他们的，没有“今日有酒今日醉”的音调！然而他们的笑，不知怎地，我听了总觉得多少是原始的，蒙昧的，正像他们肩上闪闪发光的钢叉和关刀！

“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狂欢”，时时处处在演着，不过时逢“佳节”更加表现得尖锐罢了。我好像听见这不辨悲喜的疯狂的笑，从伦敦，从纽约，从巴黎，柏林，罗马，也从东京，从大阪，……我好像看见他们看着自己的坟墓在笑。然而我也听得还有另一种健康的有自信心的朝气的笑，也从世界的各处震荡；我又知道这不是为了“现世”的事乐而笑，这是为了比《放浪者的歌》更高的理想，因为现在到底不是“中世纪”了。

1935年2月20日。

交易所速写

门前的马路并不宽阔。两部汽车勉强能够并排过去。门面也不见得怎么雄伟。说是不见得怎么雄伟，为的想起了爱多亚路那纱布交易所大门前二十多步高的石级。自然，在这“香粉弄”一带，它已经是唯一体面的大建筑了。我这里说的是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新屋。

直望进去，一条颇长的甬道，两列四根的大石柱阻住了视线。再进一步就是“市场”了。跟大戏院的池子仿佛。后方上面就是会叫许多人笑也叫许多人哭的“拍板台”。

正在午前十一时，紧急关头，拍到了“二十关”。池子里活像是一个蜂房。请你不要想像这所谓池子的也有一排一排的椅子，跟大戏院的池子似的。这里是一个小凳子也不会有，人全站着，外圈是来看市面准备买或卖的——你不妨说他们大半是小本钱的“散户”，自然也有不少“抢帽子”的。他们不是那吵闹得耳朵痛的数目字潮声的主使。他们有些是仰起了头，朝台上看，——请你不要误会，那卷起袖子直到肩胛边的拍板人并没有什么好看，而且也不会看出什么道理来的；他们是看着台后像“背景”似的显出“××××库券”，“×月期”……之类的“戏目”（姑且拿“戏目”作个比方罢），特别是这“戏目”上面那时时变动的电光记数牌。这高高在上小小的嵌在台后墙上的横长方形，时时刻刻跳动着红字的阿刺伯数目字，一并排四个，两个是单位“元”以下，像我们在普通账单上常常看见的式子，这两个小数下边有一条横线，红色，字体可也不小，因而在池子里各处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这小小的红色电光的数目字是人们创造，是人们使它刻刻在变，但是它掌握着人们的“命运”。

不——应当说是少数人创造那红色电光的纪录，使它刻刻在变，使它成为较多数人的不可测的“命运”。谁是那较多数呢？提心吊胆望着它的人们，池子外圈的人们自然是的，——而他们同时也是这魔法的红色电光记录的助成者，虽然是盲目的助成者；可是在他们以外还有更多的没有来亲眼看着自己的“命运”升沉的人们，他们住在上海各处，在中国各处，然而这里台上的红色电光的一跳，会决定了他们的破产或者发财。

被外圈的人们包在中央的，这才是那吵得耳朵痛的数目字潮声的发动机。很大的圆形水泥矮栏，像一张极大的圆桌面似的，将他们范围成一个人圈。他们是许多经纪人手下做交易的，他们的手和嘴牵动着台上墙头那红色电光数目字的变化。然而他们跟那红色电光一样，本身不过是一种器械，使用他们的人——经纪人，或者正交叉着两臂站在近旁，或者正在和人咬耳朵。忽然有个伙计匆匆跑来，于是那经纪人就赶紧跑到池子外他的小房间去听电话了，他挂上了听筒再跑到池子里，说不定那红色电光就会有一次新的跳动，所有池子里外圈的人们会有一次新的紧张——掌不住要笑的，咬紧牙关眼泪往肚子里吞的，谁知道呢，便是那位经纪人在接电话以前也是不知道的。他也是程度上稍稍不同的一种器械罢了。

池子外边的两旁，——上面是像戏院里“包厢”似的月楼，摆着一些长椅子，这些椅子似乎从来不会被同一屁股坐上一刻钟或二十分的，然而亦似乎不会从来没有人光顾，做了半天冷板凳的。这边，有两位咬着耳朵密谈；那边，又是两位在压低了嗓子争论什么。靠柱子边的一张椅子上有一位弓着背抱了头，似乎转着念头：跳黄浦呢，吞生鸦片烟？那边又有一位，——坐

在望得见那魔法的红色电光记录牌的所在，手拿着小本子和铅笔，用心地记录着，像画“宝路”似的，他相信公债的涨落也有一定的“路”的。

也有女的。挂在男子臂上，太年青而时髦的女客，似乎只是一同进来看看。那边有一位中年的，上等的衣料却不是顶时式的裁制，和一位中年男子并排站着，仰起了脸。电光的红字跳，她就推推那男子的臂膊；红字再跳一，她慌慌张张把男子拉在一边叽叽喳喳低声说了好一大片。

一位胡子刮得光光的，只穿了绸短衫裤，在人堆里晃来晃去踱方步，一边踱，一边频频用手掌拍着额角。

这当儿，池子里的做交易的叫喊始终是旋风似的，海潮似的。

你如果到上面月楼的铁栏干边往下面一看，你会忽然想到了旧小说里的伸仙：“只听得下面杀声直冲，拨开云头一看”，你会清清楚楚看到中央的人圈怎样把手掌伸出缩回，而外圈的人们怎样钻来钻去，像大风雨前的蚂蚁。你还会看见时时有一团小东西，那是纸团，跟纽子一般模样的，从各方面飞到那中央的人圈。你会想到神仙们的祭起法宝来罢？

有这么一个纸团从月楼飞下去了。你于是留心到这宛然各在云端的月楼那半圆形罢。这半圆圈上这里那里坐着几个人。在记录着什么，肃静地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背后墙上挂着些经纪人代表的字号牌子。谁能预先知道他们掷下去的纸团是使空头们哭的呢还是笑的？

无稽的谣言吹进了交易所里会激起债券涨落的大风波。人们是在谣言中幻想，在谣言中兴奋，或者吓出了灵魂。没有比他们更敏感的了。然而这对于谣言的敏感要是没有了，公债市场也就不成其为市场了。人心就是这么一种怪东西。

从半夜到天明

京沪线，××站到××站那一段。

夜间。一时到三时。没有星，没有月亮。日历翻过了一页。展示着十二月二十五日。

半个世界在睡梦中。然而在睡梦中的半个世界上有人不睡，正在忙着。

没有月亮，也没有星；白的雪铺盖了原野，也铺盖了铁轨。京沪线，这交通的动脉上，没有照常来往的客货车和花车，已经有两天半。

京沪线，这交通的动脉硬化了；机关车被罚立壁角，分道夫被放了假；车站上冷清清地，没有旅客，也没有站长，也没有工役。京沪线动脉硬化，已经有两天半。因为有青年的血，数千青年爱国的热血，纯洁的血，正要通过这硬化了的动脉。

一个赤血轮，——一架拖着壮烈的列车的机关车，在夜的黑暗里，在白雪的寒光下，在没有分道夫，没有扬旗的引导的死沉沉的路线上，向西挣扎。

轰轰轰！隆隆隆！硬化的动脉上，机关车在挣扎。它愤怒地吼着，然而它不能不小心地慢慢地走着。两三队的青年提了灯在前面压道。十余人一队的两三队青年，两三天没有吃饱，没有吃咸的，两三天没有睡。

“前面路轨又被掘断了！”冷的黑的夜气中颤动着这一声叫喊。

嘘！嘘！嘘！——机关车“嘘”着，就停止了。四五个灯火，十倍四五个人影，从车厢里飞了出来，飞扑到机关车前，再一直飞扑向前！“找铁轨呵！”车厢里更多的人动员。冷而黑的夜，白皑皑的雪地上，满布了无数的足印。

三段铁轨悄悄地躲在路旁坑里，被发现了，被俘虏了来。另一段铁轨也被发现了，在冰冻的小河，露出无知的铁头。

“就是藏在地狱里也要把它拖出来！”纠察队的叫喊。

扑通，扑通！光身子的纠察队跳进冰冻的河水里，抓着了冰冻的钢轨！

没有星，没有月亮。半个世界在睡梦中。然而在睡梦中的半个世界上，在死了似的京沪线上，有人是不知道睡的，有人是两三天不愿意睡的！

同在这时候，在京沪线东端的上海，也有另一班人不愿意睡觉。

因为这是“耶稣圣诞狂欢节”。挺大的“客满”的布告早挂在跳舞场门口。神秘的灯光下，一对对的男女挤成了人山。这里是“高等华人”的展览会。银行家，大商人，名律师，小开，……耶稣圣诞，一年一度，跳舞场特许延长时间，“高贵”的人们都来作一次长夜之欢。

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天的跳舞场通宵达旦，三夜的营业可以补偿不景气的一年。

从黄昏跳到天亮，在上海的无数跳舞场里也有几千人不睡，几千人“忙”了个整夜。然而完了，音乐停止了。狂欢的人们只好暂时离开了舞场，回家去——睡觉。

凄雨渐渐地下着。一个铅色的天。

××舞场门前最后一辆流线型的汽车啾的一声开走了，车里一男一女，头碰头，手挽手，闭着眼。

同是这时候，京沪线的苏州站到了那挣扎一夜的列车了。一夜的在雪地里寻铁轨，修路，挨饿，忍冻。然而这几个没有睡觉的人在忙着加水，忙着准备再向西开，忙着准备再是一夜的不睡，在雪地里修路，寻铁轨。

同是这时候，京沪线的昆山站上又有另一些人在忙着设法使得被阻在那里的又一列车的青年回上海来。两中队的保安队忽然跑在轨道中，结成个密密的方阵，挡在那列车的前面。

也是这时候，上海南市有几百个青年在冒雨游行演说。

也是这时候，上海北四川路刮刮刮地驶过了三四架装甲车，机关枪手头上的钢盔从钢的圆车顶的开处露出半个。车身是青灰色，绘着个“血”字般的旭日。

同在这北四川路，在电车站旁有一位矮绅士展开一张《日日新闻》，上面有一条大字新闻：“海军特别陆战队的大规模演习”。

看模型

真是作常偶然之偶然，我看到了一具精心结构的中国形势模型。也许本来不叫这名儿，可是我忘记了，就给它杜撰这么一个，自以为并没有多大曲解。

这模型的基础，自然是一盘“沙”——一个沙盘。自西至东，长长的蜿蜒的一条绿色沙，就是扬子江。也是自西至东，中段有一个大弯曲的一条黄色沙，当然是代表着黄河了。作为“万里长城”的是硬纸剪成的锯齿；想得周到极了，这沙盘上的“万里长城”是设防的，整整齐齐排列着不少军队，枪口朝外，俨然是向东北进发的姿态。

也还有许多大炮。炮口当然也是一致对外的。

也还有悬挂着的许多飞机，——看那些机头的方向，大概这些都是敌人的飞机罢，然而飞机下边有不少高射炮排列在那里，也做成瞄准的姿势。

在陆地之东，海洋里有无数战舰。不用说，这是警告我们：沿海各省受威胁。

东北四省的地面上因为摆下了四个大字“还我河山”，制图者觉得已经够了，或许是已无余地可供支配，所以“青纱帐”和荒山密林间的义勇军的活跃在这模型上便毫无痕迹。

西边，约莫也是“边疆”了罢，忽然也有硬纸剪成的“雉堞”，城垛上也有不少大炮，炮口方向似乎也是朝外的。对不起，我只能说“似乎”，因为人挤得很，模型也不算大，我实在看不清楚。

再来一个鸟瞰：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表示着各省的位置。

我还想多看一下，可是我的朋友却催我走了，并且大不敬的说：

“这样粗制应景的玩意，有什么细看的必要！”

“呵，什么？我觉得这是精心结构的呢！”

我惊讶地说，一面也跟着朋友走了。

不料我的朋友却冷笑起来：

“算了，算了，老朋友，你真是外行！在地图模型制作的标准说来，这一具是未入流的！多么粗拙，恶劣！”

我明白了。原来我的朋友是用了专家的眼光在批评这具模型了。专家，我不敢轻视；但是我常以为专家而处处带着“专家眼”，有时会迂阔得可笑的。我和眼前这位“专家”是朋友，我义不容辞要指出他的弱点，我于是和他辩论起来：

“不过，老朋友，请你不要太严格，——不，请你想到这具模型不是为学术的目的，而是为——咳，老朋友，你不觉得那些长城，长城上的兵，大炮，不都是很用了一番匠心这才布置成的么？”

“哦！”朋友似乎要敷衍我的面子了，“这，不是为学术的目的……”

他朝我看了一眼，似乎在问我：“那么，到底为什么！”我坦然回答道：

“这本来是为了哄小孩了的！”

原来这具模型是儿童玩具展览会的陈列品之一。

不料我的朋友更加愤愤不平了，他说：

“噢！哄小孩子的？哄小孩子的！甚至于自己国家的地图也可以拿来哄小孩子么？”

这时，和我们同走的朋友的儿子忽然插言道：

“昨天看见报上说：日本军在长城一带增兵了，那么我们的军队呢？”
呵呵呵！我和我的朋友只好苦笑了。
我同时感到这具精心结构的模型实在倒是顶呱呱的“幽默”的作品呢！

被考问了《中国的一日》

朋友拿起那本墨绿色布面的书，在手里掂了掂，笑着说：“噢，也许有斤半重罢！哦，太厚了，要读它，光景非得正襟危坐不可。活像一本《中华大字典》！”

书被翻开来了。朋友展开那张四折叠的插画，又自言自语道：“哦，木刻，《中国大事记》。……嗯，是原画尺寸呢，还是缩小了的？”

“缩小了总有一半。要是照原来尺寸，至少要折叠八次，恐怕装订在书里不平贴。”我回答。

朋友又笑了笑，忽然抬头细看着左方的一堵板壁；他将那板壁打量了好一回，赞叹似的说：“嗨，有那样傻劲的木刻家！亏他找到那么长，料想来也不能有木节的板！中国自有木刻，这怕是空前的巨制罢？好魄力！”于是他的眼光又转到书上，“呵，可是，这位艺术家的大名呢？大名呢？”

朋友的眼光直钉在我的脸上了。我像做错了算草的小学生一样惶悚起来，赶快凑近朋友身边，指着那木刻题目下几个小字（这都是那位艺术家的手迹），嚅嚅地说：“在这里，唐英伟！”我又翻到那书的目录第十四页，解嘲地又接一句：“幸而这里没有把他的大名漏掉！”

“插图部分弄得不好，”我又继续申说，“这是本书最大的缺点。匆促，——譬如这幅《全国大事记》漏排了题名和作者姓名，查起来，竟没有人知道所以然：谁也没有看过这木刻的大样，然而谁都以为一定有人看过了。然而……”

朋友不让我“然而”下去，翻到本文，就说：“喂，小五号字，密密麻麻！”朋友原来是近视眼。他合了书，在书面拍了一下，“嗯，你不是说有五百篇，八十多万字么？你不是说，几乎网罗尽了这一日中国的人生么？……”

“不过，我也不必在你面前代这本书吹得太厉害；缺漏的多得很呢！譬如，这里面没有社会要人，民众领袖，产业巨头，金融巨头等等的公私生活；没有铁厂，矿场，化学工业，日用品工业的记载，没有属于这些工业部门的工人生活；没有秘密结社（青帮洪帮）的生活，乃至没有电影，话剧，平剧，以及各项游艺的从业员的生活，……”

“哈哈，幸而还没有，”朋友又打断了我的话头，“要不然，怕不止二五百万字罢，我这近视眼只好望洋兴叹。可是，即使你列举了一大串的没有，到底也有了五百篇，八十万字呢，你先告诉我，这一天里，——这《中国的一日》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

这可把我几乎问倒了。这书里的全部文章，我虽然看过起码有五遍，我几乎看见每篇的题目就说得出它的内容，然而要我举出什么“特殊”来，——不用说，要是许我抽象地说说它的“特点”，我自然优为之，可是这位朋友不会满意的，——真为难！

“啊哟！你知道，五·二一是怪平凡的一天，成都事件，北海事件，丰台事件，汉口事件，乃至近日的上海虹口地方的‘不幸’事件，五·二一都没赶得上。这一日是平凡的。然而在我们中国，平凡下面就隐伏着特殊，所以你也不妨说这一本书全体是平凡而又特殊，特殊而仍似平凡！”

我这番诡辩，朋友大大不满，他拍着那书，叫道：

“你不能这样搪塞！”

糟糕！朋友像一个老师，考起我来了。情知躲不过，我只好想了一想回答：

“那么，从这一日的第一个时辰讲起罢。是在‘国防第一线的徐州’，墨黑的夜里，东南二里的泰山方面、忽然一片的砰砰拍拍的声音，——像放排枪和轻机关枪，同时泰山上下都有一团大灯火，夹杂着手电筒的一明一灭。……”

“这时徐州城南二里的云龙山东侧，正驻扎着百多个来实地演习的军官学生，立刻就紧急集合，放步哨，散兵线散开，打电话报警讯，……可是，隔了也许一点钟，才由哨兵探明那不过有些老百姓上泰山烧‘子时香’，放鞭炮罢了！（《虚惊》页四·九四）

“差不多同时罢，我们的被人瞧不起的十八条军舰在怒风中离开了吴淞口，向普陀开，——去会操。（《海军会操记及其他》，页一五·一）

“然而也是这时候，北平西北六十里的妙峰山下，正有一位全身红衣，脚镣手铐，三步一磕头的还愿女子，刚在走上山去。（《妙峰山进香》，页八·九）也许是两小时以后，南宁（广西省）二十里外的马口岭，忽然也砰砰地枪声响了，立即机关枪、大炮，都发狂似的怒吼起来，烟雾四合，而在烟雾中，大队的飞机——战斗机、轰炸机、侦探机，轧轧地布满了天空。（《演习》，页一四·五）这是正待‘北上抗日’的军队来一次规模不小的演习夜战。

“上海这都市，此时安安静静在睡觉，可是在大上海的一角，有一位女中学生提心吊胆地在暗防她的破产的父亲会自杀；（《挨过了这一天》，页三·四三）同时，离上海一小时火车行程的松江余山，也有些虔诚的宗教徒准备恭贺‘圣主升天节’的弥撒。（《五月廿一日的余山》，页四·五二）

“一句话，迎接这一日的太阳第一条光线的，有烧香客的鞭炮，也有军队演习的飞机和大炮，也有‘圣主升天节’礼拜堂的钟声；你可以说是特殊，然而仍然是平凡。”

“哦，这一开头，倒还热闹。”朋友像有点满意了。

“可是太阳出来后，就更加热闹了，”我赶忙接着说，“南京的公务员忙着预习第二天受检阅时的仪式，一位教官在逐项告诫，要那些公务员把耳朵后根擦干净，记住了自己手上有几个‘筭’，几个‘箕’；（《训话》，页二·四）上海有一个香烟厂的焙房里热死了一个工人，领到收殮费五元；（《在香烟制造厂里》，页三·八）湖州吃包饭的薪给生活者从这天起非得把肚子缩小些就得天赐个‘子母钱’；（《包饭涨价》，页五·三）宁波方面闹着贝母‘走私’，全体武装的‘贝母缉私队’大发威风；（《不能合作的合作社》，页五·三八）可是天津火车站上堆积如山的白糖和人造丝却是‘公’然。（《这一日走的私货》，页八·四五）

“有一个中学校里的学生们慌慌忙忙焚毁了不是‘宣扬王道’的书籍和刊物；（《焚书》，页一·七）另一个中学校，在师生痛哭声中撕去了教科书中的国难和国耻的章节；（《永不能忘记的一课》，页一·一二）北平一个大学校内开着毕业生职业服务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会；（《青年微弱喊声的又一韵》，页八·一四）另一个高等学府却有欢送毕业同学的游艺会，《五花洞》、《桑园会》，采声不绝；（《送别游艺会速写》，页八·一一）又一个大学里，出狱的‘爱国犯’演说铁窗经验；（《慰劳大会》，页八·二五）就在那时候罢，又有人被盘诘，被带走，有人被捕，有人被钉梢。（《逮

捕》，页八·二一；《消息》，页八·二三）

“有一个可怜的女子情愿关在牢里，（《抢人》，页一一·一四）另一个可怜女子的血液还没冷透的尸身被她娘家的人利用来大施敲诈。（《出殡》，页一二·一七）

“在山东省的乡村，一个牛栏改建的教室里，只剩下一个光杆教员；（《这碗饭真不易啊》，页一一·一）在江苏省的‘模范县’或‘小上海’的乡村，一百八十多位小学生正因缴不出祝寿捐，开了个全体大会提议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当这么一毛八分钱；（《临时全体大会》，页四·四六）另一个地方，——福建省的仙游，四五十个小学教师罢了教，要求发给三个月的薪水——十五块钱。（《罢教后的第三天》，页一三·六五）……”

“算了，”朋友拦住了我，“这不算稀奇！敝处小学教员欠薪多至半年呢！你到底再说一点特别些的生活才像样呀！”

“那么，这一天有人，——一个女人去探监，（《探望》，页三·八四）也有一个人因为‘爱国罪’在特别留置所住到第三天，也没审，也没放出来，（《特别留置所里》，页三·八六）更有一位店员胡里糊涂进了去，那天又胡里糊涂被放了；（《离狱》，页四·四二）同样的情形，又发生在远远的四川，那位不幸的人给我们看一幅血淋淋的图画，（《日记一页》，页一四·二九）有人告诉我们，在‘黑暗的一角’，人们怎样念‘哲学’，又怎样收免费的学生。（《黑暗的一角》，页四·三五）……”

“好了，好了！”我的朋友忽然又不耐烦起来，“听你这样的‘卖关子’的进述，真是不过瘾，还是让我回去慢慢地读罢！”

但现在是轮到我来报复刚才的被考问之仇了；我郑重其事又接着说：

“慢来！书太厚，字又太小，你又是近视眼，有些怪有意义的文章被你看到时，也许已经陈腐不堪；我理合先来提示你一声：

“这一天，在浙江省杭州，发现了一张‘全国祈祷和平会’的传单，题为《破除迷信谈，求达真和平》，妙句是‘……报章常见载着“一九三六年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一年”等字样，我们要打破这种迷信谈，须要……祈祷（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念一声即有一声的和平功德），忏悔’，……（《和平印刷品》，页五·八）

“这一天的广东、广西、四川，又发现了‘玉皇大帝’御赐的救国良方，是三种文件合成的，一是今年正月初二在陕西太白山出世的刘伯温先生《救劫碑文》，二是关圣帝君的亲笔警告，并附神符三道的样子，三是不明何神所赐的警世歌诀。（《救国良方》，页一四·一）

“然而最不可错过的，是这一天在湖南省湘潭县成立的宗教哲学研究社的宣言，（《奇文共赏》，页七·三一）骈四俪六，不可不背一段给你先听为快：‘……举目山河破碎。半壁犹虚。伤心文物寂寥。三纲已坏。罹兹浩劫。有始罕闻。挽此颓流。当务为急。是以吾师萧昌明先生。适应运而生。为救时而起。拒百家之邪说。集群圣之大成。综五教而同参。天将以为木铎。悯众生而普度。人望之若神仙。在湘潭面壁九年。即达摩应世之始。在蜀省讲经列席。为如来成道之时。大现金光法相。照三千界而通明。广传玉律真言。揭二十字以融贯。研究哲学为主旨。阐阴阳奇偶之精。联合宗教为依归。无门户异同之见。本一切为心造。摄心则五蕴真空。秉一贯为心传。正心则万物皆备。故老子之清静玄默。即佛子之喜舍慈悲。若耶稣博爱以救人。犹穆罕清真而醒世。理无二致。道实同源。振古如斯。而今尤显。……当此厉

行新运之际。重以国民望治之殷。亟应建筑道德洪基。以为辅助政教后盾。守师尊之明示。对异端鸣鼓而攻。遵总理之遗规。愿吾党同舟共济。灯传暗室。咸瞻白日青天。运药灵枢。即是紫芝丹穴。……’

“算了，算了，不要背下去了，听得懂的也就是神仙，”朋友大笑叫着，要挟起那厚重的书走了。“不过，对不起，错字太多，务祈海涵。”我送朋友出去时又加了点抱歉。

鞭炮声中

“耶稣圣诞”那晚上，我从一个朋友家里出来，街头鞭炮声尚在劈劈拍拍；一个卖报的孩子缩头扛肩站在冷风里，喊着“号外！号外！”我到街角一家烟纸店换零钱，听得两位国民在大发议论；一位面团团凸肚子的说：

“不是我猜对了么？前几天财神飞去，我就知道事情快要讲好了！”

“究竟花了多少？”

“三千万罢——金洋！”

面团团凸肚子的忽然转过脸来，眼光望到我，似乎十分遗憾于听见他这话的人太少。

这一类的谣言，三两天前早就喧腾众口，拜金主义的人们自然觉得这是最“合理”的解释，然而这个面团团凸肚子的家伙说来却好像亲眼看见。可是也怪不得他呵，大报上从没透露一点怎样解决的消息。老百姓虽然“蠢”，官样文章却也不能相信的。

在鞭炮劈拍声中，我忽然感到了寂寞。

时间还早，我顺便又到了一个同乡家里。这家的老爷因为尊足不便、正在家里纳闷，哈哈笑着对我说：

“刚才隔壁朱公馆放了半天鞭炮，当差的打听了来说，委员长坐飞机出来了，就在朱家；出来了大概是真的，就在朱家可是瞎说了，哈哈！”

我再走到街上时，果然看见一座很神气的洋房门前鞭炮的碎红足有半寸厚。阳台上似乎还有一面国旗迎风飘扬。一二个肮脏的孩子蹲在地下捡寻还没放出的鞭炮。两个闲人在那里研究“朱公馆”和委员长的关系。一个说：

“是亲戚呢！你怎么不晓得？”

“瞎说！不过是阿拉同乡罢哩！”另一个回驳。

我无心管这闲事，然而我忍不住笑了。

在冷静的马路上走着，蓦地——砰，拍！高升的双响从前面来了。马路如砥，两旁的店铺和人家如死，路灯放着寒光；却有一辆祥生汽车不快不慢朝我开来。刚过去了，我又忽听得脑后一声：砰——拍！我回头去看，捏着一根线香的手臂还伸出在不快不慢开着的祥生汽车的车窗外，我分明看见这手臂是穿了制服的。

我恍然了，但这一次我感到的却是无聊。

找又到了一家、——二十年前的一个老同学，却是“主耶稣”新收不满三年的信徒。客厅里一棵圣诞树，不大不小；挂着红绿小电球，也不多不少；摆着些这家的老爷太太赠给少爷小姐们的“礼物”，也是不奢不俭；——这都像这“可敬”的一家，不高不低，不上不下。

那位太太热心地告诉我：“委员长果然今天出来了，我们祷告了三天，主耶稣应许了我们的祈祷。”她拱手放在胸前，挺起眼珠望着头顶。

然而那位老爷却激昂地说：

“路透社消息，说委员长自由后第一行动是下令撤兵，这是谣言罢！必须讨伐！毒瓦斯早已准备好了！”

“哦！可是那就成为内战，那不是给敌人的侵略造机会么？”

你不是常说给敌人造机会的，禽兽都不如么？”

“不然，此一时，彼一时，为了国法，顾不了那些了！”

这个老爷近来常说什么“法”，我老实听厌了；我们有“法”么？但我

不是和他辩论来的，我轻轻一笑，就把口气变成了诙谐：

“对了，朋友，你是有一个上帝的，但这也是上帝的意旨么？”

不料那位老爷竟毅然宣言：

“主耶稣虽然还没昭告我们，然而我相信主耶稣一定嘉纳！”

我还想“诙谐”一下，可是被那位太太拦住了，说是时候到了，他们合家得唱赞美诗，为了感谢，也为了新的祈求。

我在赞美歌声中又走到街头，对于那一对夫妇觉得可笑，也觉得更加可厌。

1937年1月9日。

炮火的洗礼

我遇到了许多的眼睛，都异样地睁得很大：

这里虽然有悲痛，但也有钢铁似的冷光；有忿怒，但也有成仁取义的圣哲的坚强；有憎恨，但也有“自度度人”的佛子心肠；乃至亦有迷惘，有焦灼，然而也有“余及汝偕亡”的激昂。

这都是十天的恶战，三昼夜沪东区的大火，在中国儿女的灵魂上留着的烙印，在酝酿，在锻炼，在净化而产生一个至大至刚，认定目标，不计成败，——配担当这大时代的使命的气魄！

惋惜着悲痛着沪东区的精华付之一炬么？不错，那边有我们同胞血汗的结晶，有我们民族工业的堡垒，我们不能不悲痛。但是敌人的一把火烧得了我们的庐舍和厂房，却烧不了我们举国一致的抗战的力量！不，敌人这一把火，将我们万万颗心熔成一个至大无比的铁心了！

不错，那边有我们同胞血汗的结晶，有我们民族工业的堡垒，然而那边也正是敌人的巢，也正是敌人经济侵略的悍强的前哨；惋惜么？我们决不！我们敌人一齐倒下，然后在火净了的废墟上再建起我们的市廛和厂房。三日三夜的赤焰是敌人的毒火，然而也是我们出地狱升天堂的净火！

在炮火的洗礼中，中国民族就更新了！

让不断的炮火洗净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专制政治下所造成的缺点，也让不断的炮火洗净了我们民族百年来所受帝国主义的侮辱。

古老的伟大的中华民族，需要在炮火里洗一个澡！

大炮对大炮，飞机对飞机，我们有我们抵抗侵略的爪，抵抗侵略的牙！尤其因为我们有炮火锻炼出来的决心和气魄！

四万万人坚决地沉着地接受炮火的洗礼了！四万万人的热血，在写出东亚历史最伟大的一页了！无所谓悲观或乐观，无所谓沮丧或痛快，我们以殉道者的精神，负起我们应负的十字架！

1937年8月23日。

不是恐怖手段所能慑伏的

近来每天清晨便听得敌人的飞机在屋顶的上空嗡嗡地回旋。我准知道这样回旋的，是敌人的飞机。因为这里离战区颇远，而且是属于英军防守区域的，而且尊重“租界安全”的我国的空军听说早已避免飞行在租界上空了；而嗡嗡地回旋者则是侦察或伺隙一击，这在既离战区颇远而又属于租界上空的此地，当然不会是我国的空军。

事实证明我这推想并没错，嗡嗡地几圈以后就惨厉地像受伤之狗叫起来，——这是敌人的飞机自以为觅得了目标疾如鹰隼地向下急降；接着，轰的一声炸弹。

听炸声，知道是在西方，——也许是真茹一带罢。后来看晚报，果然是真茹无线电台受了点损失，暨南大学的校舍遭了灾。

哼！敌人的堂堂的空军原来只向没有武装的交通机关和文化机关施威么！

我这里门前常有乡下人种了青菜来卖。他们大都来自真茹一带。我偶然和他们闲谈。我知道他们这些青菜正是每天清晨在敌人飞机追逐威胁之下一直挑负了来的，这样的青菜，本来值十文钱的，就是卖二十文，也不算多罢？然而他们并不肯抬价。

“日本飞机天天来轰炸，不怕么？”我冒冒失失问了。

可是那些紫铜色的脸儿却笑了笑回答：

“怕么？要怕的话，就不能做乡下人了！”

呵呵！这是多么隽永的一句话！我于是更觉得敌人这种“威胁后方”的飞机战略不但卑劣而且无聊。

前这两天、敌人飞机照例的“早课”更做得俨然了。这两天秋老虎又颇厉害，我要写点文章多半是趁早凉时间。心神一有所注，嗡嗡声或轰轰声都听而不闻了。然而我开始觉得敌人这种卑劣的战略妨碍了我的工作了。我那间卧室兼书室的天花板曾经粉刷过，大概那位粉刷匠用了不行的东洋货罢，只两年工夫，那一层粉便傍风干的橘子皮似的皱缩起来，上次风暴，忘记关了一扇窗，——仅仅一扇，天花板上那白粉竟像雪片似的掉下来；此番，趁早凉我正在写作，那雪片样的东西忽又连续而下，原稿纸上都洒满了。我不得不停笔，抬头朝上看，而恰在此时，照例的轰轰似乎比以前近些，房子也有点震动，呸！原来那白粉作雪花舞，也是敌人飞机作的怪！听声音又在西方，或许偏北。我拂去了纸上的粉屑，陡然又想起几天前那几位真茹来的农民回答我的那一句掷地作金石声的名言，我忍不住微笑了。对于敌人飞机此种徒然的而又无聊的威胁或破坏手段，我老老实实引不起正常的愤怒或憎恨，只能作轻蔑的微笑，我相信敌人中间的所谓“支那通”一辈子也不会了解大中华民族的农民的虽似麻木然而坚凝的性质！

可是待到我知道这回是敌人空军在北新泾等处轰炸徒手的民众而且连续轰炸至数小时之久，我的血便沸腾了！世界上会有这样卑劣无耻的军人么？

当然，他们这卑劣无耻的举动有其目的：想要在我们后方民众中间散布恐怖，动摇人心。但是农民子孙的我敢于回答道：不能——绝对不能！中国农民的神神经诚然有些迟钝，然而血，血淋淋的屠杀，可正是刺激他们奋起而坚决了复仇的意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是我们古代哲人的金言。中国民众决不是什么恐怖手段所能吓倒的！

敌人以为轰毁了几个乡镇，就能动摇我们民众的抵抗的决心么？那是梦想！中国农民诚然富于保守性的多，诚然感觉是迟钝的；一个老实的农民当他还有一间破屋可蔽风雨，三餐薄粥可喂饿肚子的时候，诚然是恋家惜命的，但当他什么都没有了时，他会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一样勇敢！中国民族绝不是暴力所能慑伏的！

中国民众所受的政治训练诚然还不太够，但是敌人的疯狂的轰炸屠杀恰就加强了我们的民众的政治意识。

现在敌人的飞机天天在我们各地的和平的城镇施行海盗式的袭击。这是撒布恐怖么？不错，诚然有一点是恐怖的，但恐怖之心只是一刹那，在这以后是加倍的决心和更深刻的认识，认识了侵略者的疯狂和残酷，决心拚性命来保卫祖国！

1937年9月6日。

苏嘉路上

— 一月五日的上海西站

这天下午三时，上海西站沸腾着无数的行李和无数的旅客。站内，平时是旅客们候车的地方，这天“候”在那里的，却是堆到天花板高的箱笼和铺盖。

“昨天挂了牌的行李，还堆在站里呢，——喏，那边，你看！今天的么？明天后天，说不定哪天能装出。”

月台上一个“红帽子”大声对一个旅客说。

这天是阴天，一列铁闷车又紧挨着月台，几盏电灯放射着苍白的光亮，其实灯光亦不弱，然而人们总感得昏黑。这天空气中太多的水分，加之太多的人嘘出来的水汽，大概已经在月台上凝布成雾罢？看月台顶的电灯，委实像隔了一层雾。

一盏临时电灯像一个火黄色的牛奶柿，挂在一张板桌上，这是临时的写行李票的办事处。围着这办公桌一圈的，是“红帽子”，也有旅客。这一圈子以外，运行李——不是进铁闷车而是进站的手车，川流不息地在往来，在跳跃。

“上西站”确是进入了“非常时代”；“上西站”平时清闲惯的，这天（自然不仅这一天）饱和着行李和旅客，也饱和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人们对话，非提高了嗓子是不行的。

“上西站”，这天有海关职员的临时办事处，检查行李，给报运的货物开税单。“上西站”，这天有路警和宪兵在留心汉奸。

这天的“上西站”饱和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天空，有敌人飞机的声音；远远传来的，有炮声，敌机投弹的轰炸声，甚至卜卜的机关枪声；站外，指定的狭长地段上，有着无数候车的旅客们的嚷嚷声，——争执，抱怨，等得心焦时无目的的信口乱谈，小孩子的啼哭，还有，警宪维持秩序的吆喝声。

这天从早上起，大炮和机关枪的吼叫到处可以听得；从早上起，敌机数十架轮番轰炸沪西：三架一队的敌机几次从西南来，掠过“上西站”顶空，有时且低飞，隆隆的发动机声压倒了“上西站”的一切嘈音。

大约四时半罢，三架一队的从东北来，（那边是它们轰炸的目的地），低飞了，直向“上西站”。月台上忽然尖厉地响起了几声警笛。站外，立着“持有京沪车票者在此集合”木牌的狭长草地上就卷起了恐慌的骚动：女人们抱着孩子们站起来了，人们这时方知候车的“妇孺”竟有这样的多！

“坐下，不要动！”路警和宪兵们高声叫着。

于是不动。动也没有用。在“不动”中，人们重新记起了这是“英兵警戒区域”，敌人的炸弹大概不至于往这处投。

在“不动”中，人们看着三架一队的飞机在顶上盘旋一匝，复向北去，又看见另一队横掠而过，于是，猛听得轰轰两声，感得坐下的草地也在震动以后，人们看着东北方冲起了几道黑烟。

“持有京沪车票者”集合队伍的尾巴不断地在加长，——增添的，不止是人，也有这些人们的家当：包裹，竹箱，网篮，乃至洋铅桶中装着的碗盏和小饭锅。这是“家当”，不是“行李”，所以它们的主人们只想随身带着走，不去“挂牌子做行李”。暮色苍茫中，这一行列在进月台了，蠕动着，

像一条受伤的虫。这一行列，其中十分之八的人门都有一件“法室”，——挑他们各自的“家当”的扁担或木棒；这时却不能挑，都竖将起来，步枪似的，高射炮似的，摇摆着，慢慢地前进。

行列中有一男一女；女的抱了个不满周岁的婴儿，男的背一只木箱，里面是工具，——他是木匠。他们没有小包裹，也没有破竹箱；那口工具箱便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罢？

另一个中年男子，长袍、油腻的马褂、老鼠的眼睛和老鼠的须，肩头扛着个衣包，手里提着小网篮，篮里桎桎叉叉不知是些什么，都触角似的伸在篮口之外；他这些触角，老碰着别人，但他老在那里怪嫌别人碰了他。

淮海口音的一个妇人，脑后老大一个发髻扁而圆，武装着不少的钢针，——这也许就是她糊口的工具罢？她像豪猪似的，使得后面往前挤的人们不得不对她保持相当的距离。有几个冒失鬼，伸长了颈子，往她这面挤，不止一次被她圆髻上的缝衣针拒退了。

夜色愈来愈浓，嚷嚷然推着挤着的这一行列终于都进了站台，消纳在车厢里。月台上走动的，只有穿制服的路员和警宪了，但灯光依旧昏花，像隔一层雾。

二 苏嘉路上

没有星，没有月亮，也不像有云。秋的夜晚待有一种灰茫茫的微光。风挟带着潮湿，轻轻地，一阵阵，拂在脸上作痒。

徒步走过了曾经被破坏的铁路桥（三十一号）的旅客们都挤在路轨两旁了。这里不是“站头”，但一个月以来，这一段路轨的平凡的枕木和石子上，印过无数流离失所的人们的足迹，渗透着他们的汗和泪，而且，也积压着他们的悲愤和希望罢？一个青年人俯首穆然注视了好一会儿，悄悄地，——手指微抖地，拾了一粒石子，放进衣袋里去。

有人打起手电来了，细长一条青光掠过了成排的密集的人影：这里是壮年人的严肃的脸孔和忧郁的妇人的瘦脸木然相对，那边是一个虽然失血但还天真活泼的孩子的脸贴在母亲的胸口，……手电的光柱忽然停留在一点上了，圆圈里出现三个汉子，蹲成一堆，用皮箱当作饭台，有几个纸包，——该是什么牛肉干、花生米之类，有高粱酒罢，只一个瓶，套在嘴唇上，三位轮流。

和路轨并行的，是银灰色的一泓，不怎么阔，镶着芦苇的边儿。青蛙间歇地阁阁地叫。河边一簇一簇的小树轻轻摇摆。

“如果有敌机来，就下去这河滩边小树下躲一躲罢？”有人小声对他的同伴说，于是仰脸望着灰茫茫的夜空；而且，在肃然翘望的一二分钟间，他又回忆起列车刚开出“上西站”时所见的景象：那时夜幕初落，四野苍苍，车厢里仅有一盏电灯也穿着黑纱的长袍，人们的面目瞧不清，但隐约可辨丰满胸脯细长身腰的是女性，而小铺盖似的依在成人身边的是孩童。被“黑纱的长袍”罩住的电灯光落在车厢地板上，圆浑浑的，像是神们顶上的光圈，有人偻着身子就这光圈阅读什么，——也许是《抵抗》。忽然旅客们三三两两指着窗外纷纷议论了：东方的夜空有十多条探照灯光伞形似的张开着，高高低低的红星在飞舞追逐，——据说，这就是给高射炮手带路的信号枪。车轮匀整地响着，但高射炮声依然听得到，密密地，像连绵的春雷一样。中国

空军袭击敌人根据地杨树浦！仰首悠然回忆的那位年青人，嘴唇边掠过一抹微笑。

近来中国空军每夜来黄浦江边袭击，敌人的飞机却到内地各处去滥炸，但依据敌机暴行的“统计”看来，没有星月的晚上它们也还是不大出巢。也许为此罢，这临时待车处的路轨两旁并没施行怎样严格的“灯火管制”。路警和宪兵们杂在人堆里，有时也无目的地打着手电，纵横的青光，一条条。

草间似乎有秋虫也还在叫。虽不怎样放纵，却与永无片刻静定的人声，凝成了厚重的一片，压在这夜的原野。远处，昏茫茫的背景前有几点萤火忽上忽下互相追逐。俄而有特大的一点，金黄色的，忽左忽右地由远而近，终于直向路轨旁的人群来了。隐约辨得出这是一个人提着灯笼。但即在这一刹那间，这灯光熄灭了。可是人们还能感觉出这人依然直向这边来，而且加入了这里的人群，在行列中转动，像一个陀螺，不多时，连他的声音也听到了，急促然而分明，是叫卖着：“茶叶蛋——滚烫白米粥。”

这位半夜的小贩，大概来自邻近的村庄。那边有金色的眼睛，时开时阖的，大概就是那不知名的小村庄。听说为了“抽壮丁”，也为了“拉伕”，有些三家村里，男子都躲避起来了，只剩下女人们支应着门户。也许这位“半夜的小贩”就是个女的罢？然而列车刚过了松江站时，车上突然涌现出大批的兜生意的挑夫，却是壮丁。他们并不属于路局，他们也是所谓战时的“投机者”，但据说要钻谋到这么个“缺”，需要相当的“资本”。

提着“诸葛灯”的路警开始肃清轨道的工作。这并不怎么容易。侵占着轨道的，不单是人，还有行李。于是长长的行列中发生了骚动。但这，也给旅客们以快慰，因为知道期待中的火车不久就可以到了。

只听得一声汽笛叫，随即是隆隆的重音，西来的列车忽然已经到了而且停住。车上没有一点亮光。车上的人和行李争先要下来，早已挤断了车门，然而车下严阵以待也是争先要上去的，也是行李和人。有人不断地喝着：“不要打手电！”然而手电的青光依然横斜交错。人们此时似乎只有一个念头：怎样赶先上去给自己的身体和行李找到个地位。敌机的可怕的袭击暂时已被忘记。手电光照见每一个窗洞都尽了非常的职务：行李和人从这里缒下，也从这里爬上。手电光也照见几乎所有的车门全被背着大包袱的——挣扎着要上去或下来的——像蜘蛛一样的旅客封锁住了。手电虽然大胆地使用着，但并没找到合意的“进路”，结果是实行“灯火管制”，一味摸黑“仰攻”。说是“仰”攻，并不夸张，因为车门口的“踏脚”最低一阶也离地有三尺多。

人们会想不通，女人和小孩子如何能上车。但事实上觉得自己确实已在车中的时候，便看见前后左右已有不少的妇孺。

黑茫茫中也不知车里拥挤到怎样程度。只知道一件：你已经不能动。你要是一伸脚，碰着的不是行李便是人。

两三位穿便衣的，有一盏“诸葛灯”，挤到车门口，高声叫道：“行李不能放在走路口！这是谁的？不行，不能挡住了走路！”行李们的主人也许就在旁边，可是装傻，不理。

“不行！挡住走路。回头东洋飞机来轰炸，这一车的人，还跑得了么？”便衣们严重地警告了。

行李们的主人依然不理，但是“非主人们”可着急了，有四五个声音同时喊道：“谁的东西？没有主儿的么，扔下车去！”这比敌机的袭击、在行李的主人看来，更多些可能性，于是他也慌了，赶快“自首”，把自己的舒

服的座位让给他的行李。（然而开车以后，因为暗中好行车，这些行李仍然蹲在走路上了。）

便衣们这样靠着“群众”的帮助，一路开辟过去。群众从便衣的暗示，纷纷议论着敌机袭击的危险，车厢里滚动着嘈杂的人声，列车却在这时悄悄地开动。

有一个角上，吵闹得特别有条理：似乎丢失了什么小物件，（因为失主们老是说：口袋里都摸过了，没有。）同伴的三四位在互相抱怨，谁也不肯负责任，都是女的口音。一根火柴被擦亮了，这不服气的三四位打算在地下找寻。

“谁在那里点火？你不要命？”有人这样喊。

火也随即灭了，大概那根火柴已经烧尽。但立即第二根火柴又被擦亮，并且接着就是光芒四射的灯火；原来那三四位女客想得周到，还带着洋烛，此时就公然使用。抗议的声浪从四面八方起来了，但勇敢的她们付之不闻。

这是太“严重”了。车里谈着闲天的人们都停止了谈话，瞌睡的人们也陆续惊醒——人们的眼光都射在那烛光的一角，晃动着的烛光这时也移到座位底下了，隐约看见三四个女人的身子都弯着腰向地下寻找。同时，也已经有人挤过行李和人的障碍，到了她们的面前。烛光突然灭了，伴随着厉声的呼叱：

“懂么？不许点火！再点，叫宪兵来抓！”

“可是我们丢了东西……”女人的口音，是淮海一路。

“等天亮了再找！”

这应该可以是“结论”了，然而不然。三四个女人的口音合力争辩她们必须赶快找，并且屡次说“找东西，又不犯法”。这时又有一人挤到他们面前来了，用了比较和缓的口气，这人说：“可是你们点火，就犯了法。你们看，车里不是没有电灯么？这不是铁路上要省钱，为的是防空，——知道么？”

她们不知道。她们来自上海租界的工厂，从来不知道什么防空。但她们知道已经动了众怒，只好闷着一肚子的疑问等候“天亮”。

列车已经通过了两个小站。都是悄悄地开进站，没叫一声。都只停了不多几分钟。站上只开着一两盏灯，车窗外昏暗中顶着盘子的小贩，慢声叫卖着“蹄蹄，蹄筋”。

这以后就到了一个气象森严的大站，这就是嘉兴。

从外扬旗起，就看见引进车站的一串电杆上，路灯莹然放射光明；灯影下每隔十多步，有一个横枪在肩头的士兵。月台上，虽非“照耀如同白昼”，却也开着不少的电灯。几条车道全给占住，只留中间一道有一辆机关车去了又来，啾滋啾滋喘气，一个忙碌的传令兵。列车们，连上海来的也在内，都黑黝黝地依次靠着，等候放行。

机关车第二次去了又来，挨着那曾经发生过“防空问题”的一节车；机关车上的独眼发怒似的直瞧住这一节车，照得车里雪亮。似乎这给了那三四位女客一个暗示。她们觉得这是她们及早找到失物的机会，而且，也许她们作过这样的推理：“既然车外可以有那么多的灯火，为什么车里不能呢？”——于是她们勇敢地再拿出她们的法宝，自备的洋烛来了。

这一次，车里没有人抗议，荧荧的烛光移上移下、摇摇然似乎表示得意。另外有人也擦着火柴抽烟了，烟圈儿在车外射来的光波中轻盈飘浮。但在女

客们的洋烛尚未尽其使命以前，车窗外又来了命令的声音：

“不许点灯！懂不懂规矩？”

“懂的。可是，一会儿就完……”

“不行，不行！”不止一个声音了，并且用木棒什么的敲着板窗。于是在唰唰不平声中，洋烛光终于熄灭。

紧挨在右侧的那辆机关车突然叫一声，又开走了；客车里重复只能看见人身的轮廓。但是随即有一道强光从后面斜射而来，随即听得有隆隆的声音，一长列的车子缓缓驶过，把车站方面来的灯光全部遮断。偶尔有一二处漏明，一闪即过，不知道那夹在大批铁闷车中间的一二辆客车里有人没有。

“军火车已经让过了，我们这列车也该开了罢？”有人打着呵欠说。

“车头还没有来呢！”另一个回答。

这时，停在最左边一条车道上的一列车也开走了，但跟着就有短短的一列来补缺。

旅客中间有过“非常时期”的旅行经验的，说在某站上，“特别快车”曾经等候至三小时之久，毕竟“等来了炸弹”。

“呵！那么我们已经等候了多少时候呢？”就有人这样问，希望所得的回答是“尚未太久”。

但是没有人能作正确的答案。谁也弄不清列车是几时到站的。忽然听得远远来了“鸣”的一声，大家都吓了一跳，以为是“警报”，有过经验的几位就想夺门而走。然而这时列车忽又也像吃惊似的浑身一抖。“炸弹来了”，竟有人来大声疾呼。昏暗的车厢里不再能维持秩序。可是又看见月台和路灯都在移走。原来刚才车身那一震是列车接上了“车头”，现在车已开走。

苏嘉路，贯通了沪杭、京沪两线的苏嘉路在负荷“非常时期”的使命。列车柯柯柯地前进。车头上那盏大灯不放光明，只在司机室的旁边开亮了一盏小灯，远望如一颗大星。原野昏黑而无际，但伴着列车一路的，却有一条银灰色的带子，这便是运河。而这善良的运河不幸成了敌机寻觅苏嘉路最好的标帜。

夜已过半，人们在颠簸中打瞌睡。有时恍惚觉得列车渐渐慢下来，终于停止，于是又恍惚听到隆隆声自远而近，猛然惊醒了，侧着耳朵，知道是候让来车，俄而一长列飞也似的擦过。

车又开了，人们又沉沉睡去；即使并未入睡的人们也是昏昏地什么思想感觉都没有。

窗外是一片昏黑，原野也在沉睡。一片昏黑中，只有偶然游泳的二三极细的火星；这也许是流萤，但也许是车头烟囱里喷出来的火星。

突然列车慢下来了，在半路里停止。

谁也不知道车已停止。待到发见了车已停止时，渴睡的旅客们都振作精神来研究这原因。侧耳听，什么异样的响声都没有。有人探身窗外张望，昏黑一片中什么都没有。但是前面远处却有一两点光，打暗号似的忽暗忽明。

有人说这是某某车站。

那么列车为什么不进站去？又是让兵车么？

没有人给你回答，也无处去问。

带洋烛的三四位忽然又要活动。一根火柴擦亮了。

“不许点火，谁！谁？”

意外地，年窗外立即来了这样严厉的呵叱声。皮靴囊囊的声音很快地跑

到那几位女客所在的窗前。人们才知道车外守的有路警或宪兵。

“小便急了，怎么办呢？”窗口的女客的声音。

“小便也不许！小便要紧，性命要紧？”

窗外来的断然的命令。

旅客们议论起来了。悲观者举出许多理由证明这半路停车定是有警报，乐观者却也举出许多理由证明这是等让兵车。

议论没有结果，车却开动了。这回却一上来就是快车，没叫一声就通过了那车站。站上没点灯，只有站长俨然挺立在月台上，右臂横伸，手里有一盏绿灯；离他不远，平行线的，又有一个荷枪肃立的路警。

这以后，鱼肚白渐渐泛出在天空。

记“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是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

他们一共二十五个。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省区。他们原来在上海时，只有二十二位，但是从失陷后的上海偷走南通，又历尽千辛万苦，迂回陇海、平汉两线而到了汉口，非但原班一个不缺，反倒增加了三位！

二十五个中，最大的十九岁，最小的九岁。大多数本来在学校里读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火毁灭了他们的学校，他们的“温暖的窝”——家庭，他们成为收容所中小小的难民。他们父母兄弟姊妹都离散了，但他们在收容所中结成了比自家兄弟姊妹还亲爱些的一个团体。日本帝国主义凶残的炮火摧毁得了中国成千成万孩子们的家庭，但是摧毁不了中华民族的儿女们从血的教训中觉醒了的团结精神。二十二个小小的灵魂开始明确地认清了他们那小小国民的责任，开始坚强地要在这大时代中成长，开始以铁的纪律锻炼自己，大踏步地走上救亡的岗位。

他们觉得收容所中那种“吃了睡，睡了吃”的生活，没有意思；他们组织了这个团，加入救亡的洪流；在洪流中，他们这小小的单位跳跃着，滚腾着，他们的天真、坚决、勇敢、青春的吼声，报告了民族前途的光明！看呀，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了我们民族千万的男女，然而我们民族复兴的后备军已经在炮火中长成！

从上海到南通，迂回陇海、平汉路而至汉口，少说也有三千里路程；他们逃过敌人的虎口，越过兵荒马乱的火线，在敌人的机关枪火网下钻过，他们沿路缺乏招呼，也没有人领路，然而凭着他们的勇敢和坚决，居然到了目的地。他们此后还要继续他们的流亡的救亡运动！

我去参观的那一天，他们正在排练他们自编的话剧《咱们帮助游击队》。这是一个集体的创作。这虽然是一个短短的独幕剧，但故事是又天真而又严肃。排练的地点就是他们的卧室（本是一间课堂），高桌上躺着全团最年幼的小弟弟，被窝盖的好好的，另一位小朋友在旁边照料他。全室中只有他睡高铺，因为他病了。

我走近去抚着他的秀发，问道：“吃过药么？想家不想？”

“吃过了。不想家。”他回答，他的漆黑的眸子朝我紧紧地看着，他的神情多么凝重而又怡然。可爱的灵魂！

“孩子剧团”是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

1938年2月17日于武汉。

海防风景

法国邮船公司的“小广东”号据说是来往于香港海防间第一等的船只。并不怎样大，可是走的快。

头等舱的“吸烟室”里，有一只大菜橱，下层权充“图书馆”，放着些法文书报，其中有一二本想来最受欢迎，书角都卷了，看书名仿佛是《安南游览指南》之类，有几幅海防风景的插图。“吸烟室”壁上也挂有海防风景的照片，从照片看，海防也是美丽的呵！

但是上岸以后劈头遇见的“风景”却是“黑房子”。

事情很简单：旅客上岸以后就被指挥着进入了一座没有窗子的像是货仓的大房（后来知道这就是检查行李的地方）。人全进去了，门也随即关上，黑洞洞地沿着木板长桌布成的夹道走，接着又从旁的旅客的嚷声中知道了“命令”：把随身带的小物件放下，——就是放在木板长桌上。接着又被驱着走出另一个门，门口有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安南人，施行“人身检查”。我手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文书皮包，安南人劈手便抢了去，可是我另一手里却拿着轮船上给的“头等舱客人有尽先验放行李的优先权”的证明纸，我将这纸向法国人一扬，于是他从安南人手里拿过我的文书皮包来还我，用英语说：“你是头等舱客人。抱歉。”不过我仍旧张开文书皮包的口来，他张望了一下，就完了，——算是“尊重”头等舱客人，没有搜我的身上。

我们在“黑房子”外面等着，看见行李一车一车来了，我们的和别人的混乱的放着，伙子们推着，在轻便铁轨上辘辘地都进那“黑房子”去了。也有在半路被捉来，随即验看了放行的，——这想来就是所谓“优先权”罢？但我们的，是都进了黑房子去了。

这以后，像在做梦了。人们被吩咐再进“黑房”，被吩咐把自

己的行李有锁的都开了锁，捆扎着的都解了索，然后又被吩咐走出那“黑房子”，——是从“出口”走，就是在检验员面前走过，最后是大伙儿攒集在“出口”的门前等候认领自己的行李。

然而旅客们也有仍旧留在“黑房子”里的，这是为了要照顾自己的已经解开了的行李。我们一行有六人，分一半在外等候认领，又一半在内照顾。我是分派在内的一人。“小广东”虽小，载来的行李可不少，“黑房子”里堆得满满的，高高的，我又高高的站在行李顶上，而且是很近“出口”处，——就是神圣的检验场所。

我看见了检验是怎样进行的：解开了的行李一件一件在木板长桌上杂乱而下，安南人助手很熟练地把双手在箱筐中来一个左右包抄，于是“内容”跃然而出，赫然全陈于贵目，法国人的检验员再用手在这里面一翻，倘无疑问，这就在箱面上划了白粉字，助手又很敏捷地将“内容”纳回，这时箱盖是没法闭上了，箱子就这样开着大门，满载着溢出口外，而且摇摇欲坠的“内容”，pass 过去了；站在“出口”处的伙子就这样的接了出来，放（幸而是放）在“门”外地上。这以后，是旅客们的事了，认领，整理，闭上了箱盖，上锁。

这样“科学”的而又“合理”的检验方法，不知是谁发明？人和行李分开，而一人的行李又被前后分开，要是单身客多带了几件行李，那恐怕只有

仰天叫苦罢。

据说那天的检查，其实已经是少有的客气了，——助手只用“左右包抄”的手术，并没有“倒提葫芦”；而且也不能不说是少有的马虎了，——那么多的行李只花了四小时就“看”完了。据说这也许为的载这些行李来的，是法国邮船公司的“小广东”号。

早上八时，船靠码头，十二时许，我们飘飘然坐在人力车上，向旅馆去。马路是平整广阔的，太阳晒在身上有点烫，太阳晒在路旁的草地和成群的棕榈上，似乎那些碧绿的狭长叶子也有些发黄，太阳晒在安南人的巨大的竹笠上，窄而短的黑色绸单袍上，看去怪不协调：我是在观赏海防的“风景”了，然而我不能忘记那“黑房”。

我承认我的脾气不好，我惯用“恶眼”去观看；我不喜欢安南人的极像二十五年前我们的时髦女郎的上衣似的服装，——袖口是那么窄而长，腰身是那么小，大襟，长仅及膝，而开叉又那么高，似乎到了腋下。而和这上衣（普通是深色的）相配，下边却又是白色的大脚管裤子，垂到脚背，上面则是庞大的笠子，遮掩了半个面孔。

我不喜欢这民族的服装，正如不喜欢他们那乌亮的黑牙齿和猩红的唾液，——那是因为嚼槟榔。

我也不喜欢那样的服装穿在安南女人身上，——虽然这比在男子身上好看些。我觉得这样的服装在一个女子身上，虽似飘逸，可亦近乎佻。

至于嚼槟榔，想像起来，倒也不是怎样可憎的玩意，——我们的有闲的同胞不是常嗑西瓜子，嚼留兰香糖么？我没有嗑西瓜子的素养，也不喜欢任何口香糖，可是看见人家嗑着嚼着而觉得恶心的时候，记得也还没有过；然而这回看见了安南人的嚼槟榔，竟出乎意外地憎厌起来了，事实上嚼槟榔之可憎，远出想像之外！

这憎恶的来由，首先第一是肮脏。在街旁看见卖槟榔的小贩——女人或小孩子，蹲在地上，身边是一只小小蔑篮，剖开了的鲜槟榔一瓢一瓢的摆在绿叶上，槟榔的外皮作碧绿色，内部却是灰白，这本来也不至于引起肮脏的感觉，然而因为是剖开了的，小贩的手又是照例那样黑污，蔑篮左右又是照例的垃圾成堆，你会无疑感到槟榔内部的灰白色不是本来灰白。不单是这样罢了，蔑篮里还有一只半锈的小小的马口铁罐头，内盛浓厚的白物，像是石灰浆，小贩将一根篾片搅白浆少许裹在一张槟榔叶里，像豆荚。这东西就和槟榔一同嚼的。你看见了那石灰浆似的白东西盛在半锈的马口铁罐头里，看见了这也是吃的，便自然而然会心头作恶。

憎恶的第二原因是狞恶。一个安南人如果口辅在动，那准是在那里嚼槟榔，那时，他的嘴唇边已经溢着猩红的口沫了，要是他一张嘴，那么，旧小说里常有的四个字——“血盆大嘴”，似乎正为安南人的嚼槟榔而作。

在海防安南人聚居的所在，街道上到处可见朱红色的干迹，一朵一朵的，你会错认是油漆泼翻了苏木水，其实这些就是嚼槟榔的人们吐出来的干唾液了。我曾经观察了一小时菜场，大多数的安南小贩都摆着地摊，走过鱼贩那一段时，腥咸的气味之难受固不用说，就是在那看去似颇整洁的鲜果小贩的地盘时，也饱享了一种似膻非膻的恶味，我疑心是安南人身上蒸发出来的体臭，可是同行的朋友指着满布地上的朵朵红液对我说：“这还是这些东西在作怪！”

红头金身的大苍蝇有时会成群扑面而来，——它们与槟榔同样普遍。据

说晚上的蚊子也是大得可怕，而且多得没有办法的，不过当天下午四时，我们就乘车往河内去了。

槟榔，红唾液，金苍蝇，蚊子，在我的观感里构成了海防的风景线。但自然，海防也有地方是没有这些的，即是“洋人”居住的地段。这是“洋人”与“土人”的界限，你即使是匆匆一过也就能够看得很明显。

右杂记一则，乃一九三八年尾经过海防时所记，法语既非素习，“唐话”亦不能说，如聋如哑，印象乃真成“印象”。自知浅陋，譬如瞽者摸象，弃置行篋，本不思发表，不料万里归来，此稿仍在，而越南土地则已变色矣。乃取以附入《见闻杂记》，聊志鸿爪云尔。

1941年10月于香港。

风景谈

前夜看了《塞上风云》的预告片，便又回忆起猩猩峡外的沙漠来了。那还不能被你为“戈壁”，那在普通地图上，还不过是无名的小点，但是人类的肉眼已经不能望到它的边际，如果在中午阳光正射的时候，那单纯而强烈的返光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没有隆起的沙丘，也不见有半间泥房，四顾只是茫茫一片，那样的平坦，连一个“坎儿井”也找不到；那样的纯然一色，即使偶尔有些驼马的枯骨，它那微小的白光，也早溶入了周围的苍茫；又是那样的寂静，似乎只有热空气在作哄哄的火响。然而，你不能说，这里就没有“风景”。当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个黑点，当更多的黑点成为线，成为队，而且当微风把铃铛的柔声，丁当，丁当，迭到你的耳鼓、而最后，当那些昂然高步的骆驼，排成整齐的方阵，安详然而坚定地愈行愈近，当骆驼队中领队驼所掌的那一杆长方形猩红大旗耀入你眼帘，而且大小丁当的谐和的合奏充满了你耳管，——这时间，也许你不出声，但是你的心里会涌上了这样的感想的：多么庄严，多么妩媚呀！这里是大自然的最单调最平板的一面，然而加上了人的活动，就完全改观，难道这不是“风景”吗？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

于是我又回忆起另一个画面，这就在所谓“黄土高原”！那边的山多数是秃顶的，然而层层的梯田，将秃顶装扮成稀稀落落有些黄毛的癞头，特别是那些高秆植物颀长而整齐，等待检阅的队伍似的，在晚风中摇曳，别有一种惹人怜爱的姿态。可是更妙的是三五月明之夜，天是那样的蓝，几乎透明似的，月亮离山顶，似乎不过几尺，远看山顶的小米丛密挺立，宛如人头上的怒发，这时候忽然从山脊上长出两支牛角来，随即牛的全身也出现，披着犁的人形也出现，并不多，只有三两个，也许还跟着个小孩，他们姗姗而下，在蓝的天，黑的山，银色的月光的背景上，成就了一幅剪影，如果给田园诗人见了，必将赞叹为绝妙的题材。可是没有完。这几位晚归的种地人，还把他们的粗朴的短歌，用愉快的旋律，从山顶上飘下来，直到他们没入了山坳，依旧只有蓝天明月黑魃魃的山，歌声可是缭绕不散。

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场面。夕阳在山，干坼的黄土正吐出它在一天内所吸收的热，河水汤汤急流，似乎能把浅浅河床中的鹅卵石都冲走了似的。这时候，沿河的山坳里有一队人，从“生产”归来、兴奋的谈话中，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方音。忽然间，他们又用同一的音调，唱起雄壮的歌曲来了，他们的爽朗的笑声，落到水上，使得河水也似在笑。看他们的手，这是惯拿调色板的，那是昨天还拉着提琴的弓子伴奏着《生产曲》的，这是经常不离木刻刀的，那又是洋洋洒洒下笔如有神的，但现在，一律都被锄锹的木柄磨起了老茧了。他们在山坡下，被另一群所迎住。这里正燃起熊熊的野火，多少曾调朱弄粉的手儿，已经将金黄的小米饭，翠绿的油菜，准备齐全。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却将它的余辉幻成了满天的彩霞，河水喧哗得更响了，跌在石上的便喷出了雪白的泡沫，人们把沾着黄土的脚伸在水里，任它冲刷，或者掬起水来，洗一把脸。在背山面水这样一个所在，静穆的自然和弥漫着生命力的人，就织成了美妙的图画。

在这里，蓝天明月，秃顶的山，单调的黄土，浅濑的水，似乎都是最恰当不过的背景，无可更换。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

我们都曾见过西装革履烫发旗袍高跟鞋的一对儿，在公园的角落，绿荫下长椅上，悄悄儿说话，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在一个下雨天，你经过一边是黄褐色的浊水，一边是怪石峭壁的崖岸，马蹄很小心地探入泥浆里，有时还不免打了一下跌撞，四面是静寂灰黄，没有一般所谓的生动鲜艳，然而，你忽然抬头看见高高的山壁上有几个天然的石洞；三层楼的亭子间似的，一对人儿促膝而坐，只凭剪发式样的不同，你方能辨认出一个女的，他们被雨赶到了那里，大概聊天也聊够了，现在是摊开着一本札记簿，头凑在一处，一同在看，——试想一下，这样一个场面到了你眼前时，总该和在什么公园里看见了长椅上有一对儿在偎倚低语，颇有点味儿不同罢？如果在公园时你一眼瞥见，首先第一会是“这里有一对恋人”，那么，此时此际，倒是先感到那样一个沉闷的雨天，寂寞的荒山，原始的石洞，安上这么两个人，是一个“奇迹”，使大自然顿时生色！他们之是否恋人、落在问题之外。你所见的，是两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是两个清楚明白生活意义的人，在任何情形之下，他们不倦怠，也不会百无聊赖，更不至于从胡闹中求刺激，他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拿出他们那一套来，怡然自得。但是什么能使他们这样呢？

不过仍旧回到“风景”罢；在这里，人依然是“风景”的构成者，没有了人，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再者，如果不是内生活极其充满的人作为这里的主宰，那又有什么值得怀念？

再有一个例子：如果你同意，二三十棵桃树可以称为林，那么这里要说的，正是这样一个桃林。花时已过，现在绿叶满株，却没有一个桃子。半片旧石磨，是最漂亮的圆桌面，几尺断碑，或是一截旧阶石，那又是难得的几案。现成的大小石块作为凳干，——而这样的石凳也还是以奢侈品的姿态出现。这些怪样的家具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茶社。桃林前面，有老百姓种的养麦，也有大麻和玉米这一类高秆植物。养麦正当开花，远望去就像一张粉红色的地毯，大麻和玉米就像是屏风，靠着地毯的边缘。太阳光从树叶的空隙落下来，在泥地上，石家具上，一抹一抹的金黄色。偶尔也听得有草虫在叫，带住在林边树上的马儿伸长了脖子就树干搔痒，也许是乐了，便长嘶起来。“这就不坏！”你也许要这样说。可不是，这里是有所谓“风景”的一些条件的！然而，未必尽然。在高原的强烈阳光下，人们喜欢把这一片树荫作为户外的休息地点，因而添上了什么茶社，这是这个“风景区”成立的因缘，但如果把那二三十棵桃树。半片磨石，几尺断碣，还有养麦和大麻玉米，这些其实到处可遇的东西，看成了此所谓风景区的主要条件，那或者是会贻笑大方的。中国之大，比这美得多的所谓风景区，数也数不完，这个值得什么？所以应当从另一方面去看。现在请你坐下，来一杯清茶，两毛钱的枣子，也作一次桃园的茶客罢。如果你愿意先看女的，好，那边就有三四个，大概其中有一位刚接到家里寄给她的一点钱，今天来请同伴。那边又有几位，也围着一个石桌子。但只把随身带来的书籍代替了枣子和茶了。更有两位虎头虎脑的青年，他们走过“天下最难走的路”，现在却静静地坐着，温雅得和闺女一般。男女混合的一群，有坐的，也有蹲的，争论着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时时哗然大笑，就在他们近边，长石条上躺着一位，一本书掩住了脸。这就够了，不用再多看。总之，这里有特别的氛围，但并不古怪。人们来这里，只力恢复工作后的疲劳，随便喝点，要是袋里有钱；或不喝，随便谈谈天；在有闲的只想找一点什么来消磨时间的人们看来，这里坐的不舒服，吃的喝的也太粗糙简单，也没有什么可以供赏玩，至多来一

次，第二次保管厌倦。但是不知道消磨时间为何物的人们却把这一片简陋的绿荫看得很可爱，因此，这桃林就很出名了。

因此，这里的“风景”也就值得留恋，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贫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人创造了第二自然！

最后一段回忆是五月的北国。清晨，窗纸微微透白，万籁俱静，嘹亮的喇叭声，破空而来。我忽然想起了白天在一本贴照簿上所见的的第一张，银白色的背景前一个淡黑的侧影，一个号兵举起了喇叭在吹，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都表现在小号兵的挺直的胸膛和高高的眉棱上边。我赞美这摄影家的艺术，我回想着，我从当前的喇叭声中也听出了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来，于是我披衣出去，打算看一看。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叫出声来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红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我看得呆了，我仿佛看见了民族的精神化身而为他们两个。

如果你也当它是“风景”，那便是真的风景，是伟大中之最伟大者！

1940年12月，于枣子岗垭。

雾中偶记

前两天天气奇寒，似乎天要变了，果然昨夜就刮起大风来。窗上糊的纸被老鼠钻成一个洞，呜呜地吹起哨子，——像是什么呢？我说下出。从破洞里来的风，特别尖利，坐在那里觉得格外冷，想拿一张报纸去堵住，忽然看见爱伦堡那篇“报告”——《巴黎沦陷的前后》，便想起白天在报上看见说，巴黎的老百姓正在受冻挨饿，情形是十分严重的话。

这使我顿然记起，现在是正当所谓“三九”。北方不知冷的怎样了，还穿着单衣的战士们大概正在风雪中和敌人搏斗，便是江南罢，该也有霜有冰乃至有雪。在广大的国土上，受冻挨饿的老百姓，没有棉衣吃黑豆的战士，那种英勇和悲壮，到底我们知道了几分之几？中华民族是在咆哮了，然而中国似乎依然是“无声的中国”——从某一方面看。

不过这里重庆是“温暖”的，不见枯草，芭蕉还是那样绿，而且绿的太惨！

而且是在雾季，被人“祝福”的雾是会迷蒙了一切，美的，丑的，荒淫无耻的，以及严肃的工作。……在雾季，重庆是活跃的。因为轰炸的威胁少了，是活动的万花筒：奸商、小偷、大盗、汉奸、狞笑、恶眼、悲愤、无耻、奇冤、一切，而且还有沉默。

原名《鞭》的五幕剧，以《雾重庆》的名称在雾重庆上演；想起这改题的名字似乎本来打算和《夜上海》凑成一副对联，总觉得带点生意眼，然而现在看来，“雾重庆”这三个字，当真不坏。尤其在今年！可歌可泣的事太多了。不过作者当初如果也跟我现在那样的想法，大概这五幕剧的题材会全然改观罢？我是觉得《鞭》之内容是包括不了雾重庆的。

剧中那位诗人，最初引起了我的回忆，——他像一个朋友：不是身世太像，而是容貌上有几分，说话的神气有几分。到底像谁呢？说不上来。但是今天在一件事的议论纷纷之余，我陡然记起了，呀，有点像他，再细想，似乎不像的多。不过这位朋友的声音笑貌却缠住了我的回忆。我不知他现在在哪里？平安不？一个月前是知道的，不过，今天，鬼晓得，罪恶的黑手有而且时时会攫去我们的善良的人的。我又不知道和他在一处的另外几个朋友现在又在哪儿了，也平安不？

于是我又想起了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先生说过那样意思的话：血的淤积，青年的血，使他窒息，于无奈何之际，他从血的淤积中挖一个小孔，喘一口气。这几年来，青年的血太多了，敌人给流的，自己给流的；我们兴奋，为了光荣的血，但也窒息，为了不光荣的没有代价的血。而且给喘一口气的小孔也几乎挖不出。

回忆有时是残忍的，健忘有时是一宗法主。有一位历史家批评最后的蒲尔朋王朝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但什么也没有学得，为了学得，回忆有时是必要，健忘有时是不该。没有出息的人永远不会学得教训，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不可免的将是长期而矛盾而且残酷，但历史还是依照它的法则向前。最后胜利一定要来，而且是我们的。让理性上前，让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让死难的人们灵魂得到安息。舞台在暗转。袁慕容的戏快完，家棣一定要上台，而且林卷好的出走的方向，终究会有下落。

据说今后六十日至九十日，将是最严重的时期（美国陆长斯汀生之言）；希特勒的春季攻势！敌人的南进，都将于此时期内爆发罢？而且那雾季不也

完了么？但是敌人南进，同时也不会放松对我们的攻势的！幻想家们呵，不要打如意算盘！被敌人的烟幕迷糊了心窍的人们也该清醒一下，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夜是很深了罢？你看鼠子这样猖獗，竟在你面前公然踱方步。我开窗透点新鲜空气，茫茫一片，雾是更加浓了罢？已经不辨皂白。然而不一定坏。浓雾之后，朗天化日也跟着来。祝福可敬的朋友们，血不会是永远没有代价的！民族解放的斗争，不达目的不止，还有成千成万的战士们还没有死呢！

1941年2月16日夜。

如是我见我闻（节选）

二 兰州杂碎

南方人一到兰州，这才觉得生活的味儿大不相同。

一九三九年的正月，兰州还没有遭过轰炸，唯一漂亮的旅馆是中国旅行社办的“兰州招待所”。三星期之内，“招待所”的大厅内，有过七八次的大宴会，做过五次的喜事，其中最热闹的一次喜事，还把“招待所”的主客房全部租下。新郎是一个空军将士，据说是清准了三天假来办这场喜事，假期一满，就要出发，于是“招待所”的一间最大的客房，就权充作三天的洞房。

“招待所”是旧式房屋，可是有新式门窗，绿油的窗，红油的柱子，真辉煌！有一口自流井，抽水筒成天 ka-ta-ka-ta 地叫着。

在上海受过训练的南方籍茶房，给旅客端进了洗脸水和茶水来了；嘿，清的倒是洗脸的，浑的倒是喝的么？不错！清的是井水，是苦水，别说喝，光是洗脸也叫你的皮肤涩巴巴地难受；不用肥皂倒还好，一用了肥皂，你脸上的尘土就腻住了毛孔，越发弄不下。这是含有多量硷质的苦水，虽清，却不中使。

浑的却是河水。那是甜水。一玻璃杯的水，回头沉淀下来，倒有小半杯的泥浆，然而这是“甜”水，这是花五毛钱一担从城外黄河里挑来的。

不过苦水也还是水。甘肃省有许多地方，据说，连苦水也是宝贝，一个人独用一盆洗脸水，那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奢侈！吃完了面条，伸出舌头来舐干那碗上的浓厚的浆汁算是懂得礼节。用水洗碗——这是从来没有的。老百姓生平只洗两次身：出世一次，去世一次。呜呼，生在水乡的人们哪里想得到水竟是这样宝贵？正如不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之可贵。

然而在洪荒之世，甘肃省大部分恐怕还是一个内海呢！今之高原，侍为海底。单看兰州附近一带山壁的断面，像夹肉面包似的一层夹着一层的，隐约还见有贝壳的残余。但也许是古代河床的遗迹，因为黄河就在兰州身边过去。

正当腊月，黄河有半边是冻结的，人、牲畜、车子，在覆盖着一层薄雪的冰上走。但那半边，滔滔滚滚的急流，从不知何处的远远的上游，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冰块，作雷鸣而去，日夜不休。冰块都戴着雪帽，浩浩荡荡下来，经过黄河铁桥时互相碰击，也碰着桥础，于是隆隆之中杂以訇豁的尖音。这里的河面不算仄，十丈宽是有的，站在铁桥上遥望上游，冰块拥挤而来，那上面的积雪反映日光，耀眩夺目，实在奇伟。但可惜，黄河铁桥上是不许站立的，因为是“非常时期”，因为黄河铁桥是有关国防的。

兰州城外的河水就是那样湍急、所以没有鱼。不过，在冬天兰州人也可以吃到鱼，那是青海湟水的产物，冰冻如石。三九年的正月，兰州的生活程度在全国说来，算是高的，这样的“湟鱼”，较大者约三块钱一尾。

三九年三月以前，兰州虽常有警报，却未被炸；兰州城不大，城内防空洞不多，城垣下则所在有之。但入口奇窄而向下，俯瞰宛如鼠穴。警报来时，居民大都跑避城外；城外群山环绕，但皆童山，人们坐山坡下，蚂蚁似的一堆一堆，老远就看见。旧历除夕前一日，城外飞机场被炸，投弹百余，但据说仅死一狗。这是兰州的“处女炸”。越三日，是为旧历新年初二，日机又

来“拜年”，这回在城内投弹了，可是空战结果，被我方击落七架（或云九架），这是“新年的礼物”。从此以后，老羞成怒的滥炸便开始了，几乎每一条街，每一条巷，都中过炸弹。四年春季的一个旅客，在浮土寸许厚、软如地毯的兰州城内关外走一趟，便往往看见有许多房子，大门还好好的，从门隙窥视，内部却是一片瓦砾。

但是，请你千万不要误会兰州就此荒凉了。依着“中国人自有办法”的规律，四年春季的兰州比一年前更加“繁荣”，更加飘飘然。不说俏皮话，经过多次滥炸后的兰州，确有了若干“建设”：物证就是有几条烂马路是放宽了，铺平了，路两旁排列着簇新的平房，等候商人们去繁荣市面；而尤其令人感谢的，电灯也居然像“电”灯了。这是因为一年中间整饬市容的责任，是放在一双有计划的切实的手里，而这一双手，闲时又常常翻阅新的书报——在干，然而也在朝四面看看，不是那种一埋首就看见了自己的脚色。

但所谓“繁荣”，却也有它的另一方面。比方说，三九年的春天，要买一块肥皂，一条毛巾，或者其他的化妆品，当然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可是货色之缺乏，却也显而易见。至于其他“洋货”，凡是带点奢侈性的，只有几家“百货店”方有存储，而且你要是嫌他们“货色不齐全”时，店员就宣告道：“再也没有了。这还是从前进来的货呢，新货来不了！”但是隔了一年工夫，景象完全不同，新开张的洋货铺子三三两两地在从前没有此类店铺的马路上出现了，新奇的美术字的招牌异常触目，货物的陈列式样也宛然是“上海气派”；陌生牌子的化妆品，人造丝袜、棉毛衫裤、吊袜带、手帕、小镜子、西装领带，应有尽有，非常充足。特别是玻璃杯，一年以前几乎少见的，这时也每家杂货铺里都有了。而且还有步哨似的地摊，则洋货之中，间或也有些土货。手电筒和劣质的向来水笔、自动铅笔，在地摊上也常常看到。战争和封锁，并没有影响到西北大后方兰州的洋货商——不，他们的货物的来源，倒是愈“战”愈畅旺了！何以故？因为“中国人自有办法”。

为了谋战争时的自给，中国早就有了“工合”运动。“工合”在西北大概颇组织了些手工业。但是今天充斥了西北大小城市（不但是兰州）里的工业品。有多少是“工合”的出品呢？真是天晓得。大多数商人不知道有所谓“工合”。你如果问他们货从哪里来的，他们毫不犹豫地答着：“天津”或“上海”。这意思就是：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还有中国人办的工厂，所以这些工业品也就是中国货了。偶尔也有一二非常干练的老板，则在上上下下打量你一番之后，便幽默地笑道：“咱们是批来的，人家说什么，咱们信什么：反正是那么一回事，非常时期吗，可不是？”

一个在特种机关里混事的小家伙发牢骚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组织，有包运的，也有包销的。在路上时，有武装保护，到了地头，又有虎头牌撑腰。值一块钱的东西，脱出手去便成为十块二十块，真是国难财！然而，这是一种特权，差不多的人，休想染指。全部的缉私机构在他们的手里。有些不知死活的老百姓。穷昏了，居然也走这一道，肩挑背驮的，老鼠似的抄小路硬走个十站八站路，居然也会弄进些来；可是，沿途碰到零星的队伍，哪一处能够白放过，总得点缀点缀。要是最后一关碰到正主儿的检查，那就完了蛋，货充公，人也押起来。前些时，查出一个巧法儿：女人们把洋布缠在身上，装作大肚子混进来。现在凡是大肚子女人，都要脱光了检验……嘿，你这该明白了罢，——一句话，一方面是大量的化公为私，另一方面则是涓滴归‘公’呵！”

这问题，决非限于一隅，是有全国性的，不过，据说也划有势力范围，各守防地，不相侵犯。这也属于所谓“中国人自有办法”。

地大物博的中国，理应事事不会没有“办法”，而且打仗亦既三年多，有些事也应早有点“办法”。西北一带的根本问题是“水”。有一位水利专家指点那些秃顶的黄土山说：“土质并不坏，只要有水！”又有一位农业家看中了兰州的水果，幻想着如何装罐头输出。皋兰县是出产好水果的，有名的“醉瓜”，甜而多汁，入口即化，又带着香蕉味一般的酒香。这种醉瓜，不知到底是哈密瓜的变种呢，或由它一变而为哈密瓜，但总之，并不比哈密瓜差。苹果、沙果、梨子，也都不坏。皋兰县是有发展果园的前途的。不过，在此“非常时期”，大事正多，自然谈不到。

三 风雪华家岭

“西兰公路”在一九三八年还是有名的“稀烂公路”。现在（一九四一年）这一条七百多公里的汽车路，说一句公道话，实在不错。这是西北公路局的“德政”。现在，这叫做兰西公路。

在这条公路上，每天通过无数的客车、货车、军车，还有更多的胶皮轮的骡马大车。旧式的木轮大车，不许在公路上行走，到处有布告。这是为的保护路面。所谓胶皮轮的骡马大车，就是利用汽车的废胎，装在旧式大车上，三匹牲口拉，牲口有骡有马，也有骡马杂用，甚至两骡夹一牛。今天西北，汽油真好比血，有钱没买处；走了门路买到的话，六六十元一加仑。胶皮轮的骡马大车于是成为公路上的骄子。米、麦粉、布匹、盐……以及其他日用品，都赖它们转运。据说这样的胶皮轮大车，现在也得二千多块钱一乘，光是一对旧轮胎就去了八九百。公路上来回一趟，起码得一个月工夫，光是牲口的饲料，每头每天也得一块钱。如果依照迪化一般副官勤务们的“逻辑”，五匹马拉的大车，载重就是五千斤，那么，兰西公路上的骡马大车就该载重三千斤了。三乘大车就等于一辆载货汽车，牲口的饲料若以来回一趟三百元计算，再加车夫的食宿薪工共约计七百，差不多花了一千元就可以把三吨货物在兰西公路上来回运这么一趟，这比汽车实在便宜了六倍之多。

但是汽车夫却不大欢喜这些骡马大车，为的他们常常梗阻了道路，尤其是在翻过那高峻的六盘山的时候，要是在弯路上顶头碰到这么一长串的骡马大车，委实是“伤脑筋”的事。也许因为大多数的骡马是刚从田间来的“土包子”，它们见了汽车就惊骇，很费了手脚才能控制。

六盘山诚然险峻，可是未必麻烦；路基好，全段铺了碎石。一个规矩的汽车夫，晚上不赌、不嫖、不喝酒，睡一个好觉，再加几分把细，总能平安过去；倒是那华家岭，有点讨厌。这里没有弯弯曲曲的盘道，路面也平整宽阔，路基虽是黄土的，似乎也还结实，有坡，然而既不在弯道上，且不陡；倘在风和日丽之日，过华家岭原亦不难，然而正因为风和日丽不常有，于是成问题了。华家岭上是经常天气恶劣的。这是高原上一条山岗，拔海五六千尺，从兰州出发时人们穿夹衣，到这里就得穿棉衣，——不，简直得穿皮衣。六七月的时候，这里还常常下雪，有时，上午还是好太阳，下午突然雨雪霏霏了，下雪后，那黄土作基的公路，便给你颜色看，泞滑还是小事，最难对付的是“陷”，——后轮陷下去，成了一条槽，开上“头挡排”，引擎是呜——胡胡地痛苦地呻吟，费油自不必说，但后轮切不着地面，只在悬空飞转。

这时候，只有一个前途：进退两难。

四 年的五月中旬，一个晴朗的早晨，天气颇热，人们都穿单衣，从兰州车站开出五辆客车，其中一辆是新的篷车，站役称之为“专车”：其实车固为某“专”人而开，车中客却也有够不上“专”的。条件优良果然下午三时许就到了华家岭车站。这时岭上彤云密布，寒风刺骨，疏疏落落下着几点雨。因为这不是普通客车，该走呢，或停留，车中客可以自择。但是意见分歧起来了：主张赶路的，为的恐怕天变，——由雨变成雪；主张停留过宿的，为的天已经下雨了，路上也许麻烦，而华家岭到底是个“宿站”。结果，留下来。那一天的雨，到黄昏时光果然大了些，有檐溜了。

天黑以前，另外的四辆客车也陆续到了，都停留下来。五辆车子一百多客人把一个“华家岭招待所”挤得满坑满谷，当天晚上就打饥荒，菜不够，米不够，甚至水也用完，险些儿开不出饭来。可是第二天早起一看，糟了，一个银白世界，雪有半尺厚，穿了皮衣还是发抖。旅客们都慌了，因为照例华家岭一下雪，三五天七八天能不能走，都没准儿，而问题还不在能不能走，却在有没有吃的喝的。华家岭车站与招待所孤悬岭上，离最近的小村有二十多里，柴呀，米呀，菜蔬呀，通常是往三十里以外去买的。甚至喝的用的水，也得走十多里路，在岭下山谷挑来。招待所已经宣告：今天午饭不一定能开，采办柴米蔬菜的人一早就出发了，目的地是那最近的小村，但什么时候能回来，回来时有没有东西，都毫无把握云云。

雪早停了，有风，却不怎样大。采办员并没空手回来，一点钟左右居然开饭。两点钟时，有人出去探了路，据说雪已消了一半，路还不见得怎样烂，于是“专车”的“专人”们就主张出发：“要是明天再下雪，怎么办？”华家岭的天气是没有准儿的。司机没法，只得“同意”，三点钟光景，车出了站。

爬过了一个坡以后，天又飘起雪来。“怎么办呢？”“还是赶路吧！新车，机器好，不怕！”于是再走。但是车轮打滑了。停车，带上链子，费去半小时。这期间，雪却下大了，本来已经斑驳的路面，这时又全白了。不过还希望冲出这风雪范围，——因为据说往往岭上是凄迷风雪，岭下却是炎炎烈日。然而带上链子的车轮还是打滑，而且又“陷”起来。雪愈来愈大，时光也已四点半；车像醉汉，而前面还有几个坡。司机宣告：“不能走了，只有回去。”看路旁的里程碑，原来只走了十多公里。回去还赶得上吃夜饭。

可是车子在掉头的时候，不知怎样一滑，一对后轮搁浅在路沟里，再也不能动了，于是救济的程度一件一件开始：首先是旅客都下车，开上“头挡排”企图自力更生，这不成功；仍开“头挡排”，旅客帮着推，引擎呜呜地叫，后轮是动的，然而反把湿透的黄土搅成两道沟，轮子完全悬空起来，车子是纹丝儿也没动。路旁有预备改造路基用的碎石堆，于是大家抓起碎石来，拿到车下，企图填满那后轮搅起来的两道沟；有人又到两里路外的老百姓家里借来了两把铲，从车后钢板下一铲一铲去掘湿土，以便后轮可以着地；这也无效时，铲的工作转到前面来。司机和助理员（他是高中毕业生）都躺在地下，在泥泞里奋斗。旅客们身上全是雪，扑去又积厚，天却渐渐黑下来了，大家又冷又饿。最后，助理员和两个旅客出发，赶回站去呼救，其余的旅客们再上车，准备万一救济车下来时，就在车上过夜。

这时四野茫茫，没有一个人影，只见鹅毛似的雪片，漫天飞舞而已。华家岭的厉害，算是领教过了。全车从司机到旅客二十八人，自搁浅当时起，

嚷着，跑着，推着，铲着，什么方法都想到，也都试了、结果还是风雪和黄土占了胜利。不过尚有一着。没人想到；原来车里有一位准“活佛”的大师，不知那顽强的自然和机械肯听他法力的指挥否。大师始终默坐在那里掐着数珠，态度是沉着而神妙的。

救济年终于来了，车上有工程师，有工人，名副其实的一支生力军。公路上扬起了更多的人声，工作开始，铲土，衬木板。带上铁丝缆，开足了引擎，拉，推，但是湿透了的黄土是顽强而带韧性的，依然无可奈何。最后的办法，人和行李都搬上了救济车，回了招待所。助理员带了铺盖来，他守在那搁浅的客车里过仅。

这一场大雪到第二天早晨还没停止，车站里接到情报，知道东西两路为了华家岭的风雪而压积的车辆不下四五十乘，静宁那边的客人也在着急，静宁站上不断的打电话问华家岭车站：“你们这边路烂得怎样？明天好走么？……呀，雪还没停么？……”有经验的旅客估计这雪不会马上停止，困守在华家岭至少要一个星期。人们对招待所的职员打听：“米够么？柴还够么？你们赶快去办呀！”有几个女客从箱子角里找出材料来缝小孩子的罩衫了。

但是当天下午雪停，太阳出来了。”明天能走么？”性急的旅客找到司机探询。司机冷然摇头：“融雪啦！更糟！”不过有经验的旅客却又宽慰道：“只要刮风。一天的风，路就燥了。”

果然天从人愿，第二天早上有太阳又有风，十点光景有人去探路，回来说：“坡这边还好，坡那边，可不知道。”十一点半光景。搁浅在路旁的那辆“专车”居然开回来了，下午出发的声浪，激荡在招待所的每个角落。两点钟左右，居然又出发了。有人透了口气说：“这回只住了三天，真是怪！”

沿途看见公路两旁斑斑驳驳，残雪未消；有些向阴的地方还是一片纯白。车行了一小时以后，车里的人把皮衣脱去，又一小时，连棉的也好像穿不住了。

四 白杨礼赞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百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儿罢？

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地有一排，——不，或者甚至只是三五株，一二株，傲然地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桠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肉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干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罢，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七“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

宝鸡，陕西省的一个不甚重要的小县、战争使它崭露头角。人们称之为“战时景气”的宠儿。

陇海铁路、川陕大道，宝鸡的地位是枢纽。主鸡的田野上，耸立了新式工厂的烟囱；宝鸡城外，新的市区迅速地发展，追求利润的商人、投机家，充满在这新市区的旅馆和酒楼；银行、仓库，水一样流转的通货，山一样堆积的商品和原料。这一切、便是今天主鸡的“繁荣”的指标。人们说：“宝鸡有前途！”

西京招待所的一个头等房间，弹簧双人床、沙发、衣橱、五斗橱、写字桌、浴间、抽水马桶，电铃，——可称色色齐全了，房金呢，也不过十二元五角。宝鸡新市区的旅馆，一间双人房的房金也要这么多，然而它有什么？糊纸的矮窗，房里老是黄昏，按上手去就会吱吱叫的长方板桌，破缺的木椅，高脚木凳，一对条凳两副板的眠床，不平的楼板老叫你绊脚，——这就是全部，再没有了。但是天天客满，有时你找不到半榻之地，着急得要哭。你看见旅馆的数目可真也不少，里把长的一条街上招牌相望，你一家一家进去看旅客牌，才知道长包的房间占了多数。为什么人们肯花这么多的冤枉钱？没

有什么稀奇。人们在这里有生意，人们在这里挣钱也来得痛快，房金贵，不舒服，算得什么！

而且未必完全不舒服。土炕虽硬，光线虽暗，铺上几层毡，开一盏烟灯，叫这么三两个姑娘，京调、秦腔、大鼓，还不是照样乐！而且也还有好馆子，陇海路运来了海味，鱼翅、海参，要什么，有什么。华灯初上，在卡车的长阵构成的甬道中蹁跹，高跟鞋卷发长旗袍的艳影，不断的在前后左右晃；三言两语就混熟了，“上馆子小吃罢？”报你嫣然一笑。酒酣耳热的时候，你尽管放浪形骸，贴上你的发热的脸，会低声说：“还不是好人家的小姐么，碰到这年头，咳，没什么好说啦！家在哪里么，爹做什么？不用说了，说起来太丢人呵！”于是土包子的暴发户嘻开嘴笑了，心头麻辣辣的别有一种神秘温馨的感觉。呵，宝鸡，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调旅馆的一位长客，别瞧他貌不惊人，手面可真不小。短短的牛皮大衣，青呢马裤，獭皮帽，老拿着一根又粗又短的手杖，脸上肉彩很厚，圆眼睛，浓眉毛。他的朋友什么都有：军，政，商，以至不军不政不商的弄不明白的脚色。说他手上有三万担棉花，现在棉花涨到三块多钱一斤了，可是他都不肯放。但这也许是“神话”罢，你算算，三块多一斤，三万担，该是多少？然而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有一部商车的钢板断了，轮胎也坏了，找他罢，他会给你弄到；另一部商车已经装好了货，单缺汽油，“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统制汽油多么严格，希望很少。找他罢，“要多少？”三百加仑！”开支票来，七十块钱一加仑，明天就有了！”他什么都有办法。宝鸡这地方就有这样不可思议的“魔木家”！

但是这天天在膨胀的新市区还不能代表主鸡的全貌。你试登高一看，呵，群山环抱，而山坳里还有些点点的村落。棉花已经收获，现在土地是暂时闲着；也有几片青绿色，那是菜，但还有这样充裕的“劳动力”的人家已经不多了，并且，一个“劳动力”从保长勒索的册子里解放出来，该付多少代价，恐怕你也无从想象。

离公路不过里把路，就有一个小小村庄，周围一二十家，房屋相当整齐，大都是自己有点土地的，从前当然是小康之家。单讲其中一家，一个院子，四间房，只夫妻两口带一个吃奶的婴孩，门窗部很好，住人的那房里还有一口红漆衣橱，屋檐下和不住人的房里都挂满了长串的包谷，麻布袋里装着棉籽。院子里靠土墙立着几十把稻草，也有些还带着花的棉梗搁在那里晒。有一只四个月大的猪。看这景象，就知道这份人家以前很可以过得去。现在呢，自然也还“比下有余”。比方说，六十月前，保长要“抽”那丈夫的时候（他们不懂得什么兵役法，保长嘴里说的，就是王法），他们还能筹借四百多块钱交给保长，请他代找一个替身。虽然负了债，还不至于卖绝那仅存的五六亩地。然而，棉花是在“官价”之下卖了出去，麦子的十分之五又是作为“军粮”，而换不到多少钱；天气冷了，他们的婴孩没有棉衣，只好成天躺在土炕上那一堆破絮里，夫妇俩每天的食粮是包谷和咸菜辣椒末，油么，那是不敢想望的奢侈品。不错，他们辽养得有一口猪，但这口猪身上就负担着丈夫的“免役费”的半数，而且他们又不得不从自己嘴里省下包谷来养猪。明年有没有力量再养一口，很成问题。人的脸色都像害了几年黄疸病似的，工作时候使不出劲。他们已经成为“人渣”，但他们却成就了新市区的豪华奢侈，他们给宝鸡赢得了“繁荣”！

九 秦岭之夜

下午三点钟出发，才开出十多公里，车就抛了锚。一个轮胎泄了气了。车上有二十三人。行李倒不多，但是装有商货（依照去年颁布的政令，凡南行的军车，必须携带货物，公家的或商家的，否则不准通行），两吨重的棉花。机器是好的，无奈载重逾额，轮胎又是旧的。

于是有组织的行动开始了。打千斤杠的，卸预备胎打气的，同时工作起来。泄气的轮胎从车上取下来了，可是要卸除那压住了橡皮外胎的钢箍可费了事。绰号“黑人牙膏”的司机一手能举五百斤，是一条好汉，差不多二十分钟，才把那钢箍的倔强性克服下来。

车又开动了，上坡，“黑人牙膏”两只蒲扇手把得定定的，开上头挡排，汽车吱吱地苦呻，“黑人牙膏”操着不很圆润的国语说：“车太重了呀！”秦岭上还有积雪，秦岭的层岚叠嶂像永无止境似的。车吱吱地急叫，在爬。然而天色已经从山谷中上来。忽然车停了，“黑人牙膏”跳下车去，俯首听了听，又检查机器，糟糕，另一轮胎也在泄气了，机器又有点故障。“怎么了呀？”押车副官问，也跳了下来。“黑人牙膏”摇头道：“不行呀！可是不要紧，勉强还能走，上了坡再说。”“能修么？”“能！”

挨到了秦岭最高处时，一轮满月，已经在头顶了。这里有两家面店，还有三五间未完工的草屋，好了；食宿都不成问题了，于是车就停下来。

第一件事是把全体的人，来一个临时部署：找宿处并加以分配，——这是一班；卸行李，——又一班；先去吃饭，——那是第三班。

未完成的草房，作为临时旅馆，说不上有门窗，幸而屋顶已经盖了草。但地下潮而且冷，秦岭最高处已近雪线。幸而有草，那大概是盖房顶余下来的。于是垫起草来，再摊开铺盖。没有风，但冷空气刺在脸上，就像风似的。月光非常晶莹，远望群山骈列，都在脚下。

二十二人中，有六个女的。车得漏夜修，需要人帮忙。车停在这样的旷野，也需得有人彻夜放哨。于是再来一个临时部署。帮忙修车，五六个人足够了；放哨每班二人，两小时一班，全夜共四班。都派定了，中间没有女同志。但是W和H要求加入。结果，加了一班哨。先去睡觉的人，把皮大衣借给放哨的。

跟小面店里买了两块钱的木柴，烧起一个大火堆。修车的工作就在火堆的光亮下开始了。原来的各组组长又分别通知：“睡觉的尽管睡觉，可不要脱衣服！”但即使不是为了预防意外，在这秦岭顶上脱了衣服过夜，而且是在那样的草房里，也不是人人能够支持的；空气使人鼻子里老是作辣，温度无疑是在零下。

躺在草房里朝外看，月光落在公路上，跟霜一般，天空是一片深蓝，眨眼的星星，亮得奇怪。修车的同志们有说有笑，夹着工作的声音，隐隐传来。可不知什么时候了，公路上还有赶着大车和牲口的老百姓断断续续经过。鸣鞭的清脆声浪，有时简直像枪响。月光下有一个人影从草房前走过，一会儿，又走回来：这是放哨的。

“呵，自有秦岭以来，曾有过这样的一群人在这过过夜否？”思绪奔凑，万感交集，眼睛有点润湿了，——也许受了冷空气的刺激，脸上是堆着微笑的。

咚咚的声音，隐约可闻；这是把轮胎打了气，用锤子敲着，从声音去辨

别气有没有足够。于是眼前又显现出两位短小精悍的青年，——曾经是锦衣玉食的青年，不过一路上你看他们是那样活泼而快活！

在咚咚声中，有些人是进了睡乡了，但有些人却又起来，——放哨的在换班。天明之前的冷是彻骨的。……不知那火堆还有没有火？

朦胧中听得人声，猛睁眼，辨出草房外公路上已不是月光而是曙色的时候，便有女同志的清朗的笑声愈来愈近了。火堆旁围满了人，木柴还没有烧完。行李放上车了。司机座前的玻璃窗上，冰花结成了美丽的图案。火堆上正烧着一罐水。滚热的毛巾揩拭玻璃上的冰花，然而随揩随又冻结。”黑人牙膏”和押车副官交替着摇车，可是车不动，汽油也冻了。

呵呵！秦岭之夜竟有这么冷呢！这时候、大家方始知道昨夜是在零下几度过去的。这发见似乎很有回味，于是在热闹的笑语中弄了草来烘汽车的引擎。

[附记]此篇所记，乃是一九四一年初冬，作者从延安到西安，又在西安坐了八路军的军车经过秦岭时的事实。此篇发表时也被国民党的检查官删去了一些句子，现在既无底稿，也记不清，只好就这样罢。

1958年11月13日作者补记。

十七 贵阳巡礼

二十七年春，队长沙疏散到贵阳主的一位太太写信给在汉口的亲戚说：“贵阳是出入意外的小，只有一条街，货物缺乏，要一样，没有两样。来了个把月，老找不到菜场。后来本地人对我说：菜场就在你的大门外呀，怎么说没有。这可怪了，在哪里，怎么我看不到。我请人带我去。他指着大门外一些小担贩说，这不是么！哦，我这才明白了。沿街多了几副小担的地方，就是菜场！我从没见过一个称为省城的一省首善之区，竟会这样小的！那不是城，简直是乡下。亲爱的，你只要想一想我们的故乡，就可以情度到贵阳的大小。但是我们的故乡却不过是江南一小镇罢了！可爱的故乡现在已经没有了，而我却在贵阳，我的心情。你该可以想象得到罢？”

二十七年冬，这位太太又写信给在重庆的亲戚说：“最近一次敌机来轰炸，把一条最热闹的街炸平了！贵阳只有这一条街！”

这位江南少妇的话，也许太多点感伤。贵阳城固然不大，但到底是一省首善之区，故于土头上脑之中，别有一种不平凡气象。例如城中曾经首屈一指的老牌高等旅馆即名曰“六国”与“巴黎”，这样口气阔大的招牌就不是江南的小镇所敢僭有的。

但“六国”与“巴黎”现在也落伍了。它们那古式的门面与矮小的房间，跟近年的新建设一比，实在显得太寒伦。经过了大轰炸以后的贵阳，出落得更加时髦了。如果那位江南少妇的亲戚在三十年的春季置身于贵阳的中华路，那她的感想一定“颇佳”。不用代贵阳吹牛，今天中华南路还有三层四层的洋房，但即使大多只得二层，可是单看那“艺术化”的门面和装修（大概是什么未来派之类罢），谁还忍心说它“土头土脑”？而况还有那么的大玻璃窗。这在一个少见玻璃的重庆客人看来委实是炫耀夺目的。

如果二十七年春季贵阳市买不出什么东西，那么现在是大大不同了。现在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以有关衣食两者为限。而在“食”这一项下，“精神食粮”当然除外。三家新书店在一夜间被封了以后，文化

市场的空气更形凄凉。

电影院的内部虽然还不够讲究，但那门面堪称一句“富丽堂皇”，特别是装饰在大门上的百数十盏电灯，替贵阳的夜市生色不少。几家“理发厅”仿佛是这山城已经摩登到如何程度的指标。单看进进出出的主顾，你就可以明白所谓“沪港”以及“高贵化妆品”，大概一点也不虚假。顾了头，自然也得顾脚。这里有一家擦皮鞋的“公司”。堂堂然两开间的门面，十来把特制的椅子，十几位精壮的“熟练技师”，武装着大大小小的有软有硬的刷子，真正的丝绒擦，黑色的、深棕浅棕色的、乃至白色的真正“宝石牌”鞋油，精神百倍地伺候那些高贵的顾客。不得不表白一句：游击式的擦鞋童子并不多。是不是受了那“公司”的影响，那可不知道。但“公司”委实想得周到，它还特设了几张椅子、特订了几份报纸，以便挨班待擦的贵客不至于无聊。

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这西南山城里，苏浙沪气味之浓厚。在中华南北路，你时时可以听到道地的苏白甬白，乃至生硬的上海话。你可以看到有不少饭店以“苏州”或“上海”标明它的特性，有一家“综合性”的菜馆门前广告牌上还大书特书“扬州美肴”。一家点心店是清一色的“上海跑堂”，专卖“挂粉汤团”，“绉纱馄饨”，以及“重糖猪油年糕”。而在重庆屡见之“乐露春”，则在贵阳也赫然存在。人们是喜欢家乡风味的，江南的理发匠、厨子、裁缝，居然“远征”到西南的一角，这和工业内迁之寥寥相比起来，应作如何感想？

“盐”的问题，在贵阳似乎日渐在增加重量。运输公司既自重庆专开了不少的盐车，公路上亦常见各式的人力小车满装食盐，成群结队而过。穿蓝布长衫的老百姓肩上一扁担，扁担两端各放黝黑的石块似的东西，用麻布包好，或仅用绳扎住；这石块似的东西也是盐。这样的贩运者也绵延于川黔路上。贵阳有“食盐官销处”，购者成市；官价每市斤在两天之内由一元四涨至一元八角七分。然而这还是官价，换言之，即较市价为平。

贵阳市上常见有苗民和彝民。多褶裙、赤脚、打裹腿的他们，和旗袍、高跟鞋出现在一条马路上，便叫人想起中国问题之复杂与广深。所谓“雄精器皿”又是贵阳市上一特点。“雄精”者，原形雄黄而已；雕作佛像以及花卉、鱼鸟、如意等形，其实并无作器皿者。店面都十分简陋，但仿单上却说得惊人：“查雄精一物，本为吾黔特产矿质，世界各国及各行省，皆未有此发现，其名贵自不待言；据本草所载，若随身久带，能轻身避邪，安胎保产，女转男胎，其他预防瘴气，扑杀毒蛇毒虫，尤为能事”云云。

所谓“铜像台”就是周西成的铜像，在贵阳市中心，算是城中最热闹，也最“气概轩昂”的所在。据说贵州之有汽车，周西成实开纪元；当时周“经营”全省马路，以省城为起点，故购得汽车后。由大帮民夫翻山爬岭抬到贵阳，然后放它在路上走，这恐怕也是中国“兴行汽车史”上一段笑话罢。

铜像台四周的街道显然吃过炸弹，至今犹见断垣败壁。

大地山河

住在西北高原的人们，不能想象江南太湖区域所谓“水乡”的居民的生涯；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也还不是江南“水乡”的风光。缺少那交错密布的水道的西北高原的居民，听说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那就是水阁的门），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欸乃，飘然而过，总有点难以构成形象的罢？

没有到过西北——或者就是豫北陕南罢，——如果只看地图，大概总以为那些在普通地图上有名有目的河流、至少比江南“水乡”那些不见于普通地图上的“港”呀，“汊”呀，要大得多罢？至少总以为这些河终年汤汤，可以行舟的罢？有一个朋友曾到开封，那时正值冬季，他站在堤上，却还不知道他脚下所站的，就是有名的黄河堤岸；他向下视，只见有几股细水，在淤黄泥沙中流着，他还问：“黄河在哪里？”却不知这几股细水，就是黄河！原来黄河在水浅季节、就是几股细水！

大凡在地图上有名有目的西北的河，到了冬季水浅，就是和江南的沟渠一样的东西，摆几块石头在浅处，是可以徒涉的。

乌鲁木齐河，那也是鼎鼎大名的；然而当我看见马车涉河而过的时候，我惊讶于这就是乌鲁木齐河！学生们卷起裤管，就徒涉了延水的事，如果不是亲见，也觉得可惊，因为延水在地图上也是有名有目的呀！

但是当夏季涨水的当儿，这些河却也实在威风。延水一次上流涨水，把“女人”用以系住浮桥的一块几万斤重的大石头冲走了十多丈路。

光是从天空飞过，你不能具体的了解所谓“西北高原”的意义。光是从地上走过，你了解得也许具体些，然而还不够“概括”（恕我借用这两个字）。

你从客机的高度仪的指针上看出你是在海拔三千多公尺以上了，然而你从玻璃窗向下看，嘿，城郭市廛，历历在目，多清楚！那时你会恍然干下边是高原了。但在你还得在地上走过，然后你这认识才能够补足。

你会不相信你不是在平地上。可不是一望平畴，麦浪起伏？可是你再极目远望，那边天际一道连山，不也是和你脚下的“平地”是并列的么？有时你还觉得它比你脚下的低呢！要是凑巧，你的车子到了这么一个“土腰”，下面是万丈断崖，而这万丈断崖也还是中间阶段而已，那时你大概才切实地明白了高原之所以为高原了罢？

这也不是平空可以想象的。

谢家的哥舒以“撒盐”比拟下雪，他的妹妹说，“未若柳絮因风舞”。自来都认为后者佳胜。自然，“柳絮因风舞”，多么清灵俊逸；但这是江南的雪景。如果说北方，那么谢家哥哥的比拟实在也没有错。当然也有下大朵的时候，那也是“柳絮”了，不过，“撒盐”时居多。

积在地上，你穿了长毡靴走过，那煞煞的响声，那颇有燥感的粉末，就会完全构成了“盐”的印象。要是在大野，一望皆白，平常多坎陷与浮土的道路，此时成为砥平而坚实，单马曳的雪橇轻溜溜地滑过，那时你真觉得心境清凉，——而实在，空气也清洁得好像滤过。

我曾在戈壁中远远看见一片白，颇惊讶于五月有雪，后来才知道这是盐池！

1941年8月19日。

客座杂忆

《新青年》谈政治之前后

民国十一年，《新青年》杂志对亚东图书馆脱离承印与代理发行的关系，在上海自立门户。同时“新青年社”内部亦有变动。“元老”之中，有几位已经貌合神离。《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本为陈独秀所创办，及提倡“文学革命”，同志始多，乃改名为《新青年》。“五四”前后，在北平编辑，并由数人轮流。至是既脱离亚东而自理印刷发行，编辑亦由陈独秀一人主持，时陈方由北平来居上海。编辑移沪后之第一册《新青年》即载有陈之《谈政治》一文，封面上有一小图案，则为一地球面上东西两手相握。内容多一专栏，似名为《苏俄研究》。

此一期之《新青年》可谓为结束了过去的以“文学革命”为中心任务的《新青年》，而开始了以“政治革命”为中心任务的《新青年》。据闻《谈政治》一文之立场即为“新青年社”若干老干部所不能同意，争持久之，结果，陈独秀乃挟《新青年》在沪立门户，以《新青年》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此时之《新青年》及陈独秀，虽已被目为赤化，然中国共产党实尚未成立，与第三国际亦未有正式关系。

其时谈唯物史观者，不仅陈等一派，亦有当时主持上海《时事新报》之笔政而以研究介绍法国唯心派哲学家柏格森之“创比论”出名之张东荪。在筹谋如何结党（共产党）之时，张亦参加。其后张到湖南走了一趟，归沪即发表《旅行内地之教训》一文，则议论大变，判若两人。当时人们颇怪内地旅行一次，何以对于张之思想竟发生影响如此之巨，似不可解；但据与张接近者言，则在旅行内地以前，张已得随梁任公游欧之某某函告，彼等一系之政治立场及文化工作方策，经已决定如何如何，张不能不改变论调，内地旅行而得教训云者，不过大转弯之过门而已。

《新青年》开始“谈政治”以后，在“理论”方面，实甚驳杂。罗素博士来中国讲学时，《新青年》译登罗之著作，而对于罗之思想体系，则未有批判。《苏俄介绍》一栏杂登当时苏联国内之政治、经济、民众组织、妇女解放等消息，殊嫌零碎，缺乏有系统之研究分析文章。盖此时之《新青年》情形颇为尴尬，将以之为“理论指导”之刊物乎，则能执笔写理论文字者亦甚寥寥，对唯物辩证法有研究者，其时仅一李大钊；将以之为批评现实政治问题之刊物乎，则月出一册而又庞然综合性之刊物，亦难以活泼而顾及时效。不久，陈独秀赴粤（主持当时粤省之教育委员会），《新青年》编务委托李汉俊，常告稿荒，出版亦不准期，又受外界压迫，终于停顿了。

此后《向导》周报出版，则中国共产党已正式成立，瞿秋白、蔡和森等亦归国，人手较多。是时仍有一度拟将批评现实政治问题之任务专归《向导》，而恢复《新青年》作为专门思想指导理论研究之刊物，但竟未实现。

周、杨姻缘之一幕

民十一年秋初，上海《民国日报》登有周佛海之启事，略谓共学社丛书中有渠所译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一书，但此为售与共学社者，除此售稿关系而外，渠与共学社别无关系云云。共学社者，梁任公等所组织之团体，

有丛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盖亦研究系文化运动之一别动队也。周之所以登此启事，则因其对彼方加入新成立之中国共产党。

暑假既完，周将返日本继续其大学生生活，爱人杨亦与偕。先是周与杨之恋爱曾得女之父母同意。杨父亦湘人，云是“实业家”，但在上海为寓公，思想顽固，而又势利；见周为穷学生，本不肯以女许之，但因女自愿，而妻亦袒女，遂无可奈何。至是周与杨女将东渡，杨父坚要二人先行一仪式。“革命家”之周佛海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恋爱观”上，当然不肯，且谓亦无“闲钱”作此一出戏。杨父知周为陈独秀一派，遂谓渠本人亦“研究过新文化”，欲与陈一谈。于是某夕，陈在寓中设宴，既为周杨饯行，兼请杨父母、又邀数友为陪客。杨父衣西装，脸刮得光光的，似甚年青。俨然新式企业家风度。席间，杨表示，渠思想亦颇新，惟新须有限度，人伦大礼，则不可废，并请陈以“前辈”资格教训周，使举行结婚仪式云。陈不置答，以他语乱之。席散，来客多去，唯杨尚无走意。其妻催之，则怒目而作色。既乃复提举行仪式之事，陈为解释此非必要，于是杨突然曰，不举行亦可，惟须陈为担保。陈大为惊异，谓恋爱为当事双方之自愿，局外人何能担保？杨固执，非陈担保不可，陈亦固拒，遂成僵同。杨妻力劝杨且归，女亦劝；于是杨勃然怒，厉声斥女，谓明天不许跟周佛海走！并大骂其无耻不幸。陈乃作色谓杨曰：“你要教训女儿，回家去再教训罢；这是我的公馆，你的女儿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不能在我这里骂我的客人！”

杨经此一顿抢白，老羞成怒，遽掌女颊，大骂“我生平未尝挨人一句骂，今乃为了你这贱人，受人之辱！”女泣。杨更怒。陈亦拍案大骂，喝令“出去！”时尚有陈友杨明斋未走，明斋山东人，身材魁梧，曾侨俄多年，说话结结巴巴，笑脸常开，颇有北平山东人铺子的掌柜的风度，攘臂要捶杨，谓其压迫女性。声势汹汹，不可开交。杨见势不佳，急夺门而走，犹扬言不认其女，不许她跟人私奔。是夜杨女未回家，即与周同宿旅馆中。次日，杨妻以女之衣箱铺盖，送至旅馆，周杨二人遂上船。

据闻后来杨犹不认其女与婿。直至北伐前夕，周登报脱离共党，杨之态度乃为之一变。及至周官运亨通，杨亦沾光，乃又自诩“巨眼识英雄”了。抗战前，周任江苏教育厅长，有人于周之公馆中见杨，则此丈人峰者，俨然以老管家姿态出现。其时周每周末必赴沪流连花丛，杨女曾追踪至，于妓院中找得周，当堂大闹。杨父闻之，怪女不知妇道，且自觉教女无方，异常惶恐。现在周又“荣任”伪财政部长，不知此老丈人又将以何种姿态出现了？杨如回忆前事，当感谢其同宗明斋先生；盖彼时尚非此山东大汉之“侠义的行为”，则杨女竟被其迫回家去也说不定罢？

民九以后沪报之副刊

“五四”前后，上海报纸有显明党派关系及政治立场者，《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及《中华新报》是也。《民国日报》为国民党机关报，人所共知，显明的三民主义立场，而副刊《觉悟》尤为锋利。当时邵力子为总经理兼编《觉悟》，《民国日报》经济颇不充裕，邵教书自给，《觉悟》外稿无半文稿费，然因其坚持前进的思想立场，进步人士多乐效劳，而青年投稿亦不少。邵尝语友：“为《觉悟》拉稿，较为报馆借钱，容易多矣。”齐卢战后，邵去沪赴粤，《觉悟》为陈某接编，不能继续邵氏之前进的思想立场，

《觉悟》逐渐失青年之信仰。

《中华新报》代表政学系，其时政学系人物，在南在北，皆有关系，然《中华新报》则以政治上之中间派姿态出现。此报经济亦不充足，销数亦平平，然每天有极为卖力之长篇社论，此在当时上海各报，殊为特出。当时主笔政者，即陕北榆林张季鸾也。民十三，《创造日》以副刊形式出现于《中华新报》。此为当时旅沪之创造社同人所办，而为之介绍者，似为中华学艺社之郑心南。其时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游历上海，张郑作东请他吃饭，成仿吾亦在。创造社拟有所作为，是在这宴会上偶然提起的，张极愿帮忙，后来就出版了《创造日》。但《创造日》之思想立场与《中华新报》本身截然不同；报是报，副刊是副刊。

《时事新报》为研究系机关报，亦人所共知。“五四”以前，对新文化运动持反对态度，其后急变而以提倡自居，副刊《学灯》曾在上海青年学生中有过一个较深的印象。但自张东荪“旅行内地”得了“教训”以后，报与副刊之态度亦渐分歧，《学灯》虽尚保持进步姿态，但偏于介绍，绝少批评。以“尼采哲学”起家之李石岑接编后，研究介绍之气味似尤为浓厚，读者以“花瓶”目之矣。

此三副刊者，《创造日》不久即停。盖《创造日》之在《中华日报》出版为“借地造屋”性质，非若《觉悟》、《学灯》之为报之一部分也。

陈某之春婆一梦

接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之陈某，其名不见经传，北伐以后之一年间，忽一跃而为上海党政之红人。陈浙人，曾在杭州之江中学肄业，后在苏皖两处中学任教，均不久于位。以投稿《觉悟》之因缘，拉住叶邵两公，苦求设法；最初进《民国日报》时，无固定职务，但常打杂于总编辑室，该同事戏以“总编辑房行走”呼之。其后邵离沪，《觉悟》无人主持，叶乃以陈承乏。自所谓“西山会议派”出现后，陈乃走运，俨然为此派在上海之一小头目矣。十六年宁汉分裂之时，陈以“反共”老资格，又当吴中无人之际，遂大活跃；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长及市政府教育局长之头衔遂加于一身，气焰薰人，不可一世，凭藉地位，向文化出版界施行敲诈，陈实力始作俑者。济南惨案后，上海爱国民众之抵制日货运动，陈又窃取以为个人发财之工具。一时悖入之资，据闻达二三十万。昔日之穷措大，骤获多金，几乎手足无措；小公馆多至六七个，临时太太八九人，犹且不自足，则利用地位，威胁利诱其属下之女职员。但陈最失算之处，则为不自量力，在当时之所谓“检查日货委员会”以及党政机关中皆思独霸称雄。结果，引起内部之磨擦，劣迹上通，虽有靠山，无可庇护，而陈犹梦梦。迨及南京一电来召，陈施施然去，尚不知祸事临头。至京，即受看押，后卒呕出其所攫之大半，始得释归。从此不能复起，拥其一妻二妾在沪“息影”思过矣。陈之春婆一梦，盖首尾仅年余云尔。

记李汉俊

今或无人忆及李汉俊矣。然李之品性学问实有足多者。

李汉俊，湖北人，国民党老同志李书城之弟，汉俊亦国民党员，而亦为

中国共产党结党时最初加入者之一，民十四脱离共党组织关系。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李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实心办事，努力要造福乡里；及武汉政府亦反共时，李持正论，遂与詹大悲同以共党嫌疑被杀。詹亦鄂人，当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纯粹国民党员，与共党素无何等关系者也。

汉俊罹难时已四十余岁。体貌素清癯，然精力过人。任鄂省教育厅长时，生活朴素，治事勤奋，盖犹是书生本色。先是京汉路二七罢工之时，李氏幕后多所策划，及罢工遭遇失败，李在汉口不能安居。时适陈独秀应陈炯明聘赴粤，李乃赴沪主编《新青年》，寄寓于乃兄之公寓，容身仅斗室。此时李氏无固定收入，恃卖文自给，常一夜草万字，而翌晨无倦容。李自幼留学日本。日语日文之造诣，即日人亦为惊佩。又英、法、德三国文字，能读能译，三者之中，法文较差。

李氏本学工科，既献身革命，然素志似不在著述，故译作亦不甚多，今则并单行之译本，恐亦久已绝版。方其主编《新青年》时，常告稿荒，李则漏夜写译以补足篇幅。自奉甚俭，除香烟瘾特大外，余无嗜好，衣服朴素，如乡下佬。不幸而罹祸，未得展其所长，实亦中国革命一大损失也。

民十前后上海戏剧界

中国最早之话剧团体为“春柳社”。主持为留东学生，时在民国以前。“春柳社”旧人今尚坚持话剧运动而业绩辉煌者，似仅一欧阳予倩先生矣。当时风气未开，“春柳社”诸君子之热心毅力，只落得一个碰壁。

然种子决非落于石田，民元二年间，“民鸣社”重整旗鼓，时值袁氏拥兵自重，方欲背弃民主，剪除革命势力。“民鸣社”则借舞台为反袁之宣传，因其能反映大多数人民之要求，故三马路大舞台前，观众拥挤，颇极一时之盛。然格于环境，“民鸣社”所演出者，亦只能限于侧面之讥弹。是时“民鸣社”之主要人物即后来从事电影业之潮州人郑正秋氏是也。然“民鸣社”终以政治关系，不得不偃旗息鼓矣。

其后上海戏剧界即有所谓“文明戏”者占一角地。而此实导源于“民鸣社”。一则“民鸣社”之演剧作风已颇有“文明戏”之气味，二则迨后干“文明戏”者，亦不乏出身于“民鸣社”之人物。

“五四”前后，“海派新戏”正以压倒的优势，称霸上海。此又非“文明戏”，而实力奇特形式。剧本为新编，题材或取之于旧小说，例如《狸猫换太子》与《济公活佛》之类，或取之于时事，例如《阎瑞生》。唱白兼有，则如旧戏，然而又以新式布景（所谓“机关布景”者是也），“九音联弹”资力号召。当时九亩地“新舞台”排演《阎瑞生》，因剧情中有阎瑞生赴水逃命一节，竟于舞台上布出其真水真景（广告上谓用水数百加仑，确系事实），而饰阎瑞生之汪优游则登台表演其游泳技术。“新舞台”为民九以前最讲究布景者，然其所谓讲究，一言以蔽之，则力尽可能的以实物上台。曾忆其某一戏中须有火车，则台上布置假火车，假轨道；以此震撼乡下佬。

是时之“海派新戏”，又皆竟尚冗长，连台十本，二十本，视为故常。

但即在此时，作为“海派新戏”之设计者与演员之重要人物之一的汪优游，乃决意提倡真正的话剧，而以《戏剧》杂志先作理论上之宣传。

汪为皖人，初学海军，与周作人为同学。其后乃入戏剧界。“五四”新

文学运动之潮流，使此一久在上海戏剧界混事之“汪老板”思想大变，力求前进，然因生计关系，汪尚不能脱离其所憎厌之舞台生涯，故初时仅欲以刊物宣传。《戏剧》月刊之创办，汪曾斥私资，且撰文甚多，化名批评旧戏并分析当时“海派新戏”盛极一时之社会原因，语多中肯而警辟。彼认为“机关布景”“九音联弹”连台十本二十本之“海派新戏”固无艺术价值，然而正足表示正宗京戏已不能满足生活基础大异于前之都市小市民之要求；此其立论，固亦有足取者。

《戏剧》月刊，不久即停。盖无实践的话剧运动，则纸上谈兵，终难持久。其后上海话剧运动日益发展，而汪反消沉，说者谓其生活与理想之矛盾，苦不得解决，亦为一因。抗战前一年（？），汪亦谢世。余以为汪颇有天才，惜因早年职业关系，造成一定型之生活，不能摆脱，终于束缚其发展，未始非一生活之悲剧也。

萧楚女与恽代英

民十四五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在当时青年运动上，为一权威的刊物。常在《中国青年》撰稿诸人中，其尤受读者欢迎而影响巨大者，当推萧楚女与恽代英。

萧楚女为湖北人，与恽代英同乡。楚女略长数岁。二人皆健笔，又同为天才的雄辩家，其生活之刻苦又相似。平居宴谈，都富于幽默味；然楚女纵谈沉酣时，每目瞑而脸歪，口沫四溅，激昂凌厉，慑震四座，代英则始终神色不变，慢条斯理，保持其一贯的冷静而诙谐的作风。

二人之文，风格亦不同，代英绵密而楚女豪放，代英于庄谐杂作中见其煽动力，楚女则剽悍劲拔，气势夺人。其于演讲亦然。楚女之演词，有如进军鼓角，代英则有时嘲讽，有时诙谐，有时庄言，历二三个小时，讲者滔滔无止境，听者亦无倦容。然雅俗共赏，刺激力强，则又为二人所共同擅长。

当“楚女”之名见于各报各刊物时，读者每以为一女性作家。及知为一男子，则又想像其气度，以为必潇洒风流，神采照人。某次一集会，楚女已先到，有未与楚女谋面者询曰：“萧楚女还没到么？”楚女即应声答曰：“一开会、他就到。”众皆哄然大笑。盖楚女身材高大，面黑而麻，服装随便，有丘八风，远非美男子之伦。然楚女以是久久不得爱人。会有曾往苏联学习归来之郭女士（河北人），亦以未有配偶，郭亦魁梧而面麻，两方捻友咸谓此乃“门当户对”，因为之介。然二人既相晤后，意都不属。民十六春，楚女在粤殉难，犹是独身。而郭女在北方工作，不久亦为捕杀。

民十五春二月，楚女自沪赴广州，任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兼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军校学生听楚女课者，凡二三千，大礼堂亦不能容，则在操场中授课。第一次上课，讲未多时，值日官请楚女“再高声些”。楚女嗓子本颇洪亮，然因在露天，人数又多，后排者尚不能听清，于是楚女运气高呼，不意用力太猛，裤带崩断，幸钮扣尚固。裤仅稍落。楚女乃一手按腰，讲完了九十分钟。厥后楚女语人：“此为生平第一次窘事”云。

然楚女性格，又有其极温婉之一面。朋辈偶闹意见，楚女常为排解。某君夫妇反目，楚女力劝其妻，卒归和好。

北伐军兴，楚女因肺病不能从军北上，留广州东山医院疗治。翌年病更剧。然仍不能免祸。被捕之日，呕血数碗，两人挟持之，始能步出医院，旋

即被害。

代英毕业武昌文华大学，初为“少年中国社”有力分子，后加入中共，为青年运动之健将，曾任少共中执委。北伐前，上海国民党党务工作受多方面之压迫破坏，为最艰苦之时代，其时代英埋首为国民党地下工作，任上海特别市党部之宣传部长。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代英为上海六代表之一，赴广州出席。在大会中发挥其演说之天才，备受到会代表之拥护。大会闭幕后，代英留粤，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因其学养有素，器识凝重，办事负责，生活刻苦，颇得员生信仰。国民政府移武昌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成立，代英仍为政治总教官。一日，校中同事或言代英将结婚，询之，则莞尔曰：“不抱独身主义的人，大概总有一天会结婚的罢。”再询以日期，则谓“连我也还没知道呢”。越二三月，代英忽请假一天，此力破天荒之事，于是断走其将结婚属实。不料次日一早，代英施施然来，仍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冷静而和善的神气，仅新剃了头。来即办公。有询以婚事，则慢条斯理答道：“不是昨天已经结过了么？”

代英与其夫人，本属中表，幼时订婚。代英奔走革命，以有家室为累，本要抱独身主义，曾以此意函告父母，其未婚妻闻之，则亦以独身自矢，并教小学自给。至是，代英既因职务在武昌有较长期之居留，遂遵父母之命结婚。夫人端庄淑静，生活亦极朴素，婚后仍教小学。

政变以后，代英复居上海，仍尽力于革命。艰难困苦，非片言可尽。越一载，一机关破获，代英被执，判五年监禁，然而不知其为恠代英也。期满将释，复有叛徒告密，移解以后，即被害。

代英刻苦宽厚，无丝毫嗜好，未尝见其疾言厉色，友朋呼之为“圣人”。终年御一灰布长袍，不戴帽。体貌清癯，而精力过人。横遭挫折，不得展其抱负，是亦中国革命一大损失也，呜呼！

武汉时代之民运

武汉时代，民运一时称盛。顽梗者流，遂相惊伯有。然当时民运，因在法律范围以内，未尝有越轨举动也。当时上海报纸载汉口有裸体游行，此犹孙传芳为五省联帅时屡次谓广州有裸体游行，实行公妻等等，同为不值识者一笑。

当时民众运动，在武汉三镇，实不过工人组织工会，店员组织店员职工会而已，皆遵照国民政府法令为之。但因事属初办，干部缺乏，故幼稚行为，间或有之。例如妇女工作者宣传解放缠足，守候于工厂门首，对女工宣传，见十三四幼女双足初裹，愁眉泪眼，一步一拐，因即劝令当场解放。而顽梗者流，即谓妇女协会派人拦街强迫放足矣。又有一事，亦颇堪发噱：五一节有民众大会，党国要人都出席演说；武汉总工会事前通知各工会及职工会，是日凡各工会职工会会员赴会者，一律不得穿长衣。不料有某工会之纠察队（都为十六七岁之少年）误以为凡赴会者不得穿长衣，于是严厉执行，国民政府农政部秘书长某穿长衫，为所检举，倘不服从，便要剪去长衫下幅，闻当时确有一二人被剪。旋为上级所闻，即予制止。然顽梗者流，又扩大宣传矣。

厥后“民运过火”一词，居然成为定谳，有关方面，开会讨论，认为严重政治问题。其实“过火”论者，根本讨厌民运，但因三大政策在上，尚不

便直言心臆耳。盖倘认明是工作方式或技术问题，则纠正之道，固亦易易也，何必泼盆中污水连小孩也泼出去。

工商学联合会时代之上海学联会

“五四”以后，上海学联会内部涣散，无复“六三”运动时之虎虎有生气。当时二三“健者”，或已毕业而放洋，或竟别有出路，一时都散，留贻学生群众之印象仅为风头主义与桃色故事而已。

但不能因此而遂谓上海学生本身无革命精神。上海学生群众之为革命的小布尔知识分子的先驱，盖无疑义。“冒险家乐园”之上海，洋场十里，充塞买办政客投机作风，其必反映于学生界而在每次群众运动高潮时产生若干“弄潮儿”，宁为理之当然，若执此而诟病上海学生群众，实非确论。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后，上海学生运动乃始有新的开展。其时学联会虽仍不振，然个别学校之觉悟的学生群众则在改组后国民党之革命的宣言与纲领影响之下，已开始深入群众，作革命运动。及“五卅”运动爆发，遂如狂飚忽至，万木齐鸣，曾有“六三”革命传统之上海学生群众投入于此大运动中，即素以埋头读书不间外事为训之学校亦不能自外，造成空前的上海学生之大联合，产生盛极一时之上海学联会。

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后，上海学联会与全国学联会并为其构成份子；然因运动之中心在上海，故上海学联会在工商学联合会中之比重，实驾全国学联会而上之。当时上海中等以上公私各校盖无不加入上海学联会，其借在南市某校（似为东南体师）之办事处，规模阔大，组织严密，方运动正在高潮时，学联会中人进人出，车马阗杂，俨然一大行动机构。

然当运动因受外力之分化而造成内部之龃龉，各马路商界联合会首呈动摇，而运动陷于危机之时，此庞大之学联会亦反映此一切而发生了内部的纠纷。有所谓“法律派”者在评议会中提出若干技术上之问题，争论不已，一再开会，既虚耗宝贵之时间，亦已吸引群众目光对内而忽略外间整个运动之险恶危机。评议会盖学联会之“立法机构”，以学校为会员单位，论票数则所谓“法律派”者实居少数，然因此派中人大都代表较为绅士式之学校，为统一战线计，学联会负责诸人特别对之客气云。

是年七月以后，运动在各种高压破坏之下，遂告终结。上海学联会几被逼为不合法团体。向者高谈阔论之辈忽然不见，学校单位之会员无形中减少，工作不得不转为潜伏。然而经此一度大动员大检阅，大斗争与大锻炼，上海学生群众之组织与实力乃大非昔比，而坚苦卓越之人才脱颖而出者亦颇有之，是为后此一九二七大革命时代之少壮派之精华。然厥后十年安内，又摧折殆尽矣。

湘人之幽默

一九二七年，武汉方面正以“过火”为题目而攻击当时之民众运动，对湖南之农民运动，尤谈虎色变，若大祸已在眉睫。及诘以湖南农民运动究有何等下法之处，则大抵膛目不能答，仅忿然曰：“搅的不成样了，何用多问。”时有英美方面某某报纸之驻汉通讯员必欲访得一二所谓“过火”之材料，询之农政部，则该部亦不能答。

其后，湖南省农民会之报告渐传于外，于是始知所谓“过火”之真相；当时《汉口民国日报》亦载湖南通信，于是农村纠葛之因果及所谓“过火”之事实，始为众所知。有熟悉湘省农村情形之某公见之笑曰：“此特湘人之幽默耳！称之曰过火，得毋过当？”

今就记忆所及，略言其经过。北伐军事进展之迅速，得农民之助力不小，此为周知之事实。然湘鄂赣三省之农民运动，则在北伐以前，即已开展，就湘省而言，在北伐前夕，有组织之农民已不下百余万人，故能与北伐军作有力之配合。湘鄂底定以后，农民协会为合法团体，发展更速，呻吟于生活水平线下之农民当时所要求者，亦不过政府所预约之“减租减息”得以兑现而已。但地方土劣豪强则依然满头脑“土皇帝”思想，不但不遵法令减租减息，且禁止佃户加入农民协会，以收回耕地另行出租为要挟之具。当时武汉政府未能对此作有效且合理之措置，于是纠纷日多。农民迫不得已，乃取自卫之手段，是即喧传一时之所谓“过火”；但细考其自卫之方法，则固甚幽默也。其时流行之方式有一为“吃排家饭”。此为湘省农民所发明。当时湘省各县官厅仍多与土劣通声气；佃户依新法令缴租缴息，而上劣则仍认为“欠租欠息”，于私自拷打以后，往往送请官厅拘押，农民协会请保释无效，全村农民乃思得一法，聚集一二百人拥往该土劣之家，坐待被拘押者之释放，如过饭时不放，众人即自动开饭，坐守一日不放，即吃饭三顿。当时湘省米价甚廉，然一二百人开饭二三顿，土劣不能不感肉痛，结果只有将拘捕者释放了事。

又一则为“游街”，而且戴木制之大帽子。此亦始行于湘省。盖土劣之与北方军阀有勾结而在农村中破坏捣乱者层出不穷，而官厅亦半痴半聋。农民协会搜得证据，告诸官厅，官不理，土劣乘势反雇地痞殴打农民，于是农民聚众示威，请该土劣“游街”，戴一纸帽，上书该土劣所犯条款。其后因纸帽易碎，往往游街未终，而帽子破碎，乃改用木制。游街既毕，仍送该土劣归家。此为“名誉的制裁法”。盖游街之时，该土劣除戴有帽子外，固与其他游行者毫无区别也。

此两种办法，即为当时所谓“过火”之唯一材料，然持平而论，则固甚幽默，而要亦为土劣所自取。

“算盘珠”与“酱色的心”

陈某于“五四”时为北大教授，《北京大学月报》出版时，陈写稿甚勤，多谈法律。其时陈无甚色彩，第与李守常陈独秀颇接近而已；或谓陈在北大，不为英美派所重视（陈为留东学生），颇不得志，故有“左转”之倾向，信否不可知，倘亦所谓“酱色的心”欤？

其后，因亭林君之助，陈乃得游学欧洲，意在专攻“马氏经济学”，壮志可嘉。在欧洲时，倾向乃定，后复赴俄，居年余，北伐前一年归国，仍在北平执教鞭，是时已不讳言为共党矣。“三·一八”段祺瑞卫队汗枪射击北平示威游行请愿群众，当场死者二十六人，重伤二百余人，在医院因伤致死者复二十余人，同时段政府又通缉大批党人，于是陈某遂南下，迨抵广州，则已在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以后矣。此时陈仍为“跨党份子”，然尝对人呼冤曰：“国民党视我为阳国而阴共，共产党又视我为阳共而阴国，左右为难。”言下若不胜苦闷云。

北伐军攻下武汉，并定为临时首都，陈亦随往，其时两党虽有联席会议，而纠纷不稍减；然所谓“纠纷”，有甚琐细可笑者，举其一例，则为陈所主编之报纸之广告牌忽然不见之一事。陈主编之报，归中宣部直辖，曾在汉阳门轮渡口之城壁上，钉一匾式之广告牌，乃因工料不佳，数日后为大风吹落，由汉阳门派出所之警士抬去，存放分所中。其时适有湖北省党部所办之《民国日报》亦在该处城墙上装一同式之广告牌，于是有人遂谓后者乃劫夺前者而改成；复因《民国日报》素彼目力共党人所主持，此不足道之广告牌事件竟遂牵涉到两党关系；而陈尤张皇其词，并以共党党员资格告陈独秀，谓“同志”不应如此“幼稚”，主张应予严厉查究。厥后汉阳门派出所公函既到，原物又赫然保存于分所，乃知此所谓“纠纷”，实风姨恶作剧而已。

民众运动“过火”之论既作，陈亦为“过火论”者；然居常自诉其“左右为难”如故。夏斗寅叛变既作，武汉政府初尚梦梦，及夏军迫近乃知事亟，仓卒命中央军政校学生改编之模范师拒之，而以叶挺为司令，在近郊土地堂接战，夏军败溃，武汉始转危为安。当土地堂捷报未至时，武汉少数头脑“灵敏”之权贵，皆认为事已不可为，人心惶惑，汉口法租界之旅馆骤多临时之旅客。陈所主持之报馆中同事，亦要求发若干月薪，以备“逃难”之需。陈往见亭林君请示，亭林君则告以“毋须慌张，款不能发”，并令陈不得离岗位。陈询讨夏军事，则答以消息甚好，完全无问题，——实则此时所得军讯，正恶劣万状也。陈当时放心而退。及夜半，消息甚恶，急再觅亭林，则不可得。事后陈殊快快。会有共党中人讥陈为“所跨何党者”，陈则举此事以自明其洁白曰：“你们骂我给某人做走狗，其实人家何尝以走狗视我呢！”

清党而后，陈居日本一二年，盖亦为“亡命客”也，或疑陈此时为第三党之东京特派员，陈否认与第三党有关系，但亦自承彼在第三党中颇多友好，故有时为友谊上之帮忙，第三党人路过东京者，常代为招呼。又尝慨然语某君曰：“从前我是做了算盘珠，任人拨弄，听人打算，今后我不再做算盘珠了，有人邀我如何如何者，我先要自己打一通算盘。”时光荏苒，今又十年矣，陈氏似能自守此算盘，然而彼在东京时一度寄情于小说而所作之《酱色的心》，则由今视之，固宛然渠之自写照也，傥亦所谓下意识之流露欤？

所谓“小拉塞尔”者

曩有所谓“北大三杰”者，盖指邓中夏，张某，刘某，皆北大出身，加入共党极早，且有声于时者也。邓早已殉难，盖棺兹已论定。刘张今后之变幻，尚不可知，然十余年来，白云苍狗，现实无情，遂使毕露原形。

刘当从事革命之初，自居为“小马克思”，而张则为“小拉塞尔”；其后“小马克思”变为“小托洛斯基”，张亦不肯示弱，卒“排万难”而现身为“小犹太”，前年一纸自白，真叫罔两匿笑，狐鼠惭形，呜呼，亦“人杰”矣！

“小拉塞尔”当初，实以所谓“劳动组合书记部”起家。此为一九二二年存立于上海之组织，为中共劳工运动最早之全国性的机关。曾在此中显身手者，今已风流三散，变幻不可究诘矣。张据此组织，当时即有个人野心，不久，中共内部第一次之“小组织”阴谋发现，此“小拉塞尔”者实为其组织人。经过内部斗争以后，“小拉塞尔”曾当众自认其错误，且“宣誓”洗手收心，——此为渠之第一次“自白”，然口头指天誓日，暗中偷偷摸摸如

故，“惟多一次，已长一智”，方式逐渐巧妙，形踪弥以诡秘。拿手好戏有二：一为私人间往来，谦恭亲热，易得天真之青年之好感；二为遇有公开批评，常能看风使篷，见不可抗时，立即“悔悟”。但仍有一套话，以掩饰其“错误”之动机。

一九三 年后，张在鄂豫皖区，于军事工作人员中积极培植一己之势力，及“围剿”既急，渠遂拖大部之队伍，西向而入汉中，复转川北。是时与中共既失联络，此“小拉塞尔”遂如脱羁之马，充分发挥其“军阀作风”。此为渠之全盛时期。其后朱毛大军北上，“小拉塞尔”想要打通所谓“国际路线”，提军而西，遭受重大损失。“西安事变”时，渠对和平解决又有异议。然而“七七”以后，此公忽又渴思“迁地为良”，终于借往祭桥山黄陵之机会，“排万难”而以一纸自白作裸体舞。

“两湖书院”之风光

北伐期间，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址在武昌两湖书院，进二道门，即有一大池，两边走廊环抱，池水深处约可丈许，而碧波涟漪，了无其他点缀，不知当初建筑此两湖书院时，何以忽在二道门后辟此大池也？既借为军校校址，此池于风景无补，于军容有碍，盖两旁游廊极仄狭，数千学生整队而出校时，双人行列勉强可过，虽以包抄队形，夹地而并进，亦需时甚久，始得通过完毕。

“两湖书院”之军校，历史甚短，然此大池，却曾目击一桩浪漫的悲喜剧。当时军校学生、分数处招考，到武汉后再行复试，复因各地纷赴武汉之男女青年要求迫切，于是在武汉又补行招考一次。等待复试与补考者之男女青年，不下数千人，武昌斗级营之旧式旅馆家家住满，尽为此辈未来之军官学生，历时既久，考生间遂有由不识而相识，相识而相爱者，甚至有未及进校而革命种子已经胚胎。但当此革命高潮时期，人事变化正多，初相恋者后或移情，终于在“入学”期间，发生失恋者，而此一池春水遂力引诱自杀之场地。幸而发现尚早未酿人命。后有一时期，校方遂派步哨于他之四周，以防杜未然。但自夏斗寅事变后，军校学生既改编为模范师，且以嗅过火药味，而五百余人之女生队亦大半云散，至是“两湖”风光始全部军事化矣。

开荒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亿万年以前，地壳的一次变动，把高高低低的位置，全改了个样；亚洲中部腹地有那么一长条，本来是个内海，却突然变成了高原了。于是——在亿万年的悠久岁月中，从北方吹来的定期的猛风，将黄色的轻尘夹带了来，落在这高原上，犹如我们的书桌隔一天会积一皮尘埃；于是——悠久的亿万年中，这黄色的轻尘竟会积累得那么多，那么厚，足够担负千万人类生息的任务。

这就是我们今天叫做西北黄土高原的。

你以为这是神话么？随你高兴怎么想就怎么想罢。但这是人类的智慧现在所达到的最科学的假说，这是有土里发现的一些化石贝壳来给这“假说”撑腰；而且，黄土高原之赫然雄踞在那里，可真是百分之百的现实呵！

让我们再来想象一下：又是亿万年以前，或许是这高原的史前，洪荒世界的主人翁——大爬虫，比现在的一列火车还长还大的爬虫（蜥蜴），曾在这个地方蕃息，昂首阔步；巨大的羊齿类植物曾在这个地方生长，浓绿密布；那时候，不是现在那样童山濯濯。

你以为这是神话么？随你高兴怎么想就怎么想罢。但是，大爬虫的遗骸，就在前年被掘出来了；这是偶然的发现，打窑洞的时候掘得了一节，后来就从旁再打数洞，又得了数节。现在这遗骸就陈列在延安边区政府，这是现实！

最后，让我们再作一次“想像”：在这苦寒的黄土高原，现在有怎样的人们在于怎样的事？有说各种方言的，各种家庭出身的，经过各种社会生活的青年男女，在那里“开荒”。曾经是摘粉搓脂的手，曾经是倚翠偎红的臂，现在都举起古式的农具，在和那亿万年久的黄土层搏斗——“增加生产”，一个燃烧了热情的口号！而且还有另一面的“开荒”——扫除文盲，实行民主，破除迷信，发展文艺，提倡科学……

你以为这是神话么？随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罢！然而，正像黄土高原是现实一样，这也是现实，活生生的现实呵！

从前，大自然的力量，曾经创造了这黄土高原；如今，怀抱着崇高理想的人们，正在改造这黄土高原。信不信由你，然而这都是现实！

记“鲁迅艺术文学院”

我猜想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贫寒的西北角，有这样一个学校。

在广大的中国，在全民族为求自由解放而抗战已经四年，正迫切地需要坚强勇毅的文艺战士的今日，纪念鲁迅先生的学术机关，现在还只有这一个；而把文学艺术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和生活认识与革命经验密切地联系配合起来的，现在也还只有这一个“鲁迅艺术文学院”。

我想来一定早有人介绍过这个学校了，但是，象征着中华民族新生力量的“鲁艺”——即“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简称，是一天天在进步，在发展。我虽不文，但如能就我亲见亲闻、记下它的发展史中的一页，或者也是读者所乐许罢：

一九四一年之五月，我从新疆迪化四川内地，经过西安的时候，就打算到延安去参观，刚好有便车，五月廿四、五，到了延安，六月初，借寓于“鲁艺”所在地的桥儿沟的东山，一住四个月，双十节始离延安南下至重庆。这四个月，我可说是和“鲁艺”生活在一起的；我在我的寓居——窑洞里，可以听得山下“鲁艺”上课下课的钟声，可以听得音乐系的学生们练习合唱，我走出窑洞，在门外的空场上停立，就可以看见山下“鲁艺”校舍的全景，看见一律灰布制服的男女学生在校舍各处往来；我向对面看，则西山那一排。新开始的整整齐齐的窑洞以及那蜿蜒曲折而下，数百步的石级，实在美丽而雄壮；那是“鲁艺”附属的美术工场所在。我还可以俯瞰东山与西山之间那“山谷”中的一片绿野，这里布满着各种农作物，——青菜、茄子、玉蜀黍、南瓜、洋薯、番茄——而番茄尤为桥儿沟的特产，是从前一个西班牙的神甫从西方带了种子来的。这许多繁茂的农作物之中，有一部就是“鲁艺”师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生产”的果实。你如果读过夏蕾女士（她是在“鲁艺”教书的某著名漫画家的夫人）的《生产插曲》，你就知道生产运动在“鲁艺”简直是一首美妙的牧歌呵！

从我所住的窑洞出去，沿着半山腰的路，绕过另一山头，便到了延安颇有名的“鲁艺教员东山住宅区”。这也一律是窑洞，这里是文艺家之家，但正因为住的人是文艺家，所以每一个窑洞的布置装饰各各不同，充分表现出那主人的独特的个性来。每一个艺术家运用他巧妙的匠心，从最简陋的物质条件中亲手将他们的住所（窑洞）布置得或清雅，或明艳，或雄壮而奇特。每当夕阳在山，红霞照眼，这遥遥相对的东西两山，（教员住宅区与美术工场区）便有一簇一簇的人儿，在他们门前的广场上（请记得，这是在山顶，而且扩展成为大可作球戏的广度，而且横跨了两三个山头的），逍遥散步，谈天游戏。

艺术家的夫人们，用她们自制的小坐车推着孩子们慢慢地走，或者是抱着挽着她们的孩子们聚在一堆谈天。她们也是一律的灰布制服，但是她们的“小天使们”却一个个打扮得新奇艳丽——用了她们在“外边”所穿的衣服为原料，用了她们巧妙的勤劳的十指。你也可以看见那边一小堆人谈论得很热烈，从前线回来不久的小说家荒煤，在滔滔不绝有声有色讲述前方的文艺工作，民众运动；巨人型的木刻家马达，叼着他那手制的巨大烟斗，站在旁边听，照例是只把那浓眉的耸动来代替说话。

爽朗的清脆的甜蜜的各样笑声，被阵阵的和风，带到下边的山谷里，背驮着斜晖的牛羊从对面山坡上徐徐而下，而“鲁艺”的驴马群也许正在谷中

绿草地上打滚嬉戏地追逐。

“鲁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就是这样的！

“鲁艺”的校舍是延安唯一的道地的西式建筑。大约是一九二五年罢，西班牙的神甫在桥儿沟经营了这巍峨的建筑。全体是石头和砖的，峨待式的门窗，可容五六百人的大礼拜堂（现在是大礼堂），它那高耸入云的一对尖塔，远远就可以望到，那塔尖的十字架也依然无恙，“鲁艺”美术系的一个学生——富有天才的青年木刻家古元，曾经取这从前的“大礼拜堂”及其塔尖为题材，作了一幅美妙的木刻，题名曰《圣经时代已经过去了》；正像这幅木刻所示，现在这所巍峨的建筑四周的大树荫下，你可以时时看见有些男女把，一只简陋的木凳子侧卧过来，靠着树干，作成一种所谓“延安作风”的躺椅，手一卷书，逍遥自在的在那里阅读。大礼堂内，昨天是讲演会，有学问有经验有斗争历史的“老干部”讲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形势，或者是从前线回来的老战士作一个华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动态的报告，或者是“长征的英雄”演述长征的故事，青草地，猓猓国，雪山，大渡河。但今天则是赏心悦目的晚会了，“鲁艺”的“实验剧团”演出了果戈尔的，莫里哀的，莎士比亚的不朽名作。或者是曹禹的《雷雨》和《日出》，或者是“鲁艺”戏剧系教师王震之（也是不久以前刚从前方回来的）根据了华北前方的实际生活新编的四幕剧《佃户》，或是又是姚时晓的现实主义的独幕剧《棋局未终》和《闲话江南》了。那时候，你会惊异，哪里来的这么婀娜潇洒的都市风的摩登姑娘？在桥儿沟，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呀！然而这是“实验剧团”的演员，“鲁艺”戏剧系的助教或学生；昨天也许她还身上是灰布制服，脚上是草鞋，在“生产队”中抡起了锄头；她是从大都市来的，从前曾经穿厌了绮罗，住惯了洋房，曾在北平或上海的有名的大学里念书，或竟已经毕业了，但现在她是灰布制服，草鞋，爬山，吃小米饭的“鲁艺”学生！“鲁艺”的“平剧团”，也许在晚会中也有一个节目，演出了《八大锤》或《打渔杀家》；那时你会吃惊地认出来：这里有好多位“男女同志”也是演话剧的好手，而且你还记得不多几天以前他们还和你讨论国际政治经济的形势，抗战的现阶段的一些问题，文艺上的现实主义，“民族形式”，贝多芬，谭鑫培，汪笑侬，也许还有人指着“平剧团”中一个鼓手，一个老头儿，告诉你：这位严然正容打鼓的老头儿从前是江西的一个商人，家景很不差，酷爱平剧，但是“发狂似的”舍施了家财，万里长征，参加了“平剧团”，担任了鼓手的任务。

“鲁艺”的音乐系也来一个节目，他们人数不多，不能演奏作曲家冼星海所作的《黄河大合唱》，（那在延安通常是二三百人的合唱，最多为五六百，至少也有一百多人，）但他们的新曲多着，可以是北方民间小调，也可以是西欧古典作家名作的一段，也可以是蒙古和青海的民歌，而且提琴独奏和口琴独奏也是素擅胜场。

你也许抽空窥看一下演员们的化妆室罢？那就在舞台后面一个小房，你看见正在烫头发。你记得那位“长征”过来的“理发师同志”并不会这一套。仔细一认，才知道那临时技师原来也是学生。她以前自然是端坐着让人家给她烫发的，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拿起钳子为人家烫，但现在既需要这么一手，她也就干，也就学会了！而那边一排房子据说是“实验团”的道具服装室，你进去一看，多么整齐，管理员指着那形形色式的服装告诉你：这些，大部分是教员和学生自己带来的衣服，延安是穷的，“鲁艺”也是穷的，哪里有钱设备剧团的服装！

在“鲁艺”，有不少在“外边”成名的导演和演员，但更多的是崭新露头角的新人，他们的技术曾使那多见多闻的中国制片厂的头等艺人大为惊讶。当拍摄《塞上风云》外景的一行人，由蒙边回渝，经过延安的时候，适逢演出曹禹的《日出》，他们看了以后赞叹道：“想不到你们在这里演出这样的大戏，而且演得这样好！”

在“鲁艺”，聚集着全国备省的青年；他们的身世也多式多样，有在国内最贵族式的大学将毕业的，也有家景干平，曾在社会混过事的，更有些是“南洋伯”的佳儿女，偷偷从家庭里跑出来的，有海关邮局的职员，有中小学教员，有经过战斗的“平津流亡学生”。他们齐集在“鲁艺”，为了一个信念：娴习文艺这武器的理论与实践，为民族之自由解放而服务！

“鲁艺”的学生有四五百，但教师和工作人员也有二三百。你觉得奇怪么？其实说明了一点也不怪。“鲁艺”并不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法，它是由学生自动研究，各自发挥其所长为主体，而以教师的讲解指导为辅佐的，所以除了正规教师而外，又有不少介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指导员，各系都有。指导员们自己学习，同时又帮助学生学习，他们都是优秀的文艺青年，也有的已经是新作家。除了文艺部门的教师和指导员，又有社会科学，哲学部门的教师和教导员，他们除了学识丰富，还有长期的斗争经验和多种多样的生活经验。

“鲁艺”现在有四系，文学，戏剧，音乐，美术。修业期限为二年。在此时间要娴习基本的技术知识，并须立下高深理论研究的基础。你觉得二年的时间太短促么？但民族社会的需要太迫切了，不能不赶快。所以每周上课时间虽有廿多小时，而“实践”的时间还要多。戏剧系和音乐系“实践”的场所是经常在开各种晚会，美术系献身手的地方是没有空间的限制的，而且他们还有“美术工场”。至于“文学系”，则有他们自己的壁报以及延安出版的各种刊物。

学习性质的小组会，其重要性不下于课室教授。在小组会中，指导员的作用，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文艺方面造诣颇高而又对于社会科学有研究的指导员，常能使他所参加的那一组学生进步特别快。

“鲁艺”还只有三年的历史，——以前名为鲁迅艺术师范——但改为两年制还只有两年工夫。不过时间虽短，贡献却已不少。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以及游击部队中，到处可见“鲁艺”毕业生的踪迹。“鲁艺”图书馆中藏有“鲁艺同学”从前方寄回的各种成绩。就中美术系学生的木刻（宣传性质的新式漫画，故事性的连环木刻等），最为出色。大抵“鲁艺”学生在前方最活跃的，是戏剧系，音乐系和美术系，文学系只好排在末位，这一半因为文学手要借文学来表现，在文盲众多的农村中，文学作品不免形同奢侈品了，又一半则因善能运用文学而具有深入浅出之妙者，亦尚难找。然这是就各系比较而言，非谓文学系学生遂无佼佼者，事实上他们写了不少很好的关于前方的报告文学。

一九三九年尾，“鲁艺”派出去一班毕业生到华北前线，这是一个混合性的文化纵队，有戏剧工作者，歌咏工作者，美术及文学工作者。他们随同两支被派往华北去的武装队伍出发，冲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急行军时一夜走百五十里，有时无水可喝，连马溺也喝过；四年六月他们到达目的地后第一次写出来给母校同学的长信，揭示在“鲁艺”的报告处了，从这信里，我们知道他们一路所遇的艰险，但从这信中又看出他们的精神多么奋发而愉

快。他们全体一百多人在冲过封锁线时只有二人掉队，存亡未卜，但这二位都是男生，女生没有一个掉队。

在这封信到了以后约一月，“鲁艺”的又一“实习计划”成熟了。这次所派也是混成队，但分成数小队，目的地是“边区”。这新的计划是根据了在前方工作若干时回来的教师们的报告而拟订的。过去的工作方式，有若干是被修改了；新计划的主要点是要被派出的人员先真正地充实各自的生活，——多了解各地的社会情形，多了解民众，而不以走马看花式的写报告文学为急务。依这方针被派出的人员到了目的地后，不像从前那样以文艺工作者的特殊姿态出现，而以一个普通工作者的身份参加到当地的各种工作里去。一年半载以后，然后再谈写作。不过在此期间，他们和“鲁艺”各系还是要保持经常的联络，他们要就实地工作中提出有关文艺运动的意见，而“鲁艺”各系，要经常给他们以指示。这新计划下所编的数小队，每队有一队长，则是指导员或教师担任的。这几队虽然是在“边区”工作，但生活之刻苦不下于前方，因为“边区”民众对于一些稍有“拿身份”倾向的工作人员就不满意，更不用说摆官架子了，而知识分子生活习惯之未能全然群众化，即“鲁艺”学生亦时或不免。

北方的夏季晚上总是凉快的。月圆之夜，天空无半点云彩，仰视长空，万里深蓝，明星点点。这时候，“鲁艺”大礼堂后边第一个院子里，正展开一幅诗意的画面，两列峨特式的石头建筑，巍然隔院而对峙，这是学生的宿舍。作为近厢的另一列房子，则是会客室和办公室，三面游廊，很整齐的石级。月明之下，树影婆娑，三人五人一小堆一小堆的青年，席地而坐，有靠着一株树的，也有在游廊的石级上的，有人在低语谈心，有人在月光下看书，但也有人琮琮地弹着曼陀琳，有人在低声的和唱，如微风穿幽篁，悠然而又洒然，但渐渐和唱者多了，从宿舍里也传出了歌曲的旋律，于是突然，男中音，女高音，一齐迸发，曼陀琳以外又加进了小提琴和萧管，错落回旋，而终于大家不谋而合地唱起“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来。这时候，也许和风又送来了黑头的悲凉苍老的唱歌词，那是相距下远的“平剧团”的“同志”们也在户外休息了。歌声像风发云涌，愈来愈高愈壮烈，到了顶点，忽然一下停止，大家都又不约而同朗声纵笑起来，然而笑声过后，从树影下又轻轻传出带点哀婉味儿的民歌的旋律，三个女同志坐成品字形，脸对着苍穹，深有所思地低声唱着。四周静的像入了云似的。民歌唱到第二叠，声音低细到不可得闻了。稍顷，曼陀琳声复作，于是错综的笑语也在四处陆续起来。有人扬声念道，“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但语音未终，早为一阵元神旺盛的笑声所淹没。

这些寄灰布制服吃小米饭的青年男女，就是这样的情感淋漓，大气磅礴的！

新疆风土杂忆

晚清左宗棠进军新疆，沿途筑路栽树，其所植之柳，今尚有存者。那时湘人杨某（忘其名）曾有诗曰：

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有人说，创现在新疆地主引水灌田的所谓“坎儿井”，不是左宗棠而是林则徐。但“坎儿井”之创设，也是左宗棠开始的。“坎儿井”者，横贯砂碛之一串井，每井自下凿通，成为地下之渠，水从地下行，乃得自水源处达于所欲溉灌之田。此因砂碛不宜开渠，骄阳之下，水易干涸，故创为引水自地下行之法。水源往往离田甚远，多则百里，少亦数十里。“坎儿井”隔三四丈一个，从飞机上俯瞰，但见黑点如连珠，宛如一道虚线横贯于砂碛，工程之大，不难想见；所以又听说，新省地主计财产时，往往不举田亩之数而举“坎儿井”之数，盖地广人稀，拥田多不为奇，惟拥有数百乃至数千之“坎儿井”者，则开井之费已甚可观，故足表示其富有之程度也。此犹新省之大牧畜主，所有牛羊亦不以数计，而以“山”计；何谓以“山”计？据言大“把爷”羊群之大，难于数计，每晚放牧归来，仅驱羊群入山谷，自山顶望之，见谷已满，即便了事。所以大“把爷”计其财产时，亦不曰有牛羊若干千头，而曰有牛羊几山。

本力鲜卑民歌，从鲜卑语译成汉文的《敕勒歌》，其词曰：“敕勒川，阴山下；天如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前人评此歌末句为“神来之笔”，然在习惯此种生活之游牧民族，此实为平凡之现实，不过非有此生活实感者，也道不出这一句的只字来。此种“风吹草低见牛羊”之景象，在今日南北疆之大草原中，尚往往可见。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丰茂的牧草，高及人肩，几千牛羊隐在那里啃草，远望如何能见？天风骤来，丰草偃仰，然后知道还有那么多牛羊在那里！

新疆是一块高原，但在洪荒时代，她是中央亚细亚的大内海的一部分。这一苍海，在地质学上的哪一纪始变为高原？正如亚洲之边缘何时断离而为南洋群岛，同样尚未有定论。今新省境内，盐碛尚所在有之。昔年自哈密乘车赴吐鲁番，途中遥见远处白光一片，似为一个很大的湖泊，很是惊异，砂碛中难道竟有这样的大湖泊？乃至稍近，乃辨明此白皑皑者，实非流动之水而为固体之盐。阳光逼照，返光甚强，使人目眩。因新疆古为内海，故留此盐碛。然新省之盐，据谓缺少碘质，迪化的讲究卫生的人家都用苏联来的精盐。又盐碛之盐，与云南之岩盐不同；岩盐成块如石，而盐碛之盐则为粒状，粗细不等，曾见最粗者如棋子而形方，故食用时尚须略加磨捣。

吐鲁番地势甚低。新疆一般地形皆高出海面一二千公尺，独吐鲁番低于海面数百公尺，故自全疆地形而言，吐鲁番宛如一洞。俗谓《西游记》所写之火焰山，即今之吐鲁番，则其热可想而知。此地难分四季，只可谓尚有寒暑而已。大抵阳历正二三月，尚不甚热，白天屋内须衣薄棉，晚上还要冷些；五月以后则燥热难堪，居民于正午时都进地窖休息，仅清晨薄暮始有市集。

以故吐鲁番居民家家有地窖，街上跨街搭荫棚，间亦有种瓜果葡萄盘缘棚上者，市街风景，自有一格。最热之时，亦在阳历七八月，俗谓此时壁上可以烙饼，鸡蛋可以晒熟；而公安局长蹲大水缸中办公，则我在迪化时曾闻吐鲁番来人之言，当必不虚。

然吐鲁番虽热，仍是个好地方，地宜植棉，棉质之佳，不亚于埃及棉。又多产蔬菜水果。内地艳称之哈密瓜，其实不尽产于哈密，鄯善与吐鲁番皆产之，而吐鲁番所产尤佳。石榴甚大，粒粒如红宝石。葡萄在新疆，产地不少，然以吐鲁番所产，驰名全疆。无核之一种，虽小而甜，晒为干，胜于美国所产。新疆有民谣曰：“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库车的杨姑，一朵花。”（《新疆图志》亦载此谣）然则哈密之瓜，固有其历史地位。惟自马仲英两度焚掠而后，哈密回城已成废墟，汉城亦萧条冷落，未复旧观，或哈密之瓜亦不如昔年乎？这可难以究诘了。民谣中之“库车”，在南疆，即古龟兹国，紫羔以库车产者为最佳；“杨姑”，维族语少女也。相传谓库车妇人多美丽，故民谣中如是云尔。库车居民多维吾尔族（即元史所称畏兀儿族，前清时俗称缠回或缠头）。不仅库车，南疆各地皆然。

迪化自春至秋，常有南来燥热之风，三是吐鲁番吹来，故俗名“吐鲁番风”。吐鲁番风既至，人皆感不适，轻则神思倦怠，重则义目晕眩，且发烧；体虚者甚至风未到前三四日即有预感。或谓此风来源实不在吐鲁番，而在南疆塔里木盆地之大戈壁，不过经由吐鲁番，逾天山缺口之大坂城而至迪化耳。大坂城者，为自吐鲁番到迪化所过的天山一缺口，然已甚高；过大坂城则迪化已在脚下，此为自南路进迪化之一要隘。

忆《隋书》谓炀帝得龟兹乐，列为燕乐之一，此后中国燕乐，

龟兹乐实居重要部分。古龟兹国，即今新疆库车县。龟兹乐何如，今日新疆维族之音乐歌舞是否与龟兹乐相似，颇难猝下断语。盖自伊斯兰教代佛教而后，天竺文物，渐灭殆尽；今日新省维吾尔民族之歌舞，与中亚各民族之歌舞想相近似。迪化每有晚会，往往有维族之歌舞节目；男女二人，载歌载舞，歌为维语，音调颇柔美，时有顶点，则喜悦之情，洋洋欲溢，舞容亦婉约而雍穆；盖在维族的民族形式歌舞中，此为最上乘者。据言，此旧为

男女相悦之歌，今倚旧谱而填新词，则已变男女相悦而为政治之

内容矣。以我观之，旧瓶新酒，尚无牵强之痕迹。我曾问维族人翻译哈美德：“新同是准的手笔？”他答道：“也不知是谁，大概是许多人集体的作品。”

维语为夏音语文，其字母借用阿剌伯文的字母。书写时，横行而自右至左，外行人视之，似甚不便，然彼人走笔如飞、形式且极美丽。文法不甚复杂，曾习他种外国语者，用功半年，即可通晓。在新疆，虽有十四民族，然维吾尔语，实力可以通行全疆之语

言，此因维族人数约占全疆总人口之半，其他各少数民族大都晓维语；哈萨克族人口在全疆仅次于维族，其语文与维语大同小异，其字母，亦为阿剌伯文字母。迪化每开大会，演说时例须用三种语言，即汉、维，及蒙古语，平常的集会，为节省时间，仅用汉、维两种语言，则因蒙族人在迪化者倘不解汉语，大概都能懂维语。

迪化在阳历十月初即有雪。但十月天气最佳，可说是“寒暖适中”。十

二月后始入正常的寒冬，积雪不融，大地冻结，至明年四月初始解冻（有时为三月中旬）。冬季少风，南方冬季西北风怒吼之景象，以我所得短暂之经验而言，在迪化是没有的。然而冬季坐车出门，虽在无风之日，每觉寒风刺面入骨，其凛冽十倍于南方的西北风，此因户外空气太冷之故。室内因有大壁炉，且门窗严闭，窗又为双层，故融暖如春，然而门窗倘有罅缝，则近此罅缝之处，冷风如箭，触之战栗；此亦非风，而因户外空气太冷，冷故重，觅罅隙而钻入，其劲遂似风。室内铺厚毯，亦以防寒气从地板之细缝上侵。关西大汉张仲实素不怕冷，在家时洋服内仅穿毛线衫裤，无羊毛内衣，某日忽觉腿部酸痛，举步无力，此为腿部受寒之征象，然不明寒气从何来；越一日始发见寒气乃从书桌下来，盖书桌下之地毯一角上翘，露出地板之罅缝，寒气遂由此浸润。北方人常言地气冷，故下身所穿必须较上身为多，必解冻以后，乃可稍疏防范。三月中、有时白天气温颇高，往往见迪化人上身仅穿一单衫而下身仍御厚棉裤。

最冷的日子通常在阴历年关前后；白大为零下二十度，夜间则至四十余度。此为平均的气温。在此严寒的季节，人在户外半小时以上，皮帽、大衣领皮、眉毛、胡须等凡为呼吸之气所能接近之处，皆凝积有薄薄白霜，胡须上往往还挂着小小的冰珠。人多处，远望雾气蒸腾；此亦非雾、而为口气凝成，真所谓“嘘气成云”了。驴马奔驰后满身流汗，出气如蒸笼，然而腹下毛端，则挂有冰球，累累如葡萄，此因汗水沿体而下，“至腹下毛端，未及滴落，遂冻结为珠，珠复增大，遂成为冰葡萄。

地冻以后，积雪不融，一次一次雪下来，碾实冻坚，平时颇多坎坷的路面，此时就变成了平坦光滑，比任何柏油路都漂亮。所以北方赶路，以冬季为最好。在这时候，“爬犁”也就出现了。“爬犁”是土名，我们的文绉绉的名称，就是“雪橇”。迪化的“把爷”们，冬季有喜用“爬犁”者。这是无轮的车，有滑板两支代替了轮，车甚小，无篷，能容二人，仍驾以马。好马，新钉一副高的掌铁（冬季走冻结的路，马掌铁必较高，于是马也穿了高跟鞋），拖起结实的“爬犁”，在光滑的冻雪地上滑走，又快又稳，真比汽车有意思。但“爬犁”不宜在城中热闹处走，最好在郊外，在公路上。维族哈族的“把爷”们驾“爬犁”，似乎还是娱乐的意味多，等于上海人在夏天坐车兜风。我有一首歪诗记之：

纷飞玉屑到帘拢，大地银铺一望中；
初试爬犁呼女伴：阿爹新买玉花骢。

北方冬季少霜。如有之，则其浓厚的程度迥非南方人所能想像。迪化冬季亦常有这样的严霜。晨起，忽见马路旁的电线都变成了白绒的彩绳，简直跟圣诞节人们用以装饰屋子或圣诞树的比手指还粗些的白绒彩绳一样。尤其是所有的树枝，也都结起银白的彩来了。远望就同盛开了的银花。如果树多，而又全是落叶树，那么，银白一片，宛如繁花，秾艳的风姿，和盛开的樱花一般——而樱花尚无其洁白。此种严霜，俗名“挂枝”，不知何所取义，或者因其仅能在树枝上见之，而屋面地上反不能见，故得此名。其实霜降普遍，并非独厚于“枝”，不过因为地上屋面皆已积雪，本来是白皑皑的，故遂不觉耳。但因其“挂枝”，遂产生了神话：据说天山最高之博格达峰为神仙所居，有冰肌雪肤之仙女，为怜冬季大地萧条，百花皆隐，故时以晶莹之霜花

挂到枝头。此说虽诞，然颇有风趣，因亦记以歪诗一首：

晓来试马出南关，万树银花照两间。
昨夜挂枝劳玉手，藐姑仙子下天山。

照气候说，新疆兼有寒带、温带以及亚热带的气候。天山北麓是寒带，南麓哈密、都善一路（吐鲁番因是一个洞，作为例外）是温带，而南疆则许多地方，终年只须穿夹，是亚热带的气候了。但橘、柚、香蕉等，新疆皆不产，或者是未尝试植，或者也因“亚热带”地区，空气太干燥之故，因为这些终年只须穿夹的地方，亦往往终年无雨，饮水、灌田的水，都赖天山的万年雪融化下来供给人们。除了上述数种水果外，在新疆可以吃到各种水果，而尤以瓜、苹果、葡萄、梨、桃为佳。瓜指甜瓜；种类之多，可以写成一篇文章；“哈密瓜”即甜瓜之一种，迪化人称为甜瓜，不称为哈密瓜。这是大如枕头的香瓜，惟甜脆及水分之多，非南方任何佳种香瓜所可及。此瓜产于夏初，窖藏可保存至明年春末；新疆人每谓夏伙食此瓜则内热，惟冬日食之则“清火”。苹果出产颇多，而伊犁之二台所产最佳，体大肉脆，色味极似舶来的金山苹果，而香过之。二台苹果熟时，因运输工具不够，落地而腐烂于果林中者，据云每每厚二三寸，在伊犁，大洋一无可购百枚；惟运至迪化，则最廉时亦须二三毛一个。

梨以库车及库尔勒所产最佳，虽不甚大，而甜、脆、水分多，天津梨最好者，亦不及之。梨在产地每年腐烂于树下者亦不可胜计，及运至迪化，则每元仅可得十枚左右。南疆植桑之区，桑椹大而味美，有黑色白色两种；惟此物易烂，不能运至他处。据言当地维族人民之游手好闲者，每当桑椹熟时，即不工作，盖食桑椹亦可果腹；桑椹在产地，人可随意取食，恣意饱啖，无过问者。

初到哈密，见有“定湘王”庙，规模很大，问了人，才知这就是城隍庙。但新疆的城隍何以称为“定湘王”，则未得其解。后来又知道凡汉人较多的各城市中都有“定湘王”庙，皆为左宗棠平定新疆以后，“湖湘子弟”所建；而“定湘王”者，本为湖南之城隍，左公部下既定新疆，遂把家乡的城隍也搬来了。今日新疆汉族包含内地各省之人，湘籍者初不甚多，然“定湘王”之为新疆汉族之城隍如故。

迪化汉族，内地各省人皆有，会馆如林，亦各省都有；视会馆规模之大小，可以约略推知从前各该省籍人士在新省势力之如何。然而城隍庙则仅一个，即“定湘王庙”是也。每年中元节，各省人士追荐其远在原籍之祖先，“定湘”庙中，罗天大醮，连台对开，可亘一周间。尤为奇特者，此时之“定湘王”府又开办“邮局”，收受寄给各省籍鬼魂之包裹与信札；有特制之“邮票”乃“定湘王府”发售，庙中道士即充“邮务员”，包裹信札寄递取费等差，亦模拟阳间之邮局；迷信者以为必如此然后其所焚化之包裹与信札可以稳度万里关山，毫无留难。又或焚化冥镪，则又须“定湘王府”汇兑。故在每年中元节，“定湘王府”中仅此一笔“邮汇”收入，亦颇可观。

作者原注：甜瓜即南方所谓香瓜。

昔在南北朝时，佛法大行于西域；唐初亦然，读三藏法师《大唐西域记》已可概见。当时大乘诸宗皆经由西域诸国之“桥梁”而入东土，其由海道南来者，似惟达摩之南宗耳。但今日之新疆，则除蒙族之喇嘛外，更无佛徒。汉人凡用和尚之事，悉以道士代之。丧事中惟有道士，而佛事所有各节目，仪式多仍其旧，惟执行者为道士而已。蒙族活佛夏礼瓦圆寂于迪化，丧仪中除有喇嘛诵经，又有道士；省政府主席李溶之丧，道士而外，亦有喇嘛数人。

伊斯兰教何时始在新疆发展而代替了从前的佛教，我没有作过考据，然而猜想起来，当在元明之交。道士又在何时代行和尚职权，那就更不可考了，猜想起来，也许是在清朝季世汉人又在新疆站定了脚跟的时候。但当时何以不干脆带了和尚去，而用道士，则殊不可解，或者是因为道士在宗教上带点“中间性”罢？于此，我又连带想起中国历史上宗教争论的一段公案。南北朝时，佛法始来东土，即与中国固有之道教发生磨擦，其间复因北朝那些君主信佛信道，时时变换，以至成为一件大事。但自顾欢、慧琳、僧绍、孟景翼等人一场无聊的争论以后，终于达到“三教”原是“一家”的结论；然而这种论调，也表示了道教在当时不能与佛教争天下，故牵强附会，合佛道为一，又拉上孔子作陪，以便和平共处；故当时释家名师都反对之。不谓千年以后，伊斯兰教在西域既逐走佛徒，和尚们遗下的那笔买卖，居然由道士如数顶承了去，思之亦堪发噱。

然道士在新疆，数目不多，迪化城内恐不满百，他处更无足论。普通人家丧事，两三个道士便已了事。此辈道士，平日几与俗家人无异。

新疆汉族商人，以天津帮为巨擘。数百万资本（抗战前货币之购买力水准）者，比比皆是。除迪化有总店，天津有分庄而外，南北疆之大城市又有分号。新疆之土产经由波等之手而运销于内地，复经由彼等之手，内地工业品乃流入于新疆。据言此辈天津帮商人，多杨柳青人，最初至新省者，实为左宗棠西征时随军之负贩，当时称为“赶大营”。左西征之时，旷日持久，大军所过，每站必掘井，掘井得水必建屋，树立小小之市集，又察各该处之土壤，能种什么即种什么。故当时“赶大营”者，一挑之货，几次转易，利即数倍，其能直至迪化者，盖已颇有积累。其魄力巨大者，即由行商而变为坐庄。据言此为今日新疆汉族巨商之始祖。其后“回疆”既定，“赶大营”已成过去，仍有“冒险家”画依样之葫芦，不辞关山万重，远道而往，但既至镇西或迪化，往往资斧已罄，不能再贩土产归来，则佣工度日，积一二年则在本地为摊贩，幸而获利，足可再“冒险”矣，则贩新省之土产，仍以行商方式回到天津，于是换得现钱再贩货赴新省；如此每年可走一次，积十年亦可成富翁，在迪化为坐庄矣。但此为数十年前之情况，如此机会，早成过去。

抗战前，新省对外商运孔道，为经镇西而至绥边，有绥新公路，包头以东则由铁路可抵天津；此亦为新疆多天津商人之一因。抗战后，绥新公路为新省当局封锁，表面理由是巩固边防。目前新省对外商运，已经有组织地集中于官商合办之某某土产公司之手，情况又已不同。

博格达山为天山之最高峰。清时初定天山南北路后，即依前朝故事，祭博格达山。据《新疆图志》，山上最占之碑为唐代武则天所立。其后每年祀典，率由地方官行之，祭文亦有定式，《新疆图志》载之。

博格达山半腰有湖（俗称海子），周围十余里，峭壁环绕，水甚清，甚冷；此处雪线之下，故夏季尚可登临，自山麓行五十余里即到。自此再上，则万年雪封锁山道，其上复有冰川，非有特别探险装备，不能往矣。山巅又有一湖，较山腰者为大。当飞机横越天山时，半空俯瞰，此二湖历历可睹，明亮如镜。《新疆图志》谓山上积雪中有雪莲，复有雪蛆，巨如蚕，体为红色，云可合媚药。二十九年夏，有友登博格达，在山腰之湖畔过一宿，据云并不见有雪莲雪蛆，亦无其他奇卉异草，珍禽瑞兽，惟蚊虫大而且多，啮人如锥刺耳。湖边夜间甚冷，虽当盛夏，衣重裘尚齿战，乃烧起几个火堆，卧火旁，始稍得寐。又山腰近湖处有一庙，道十数人居之，不下山肯已数年，山下居民每年夏季运粮资之，及秋、冰雪封山，遂不通闻问，俟来年夏季再上山探之。在全疆，恐惟此数道士为真能清苦。诗以记之：

博格达山高接天，云封雪锁自年年。
冰川寂寞群仙去，瘦骨黄冠灶断烟。（其一）
雪莲雪蛆今何在？剩有饕蚊逐队飞。
三伏月圆湖畔夜，高烧篝火御寒威。（其二）

雪莲有无，未能证实，然天山峭壁生石莲，则余曾亲见。离迪化约百余公里，有白杨沟者，亦避暑胜地，余曾往一游。所谓“白杨沟”，实两山间之夹谷耳，范围甚大，汽车翻越数山始到其地。此为哈族人游牧地，事前通知该管之“千户长”，请彼导游，兼代备宿夜处。“千户长”略能汉语，备马十余匹，请客人作竟日之游，出“白杨沟”范围，直抵焉耆境之天山北麓。途次经过一谷，两岸峭壁千仞，中一夹道长数里，山泉潺潺，萦回马足；壁上无草木，惟生石莲。此为横生于石壁之灌木，叶大如掌，形似桐叶，白花五六瓣甚巨，粗具莲花之形态，嗅之有浓郁之味，似香不香，然亦不恶。询之“千户长”可作药用否？渠言未知可作何用，惟哈族人间或以此为催生之剂，煎浓汤服。石莲产于深谷，盖不独白杨沟有之。

夏季入山避暑，宿蒙古包，饮新鲜马乳，是新疆摩登乐事。但亦游牧民族风尚之残余。维、哈两族之“把爷”每年夏季必率全家男女老小，坐自家之大车，带蒙古包、狗，至其羊群所在之山谷，过一个夏季的野外生活。秋凉归来，狗马皆肥健，毛色光泽如镜面，孩子们晒成古铜色，肌肉结实。

马乳云可治肺病胃病；饮了一个夏季的马乳，据云身必健硕，体重增加。但此恐惟在山中避暑饮之，方有效验；盖非马乳之独擅神效，亦因野外生活之其他有益条件助成之也。维、哈族人善调制马乳，法以乳盛革囊中，摇荡多时，略置片刻，又摇之，如是数回，马乳发酵乃起沫，可食。味略酸而香冽，多饮觉微醺；不嗜酒者饮马乳辄醉。初饮马乳者，常觉不惯，然经过一时期，遂有深嗜，一日可进十数大碗，而饭量亦随之增加。然马乳新鲜者，城中不易得。马肉制之腊肠，俗名马肠子，维、哈、蒙等族所制者甚佳。据云，道地之马肠子，乃用马驹之肉，灌入肠管后挂于蒙古包圆顶开口通风之处，在风干之过程中，复赖蒙古包中每日自然之烟熏，——盖包中生火有烟，必从顶上之孔外出也。马肠子佳者，蒸熟后色殷红，香腴不下于金华火腿。避暑山中者，倘能骑马爬山，饮马乳，食馕（一种大饼），佐以自制之奶皮（即牛乳蒸热后所结之奶皮）、草莓果酱、马肠子、葡萄，睡蒙古包，则空

气、阳光、运动、富于养分之饮食，一切都有，对于身体的益处是不难想像的！

维族哈族人有嗜麻烟者，犹汉族人之嗜鸦片。麻烟比鸦片更毒，故在新省亦悬为厉禁。麻烟自印度来，原状不知如何，但供人吸用者则已为粉状，可装于荷包中，随时吸食。因其简易，为害更烈。

食麻烟后，入半醉状态，即见种种幻象；平日想念而不可多得之事物，此时即纷陈前后，应接不暇。嗜钱财者即见元宝连翩飞来，平常所未曾见而但闻其名之各种珍宝，此时亦缤纷陆离，俯拾即是；好色之徒则见粉白黛绿，围绕前后，乃至素所想念之良家子亦姗姗自来，偎身俯就。人生大欲，片刻都偿，无知之辈，自当视为至乐。旁人见食麻烟者如醉如痴，手舞足蹈，以为癫疯，而不知彼方神游于极乐幻境也。既而动作停歇，则幻境已消，神经麻痹而失知觉。移时始醒，了无所异，与未吸食同。

然而多次吸食之后，即可成癮；癮发时之难受，甚于中鸦片毒者。同时，肺部因受毒而成喘哮之病，全身关节炎肿，毒入脊髓，伛偻不能挺立，不良于行；到这阶段，无论再食与否，总之是去死不远了。

维哈族人之嗜赌博者，以羊骨为博具，掷地视骨之正反，以定输赢。据说他们结伴贩货从甲地至乙地，在途中往往于马背上且行且赌，现金不足，则以货物作抵押，旅途未终，而已尽丧所有，则转为博进者之佣工，甚至以佣工若干年作为赌注而作最后之一掷者。

维吾尔（元史称畏兀儿）族人口占全疆总人口之半数，南疆居民，什九为维族。奉伊斯兰教。旧时阿訇（教中长老）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教长同时即为一部落或一区域之行政首长。今则阿訇惟掌教，不复能过问地方行政矣。维族人兼营商业，游牧，及农业；手工业（如裁缝、木匠、泥水、织毯等）亦多彼族中人。南疆所产之绸，色彩鲜艳，图案悦目，亦多为维族工人所织造。

在文艺美术方面，维族人具有天才，土风歌舞，颇具特色，此不赘言。尝观一出由民间故事改编之短剧，幽默而意味深长，实为佳作。此种民间故事，大都嘲笑富而不仁之辈。短剧内容，写一富人路遇一穷人，穷人向彼行乞，富人不应当，且骂之。既而同憩于路侧，穷人徐问富人何来，将赴何处，且进以谀词。富人大喜，乃夸其家宅之美，夸其子，夸其骆驼，终乃夸其所爱之狗。穷人随机应变，亦盛赞其房屋之美轮美奂，其子之多才多艺，其骆驼之健硕，其狗之解人意。富人大喜。穷人乃乘间复请周济。富人怫然掉头不顾。二人于是无言。富人解行囊，取馕食之，不能尽，则以所余投界路旁一野犬，穷人至是复乞分一小块馕，富人仍不肯，谓宁投界狗食，不与汝懒虫，荷囊而起，将行。穷人忽思得一计，遂追语之曰：你不是有一条很好的狗么？我适从你家乡来，见你的狗已死。富人大惊，问故。穷人曰：因为你的狗吃了你那匹骆驼的肝，所以死了！富人更惊，复问骆驼何故致死。穷人曰：因为你的儿子死了，你的妻杀骆驼以祭你子。富人惊极而号哭，复问子何因死。穷人曰：因为你的家中失火，你的儿子被烧死了。至是，富人大哭，捶胸捋发，如中风狂，尽弃其行囊，并自褫其衣，呼号痛哭而去。穷人大喜，乃尽取富人之行囊、衣物，坐于道旁，从行囊中取馕食之，未尽一枚，而富人已大呼而来，指穷人为偷儿，夺还各物，且将夺其手中之余馕。穷人急逃，

富人追之，幕遂下。维族风俗，杀骆驼致祭，乃最郑重之典礼，又谓狗食骆驼肝必死。

维族乐器，有长颈琵琶（四弦）、鼓、箫、琴（铜丝之弦甚多，而以小竹片鼓之，广东人亦常用之，称为洋琴）等数事。所谓长颈琵琶者，实似一曼陀令，而颈特长，在三尺以上；意谓当别有名，但曾询翻译人哈美德，则云是琵琶。或者吾人今日习见之琵琶已经汉化乎。

维族人席地而坐。炕之地位占全室过半有强，或竟整个房间是一大炕，炕上铺毡，毡上更有大坐垫。有矮几，或圆或长方。维族人上炕坐时，足上仍御牛皮软底靴，实则此为袜子；下炕则加牛皮鞋，无后跟，与吾人之拖鞋相仿，出门亦御此鞋。长袍左衽，无钮扣，腰束以带。头上缠布，或戴无帽结之瓜皮小帽，帽必绣花，而甚小，仅覆头顶之一部。至于戴打乌帽，穿长统靴，则已为欧化之结果。哈族人装束相同。两族女子平日亦穿靴。

日常饮食，为牛乳、羊肉、馕、奶皮、酥油、水果、红茶，而红茶中例必加糖。菜肴中甚少菜蔬。待客，隆重者宰一羔羊，白煮，大盘捧上，刀割而食。主人倘割取羊尾肥脂以手塞客人口中，虽系大块，客人须例张口承之，不得以手接取徐徐啣食，更不得拒而不受。盖此为主人敬客之礼，不接受或不按例一口吞下者即为失礼。客人受后，例须同样回敬主人。

所谓“抓饭”者，乃以羊油蒸饭，又加羊肉丁与胡萝卜（黄色）丁子；因其非羊油炒饭，而为蒸饭，故虽似炒饭而味实不同。俄国风之“萨莫伐”

在新疆颇为流行，有钱之维族人家都置一具。盖嗜饮红茶，维哈及其他各民族皆然也。

新疆十四民族，除汉族外，维族兼营农业、商业、牧畜、手工业，已如上述。蒙族及哈族则以游牧为主。哈族在北疆居近汉人众多之大城市者，亦种地，惟视为副业；种地不施肥，用休耕制，下种后即自驱羊入山，不复一顾，待秋收时再来收割，有多少算多少。据闻南疆维族人之养蚕者，亦如我们之养野蚕然，蚕置桑树上，即不复措意，蚕及时成茧，亦在树上。此因南疆气候温和又无雨，故得如此便宜省事也。蒙族多逐水草而游牧，故小学亦设蒙古包中，跟着他们一年迁徙数次。

余如柯尔柯斯、泰阑其、泰吉克、塔塔尔等族，本皆为中亚细亚民族，今在苏联中亚境内亦有诸族；然此诸族在新省者尚多在游牧阶段。锡伯、索伦二族，乃乾隆年间由满洲移往，今多居伊犁一带，人数不多，亦为农牧兼营者，仍保存其自族之语言，然能汉语及维语者甚多。人谓此族人习语言，特有天才。

据说南疆之罗布淖尔尚有最原始之小部落在焉。此为水上居民，住罗布淖尔中，与其他人民几无往来，不知牧畜，惟特捕取罗布淖尔之鱼介为食；人数无确计，度不过数百人而已。罗布淖尔在南疆大戈壁之一端，塔里木河注入之；此一带为其他民族所不到，故此小小部落尚能自生自息，保留其原始状态。

游牧民族多喜养狗，盖警卫羊群，管束羊群，皆有赖于狗。而庞大骆驼

“萨莫伐”俄语 caMOBap 的音译。意即茶炊。

作者原注：淖尔蒙语，即湖泊。

队中亦必有狗若干头任巡哨纠察之责。新省之游牧民族既多来自他处，来时携狗自随，是故新省之狗，种类亦甚多。大概而言，有蒙古种、西藏种、各式中亚种，及此诸种之混血种，凡此皆为帮人办事的狗。再加以汉人豢畜供玩弄之叭儿种，形形色色，不可究诘；我尝戏语，狗与甜瓜在新省种类之多，恐甲于全国。

迪化人家，几乎家家有狗。此种狗，半为供玩弄而豢养。自南梁（即南郊）至城门之一段路上，群狗竟分段而“治”。倘有他段之狗走过其“地盘”，必群起而吠逐之，直至其垂尾逃出“界线”而后已。因此，狗的行动范围，颇受限制，除非跟了主人同走。然此种无理取闹的狗们，都为叭儿种或其混血种；至于禀有“帮人办事”的天性的猎狗族类，则无此习气。

野羊又名黄羊，毛直而长，佳者可以麝入狐坎中混充狐之腹皮。黄羊跳走甚速，在无边之戈壁滩上，虽小跑车亦不能追及之。黄羊肉又甚鲜美。猎黄羊须用合围之法，侦得其群居之处，四面包围击之；若二三人出猎，往往不能有所得。盖黄羊甚为机警，目力甚好，人在二三里外，黄羊即见之。

迪化是省会，饮食娱乐之事，自然是五花八门的了。汉族人开的酒馆，大抵是混合了山东、陕西、天津各帮烹调的手法，可以“北方菜”目之，然厨子则多甘肃籍。城里有一家自称“川菜馆”的，据试过的人说，毫无川菜风味；或亦可说，仅在菜单上看得见川菜风味。至于官场大宴会，倘用中菜，还是“北方味”的馆子来承办，可异者竟有烧烤乳猪，而且做得很好。但挂炉鸭子则从未见过，简直绝对不用鸭子，有时用鹅。冷盆极多。倘是一席头等的菜，所用冷盆多至二三十个，圆桌面上排成一圈。这许多冷盆，例必杂拌而食之，故有一大盘居中，为拌菜之用。冷盆中又必有“龙须菜”一味，此为海菜。亦有海参，财为苏联货。有鱼翅。此外各种海味则因抗战后来源断绝，已不多见。乌鲁木齐河中产一种鱼，似属鲑鱼一类，尚为鲜美，此为迪化唯一可得之鲜鱼。

“汉菜”而外，有清真教门馆与俄国式西菜。

娱乐之事，除各种晚会外，惟有电影与旧戏。电影院皆为各族文化促进会所办之俱乐部所附设，苏联片为多，国产片仅抗战前的老片子偶有到者。

旧戏园有五六家，在城内。主要是秦腔，亦有不很纯粹之皮黄。故李主席寿辰，曾在省府三堂演旧戏；据说这是迪化最好的班子，最有名的角儿，所演为皮黄。但我这外行人看来，也已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汉族小市民喜听秦腔。城内几家专唱秦腔的戏园，长年门庭如市。据说此等旧戏园每三四十分钟为一场，票价极低，仅省票（新省从前所通用之银票，今已废）五十两（当时合国币一分二厘五），无座位，站着看，屋小，每场容一百余人即挤得不亦乐乎；隆冬屋内生火，观戏者每每汗流浹背，幸而每场只得三四十分钟，不然，恐怕谁亦受不住的。电影票价普通是五毛三毛两种，座位已颇摩登。然因所映为苏联有声片，又无翻译，一般观众自难发生兴味，基本观众为学生与公务员。

电影院戏园皆男女分座。此因新省一般民众尚重视男女有别之封建的礼仪也。但另一方面，迪化汉族小市民之妇女，实已相当“解放”；妇女上小茶馆、交男友，视为故常，《新疆日报》所登离婚启事，日有数起，法院判离婚案亦宽，可谓离婚相当自由。此等离婚事件之双方，大都为在戏园中分坐之小市民男女。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对照。归化族（即白俄来归者）之妇女

尤为“解放”，浪漫行动，时有所闻，但维哈等族之妇女就不能那么自由了，因为伊斯兰教义是不许可的。然又闻人言南疆库车、库尔勒等地风气又复不同，维族女子已嫁者，固当恪守妇道，而未嫁或已寡者，则不以苟合为不德云。

[附记]此篇大概写于一九四一年冬或一九四一年初夏，后来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之《旅行杂志》。我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出新疆，到延安住了几个月，于同年初冬到重庆。那时候，重庆的朋友们正担心着杜重远和赵丹等人的安全（我离新疆时，杜已被软禁，赵等尚未出事，后来在延安，知道杜、赵等皆被监禁，罪名是勾通汪精卫，无人置信；足见盛世才实在不能从杜、赵的言行中找到其他借口，只好用这个无人相信的莫须有罪名来逮捕他们），纷纷向我探询新疆实况；我的回答是很率直的，我揭穿了盛世才的假面具。有一次，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多人（其中有好几位是很进步的）找我谈新疆情形，由龚澎同志介绍，并任翻译；谈完以后，有一位记者问我能不能发表？我回答，可以用背景材料的形式发表，不要用访问记的形式。为什么我这样回答？原因是，一，当时我正和沈老（钧儒）、郭老（沫若）及韬奋，一同写信给盛世才，要求释放杜、赵等七、八人，如果发表了我暴露盛世才的访问记，就会影响到营救杜、赵等人的工作；二，当时盛世才的亲俄联共（中共）的假面具还戴着，盛和蒋介石还有矛盾，公开暴露盛，还不到时候。但是，另一方面，我以为盛世才的欺诈行为对后方（指那时的重庆、成都、昆明等地）青年知识分子所起的欺骗作用（特别因为两年前杜重远为盛所欺，写了两本小册子，歌颂盛世才，造成了许多青年对盛的极大幻想），有加以消解的必要。由于上述的考虑，我写了这篇《新疆风土杂忆》。但发表时，有些字句被国民党检查官或删或改，歪曲了原来面貌。此文后来收在《见闻杂记》单行本时，我又作修改，但不知何故，单行本印出来时仍然是《旅行杂志》发表时的样子。现在冷饭重炒，字句上我再作小小的修改。

此篇所述新疆的风土习俗，在今天看来，已成陈迹。但从这里也可以对照出来，解放后的新疆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事业的飞快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史无前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正确政策和英明领导的实例之一。

1958年11月16日，茅盾记于北京。

谈鼠

闲谈的时候偶尔也谈到了老鼠。特别是看见了谁的衣服和皮鞋有啮伤的痕迹，话题便会自然而然的转到了这小小的专过“夜生活”的动物。

这小小的动物群中，大概颇有些超等的“手艺人”：它会把西装大衣上的胶质钮子修去了一层边，四周是那么匀称，人们用工具来做，也不过如此；女太太们的梆硬的衣领也常常是它们显本领的场所，它们会巧妙地揭去了这些富于浆糊的衣领的里边的一层而不伤及那面子。但是最使我敬佩的，是它们在一位朋友的黑皮鞋上留下的“杰作”：这位朋友刚从东南沿海区域来，他那双八成新的乌亮的皮鞋，一切都很正常，只有鞋口周围一线是白的，乍一看，还以为这又是一种新型，鞋口镶了白皮的滚条，然而不是！

对于诸如此类的小巧的“手艺”，我们也许还能“幽默”一下，——虽然有时也实在使你“啼笑皆非”。

可惜它们喜欢这样“费厄泼赖”的时候，并不太多，最通常的，倒是集恶劣之大成的作法。例子是不怕没有的，比方：因为“短被盖”只顾到头，朋友A的脚趾头便被看中了，这位朋友的睡劲也真好，迷迷糊糊地，想来至多不过翻个身罢了，第二天套上鞋子的时候这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急忙检查，原来早已血污斑驳。朋友B的不满周岁的婴儿大哭不止，渴睡的年青的母亲抚拍无效，点起火一看，这可骇坏了，婴儿满面是血了，揩干血，这才看清被啮破了鼻囟了。为了剥削脚趾头上和鼻孔边那一点咸咸的东西，竟至于使被剥削者流血，这是何等的霸道，然而使人听了发指的，还有下面的一件事。在K城，有一位少妇难产而死，遗体在太平间内停放了一夜，第二天发现缺少了两颗眼珠！

“鼠窃”这一句成语，算是把它们善于鬼鬼祟祟，偷偷摸摸，永远不能光明正大的特性，描摹出来了。然而对于弱者，它们也是会有泼胆的。它们敢从母鸡的温暖的翅膀下强攫了她的雏儿。这一只可怜的母鸡，抱三个卵，花了二十天工夫，她连吃也无心，肚子下的羽毛也褪光了，憔悴得要命，却只得了一只雏鸡，这小小的东西一身绒毛好像还没大子，就啾啾的叫着，在母亲的大翅膀下钻进钻出，洒几粒米在它面前，它还不知道吃，而疲惫极了的母亲咕咕地似乎在教导它。可是当天晚上，母鸡和小鸡忽然都叫得那样惨，人们急忙赶来照看时，小鸡早已不见踪影，母鸡却蹲在案外地上，——从此她死也不肯再进那案了。

其实鸡们平时就不愿意伏在窝里睡觉，孵卵期是例外。平时它们睡觉总喜欢蹲在什么竹筐子的边上，这大概是为了防备老鼠。因此也可想到为了孵卵，母鸡们的不避危险的精神有多么伟大！江南养鸡都用有门的竹笼，这对于那些惯会放臭屁来自救的黄鼠狼，尚不失为有效的防御工事，黄鼠狼的躯干大、钻不进那竹笼的小方格。但是一位江南少妇在桂林用了同样的竹笼，却反便宜了老鼠；鸡被囚于笼走下开，一条腿都几乎被老鼠咬断了。

但尽管是多么强横，对于“示众”也还知道惧怕。捉住了老鼠就地钉死，暴尸一二日，据说是颇有“警告”的效力的。不过这效力也有时间性，我的寓所里有一间长不过四尺宽二尺许的小房，因其太小，就用以储放什物，其中也有可吃的，都盖藏严密，老鼠其实也没法吃到，然而老鼠不肯断念，每夜都要光顾这间小房。墙是竹笆涂泥巴的墙，它们要穿一个孔，实在容易得很。最初我们还是见洞即堵，用瓦片，用泥巴，用木板，后来堵住了这里，

那边又新穿了更大的洞，弄得到处千疮百孔，这才从防御而转为进攻。我们安设了老鼠夹子。第一夜，到了照例的时光，夹墙中果然照例蠢动，听声音就知道是一头相当大的家伙，从夹墙中远远地奔来，毫不踌躇，熟门熟路，直奔向它那目的地了，接着：拍叉一声，这目无一切的家伙果然种瓜得瓜。这以后，约有个把月，绝对安静，但亦只有个把月而已，不能再多。鼠夹子虽已洗过熏过，可再也无用。当然不能相信老鼠当真通灵，然而也不能不佩服它那厉害的嗅觉。我们特别要试验这些贪婪的小动物抵抗诱惑的决心有多大。我们找了最香最投鼠之所好的东西装在鼠夹子上，同时厉行了彻底的“清野”，使除此引诱物外，简直无可得食。一天，两天，没有效；可是第三天已经天亮的时候，我们被拍叉的声音惊醒，一头少壮的鼠子又捉住了，想来这是个耐不住馋的莽撞的家伙。

然而这第二回所得的安静时间，只有一个星期。

不但嗅觉厉害，老鼠大概又是多疑的，而且警觉心也提得相当高。鼠药因此也不能绝对有效，除非别无可食之物，鼠们未必就来上当；特别是把鼠药放在特制的食物中，什九是徒劳。扫荡老鼠似乎是个社会问题，一家两家枝枝节节为之，决不是办法。记得前些时候，报上载过一条新闻，伦敦的警察和市民合作，举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全市于同一日发动，计用去鼠药数万磅，粮食数吨，厨房，阴沟，一切阴暗角落，全放了药，结果得死鼠数百万头。数百万这数目，不知占全伦敦老鼠总数的几分之几，数百万的数目虽然不小，但说伦敦的老鼠全部毒死，恐怕也不近事理。自然，鼠的猖獗是会因此一举而大大减少的，不过这也恐怕只是一时而已。

似乎凡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就不会没有偷偷摸摸的又狡猾贪婪的丑类。所差者，程度而已。报上又登过一条消息：重庆市卫生当局特地设计了防鼠模范建筑。我们可以相信这种模范建筑会比竹笆汰泥巴的房屋要好上百倍；然而我们却不敢相信这样一道防线就能挡住了老鼠侵略的凶焰，当四周都是老鼠繁殖的好场所的时候，一幢好的房子也只能相当的减少鼠患而已。老鼠是一个社会问题，没有市民全体的总动员，一家两家和鼠斗争，结果是不容乐观的。但这不是说，斗争乃属多事，斗争总能杀杀它们的威；不过一劳永逸之举，还是没有。

人们的拿手好戏是妥协。和老鼠妥协，恐怕也是由来已久的。人，到底比老鼠会打算盘，权衡轻重之后，人是宁愿供养老鼠、而不愿因小失大，损坏了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鼠们大概会洋洋得意，自从胜利，而下知已经中了人们的计。有一家书店把这妥协方策执行得非常彻底，他们研究出老鼠们喜欢换胃口，有时要吃面，有时又要吃米，可是老鼠当然下会事前通知，结果，人们只好每晚在书栈房里放一碗饭和一碗浆糊，任凭选择。据说这办法固然可以相当减少了书籍的损坏，如果这样被供养的鼠类会减低它们的繁殖力，那问题倒还简单，否则，这妥协的办法总有一天会使人们觉得负担太重了一点。

在鼠患严重的地方，猫是照例不称职的。换过来说，也许本来足猫不像猫，这才老鼠肆无忌惮，而且又因为鼠患太可怕了，猫被当作宝贝，猫既养尊处优，借鼠以自重，当然不肯出力捕鼠了；不要看轻它们是畜生，这一点骗入混饭的诀窍似乎也很内行的呢！

1944年3月17日。

马达的故事

— 马达的“屋子”

东山教员住宅区有它的特殊的情调。

这是一到了这“住宅区”的人们立刻就会感到的，然而，非待参观过各位教员的各种个性的“住宅”以后，说不出它的特殊在哪里；而且，作得住上这么半天，最好是候到他们工作完毕，都下来休息了，一堆一堆坐首站着谈天说地，而他们的年青的太太们也都带着儿女们出来散步，这高冈上的住宅区前面那一片广场上交响着滔滔的雄辩，圆朗的歌音，及女性的和婴儿的唧唧呀呀学语的柔和细碎的话声的时候，其所谓特殊情调的感觉也未必能完整。

而在这中间，马达的巨人型的身材，他那方脸、浓眉、阔嘴，他那叉开了两腿，石像似的站着的姿势，他那老是爱用轩动眉毛来代待笑的表情，而最后，斜插在嘴角的他那枝硕大无比的烟斗，便是整个特殊中尤其突出的典型。

不曾听说马达有爱人，也没有谁发见过马达在找爱人：他是“东山教员”集团内少数光棍中间最为典型的光棍。他的“住宅”就说明了他这一典型，他的“住宅”代表了他的个性。没有参观过马达的“住宅”、就不会对于“东山教员住宅区”的各个“住宅”的个性了解得十分完整。

门前两旁，留存的黄土层被他削成方方正整下广上锐的台阶形，给你扑面就来一股坚实朴质的气氛，当斜阳的余晕从对面山顶淡淡地抹在这边山冈的时候，我们的马达如果高高地坐在这台阶的最上一层，谁要说这不是达·芬奇的雕像，那他便是没眼睛。白木的门框，白木的门；上半截的方格眼蒙着白纱。门楣上刻着两个字：马达。阳文，涂黑，雄浑而严肃，犹似他的人。

门是门以内的情调可不是这般单纯了。土质的斗型的工作桌子，庄重而凝定，然而桌面的二十五度的倾斜，又多添了流动的气韵。后半室是高起二尺许的土台，床在中心，四面离空，几块玲珑多孔的巨石作了床架，床下地面繁星一般铺了些小小的石卵，其中有些是会闪闪耀着金属的光辉。一床薄被，一张猩红的毯子，都叠成方块，斜放在床角。这一切，给你的感觉是凝定之中有流动，端庄之中有婀娜，突兀之中却又有平易。特别还有海洋的气氛，你觉得他那床仿佛是个岛，又仿佛是粗阔的波涛上的一叶扁舟。

然而这还没有说尽了马达这“屋子”的个性。为防洞塌，室内支有木架、这是粗线条的玩意。可是不知他从哪里去弄来了一枝野藤（也许不是藤，总之是这一类的东西），沿着木架，盘绕在床前头顶，小小的尖圆的绿叶，纓络倒垂。近根处的木柱上，一把小小的铜剑斜入木半寸，好像这是从哪里飞来的，铿然斜砍在柱上以后，就不曾拔去。

朝外的土壁上，标本似的钉着一枝连叶带穗的茁壮的小米。斗型的工作台上摆着全副的木刻刀，排队一般，似乎在告诉你：他们是随时准备出动的。两边土壁上参差地有些小洞，这是壁橱，一只小巧的表挂在左边。一句话，所有的小物件都占有了恰当的位置，整个儿构成了媚柔幽娴的调子。

巨人型的马达，就住了这么一个“屋子”。一切都是他亲手布置，一切都染有他的个性。他在这里工作，阔嘴角斜叼着他那硕大无比的烟斗。他沉默，然而这像是沉默的海似的沉默。他不大笑，轩动着他的浓重的眉毛就是

他代替了笑的。

二 马达的烟斗和小提琴

认识马达的人，先认识他的大烟斗。

马达的大烟斗，是他亲手制造的。

“这有几斤重罢？”人们开玩笑对他说。

于是马达的浓眉毛轩动了，他那严肃的方脸上掠过了天真的波动似的笑影。他郑重地从嘴角上取下他的烟斗，放在眼前看了一眼，似乎在对烟斗说：“嘿！你这家伙！”

他可以让人家欣赏他的烟斗。像父母将怀抱中的爱子递给人家抱他似的，他将他的烟斗交在人家手里。

那“斗”是什么硬木的老根做的，浑圆的一段，直径足有一寸五分。差不多跟鼓槌一样的硬木枝（但自然比真正的鼓槌小些），便作成了“杆”，插在那浑圆的一段内。

欣赏者擎起这家伙，作着敲的姿势，赞叹道：“呵，这简直是个木榔头（槌子）呢！”他仰脸看着马达，想要问一句道，“是不是你觉得非这么大这么重，就嫌为称手？”可是马达的眉毛又轩动了，他从对方的眼光中已经读到了对方心里的话语，他只轻声说了七个字：“相当的材料没有。”

“这杆子里的孔，用什么工具钻的？”

“木刻刀，”回答也只有三个字。

这三个字的回答使得欣赏者大为惊异，比看着这大烟斗本身还要惊异些，凭常情推断，也可以想像到，一把木刻刀要在这长约四寸的硬木枝中穿一道孔，该不是怎样容易的。马达的浓眉毛又轩动了，他从欣赏者脸上的表情明白了他心里的意思；但这回他只天真地轩动眉毛而已，说明是不必要的，也是像他这样的人所想不到的。

可不是，原始人凭一双主手还创造了个世界呢，何况他还有一把木刻刀！

市上卖的不是没有烟斗。这是外边来的粗糙的工业制造品，五毛钱可以买到一支。虽说是粗糙的工业制造品，但在一般人看来，还不是比马达手制的大家伙精致些。鄙视工业制造品的心理，马达是没有的，即使是粗糙的东西。然而这五毛钱的家伙可小巧的出奇。要是让马达叼在嘴角，那简直像是一只大海碗的边上挂着一支小小的寸把长的瓷质的中国式汤匙。

“你也买过现成的烟斗么？”欣赏者又贸然问了。

“买过，”马达俯首看着欣赏者的脸，轻声说，于是他慢慢地抬起头来，看着遥远的空际，他那富于强劲的筋肉的方脸上又隐约浮过了柔和而天真的波纹，似乎他在遥远的空际望到了遥远的然而又近在目前的过去，“买过的，”他又轻声说，“比这一支小些！”

他从欣赏者手里接过了他的爱人一般的大烟斗。又开了两腿，他石像似的站着，从烟斗里一缕一缕的青烟袅绕上升，在他那方脸上掠过，好像高冈上的一朵横云。刹那间云烟散了，一对柔和的眼睛沉静地看着你，看着周围的一切，看着这世界宇宙。于是你会唤起了什么的回忆：那是海，平静的海，阔大，而且和易，海鸥们在它面上仆着翼子，追逐游戏，但是在这平静和易之下，深深的，几十尺以下，深深的蛟龙潜伏在那里，而且，当高空疾风震雷闪电突然际会的时候，这平静的海又将如何，谁又能知道呢？

一天，夕阳西下，东山教员住宅区前那一片广场上照例喧腾着笑声，歌声，谈话的时候，人们忽然觉得缺少了什么东西。

又开了两腿，叼着大烟斗，石像似的站着，只用轩动眉毛来代替笑的马达，不在这里。当他照例那样站着和人们在一处的时候，人们不一定时时想着：“哦！马达在这里！”但当这巨人型的马达忽然不在的时候，人们就很尖锐地感到缺少了一件不能缺少的东西。

“马达正在向他的爱人进攻呢！”和马达作紧邻的人笑了说。“马达是会用水磨功夫的！”

这一句不辨真假的话，可能立刻成为一个主题；戏剧家、小说家、诗人、漫画家、作曲家，甚至也还有理论家，一时会纷纷议论，感到极大的兴趣。女同志们睁大了眼睛听，同时也发表了她们的观察和分析。

不错，马达是正在用水磨功夫，对付——但不是人，而是一块薄薄的木板子。

当好奇者在马达“住宅”的门前发见了他的时候，这巨人正躬着腰，轻轻而又使劲地，按住一块薄薄的木板子，在一块砂石工作水磨，那种谨慎而又敏捷的姿势，好像十七八岁的小儿女在幽闺中刺绣。

谁要是看了这样专心致志而又兴趣盎然，还会贸然冲上去问一句：“喂，马达同志，你这是于么的？”——那他真是十足的冒失鬼。

蹲在一旁，好奇者孜孜地看着：他渐渐忘记了马达，马达也似乎始终不曾见到他。

大烟斗里袅起青烟的当儿，马达轩动着眉毛，探身从土台的最高一级拿下个古怪的东西，给好奇者看。

“哦！”好奇者恍然大悟了。这是个小提琴的肚子，长颈子还没装上；这也是薄薄的木板——该说是木片，已经被弯成吕字形，中间十字式的木架撑住，麻绳扎着：这是极合规则的小提琴的肚子，但前后壁却还缺如。

“哦，”好奇者指着马达正作着水磨功夫的一块说，“这是装在那肚子上的罢？”

马达点头，又轩动着眉毛，满脸的笑意。

被水磨的那块板并不是怎样坚硬细致的木料，马达总希望将它弄到尽可能地光滑，他找不到砂皮，所以想出了水磨的法子。但是，已经被磨成吕字形的长条的薄木片，光滑固然未必十足，全体厚薄之匀称却是惊人的。

“呵！这样长而且薄的木板，你从哪里去弄来的？”好奇者吃惊地问？”

“买来的，”马达静静地回答，柔和的眼光忽然闪动了，像是兴奋，又像是害羞。“新市场里买的。”

“哦！”好奇者仰脸注视着马达的面孔，“了不起！”这当儿，他的赞叹已经从木板移别人，他觉得别的且不说，光是能够“找到”这样的薄傅的木机，也就是“了不起”的事情。

马达完全理会得这个意思，他庄重地说道：“买这容易。这是本地老百姓做蒸笼的框子用的！”

于是谈论移到了制造一个小提琴所必需的其他材料了。马达以为弦线最成问题。

“胡琴用的弦线，勉强也可以。”马达静静地说，从嘴角取下他那大烟斗。

躬着腰，他又专心一意兴趣盎然去对付那块木板了。好奇者默默地在一

旁看，从那大烟斗想到未来的小提琴，相信它一定会被制成的。

隔了好几天，傍晚广场上照例的小堆小堆的人们中间，又照例的有叉开了两腿，叼着大烟斗的马达了。他的小提琴制成了罢？没有人问他，照例他不会先对人家提到这话儿。然而大家都知道，制成是没有疑问的。当好奇者问他：“那弦线怎样？成么？”

“木料也下成！”马达庄重地回答。

只是这么一句话。

青烟从大烟斗中袅袅升起，烟丝在烟斗里吱吱地叫。马达轩起了他那浓眉，举起柔和的眼光，望着对面山顶的斜阳，斜阳中款款摇摆着的狗尾巴草似的庄稼，驮着斜阳慢慢走下山冈来的牛羊。

不能忘记的一面之识

他们第一次感觉到有这么一位年青人在他们一起，是在天方破晓，山坡的小松林里勉强能够辨清人们面目的时候。朝霞掩蔽了周围的景物，人们只晓得自己是在一座小小的森林中，而这森林足在山的半腰。夜来露重，手碰到衣服上觉着冷，北风穿过森林扑在脸上，虽然是暖和的南国的冬天，人们却也禁不住打起寒战来了。

昨应他们仓皇奔上这小山，只知道是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敌人的游骑很少可能碰到的地方；上弦月早已西沉，朦胧中不辨陵谷，他们只顾跟着向导走，仿佛觉得是在爬坡，便断定是到山里的一间土寮或草寮去。那里有这么几株亭亭如盖的大树，掩护得很周密而又巧妙，而且——就像他们在木古所经验过的住半山土寮的风味，躺在稻草堆上一觉醒来，听远处断断续续的狗叫，似在报导并无意外。撑起半身朝索外望一眼，白茫茫中有些黑魇魇，像一幅迷漫的米芾水墨画，这也算是够“诗意”的了。他们以这样的“诗意”自期，脚下在慢慢升高，谁知到最后站住了的时候却发现这期待是落空了，没有土寮，也没有草寮，更没有亭亭如盖的大材，只有疏疏落落散布开的小树，才到一人高。然则这地方之尚属于危险区域，那时倒也不知道。现在，他们在晓风中打着寒噤，睁大了眼发楞，可突然发觉在他们周围，远远近近，有比他们多一倍的武装人员，不用说，昨夜是在森严警戒中糊里糊涂地睡了一觉。

不安的心情正在滋长，一位年青人，肩头挂一枝长枪，胸前吊颗手榴弹，手提着一支左轮，走近他们来了。他操着生硬的国语，几乎是一个单字硬拼凑起来的国语，告诉他们：已经派人下去察看情形了，一会儿就能回来，那时就可以决定行动了。

“敌人在什么地方？”他们之中的G君问。

年青人好像不曾听懂这句话，但是不，也许他听懂，他侧着头想了想，好像一个在异国的旅客临时翻检他的“普通会话手册”要找一句他一时忘记了“外国话”；终于他找到了，长睫毛一闪，忽然比较流利地答道：“等等就知道了。”

如果说是这句话的效力，倒不如说那是他的从容不迫的态度给人家一服定心剂，人们居然自作了结论：敌人大概已经转移方向，威胁是已经解除了。然而人心总是无厌的，他们还希望他们自作的结论得到实证。眼前既然有这么一位“语言相通”的人，怎么肯放过他？问题便像榴霰弹似的纷纷掷到他头上。他们简直不肯多费脑力估量一下对方的国语程度究竟是能够大概都听懂了呢，还是连个大概都听不懂，而只能像一位环绕地球的游客就凭他那宝贝的“会话手册”找出他所要说的那几句话。

但是年青人不忙不慌静听着，闪动着他的长睫毛。末了，他这才回答，还是那一句：“等等就知道了。”这一句话，现在可没有刚才那样的效力了。因为提出的问题太多又太复杂，这一句回答不能概括。人们内心的不安，开始又在滋长。他们开始怀疑这位年青人能听懂也能说的国语究竟有几句了，如果他们还能够不起恐慌，那亦还是靠了这位年青人的镇静从容的态度。

幸而这所谓“等等”，不久就告终，“就知道”的事情也算逐一都知道了。敌人果然离这小小村落远些了，他们可以下山去，到屋里一歇了。

在一座堡垒式的大房子里，人们得到了一切的满足：关于“敌情”的，

关于如何继续赶路的，最后，关于休息和口腹的需要。

因为是整夜不曾好生睡觉，他们首先被引进一间房去“休息”一会儿，这房本来也有人住，但此时却空着。招待他们的人——两位都能说国语，七手八脚把一些杂乱的东西例如衣服、碗盏之类，堆在一角，清理出一张大床来，那是十多块松板拼成，长有八九尺，宽有四五尺，足够一“班”人并排躺着的家伙；又弄来了一壶开水，于是对他们说：“请休息罢，早饭得了再来请你们。”

这房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洞，狭而长。实在不能算是窗，只可说是通气洞。但真正的用途，却是从这里可以射击屋子外边的敌人。此时朝暾半上，房里光线黯淡，而在他们这几位弄惯了必先拉上窗帏然后始能睡觉的人看来，倒很惬意。然而他们睡不着，也许因为疲劳过度上了虚火，但也许因为肚子里空，他们闭眼躺在那些松板上，可是睡不着。

但是不久就来请吃早饭了。

吃饭的时候、招待他们的两位东道主告诉他们：今晚还得走夜路，不远；可也有三十多里，因此，白天可以畅快的睡个好觉。

他们再回那间房去，刚到门口，可就楞住了。

因为是从光线较强的地方来的，他们一时之间也看不清楚，但觉得房里闹烘烘挤满了人，嘈杂的说笑，他们全不懂。然而随即也就悟到，这是这间房的老主人们回来了，是放哨或是“摸敌人”回来了，总之，也是急迫需要休息的。

渐渐地看明白，闹烘烘的七八人原来是在解下那些挂满了一身的捞什子：灰布的作为被子用的棉衣、子弹带、面巾、像一根棒槌似的米袋、马口铁杯子、手榴弹等等，都堆在墙角的一只板桌上。看着那几位新客带笑带说，好像是表示抱歉，然后一个一个又出去了，步枪却随身带起。

房里又寂静了，他们凡位新客呆了半晌，觉得十二分的过意不去；但也只好由它，且作“休息”计。他们都走到那伟大的板铺前，正打算各就“岗位”，这才看见房里原来还留得有一人，他坐在那窗洞下，低着头，在读一本书，同时却又拿支铅笔按在膝头，在小本上写些什么。

看见他是那么专心致志，他们都不敢作声。

一会儿，他却抬起头来了，呀，原来就是早晨在山上见过的那位年青人。

只记得他是多少懂得点国语的，他们之中的C君就和他招呼，觉得分外亲切，并且对于占住了房间的事，表示歉意。

年青人闪动着长睫毛，笑了一笑。这笑，表示他至少懂得了C君的意思。可是他并不开口，凝眸望了他们一眼，收拾起书笔，站起身来打算走。

“不要紧，你就留在这里，不妨碍我们的，况且我们也不想睡。”C君很诚恳的留他。

C君的同伴们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

他可有点惘然了。——是呀，他这时的表情，应当说是“惘然”，而不是“踌躇”。长睫毛下边的澄澈而凝定的眼睛表示了他在脑子里搜索一些什么东西。终于搜索到了，乃是这么一句：“我的事完了。”

他似乎还有多少意思要倾吐、然而一时找不到字句，只好笑了笑，又要走。这当儿C君看见他手里那本很厚的书就是他们一个朋友所写的《论民族民主革命》，一本高级的理论书，不禁大感兴趣，就问道：“你们在研究这本书么？”

他的长睫毛一敛，轻声答值：“深得很，看不懂。”忽然他那颇为白皙的脸上红了一下，羞怯怯地又加一句：“没有人教。”

“你们有学习小组没有？”

年青人想了一会儿，然后点头。

“学习小组上用什么书？不是这一本么？”

“不是。”年青人的长睫毛一动，垂眼看着手里那本书，又叹气似的说，“好深呵，好多地方不懂。”

这叹息声中，正燃烧着人焰一样的知识欲；这叹息声中，反响育理论学习的意志的坚决，而不是灰心失望。他们都深深感动了。C君于是问道：

“你是哪里人？”

“新加坡。”

“什么学校？”

“我是做工的。”年青人回答，长睫毛又闪动一下。

这一回答的出人意外，不下于发见他在自习那本厚书。C君的同伴们都加入了谈话。而且好像这极短时间的练习，已经使得那年言人的国语字汇增加了不少，谈话进行得相当热闹。

从他的不大完全的答语中，他们知道了他生长在新加坡，父母是工人，兄弟姊妹也是工人，他本人念过一年多的小学，后来就做机器工人，抗战以后回祖国投效，到这里也一年多了。

“你怎么到了这里的？”有人冒昧地问。

年青人又有点偶然了。急切之间又找下到可以表达他的意思的国语了，他笑了笑，低垂着长睫毛，又回到原来的话题，叹息着说：“知识不够，时间——时间也不够呀。”

于是把那本厚书塞进衣袋，他说：“我还有事，等等，时间到了，会来叫你们。”便转身走了。

房里又沉静了，一道阳光从窗洞射进来，那一条光柱中飘游着无数的微尘，真可以说一句万象缤纷。他们都躺在松板上，然而没睡意，那年青人的身世，性格——虽然只从这短促的会晤中窥见了极少的一部分，可是给他们无限兴奋。

态度沉着，一对聪明而又好作深思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异常清秀端庄的面孔，说话带点羞涩的表情：——这样一个年青人，这样一个投身于艰苦的战斗生活的年青人，仿佛在他身上就能看出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儿女们的面影。

森林中的绅士

据说北美洲的森林中有一种“得天独厚”的野兽，这就是豪猪，这是“森林中的绅士”！

这是在头部，背部，尾巴上，都长着钢针似的刺毛的四足兽。所谓“绅士相处，应如豪猪与豪猪，中间保持相当的距离”，就因为大靠近了彼此都没有好处。不过豪猪的刺还是有形的，绅士之刺则无形，有形则长短有定，要保持相当的距离总比无形者好办些，而这也是摹仿豪猪的绅士们“青出于蓝”的地方。

但豪猪的“绅士风度”之可贵，尚不在那一身的钢针似的刺毛。它是矮胖胖的，一张方正而持重的面孔，老是踱着方步，不慌不忙。它的潇洒悠闲，实在也到了殊堪钦佩的地步：可以在一些滋味不坏的灌木丛中玩上一个整天，很有教养似的边走边哼，逍遥自得，无所用心，宛然是一位乐天派。它不喜群的生活，但也并非完全孤独，由此可见它在“待人接物”上多么有分寸。

若非万不得已，它决不旅行，整年整季，它的活动范围不出三四里地。一连几星期，它只在三四棵树上爬来爬去；它躺在树枝间，从容自在地啃着树皮，啃得倦了，就打个瞌睡；要是睡中一个不小心倒栽下来，那也不要紧，它那件特别的长毛大衣会保护它的尊躯。

它也不怕跌落水里去，它全身的二万刺毛都是中空的，它好比穿了件救生衣，一到水里，自会浮起来的。

而这些空心针似的刺毛又是绝妙的自卫武器，别的野兽身上要是刺进了几十枚这样的空心针，当然会有性命之忧，因为这些空心针是角质的，刺进了温湿的肌肉，立刻就会发胀，而且针上又遍布了倒钩，倒钩也跟着胀大，倒钩的斜度会使得那针愈陷愈深。因此，遇到外来的攻击时，豪猪的战术是等在那里“挨打”，让敌人自己碰伤，知难而退。因为它那些刺毛只要轻轻一碰就会掉落，而又因其尖利非凡，故一碰之下未有不刺进皮肉的。

然而具有这样头等的自卫武器的它，却有老大的弱点：肚皮底下没刺毛，这是不设防地带，小小的老鼠只要能够设法钻到豪猪的肚皮底下，就是胜利者了。但尤其脆弱者，是豪猪的鼻子。一根棍子在这鼻尖上轻轻敲一下，就是致命的。这些弱点，豪猪自己知得很清楚；所以遇到敌人的时候，它就把脑袋塞在一根木头下面，这样先保护好它那脆弱的鼻子，然后四脚收拢，平伏地面，掩蔽它那不设防的腹部，末了，就耸起浑身的刺毛，摆好了“挨打”的姿势。当然，它还有一根不太长然而也辽强壮有力的尾巴（和它身长比较，约为五与一之比），真是一根狼牙棒，它可以左右挥动，敌人要是挨着一下，大概受不住；可是这根尾巴的挥动因为缺乏一双眼睛来指示目标，也只是守势防御而已。

敌人也许很狡猾，并不进攻，却悄悄地守在旁边静候机会。那时候，豪猪不能不改变战术了。它从掩蔽部抽出了鼻子，拚命低着头（还是为的保护鼻子），倒退着走，同时猛烈挥动尾巴，这样“背进”到了最近一棵树，它就笨拙地往上爬，爬到了相当高度，自觉已无危险，便又安安逸逸躺在那里啃起嫩枝来，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

这真是典型的绅士式的“镇静”。的确，它的一切生活方式——连它的战术在内，都是典型的绅士式的。但正像我们的可敬的绅士们尽管“得

天独厚”，优游自在，却也常常要无病呻吟一样，豪猪也喜欢这调门。好好地它会忽然发出了声音摇曳而凄凉的哀号，单听那声音，你以为这位“森林中的绅士”一定是碰到绝大的危险，性命就在顷刻间了；然而不然。它这时安安逸逸坐在树梢上，方正而持重的脸部照常一点表情也没有，可是它独自在哀啼，往往持续至一小时之久，它这样无病而呻吟是玩玩的。

据说向来盛产豪猪的安地郎达克山脉，现在也很少看见豪猪了，以至美国地方政府下得不用法令来保护它了。为什么这样“得天独厚”，具有这样巧妙自卫武器的豪猪会渐有绝种之忧呢？是不是它那种太懒散而悠闲的生活方式使之然呢？还是因为它那“得天独厚”之处存在着绝大的矛盾，——几乎无敌的刺毛以及毫无抵抗力的暴露着的鼻子，——所以结果仍然于它不利呢？

我不打算在这里来下结论，可是我因此更觉得豪猪的“生活方式”叫人看了寒心。

1945年5月21日。

上杂谈一则，昨日从一堆旧信件中检了出来。看篇末所记年月日，方才想起写这一则时的心情，惘然若有所失。当时写完以后何以又搁起来的原因，可再也追忆不得了。重读一过，觉得也还可以发表一下，姑以付《新文学》。

1945年12月14日记于无阳光室，重庆。

船名叫做“醒狮”，这小小一组的旅客一共是五位，开船的那一天不迟不早是阳历元旦。

预先打听过了，这条“醒狮”要走这么十天才能到埠。但没有办法，十天就十天罢。“沙基惨案”以后，“香港”交通还没恢复常态，而且五位之中那个常常自吹他有“阔本家”的“准小开”不知从哪里听来了无稽之谈，像一匹鼓起了肚子不怕吹垮的癞蛤蟆，一口咬定要是在香港过身，准会惹起麻烦。就这样，买票等等手续都由“准小开”一手包办。

轮船公司也是抓住机会打算在这一条航线上插一脚，急急忙忙把货船改了装，据说一共才只走了三班，这就可想而知，这条“醒狮”的设备不会高明到哪里去的。然而“准小开”单凭“掙客”一面之词，只知道这是一条“新船”，且又一定的是“官舱”，一幅美丽而舒适的近海旅行的图画在定妥舱位的时候便装进他脑子里了；因此，三十一日上午，为了周到起见，他亲自上船一看，好容易揪住一个茶房带路，从船长室抄过一排虽不怎样富丽堂皇但也还精致干净的房间，而后到了船尾，当那带路的茶房指着一个长方形的黑洞，说“官舱就在下边”的时候，“准小开”简直是弄昏了。他看看黑侗右首是雏鸭棚，左首是厕所，突然伸手捏住了鼻子，转身便走，不发一言。

那天午后，“准小开”的同行者接到电话：交涉办妥了，船上人让出了一间房，有六个铺位，你们赶快上船，迟了也许又有变卦，到船上找西崽头目就得了。

四点钟左右，Y 君和两个同伴挤在那船上人让出来的房间里，三个人站成一排，侧着头我看你，你看我；三层的铺架挡在他们面前，稍稍一个不小心，就会碰鼻子，而他们的背脊却已贴着了板壁；三位之中衣服穿的最厚的刘，几乎连转个身也怪费力。

“不对，不对，一定弄错了！”刘大声嚷着，他那凹面孔上亮晶晶地冒出一层油汗，平时的三分傻气七分少爷派。此时掉过头来足有七分的傻气了。

“怎么会弄错，”靠在门框上那西崽说：“头目是交代得清清楚楚的。”

“那么，你去叫头目来！”刘很神气地喊，面对着那三层铺架。

“头目上岸去了，你有话同我说！”

“那——那——”刘用臂推着 Y 君，表示要他让出路来，“那我就找你船上的买办。”

按照这间房的极端经济的布置，Y 君亦只能用臂推着那身在门外而又靠在门框上的西崽要他先让开，但是 Y 君并不这么办；他攀住了最上一层铺架的木板，身子一缩，居然很顺利地塞在中间层的一个铺位里了，好像他早就有过训练。

“错是不会错的，”身子折成两半似的“坐”定了以后，Y 君慢吞吞地说。他把头伸在上层的铺板之外，悠悠然笑了笑，又说道：“我们的准小开到底有点手腕，找到了这样特别的房间！”

那西崽也笑了。“当真，这条船上就数这一间房是呱呱叫的，”他斜起

半只眼看着刘说，“你瞧，亮爽，空气好，那边是船长窄，这对面，就是大餐间。”

刘不作声，扁着他那臃肿的身子慢慢地挨到门边，自言自语道，“也罢，等小开来了再说。”他抬头朝前看，这才发见那三层的铺架是紧靠着一排玻璃窗把窗做死了的，窗外就是水和天，要不是上下层的铺位距离太小，莫说挺腰而坐绝对不成，就连上去下来都得横着身体平塞进去，那他是没有理由还觉得不能满意的。他轻轻叹口气，也想学Y君的样，怎生设法在最下层一个铺位上坐下来，可是耸着屁股作势蹲了两下以后，终于知难而罢，只转过身、把脊梁靠住了铺架。

“定规了罢？”西崽看见刘也驯顺得多了，便想把使命完成，“头目交代过，请你们把房间钱付清；收过定洋二十五块，还差一百……”

“怎么！”刘大声叫了起来，“我们是打了票的呢！”

“那不相干，船票是船票，归公司，这是我们的伙计，我们自家住的房间让给你们的。”

刘当然不肯让步，并且忘记了自己本来就不打算要这间房，抖擞精神，据“理”和那西崽争论，刘是学法律准备做大律师的。眼前既然有这演习的机会，当然要拿出他的看家本领。然而不幸，刘的“普通话”土音太重，本来就难懂，他的上海话呢，一开口就叫人头痛。现在他又兴奋过甚，更加口齿不清，何况还夹着那么多的法律术语！那西崽弄得莫名其妙，只好光着眼看刘一个人在那里演说。

可是还没开过口的S却打断了刘的好兴致。S不耐烦地叫道：“等小开来办就得了，何必跟他多说废话！”

刚才他们三人进这房来，S是第一位，现在如果要出去，他得等待到最后；他一进来就有这样的感觉：这间房好比一个狭长的口袋，而他是被装在袋底了。他根本看不见那西崽的面孔，可是光听他头目长，头目短的，就觉得这是个奴才嘴脸十足的人。从心底里厌恶起来，而他之所以插这么一句，倒不是想戳破刘的气泡，而是要撵走那西崽。

果然，反应马上就来，第二次又听到“小开”二字，那西崽似乎恍然大悟，立即把客人口里的“小开”和他自己脑子里的“头目”并排一比，当下就得出结论来：

“好，好，你们等你们的小开，我等我的头目，让他们自家当面谈罢。”

这可把刘气坏了。他哼了一声，转眼朝S看，S不理睬，凝眸正望着这“狭长口袋”的一角。那西崽也已走了。刘叹了一口气，忽然有了寂寞之感。

房间的右上角，靠近门口，有一具硕大无朋的电铃，S惘然望着的，正是这个，他想像十天航程之中，这具电铃不知要响多少次呢！他又猜想这电铃是通到船长室的呢还是什么大餐间？他又想到，要是在深更半夜，这伟大的电铃忽然叫个不停，那他和他的同伴们该怎么办：相应置之不理呢，还是到处去找那班鬼知道躲在哪一角的西崽？

这当儿，房外老是有几个人来回地踱着，而且在门口站住了朝房里看，闷在这“袋底”的S当然不会看见，可是他听得Y君的慢吞吞的口音十分正经地在说：“要进来看看么？今天换了人了。今天是我们在这里了。没有什么好看的，也没有咖啡、牛奶、芥哩鸡、蛋炒饭。”

这样说的时侯，Y君的缓慢而冷静的音调以及他那事务式的表情，往往会给人异常强烈的幽默感。门外的窥视者笑着走了。刘也笑了，笑声中带点

儿愤懑。Y君自己却毫无笑容，他从那夹板似的铺位里脱身出来，解开了他那有名的灰布大衫，露出里面的棉袄，棉袄的两只口袋都装得满满的，这里有日记本，信札，当天的报，新出版的刊物。他脱下大衫，郑重其事的摺好，放在一边，就拣出一份刊物，靠在铺位上读起来。

曾经有人说过一句笑话：灰布大衫就是Y君的商标，“五四”时代在武昌听过Y君第一次讲演的青年们，后来在上海某大学的讲坛上又看到Y君时，首先感到亲切的，便是这件灰布大衫。这一件朴素的衣服已经成为他整个人格的一部分，这从不变换的服装又象征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始终如一的坚贞和苦干。将来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要是可能，Y君这件灰布大衫是应当用尽方法找了来的。

现在且说他正在看书，而且摸出钢笔，按住书角打算记下一点感想，旁边的刘蓦地喊了一声，接着又连声招呼道：“小开，小开，我们都在这里！”

一张女型的面孔随即在门口出现，皱着眉头，眼光扫了一下，便抱怨道：“这样一间房么，怎么住得！”

“这不是你找的？”刘立即反诘。

“准小开”并不回答，靠在门框上，却诉苦道：“打了半天电话，嘴唇也说破了，结果是这么一间！”

Y君一面在写，一面却轻轻提了一句：“恐怕还有别的问题呢！”

“那倒不会，”这是“准小开”的非常有把握的回答，但又马上转了口气道：“刘，我们一同去办交涉去，这一间是不能住的！”

以后的发展并不怎样复杂。当Y君索性爬在那中间一层的铺位上，从看书做札记而发展为写一篇短文的时候，他的同行者来搬行李了；“准小开”终于另外物色到一间，这回是水手们“情让”的，这回既无电后可打，当然是亲眼察看过了，房间未必干净，滑机油和其他什么油类的气味相当浓重，但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挺直腰板坐了，而尤有特点，房内还有一只两尺见方的简陋的小桌子，“准小开”得意地悦。“碰和不够大，打打圈的温是刚好的。”然而还有个问题：已经打好的官舱票怎么办呢？“准小开”一口咬定“能退”，他还觉得刘不够大方，只肯先付五元定洋，而且再三说明，要是退不了票，成议作废。他们本来是定得有官舱的房间的，可不是？

然而到此为止，最热心于挑选房间的两位，却始终不肯到预定的官舱去看一看。那个长方形的黑间以及雄峙两旁的鸡鸭棚和厕所，竟也把那还有三分傻气的刘吓得退避三舍，待到S发见了这梦魇似的所谓官舱并不和它的进口处同样地肮脏而黑暗，那已是他们在水手房里过了一夜而且“准小开”办退票不甚得手的时候。于是在“准小开”垂头无话、刘却自夸他幸而考虑周到，只付了五元定洋，而且和水手们言明在先的喜悦中，他们终于进了那命定的官舱。

船起锚前十分钟，他们同行者的最后一人也赶到了。这一位“马路英雄”根本不知道刘和“准小开”曾经怎样奋斗，——为了大概十天工夫的住所。他只听得Y君慢吞吞在说：“做西崽不成，做水手也不成，到头儿还是做官来了。”

臂上搭着他那件灰布大衫，Y君接着又说：还是他去住六号罢。六号里的另一铺位上，是个素不相识的旅客。

将来的传记家或许要把这十天的航程作为 Y 君一生事业中的一个里程碑。革命的风暴从南而北，一年以后，在当时还是大熔炉的武汉，S 又遇见了 Y 君，态度议论，一切都照旧，只是他那件灰布大衫已经脱下了，换上了军服——也是灰布的，那时候，Y 君是那有名的军事学校的主持校务的三委员之一。

他住在学校里，他从不说起他还有一个家，当人们知道了他有家而且年老双亲都还睦在的时候，便是那些和他共事多年的同志也吃惊下小。Y 君向来不讲自己个人的事，他给同志们的印象就好像是《西游记》上说的“天生石猴”。人们后来又知道 Y 君每逢例假下午一定回家省视父母。父亲是小职员，也是不到例假便不会有闲的。好事之徒曾经统计，Y 君每周的省亲之举，所费约一小时，不会多，但亦不至于少。

然而使人惊异的 Y 君的私生活还不止这一点。

大概是四月里的某一于罢，军校里忽然有了 Y 君请假一天的新纪录；显然不是因为生病，当天早上站在大门口警卫的学生明明看见他安步而出，灰布绑腿打的很整齐，清癯的脸上依然那样若有所思，冷静谦逊，而又精神饱满；当然并无紧急公事，校务委员会的秘书敢以人格担保。可是这一天从早晨他出了校门以后，人们就不曾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有几个客人来拜会，秘书代见，问起了何时可以面会的时候，秘书只好把 Y 君留下来的话转述一遍：明天，上午八时以后，直到晚上十点。

这一天，Y 君算是很彻底地留给他自己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光景，办公室里果然又有了 Y 君，这是他规定的办公开始的时间。这天除了出去开会，Y 君总在办公，见客，没有片刻的休息，但照旧是那样从容不迫；晚上，他又和同志们讨论问题，直到深夜。和他处得极熟的同志偶尔也问这么一句：“昨天你到哪里去了？”他只淡淡地回答道：“还不是在武昌呀，不过家里有点事。”

可是过不了两天，人们终于知道他这所谓“不过家里有点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说来奇怪，这消息还是那时在于教育厅的 L 君传出来的，而 L 君又得之于他的属员——本城某小学的校长，校长则是他手下的一个女教员告诉他的。原来 Y 君那无请假为的是结婚。新夫人也在那小学当教员，为了结婚，也曾请假一天。那位校长十分惋惜这消息他得的太迟，据说他向“各有关方面”报告甚至对 Y 君的新夫人当面道歉的时候，都曾冒冒失失地用了这样一句话：“真该死、我实在毫不知情！”

消息传布以后，Y 君的同志好友们就议论纷纷。

对于 Y 君的此种简直一个人也不“惊动”的作风，同志好友们倒也可以存而不论，问题是：他们这样多的精明强干的人儿怎么这许多年来竟会对于 Y 君的“恋爱生活”——借用那校长的话，“毫不知情”？没有人能够记得，Y 君主张过独身，但也没有人能够提出证据，Y 君有过比较亲密的女友，——更不用说爱人。”然则也是五分钟恋爱的结果么！”五分钟恋爱是当时的流行性感冒，理论根据则为细磨细琢的“谈”恋爱在紧张革命空气中实在不可能。你说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观点罢，也行。而 Y 君当然也是抱有现实观点的人。

困惑之余，同志好友们所得到的一致，就是要求见见这位新嫂夫人。

Y 君并不拒绝，可是很滑稽地拉长了脸说：“她，只在星期日还有点闲

工夫。”

“那么，就是后天罢，后天是星期。”同志之一立刻接口说，那态度的严肃和口气的郑重几乎等于约期商量军国大事。

“哦，后天又是星期了么？”Y君像要瞌睡似的闷着声音回答，但又淡淡一笑道，“随你们各位的便罢！可是我不能奉陪。后天有一个会。”

看见朋友们的脸上都有惊愕之色，Y君又闷着声音慢慢地加说道：“反正她又丁是囚犯，也辽不曾生着什么需要隔离的传染病。”

朋友们忍不住哄然笑了。第一个提议要“见见”的那位正想好了一句俏皮话准备来个反攻，可是Y君已经站起来，走到电话机跟前去了。

那天午后应该是歇中觉的时候，第x号教官寝室就有一个临时的非正式的“卧”谈会。特别关心着Y君私人幸福的三位革命家用了“争决议”的精神互不让步，嘤嘤不休。问题的前半段，他们三位已经求得一致：既然Y君对于新婚生活那么冷淡，甚至不愿意朋友们知道有这一件事。那就可想而知，他和新夫人的感情是有点那个的，然而为什么他又要结婚呢？这问题的后半段争辩最为激烈，三位革命的理论家各有所见，而且准备坚持到“革命成功”以后。

“哎，哎，又得从头说起了，真是，糟糕イマス！”躺在靠近窗口的一张床上的A君发急地捶着床板说，“这样的辩论，简直、简直是瞎扯，得不到结论的，喂，喂，C同志，你断定他这是五分钟恋爱的一种形态，请问你根据什么下这判断？”

“得了，得了，”对面床上的B插口说，“倒好像你的议论比C同志的多些事实根据似的！”

“那么你呢？怎么你下拿面镜子照照自己呀！”C撇开了A的挑战却对准了B当心一拳。

B从床上坐了起来，带点夷然不屑的神气冷冷地答道：“我么？我的论据，和你们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我是从Y同志是一个有经验的革命者，从目前的革命形势出发……”

可是对面的床板又蓬蓬地响了、A一边在捶，一边叫道：“仁兄，老早听厌了，你这一套！浪费精神，浪费时间，于什么？好，我要宣告辩论终止了；好，我最后一次再把我的意见总结起来……”

“赞成！”C大笑着举起他那打着绑腿的一双脚来，C的床位正和A的相连，他这一双脚就在A的头上举将起来。“可是，我的A同志，”C依然带着笑声，同时着眼，做鬼脸，“我来代劳罢，比你自己做总结会叫人懂得明白一点。喂，B呀，是你在那里专念革命的妈妈经么？胡扯！而你这个同志C，又把什么五分钟恋爱来解说咱们的校务委员Y的行动，那简直，简直是庸俗、平凡、市侩主义、机会主义、小布尔乔亚的不正确——意识！”

说完，C又哈哈地笑起来了，连A和B也忍不住笑了。

片刻的沉默。然后是A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道：“老是胡闹，胡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对！咱们正正经经再讨论一下，五分钟为限，”B摸出表来看了一眼，生怕C又来打岔，赶快急口再往下说，“A同志认为这是封建意识使得Y扮演了这么一出戏，而Y之不免还有封建意识，依A同志的分析，就表现在他

一星期一度一定要回家向父母请安，而由此 A 同志又推测，Y 为了要满足父母的抱孙子的要求，更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终于在婚姻问题上违背了恋爱的原则而接受了父母之命。——A 同志，这是你的全部论据；然而，你这论据是脆弱的，你的全部的推论全是非科学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出发点不站在目前的革命形势，不把 Y 恰如其人的身份似的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革命者来看的！一个革命者在婚姻问题上有时可以违背恋爱的原则。但这决不是从封建的感情出发，而是为了服从于革命的利益，为了工作上的便利，为了在必要时取得——”

B 一气说到这里好像不能不换口气了，但也许在斟酌“取得”以下的一两个字。这当儿，高翘着一条腿躺在那里的 C 就很正经地提醒他道：“取得掩护，取得隐蔽，对不对？”

咽下了一口唾沫，B 将眼一瞪，还没开口，对面的 A 猛拍一下床板叹道：“够了，真是想入非非！”

“不然！”C 蓦地跳了起来，板起脸，看着 A 说，“有书为证。当初列宁同志……哎，不必引证的那么远，就说那年我们在北平到什么执政府请愿，段棋瑞的卫队开了枪，那时好像有这么一位革命者赶快要找掩护，恰巧有一对赶庙会去的嫂姑，站在人家屋檐下回避那排山倒海似的下来的人马，于是我们这位革命者就隐蔽到她们的裙子底下去了。A 同志，这就是一种违背了原则的——什么呢！”

C 的话还没说完，B 早已气得满脸通红，噗的坐在床上，发恨地嘶声说道：“老是嘻皮笑脸，真不成话儿！”

A 也皱起眉头，但又不禁笑了笑。看见自己的论敌受窘，当然高兴，可是 C 的嘻皮笑脸的战术实在也够厉害，叫人奈何它不得。在这一点上，A 和 B 又有点同病相怜。

看来“胜利”要属于最不把问题郑重地来处理的那一位了。笃笃的声音忽然从 C 的床位上传来，A 和 B 都把眼光转过去。C 也在倾耳谛听。声音来自他那床位所在的板壁。不知是隔房的哪一位在向这边拍无线电。本来这是歇中觉的时间，而且房外走道中贴的标语也还有这么一条：肃静自重！A 和 B 面对面看了一眼，吐吐舌头。

然而笃笃之声，并没停止。

“干么？”C 不耐地叫了一声，也伸手在板壁上重重地拍了几下。同时又叽叽咕咕道：“人家早就闭嘴了，你还笃笃地，这可该计我来警告你了！”

然而笃笃的声音很有节奏地还在响，而且隐隐还有笑声。

C 忽然省悟过来，也屈起中指叩着板壁笃笃两下，就问道：“是不是 S 同志呢？笑什么？”

板壁那边的笑声放大了，S 的洪亮的音调在说话了，一字一字清晰可辨。

“我们正在讲一只故事呢……”

“什么故事？”

“城隍庙新上了匾，三个近视眼睹匾上的字。”

“哦！”C 转脸朝 B 使个眼色，便提高了嗓子道，“可是，我们也在讲故事，真巧！”

“什么故事？”

“我们讲的是外国的故事，出在伊索预言。”

“哦？伊索寓言？”

“不——对！是预言，不是寓言。”

“哦，怎么个预言？”

“伊索，他说，摸象的瞎子一共是四个，我正在奇怪，怎么数来数去只有三位，可妙啊，立刻又添上一个，还是应了他的预言！”

“呵！——”又听得见 S 在那里笑了，“瞎说！”

“不过，”C 恶意匿笑着，又朝 A 和 B 一眼，“寓言毕竟是预言，你自己找上来补这第四的缺！”

A 和 B 都失声笑了，隔房也哄然笑了起来。

三

一会儿以后，ABC 三位都规矩坐在各自的床上，S 站在他们面前。

“你们也摸够了，”S 微笑着说，“我来供给一点儿新材料罢。Y 有过一个女朋友，——可不要误会，只是朋友。……”

“对，敬遵台命，绝不敢误会。”C 说。

S 却不理 C 这讥刺，依然微笑地说下去：

“这一位女友却把 Y 同志当作者师，是读了 Y 同志的文章然后通起信来的，——这样，一方的眼中是老师，一方的眼中是朋友，直到变成了一家人！”

A 和 B 都睁大了惊异的眼睛，房中只有一只小钟的秒针跳动的声音。于是，像喷了什么出来，B 和 C 忽然仰脸大笑，一边笑，一边用手指着 A。

S 却不笑，一脸思虑很深的样子，慢慢地又说：“这一位女友和 Y 的弟弟恋爱上了，成为他的弟妇，这可不是变做一家人了？”

“造谣！我才不相信！”C 忍住了笑，喘息着说。转脸望一下 A 和 B，又恶意地笑了。

“你不相信？”S 的脸色严肃起来了，“你没有见过他的弟弟和弟妇？”

“见是都见过——”B 接口说，却又摇摇头。

“岂但见过，”A 抢着说，“我和他俩还相当熟呢，去年我们有一个时期是同事。……”

“哦，那就有办法证明——”

“可是正因为我和他们同过事，我有资格证明你那个故事只是一个故事！”

“你不要下结论，”C 拦住了 A，“让我来问他一句。——可是，”C 转脸看定了 S，“刚才你说供给一点新材料，这就是么？”

S 笑了笑，并不直接回答，自顾自说：“这里有两个可能。如果那位老弟不登场，那末，自称为学生的一位谁敢担保她不从门墙而入室呢？这是人情之所可能。但这一可能却以另外一个可能做前提。如果彼当作者师的不曾把那已有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一回事，那自然什么就不同了。然而这一可能刚巧碰到了人情之所难能。”

A 和 B 都不作声，只相视而笑，这笑，可以解释是“姑妄听之”的态度，但也可以解释是惊异的笑。终于是 C 又开口问道：“所谓父母之命，就是现在这一位么？”

“这要老兄自己去判断了！”S 忍不住笑着回答，“我只知道，当 Y 决心献身革命的时候，曾经表示，革命尚未成功，不愿有家室之好，请废止那神圣的订约。可是对方的回答是：情愿守一辈子，你干你的革命去罢！”

“哦！”A急忙插口说，“那么他们并不是素不相识的了？”

“他们原来是表亲，从小儿就很熟的。”

房里又只有那小钟的声音了，S转眼看了那钟一眼，提起脚来正想走，忽然C大声笑着叫道：

“编的真好！不要走，再编造一点给我们听听罢！”

S站住了，也笑了笑回答道：“如果编得好，那也不是我的功劳，这是萧麻子的功劳。可惜他远在广州。不然，他会虎起麻脸质问你，凭什么就断定人家是编造？”

说完，S就走了。

这里，ABC三位好半晌都不作声。远远地吹起军号来了，近处也在应和了，终于宿舍外面院子里也很洪亮地吹出那短短的调子。午睡时间已完，又要上课了。

A穿上军衣，自言自语他说：“Y真是怪人！真有他那一套！”

“萧麻子和他是老朋友，”B也说，“他的一些事，萧麻子应当知道。”突然B双手一拍，得意地笑起来，“啊，你瞧，我简直几乎忘了：萧麻子本来也是爱那位学生的，也是因为那老弟一出场，他就退让了。这件事，萧麻子并不忌讳，自己也给朋友说过。”

“也是怪人！”C神情不属地随口应着，同时往房外走，“当然，我不是指他这一件恋爱的故事。那倒是合情合理的。”

这天晚上，就有两句不伦不类的口号在军校里叫开来了，这两句是：Y委员奉命结婚，X小姐坚持到底。和S君所讲述的大致差不多的故事，也在到处传布，不过删除了其中关于那位“自认为学生”的一部分。争论当然也有。两个意见相持不下：Y君办这件事的动机究竟是对于封建道德的让步呢，还是由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如果两者都有一点，那么，第三个问题：这不会伤害革命家的风度，这不违反“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么？

可是这一切的议论纷纷，从中午就出去开会的Y君都不知道。因此，当熄灯号刚刚吹过，他回到校内，在他那简陋的卧室中正看着秘书送来的一份报告，突然发见有一张字条夹在那里，而字条上A的笔迹明明写着：“对封建道德让步和人道主义的行为，是否符合于我们的革命立场？应当怎样解答？请您抽出几分钟来给我分析一下。”——他当真摸不着头脑。

他把这字条从头至尾再看一遍，微微笑着，就搁在一旁。同志们之喜欢辩论抽象的问题，他是向来就知道的。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今回这个抽象问题倒是从实际问题引出来的，而且问题的主人公就是他本人啊！

看完了报告，摸出日记本来记下一些要点，他随手拿过那张字条来夹在日记本里，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在办公厅内，在照例的和教官们作一次简单的会议以后，他望着坐在那里的A，就想起那张字条来了。他打开日记本，取出那字条当众扬了一扬，用他那沉着而和平的声音说道：

“有一位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抽象的问题。要是这位同志不反对，我愿意先听听他的意见——”他顿了一下，然后又补充道：“把这问题来个具体的说明罢！”

Y君一边说，一边就将那字条递给坐位和他最近的人。字条在人们手中

传过去了。大约有一分钟的沉默。人们都知道这字条上所指的是怎么一回事。人们偷偷地看了 Y 君一眼，就又望着稍稍见得有点局促的 A。谁都以为 Y 君早已知道昨天下午以后校中的纷纷议论，因而谁都怀了极大的好奇心准备倾听 Y 君的诙谐而常尖锐，平淡而又深刻的言论。

然而 Y 君的神色是那样平静，他若无其事地翻着手边的一叠公事，嘴里轻轻发着催促 A 的一个音——“嗯？”

“这，这问题，” A 开口说话了，眼光溜到 S 那边，似乎在征求同意，打算把那“故事”和盘托出，可是突然又变了主意，笑了一笑，便接着说道，“我想，简单一点罢，例如，不在恋爱的基础上而为了父母之命夫结婚，应当怎样解释呢？女同志们认为这是助长了封建势力对于青年的压迫。……”

Y 君抬起头来了，似乎他终于明白了眼前提出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他笑了一笑，等候 A 说完他的话；然而看到 A 不想再往下说了，他就接口道：“这要看当事人是否被压迫着去做的呢，还是出于自动。至于什么恋爱呢，在我看来，恐怕也得有个基础。要是在恋爱的基础上和反革命者结婚，恐怕也不足为训。”

忽然有人插口问道：“可是人道主义如何呢？”

Y 君的脸色严肃起来了，他慢声答道：“除了对付反革命，我倒也不觉得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对。……”他朝在座的人们看了一眼又接着说，“而且，人道主义这名同，恐怕不好随便用的。革命，当然不是为了要讲人道主义，革命是为了消灭压迫者，熄灭专制独裁，为了争得被压迫者应当享有的人的权利。我们是为了要使一切都平等自由，都有幸福，这才来于革命的。要是只顾到什么自私的恋爱而使你的最亲近的人受到痛苦，要是连那为了你而牺牲自我的人你都不能使他幸福，那我们还于什么革命？……”

说到这里，Y 君很激动了，他那瘦而长的脸上微微泛起一点红晕。但他的声浪依然那么沉着和平。

他沉吟了一下，然后把嗓子提高些，像作结论似的加一句道：“当然，前提是你那最亲近的人不是反对你的事业的，你顾到他们的幸福同时并不妨碍革命。同志们，我的意见对不对？”

没有人再发言了。会议就又转入了日常的程序。A 的面前忽然抛来了一个纸团。A 打开一看，是 S 的笔迹，铅笔写着：“你相信么：人情之所难能！”A 望着 S 点一下头，提笔在那纸上无心的划着，坐在对面的 C 看见 A 信笔写的，横横直直的，只是两个字：圣人！

1945 年 7 月 7 日写毕。

忆冼星海

和冼星海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在听过他的作品（抗战以后的作品）的演奏，并且是读过了他那万余言的自传（？）以后。（这篇文章发表在延安出版的一个文艺刊物上，是他到了延安以后写的。）

那一次我所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还是小规模，然而参加合唱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诉我，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挥是一位青年音乐家（恕我记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担任鲁艺音乐系的短短时期内训练出来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诉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挥，这次的演奏当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实说，尽管“这是小规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挥，可是那一次的演奏还是十分美满；——不，我应当承认，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对于音乐，我是十足的门外汉、我不能有条有理告诉你：《黄河大合唱》的好处在哪里。可是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

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像：冼星海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经想像他该是木刻家马达（凑巧他也是广东人）那样一位魁梧奇伟，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们又告诉我：不是，冼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欢说笑，话匣子一开就会滔滔不绝的。

我见过马达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执笔沉思，大的斗篷显得他头部特小，两眼眯紧如一线。这人就是冼星海，这幅木刻就名为《冼星海作曲图》。木刻很小，当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下在“写真”，而在表达冼星海作曲时的神韵。我对于这一幅木刻也颇爱好，虽然官还不能满足我的“好奇”。而这，直到我读了冼星海的自传，这才得了部分的满足。

从冼星海的生活经验，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气魄。做过饭店堂倌，咖啡馆杂役，做过轮船上的锅炉间的火夫，浴堂的打杂，也做过乞丐，——不，什么都做过的一个人，有两种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压倒，虽有抱负只成为一场梦，又一是战胜了生活，那他的抱负不但能实现，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星海就是后一种人！”——我当时这样想，仿佛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约三十月以后，在西安，冼星海突然来访我。

那时我正在候车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几个月，即将经过新疆而赴苏联。当他走进我的房间，自己通了姓名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呀，这就是冼星海么！”我心里这样说，觉得很熟识，而也感得生疏。和友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拙于言词，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而在那时，我又忙于将这坐在我对面的人和马达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较，也和我读了他的自传以后在想像中描绘出来的人作比较，我差下多连应有的寒暄也忘记了。然而星海却滔滔不绝说起来了。他说他刚出来，就知道我进去了，而在我还没到西安的时候就知道我要来了；他说起了他到苏联去的计划，问起了新疆的情形，接着就讲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我对于音乐的常识太差，静聆他的议论，（这是一边讲述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计划，一边又批评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将来致力的方向，）实在不能赞一同。岂但不能赞一词而已，他的话我记也记不全呢。可是，他那种气魄，却又一次使我兴奋鼓舞，和上回听到

《黄河大合唱》一样。拿破仑说他的字典上没有“难”这一字，我以为阶星海的字典上也没有这一个字。他说，他以后的十年中将以全力完成他这创作计划；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因为他不但有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魄力，并且因为他又是那样好学深思，勇于经验生活的各方面，勤于收集各地民歌民谣的材料。他说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带给他的一包陕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觉得还远远不够，还有一部分材料（他自己收集的）却不知弄到何处去了。他说他将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载，尽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谣，然后再去苏联。

现在我还记得的，是他这未来的（民族交响乐）的一部分的计划。他将从海陆空三方面来描写我们祖国山河的美丽，雄伟与博大。他将以“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间的娱乐，作为他这伟大创作的此一部分的“象征”或“韵调”。（我记不清他当时用了怎样的字眼，我恐怕这两个字眼都被我用错了。当时他大概这样描写给我听：首先，是赞美祖国河山的壮丽，雄伟，然后，狮子舞来了，开始是和平欢乐的人民的娱乐，——这里要用民间“狮子舞”的音乐，随后是狮子吼，祖国的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了。）他也将从“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族形式的民间娱乐，来描写祖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你预备在旅居苏联的时候写你这作品么？”我这么问他。“不！”他回答，“我去苏联是学习，吸收他们的好东西。要写，还得回中国来。”

那天我们的长谈，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谁又料得到这就是最后一次呵！“要写，还得回中国来！”这句话，今天还在我耳边响，准又料得到他不能回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写这小文的时候还觉得我是在做恶梦。

我看到报上的消息时，我半晌说不出话。

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这样想：当在国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万里，且经受了生活的极端的困厄，而回莫斯科去的时候，他大概还觉得这一段“傥来”的不平凡的生活经验又将使他的创作增加了绮丽的色彩和声调；要是他不死，他一定津津乐道这一番的遭遇，觉得何幸而有此罢？

现在我还是这样想：要是我再遇到他，一开头他就会讲述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要说，“我经过中亚细亚，步行过万里，我看见了不是不少，我得了许多题材，我作成了曲子了！”时间永远不能磨灭我们在西安的一席长谈给我的印象。

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具有伟大气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远坐在我对面，直到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只要我神智还没昏迷，他永远活着。

1946年1月5日。

回忆之一页

这是香港战争以后我们第四次搬家。

我们本来住在东区的半山，战事一发生，就往山下搬，但仍在东区；战事将近结束时，我们又搬到中区，战事结束后第一周，我们第三次搬家，仍在中区；现在第四次却搬到西区，而且在坡上，相当高，可以说又在半山。

我们本来是个“大家庭”，全盛时代俨然是“八口之家”。后来搬一次缩小一次，现在只剩我们夫妇俩和Y君（他是帮助我们解决若干困难的，所以“命定的”要作为我们这“小家庭”之一员了），在一个没有太阳的下午，走上了这西区的高台。

二房东是一个宁波人，大北电报公司的职员，和我们攀了大同乡，倒也十分亲热。我们租的是他家的一间后房，家具就借用他的，仅得一张大床，只好有屈Y君暂打地铺。

这时候，四区算是岛上比较“太平”的一角，二房东颇以此“自傲”。他这家庭，大小共计五六口，战前生活想来也还优裕，一些中产之家所必有的生活点缀品，例如留声机、麻雀牌之类，应有尽有。当然也有一架无线电收音机，不过这位懂事的家长早已把它收藏得好好的。第一次和我们聊天的时候，这位年青的家长得意洋洋地描写战争初期四环一带挨了对海来的炮火，所有的人家如何惊惶失措，纷纷逃避，而他自己如何镇静，“以不变应万变”；回头对他的年青的太太看了一眼，继续说：

“那几天，左邻右舍都逃光了，我们住在这里自然害怕，可是，逢到这种乱世，别的全不可靠，最可靠的，还是运气。你要是额角不亮，逃来逃去都会碰到晦气，况且，香港是一定守不长久的。英国人最会见机行事。香港又是一个海岛，小小弹丸之地，你逃来逃去都会吃到炮弹，何必多此一举。”

“他们逃的都吃了苦头了，”那位房东太太也接口说，“带出去的东西丢光了且不用说，回来一看，家里的东西也被‘烂仔’（流氓）搬得精光。几天工夫，一个家就完了。”

的确确实，这位二房东连一根筷子也不曾损失，而现在则又有意外的收入，他的得意，他的自负和自信——自负额角亮，自信见解高，如果都叫人肃然起敬，在他也是居之不疑。然而，美中不足，这位幸福的丈夫和父亲却还有些忧虑。这是他那只饭碗是否保得住的问题。战争已经过去十天之久，可是他那“洋东”——大北电报公司，还没有恢复营业的朕兆。

“大北是丹商，”他不掩饰他的焦灼，“照理是不相干的，不过东洋人做事也就难说得很呢！”

“难道东洋人不要电报局么？”他的太太又插嘴了，但显然，她这一问，并非为要得到回答；不但此也，他们夫妇间对于这一个问题大概已经讨论过不止一次了，而且大概早已有了自以为“天经地义”的解答，然而仍旧不免随时冲口而出，且在陌生的“三房客”面前亦不自觉，无非因为她实在被这问题困扰到了神经衰弱的地步了。

那位可敬的丈夫苦笑着不置一词。

“东洋人办电报局就不要中国人么？”这一句是愤愤然吐出来的、因而它的目的与其说是“质疑”，还不如说它是“控诉”。

“当然要。”我忍不住笑了笑说，同时也很“佩服”这位女房东的坦白而痛快。

“反正是在外国人手底下做事呵，大北是丹麦人，……”二房东先生有点感慨似的表示了他的意见，自然，这又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妙用了。

二房东先生曾经夸耀的所谓西环的“治安”，到晚上便有事实上的表现。

因为没有电灯，我们厉行“日入而息”。战争早已把我的失眠症医好，每夜都能酣眠。但是这一夜我有了梦，梦在辽远的故乡，躬逢着什么热闹场面，可又看不见热闹者何事，只听得锣声铿锵然，断断续续，一阵慢，一阵急。终于我从梦中出来了，铿锵然的锣声却仍在耳畔，忽然发觉床上只我一人，于是意识骤然清醒，抬头一看，床头那对玻璃窗变成了银幕，一个人影子赫然映在这上面。同时那铿锵然的声音也让我听清楚了，这不是锣而是搪瓷脸盆或者空火油箱，甚至也许是饼干箱和较大的汤盘，远远近近，此起彼落，好像在打招呼。这当儿，窗前的人影子也动了，并且还轻声说了三个字：“看不见。”

听声音，我这才知道这是我的太太，可是她这话并非对我而发，她是告诉那睡在楼板上的Y君的。

我忍不住开口了：“什么事？”

似乎一惊，太太的影子离开了窗前。接着是轻声的说明：原来发生了抢劫，而这些丁丁冬冬的敲响是作为警报的。

“抢了谁家呢？”我又问。

回答依然是：“看不见。”

我也起身朝窗外看。月光很好，对面的那排房子（地势比我们的更高），有一半浴在月光中，连那些玻璃窗后边的镂空花窗帏也都看得明明白白，咚咚 敲打的声音从四面传来，似乎整个区域都在报警了，然而不见半个人影，也没听到有人声。

“这真是新鲜的办法，”我一边在看，一边心里这样想。“好像大家都满足于这样的守望相卫的方式。——各人守在自己家里拚命敲打洗脸盆之类，便觉得已经保证了安全。好像强盗就不过是些偷偷摸摸的老鼠，只要你表示并没睡得跟死人一样，他就不敢放肆了。”

“没有事了罢，”Y君说，打着呵欠。

我看那夜明小钟，才只有十点多。

忽然铿锵的声音从楼下来了，而且很急。楼下住的是何等样的人家，我们不晓得；但他们既然像我们一样在那里静观（我猜想他们不会还在睡觉），而此时突来告警，总不见得是出于一时的高兴罢？我们正在迟疑，却不料楼下这铿锵之声不知怎地竟已爬到楼上。这是在前楼，而且是用了两种都能发音的器皿在互相敲击，一种是金属，另一种大概是瓷器。形势发展到这地步，可能的推论似乎只有一个：强盗之类确乎在威胁这区域，而现在这威胁已经蔓延到我们头上来了。

Y君从地铺上坐了起来，而我也下了床，可是我的太太摇手示意，我们就暂时不动。太太悄悄地趑到房门边，开了门。前楼的敲击声，忽缓忽急，颇有节奏。太太从门里出去了。

楼下的铿锵之声这时候消沉下去了，我断定了所有这楼下的以及前楼二房东的一番举动都是“奉行故事”，正像这整个区域的喧嚣一样。说来也许太不敬了，一句成语，这时候忽然浮上我的脑膜：“一犬吠影，众犬吠声。”想来不但我们楼下的芳邻和前楼的二房东，甚至整个区域内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吠声”的罢？而这时候，太太又趑进房内来了。

“没有事罢？”我随口问了一句。

“莫明其妙，”太太回答。“他们敲得那么起劲的，也是莫明其妙，不过这是大家约好了的，一家敲了，大家都得敲。”

这一夜的咚咚镗镗之声究竟到什么时候完全停止，请恕我荒唐，实在说不上来了。我只记得又睡下一觉醒来时，还听得这一种“音乐”若远若近，依然在那里“唱和”。而在这奇妙的“唱和”声中，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由于好奇，更由于有闲，一遇机会，我就打听昨夜的告警，到底“所为何事”？结果使我大失所望。原来百分之百都是“吠声”者，简直没有谁说他见了什么影子。

于是我理解了二房东所称，此地“治安”有保证这一句话的真实意义了。这保证不是别的，而是夜行者引吭高歌以自壮胆的办法，然而那可敬的二房东却郑重其事对我说：

“东洋人有命令，准许我们遭到抢劫就敲锣——敲洋油箱也行；报纸上登过。”

“那是想吓退强盗罢？”

“不是。报纸上说，这是告诉查夜的东洋兵有了强盗了，东洋兵捉强盗也还认真。”

“捉过了没有呢？”我好奇地再问。

“捉过，捉过，”二房东急口说，指手划脚地举了不少证据，例如附近的一个防空洞内藏着“烂仔”，东洋兵曾经去搜捕，而在马路上白昼行劫的，也触过“霉头”。

“这都不是在夜里呀！”我笑着说。

二房东惊异地看了我一眼，意若曰：你这人何其拘泥不化！

“可是我告诉你，在湾仔一带，晚上敲门进去抢劫奸淫的，虽然也有‘烂仔’，然而大多数却是伪军和东洋兵。”

我这句话简直把二房东吓得什么似的，他瞪大了眼睛，一言不发。为什么他这样吃惊，我实在不明白。湾仔一带的情况，他应该早有所闻。如果他当真未之前闻，那我这一下，造孽可真不小；我把他的“鸵鸟精神”破坏了。

记香港战争时韬奋的琐事

在香港战争时和韬奋先生最后一次的晤谈是十二月十一或十二的午后，坚尼地道我的寓楼。十二月八日，战事爆发后，住在九龙的朋友们陆续逃到香港来了，韬奋想看看坚尼地道我的寓所是否“安全”。当然，如果日本人进了香港，那么，我这寓所一定不能再用了。不，即使日本人还没进香港而战事日益不利，我这寓所也未必“安全”，因为才只打了两三天而已，而日本人的间谍和汉奸在香港已很活跃了。当韬奋了解了这样的情形时，他就颇为踌躇了。九龙来的朋友（连韬奋也在内），本来已经看好了一所屋子，但只是空空荡荡两间大房，什么也没有。这就是韬奋来到我处看看的原因。但我还是请他住下来再说，而他们也同意。

这时他还没有吃过中饭。我们就把冷饭炒起来，他一面吃，一面说：“那边，（指他们已经看好的那屋子——笔者）连一口开水也弄不到；我们每人倒都有热水瓶，可是没有风炉和水壶，没何法子烧水。”

谈到九龙的战事，他慨叹于元朗一线之不能久守。“想不到这样快的，这样快的。”他说。

看见我们书架上依然是满满的书籍，他就问道：“这些书，都不要紧么？”

“难说，”我回答，“多少总有点抗日的嫌疑。”

“怎么办呢？”他很关切又很天真地问。

“明天想法搬到别处去。”

沉默了一会，他又说：“这样的事。我还是第一回，一点经验也没有。”看见我望住他微笑地点头，他又补充道：“当真没有经验，人家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看我学得会么？”说着他自己笑了，这笑是非常天真的。

“当然，”我也笑了，“包你一学就会。”

“不过，我是粗心的。日常生活的琐屑事务，一向都是粹真（他的太太的名字——笔者）照料我的。”

我笑了。他也想起了什么似的拍着身上的背心笑了起来。

原来他这背心口袋里装着钞票，为防掉落，袋口有线缝住，——当然是细心的太太为他这样准备好的，然而他来到我寓所以后上一次毛厕，出来时可就这件背心忘掉在毛厕内衣钩上了，幸而我们跟着就发见了，总算没有被房东的用人们顺手牵了羊去。

“果然有点粗心，”我说，“但这是你的细心的太太养成你的。”

“以后跟你们学罢。”他说，又高兴地笑了。

半小时以后，来了一个朋友，是来找韬奋的。据他说。九龙好紧，说不定今晚即会不守，而香港之能否坚持多少日子，也正未可知。“你住在这里是不妥当的，”那朋友对韬奋说。

“那么住什么地方呢？”

“还是那两间空房间。虽然不大方便，问题是没的。”

“好，好，”韬奋完全赞同，又邀我也去，“你也到那边去罢，房间大得很，打地铺，再多几个也住得下去。”

我辞谢了他的好意。我告诉他：我本来要搬下山去，房子已经在找了，我得等候朋友的回音。

“那么，要是回音来了找不到，你还是到我们这边去。”他边走边叮嘱就和那朋友一同去了。

那天晚上，我就搬下山，住在一家暂时歇业的跳舞学校内。

以后，香港沦陷了，又过了新年了，正月九日，我们偷过九龙，准备取道陆路回祖国，在船上又和韬奋遇见了。这时他穿了唐装，很高兴，他指着他那大裤管问我道：“看得出么？——一枝自来水笔，一只手表、在这边；那边是钞票，都是粹真缝的。”他又天真地笑了。……

这一切，回忆起来，历历都如在目前。然而不幸韬奋离开我们已经有了三年了。认识了真理的人，虽处危难，却能乐观，韬奋在香港沦陷之时，诚如他自己所说，他对于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尚无经验，但他既不喊苦，更不悲观，他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上也真想学学向来所未尝躬亲的，从这些小地方，也可见他之为人，也可供年青的一代作模范。韬奋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他的认识真理的过程，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历历可指数，而他的一切美德则可以两字概括：诚与真。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固然很多，然而如果诚与真尚不足，则亦不是善于学习韬奋。愿景慕韬奋者，记取他这诚与真。

忆谢六逸兄

两年前，胜利的鞭炮放过以后，紧接着就听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而其中之一便是谢六逸兄在贵阳病故。他没有听到“胜利的鞭炮”，但不知为什么，他逝世的消息传到重庆却已在“胜利”以后。那时我住在乡下，离重庆水路三十华里，长江边的小村，有人戏尊称之曰“中国海军根据地”的唐家沱。

这是个烦嚣而又寂寞的怪地方。烦嚣——因为这小村的官名是“唐家沱新村”或“唐家沱疏建区”，坐落在江北县境内却又直隶于重庆市管辖，它的若干泥路不但拥有“民生”、“民权”（好像并无“民主”）、“建国”、“复兴”乃至“四维”、“五权”等等美名，而且还有全国业已沦陷的各大都市的名号，它的地方的权力者不但有本地的“大爷”，也有外来的“阿拉同乡”，而且既然荣膺了“中国海军根据地”的头衔，当然不会没有“海军”，停泊在“沱”面的几条小军舰不但使这小小的“疏建区”常常出现水兵，也使得这小小的“疏建区”的南京路上出现了福建人开设的茶馆、杂货店和理发铺。真是十足的五方杂居。如果不嫌夸大，那么，耸立在江边的“亚细亚火油厂”内虽然已无滴油，却还有洋人和洋婆子，也够备“华洋杂处”的一格。

然而这样一个具备了大都市雏形的“疏建区”，却又是异常寂寞的。这不仅是我这被人家看来十二分“不近人情”的文化人有此感觉，只看当地的其他公民（包括公教人员），整日整夜只好以麻将为唯一的消遣，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样一个地方，而又当听过了“胜利鞭炮”忽然听出其声空虚的时候，六逸兄逝世的噩耗不但使我悲哀使我怀旧，确也引起了我的无法排遣的怅惘与寂寞。

而且我又记起最后一次和六逸遇见，匆匆数十分钟的谈话，留在我记忆中永远那么浓而至今亦未见褪色的，是这样的一个感想：六逸老了，六逸衰且惫了，六逸心境空虚而且寂寞。那次的遇见是在贵阳，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年，这小小的山城正喧嚣着各式各样争名逐利的风云人物的声浪。这是六逸的家乡，抗战以后，六逸在这山城的故乡一连住了七个年头了，那时他兼着五六种职务——教书，坐办公桌，每天排定的时间那么紧，几乎连吃饭抽烟的悠闲也被剥夺了；他够忙，然而他的心境空虚而且寂寞。

那时我忽然有了这一个感想：贵阳如果可算是缩小的中国，那么，唐家沱倒像是缩小的贵阳。于是对于六逸的空虚寂寞的心境，我自以为能够了解了，——虽然和他最后遇见那一次我正从桂林去重庆，我还不知道距重庆三十华里的长江边上有一个唐家沱，更不用说它之有如贵阳的缩影了。

第一次和六逸见面，少说也有二十年了，日子记不真，总而言之也是夏天，他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地点大概是在郑振铎兄的寓所，那时铎兄还没有结婚，他和另外几个朋友同租了一所比较宽大而不是弄堂房子式的小洋房，一进门便有一种上等公寓的感觉。六逸从日本来了，便不打算回去，铎兄却正在设法留他在上海住下。在这一类事上，振铎兄的组织天才向来是朋辈所钦佩的，六逸留下来了，而且一住十多年，直到抗战为止。这十多年中，六逸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作过“无名英雄”，也教过书，编过刊物，最后几

年则在复旦大学。当他还在“商务”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机会多，我们给他上个尊号：“贵州督军”。尊号何以必称“督军”，但凡见过六逸而领略到他那沉着庄严的仪表的，总该可以索解；至于“督军”而必曰“贵州”，一则因为他是贵州人，二则我们认为六逸倘回家乡去，还不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至少该当个把督军”。那时谁也料不到，十年后这位“督军”被日本侵略的炮火逼回了家乡，一住七年，却弄得几乎穷无立锥之地！

在上海最后一次和六逸见面（也许这不是事实上的最后一次，但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这是最后一次），是在“七七”的上年，《国民周报》发刊的时候。也许现在很少人记得这刊物了，但在那时的低气压中，这“无奇不有”的刊物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的。应当记得，这刊物之出现，正在《新生》、《永生》连续被禁，爱国有罪的时期，以广泛的读者阶层为对象的进步的综合性的刊物，在当时成为迫切的需要。但主编的人物颇难其选，于是在这一类事上常常表现出其卓特的组织天才的又一朋友——胡愈之兄，把沉着持重的“贵州督军”拉出来了。那一个可纪念的晚上，大概是在饭店弄堂的一家小馆子，用“无奇不有”这四个字来形象了这刊物的以“广泛读者阶层”为争取对象的，是六逸兄的隽语。那时叫了几样下酒的菜，其中一样是“海瓜子”，也是六逸点的；这使我想起了他的太太是宁波人，也曾经是他当了多年的教务主任的神州女校的学生。

后来是“七七”，“八一三”，淞沪战争，上海弃守，一连串的大事，朋友们纷纷走内地，六逸也带了他颇大的一家人取道香港回老家去了。他在香港换船那一天，我也刚刚从上海到了香港。离家二十年的游子却在这烽火漫天的时期和太太以及大群儿女回到了家乡，该有点说不出的甜酸苦辣罢？但是那时的六逸兄和所有往内地去的朋友们一样抱着一种“理想”，——也许只能说是“憧憬”，不问怎的，精神上总是昂扬的，这和七年以后，敌骑直陷独山，贵阳大恐慌，拖着一家人又不得不想到如何逃难的六逸的心境，该是如何的不同啊。而特别是：在故乡一住七年的六逸只饱尝了空虚和寂寞。

太平洋战争之第二年，我从桂林赴重庆，路过贵阳，寓“贵阳招待所”。预计在贵阳有三四天的逗留，我便计划着找几位多年不见面的朋友谈谈。第一位我就找了六逸。我知道他那时担任了文通书局的总编辑，便到“文通”去看他，哪知扑了一场空，只好留下名片和地址。从“文通”那边，我才知道六逸兼职五六个之多，每天奔跑于马路上的时间少说也有三个小时。于是我就想到六逸的经济情形不见得好。六逸的个性我知道一点，他不大喜欢多兜揽；如果不是为了增加收入，他不会兼职如此之多的。那天下午，六逸到“招待所”来看我了。乍一见面，我就觉得这位老朋友“搁浅”在贵阳的六七年间实在弄得身心交疲了。丰腴尚如旧日，然而眉宇之间那股消沉抑悒之态却不时流露于不知不觉。略谈了从桂林到贵阳的路上情形以后，他有意无意地说道：

“刚才进来的时候，宪兵盘查的很认真呢！”

“想来这是例行公事。”我不经意地回答。“因为这是贵阳独一无二的贵族化的旅馆。”

“不然。一向没有宪兵。”口气表示了他很注意这一点小事。

于是我也记了起来：是有一名或两名宪兵经常徘徊于“招待所”的“新楼”的进出口，——“招待所”的房屋有新旧两部，“新楼”是完全西式的，

最贵族化的房间，我就住“新楼”；但同时我也悟到何以加了宪兵的原因：

“招待所新楼里还有几位贵宾，广东省的军政大员，宪兵大概是保护他们的。”

六逸笑了，第一次用轻松而幽默的口气说：“哦，这就差不多了，可是刚才我还以为是来‘保护’你的呢！”

“从金城江上车后，当真发现了有人在‘保护’我，不过那是不穿制服的。”我也笑着回答。

渐渐谈到了几年来各人的生活；六逸对于我的动荡多变，东南西北的生活似乎有点兴趣，却叹了口气说他自己道：“在贵阳一住七年，寂寞得很；可是也没法子动呀，孩子们又多又年纪小。”突然他提出一个问题：

“你看还有几年？”

“几年么？”我知道他问的是战事，“总该快了。”

“两三年还可以拖拖，再多真有点吃不消了。”他的口气很认真而且充满了忧虑。

“各人的看法不同。譬如住在上海的人估量起来‘天快亮了’，而我们在桂林的则以为这时还刚刚过了半夜，甚至于是刚刚到了半夜而已。我也是往长处看的。”

六逸叹了口气，不作声；可是我知道他也是“往长处看的”，正惟其他觉得抗战不是三五年所能了结，而物价却天天高涨，所以他有拖不下去的忧惧。

“如果仗打完了，你回不回上海？”我改变了话题。

“当然回上海！”

他这样坚决肯定的回答使我惊异。但是我立刻了解了：他虽然是贵阳人，但他在贵阳无异是作客，——不，有些外乡人却比他更能适应环境。

初回贵阳的时候，六逸本有一番抱负。他并无空想，而且他在战前几乎拿定主意要老死于上海，足证他对于他的故乡了解得如何深刻，而在不得不回故乡以后终于又有一些抱负，则因他得到底是在抗战了，抗战应当使最顽强的冰原也起些变化。变化也终于发生了，但却是不利于真正想为国家民族——小而言之为故乡做点事的人。于是六逸不能不碰壁，不能不受猜疑，尚幸他是贵阳人，所以还能在几个学校里兼几点钟课，实是靠卖命养活了一家人。

在贵阳那一次的会见，遂成永诀，是我当时所万万想不到的。我那时觉得贵阳那种喧嚣而又寂寞的环境会把六逸闷死，便劝他迁地为良；但是我这也是白说。拖了一大堆孩子，赚一天吃一天的人，在那抗战时代，要迁地，真是谈何容易！

当六逸的不幸消息传到重庆以后，很多朋友以为他是工作太重而死了的，我却觉得工作太重只是一因，但还不是主因；厌恶那环境，又不能脱离那环境，柴米油盐之外，还有莫名其妙恼气的事天天来打扰，这样抑悒愁烦的心境才是损害他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六逸不是喜欢自我表现的人，他不谈个人的私事，然而我的猜度敢说是绝对正确的。

六逸在上海的时候除了教书只有一样嗜好——日本古代文学。不幸而生当这翻天覆地的大时代，当一名教授养不活家，于是不得不兼职，不得不花时间精力于粉笔、黑板、办公桌，不幸而他又“书呆气”太重，在贵阳那样一个投机活跃的市场他却在喊生活无路，当他的学生们有好多已经飞黄腾达

而他却有所不为，——这就是他“活该”抑悒以死的全部“罪状”！

如果六逸活到今天，大概他仍然不能展颜一笑的，而他的研究日本古代文学的志愿大概也仍然为了衣食奔忙而不能达到。那么，说一句无可奈何的话，死也是安息罢？但贵阳一夕之谈，如犹在耳，我不能不为六逸愤慨。值兹两周年纪念，聊记梗概以志永念。至于他对于文学上的贡献将来有机会再为论列罢。

海南杂忆

我们到了那有名的“天涯海角”。

从前我有一个习惯：每逢游览名胜古迹，总得先找些线装书，读一读前人（当然大多数是文学家）对于这个地方的记载——题咏、游记等等。

后来从实践中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当我阅读前人的题咏或游记之时，确实很受感染，陶陶然有卧游之乐；但是一到现场，不免有点失望（即使不是大失所望），觉得前人的十分华赡的诗词游记骗了我了。例如，在游桂林的七星岩以前，我从《桂林府志》里读到好几篇诗、词以及骈四骊六的游记，可是一进了洞，才知道文人之笔之可畏——能化平凡为神奇。

这次游“天涯海角”，就没有按照老习惯，皇皇然作“思想上的准备”。

然而仍然有过主观上的想像。以为顾名思义，这个地方大概是一条陆地，突入海中，碧涛澎湃，前去无路。

但是错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所谓“天涯海角”就在公路旁边，相去二三十步。当然有海，就在岩石旁边，但未见其“角”。至于“天涯”，我想像得到千数百年前古人以此二字命名的理由，但是今天，人定胜天，这里的公路是环岛公路干线，直通那大，沿途经过的名胜，有盐场、铁矿等等：这哪里是“天涯”？

出乎我的意外，这个“海角”却有那么大块的奇拔的岩石；我们看到两座相偎相倚的高大岩石，浪打风吹，石面已颇光滑；两石之隙，大可容人，细沙铺地；数尺之外，碧浪轻轻扑打岩根。我们当时说笑话：可惜我们都老了，不然，一定要在这个石缝里坐下，谈半天情话。

然而这些怪石头，叫我想起题名为《儋耳山》的苏东坡的一首五言绝句：

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
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

感慨寄托之深，直到最近五十年前，凡读此诗者，大概要同声浩叹。我翻阅过《道光琼州府志》，在“谪宦”目下，知谪宦始自唐代，凡十人，宋代亦十人；又在“流寓”目下，知道隋一人，唐十二人，宋亦十二人。明朝呢，谪宦及流寓共二十二人。这些人，不都是“补天遗”的“道旁石”么？当然，苏东坡写这首诗时，并没料到在他以后，被贬逐到这个岛上的宋代名臣，就有五个人是因为反对和议、力主抗金而获罪的，其中有大名震宇宙的李纲、赵鼎与胡铨。这些名臣，当宋南渡之际，却无缘“补天”，而被放逐到这“地陷东南”的海岛作“道旁石”。千载以下，真叫人读了苏东坡这首诗同声一叹！

经营海南岛，始于汉朝；我不敢替汉朝吹牛，乱说它曾经如何经营这颗南海的明珠。但是，即使汉朝把这个“大地有泉皆化酒，长林无树不摇钱”的宝岛只作为采珠之场，可是它到底也没有把它作为放逐罪人的地方。大概从唐朝开始，这块地方被皇帝看中了；可是，宋朝更甚于唐朝。宋太宗贬逐卢多逊至崖州的诏书，就有这样两句：“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原来宋朝皇帝把放逐到海南岛视为仅比满门抄斩罪减一等，你看，他们把这个地方当作怎样的“险恶军州”。

只在人民掌握政权以后，海南岛才别是一番新天地。参观兴隆农场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了历史上的这个海岛，又一次想起了苏东坡那首诗。兴隆农场是归国华侨经营的一个大农场。你如果想参观整个农场，坐汽车转一转，也得一天两天。从前这里没有的若干热带作物，如今都从千万里外来这里安家立业了。正像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祖辈或父辈万里投荒，为人作嫁，现在他们回到祖国的这个南海大岛，却不是“道旁石”而是真正的补天手了！

我们的车子在一边是白浪滔天的大海，一边是万顷平畴的稻田之间的公路上，扬长而过。时令是农历岁底，北中国的农民此时正在准备屠苏酒，在暖屋里计算今年的收成，筹画着明年的夺粮大战罢？不光是北中国，长江两岸的农民此时也是刚结束一个战役，准备着第二个。但是，眼前，这里，海南，我们却看见一望平畴，新秧芊芊，嫩绿迎人。这真是奇观。

还看见公路两旁，长着一丛丛的小草，绵延不断。这些小草矮而丛生，开着绒球似的小白花，枝顶聚生如盖，累累似珍珠，远看去却又像一匹白练。

我忽然想起明朝正统年间王佐所写的一首五古《鸭脚粟》了。我问陪同我们的白光同志，“这些就是鸭脚粟么？”

“不是！”她回答。“这叫飞机草。刚不久，路旁有鸭脚粟。”

真是新鲜，飞机草。寻根究底之后，这才知道飞机草也是到处都有，可作肥料。我问鸭脚粟今作何用，她说：“喂牲畜。可是，还有比它好的饲料。”

我告诉她，明朝一个海南岛的诗人，写过一首诗歌颂这种鸭脚粟，因为那时候，老百姓把它当作粮食。这首诗说：

五谷皆养生，不可一日缺；
谁知五谷外，又有养生物。
茫茫大海南，落日孤鸟没；
岂有亿万足，垆亩生倏忽。
初如鸟足撑，渐见蛙眼突；
又如散细珠，钗头横屈曲。

你看，描写鸭脚粟的形状，多么生动，难怪我印象很深，而且错认飞机草就是鸭脚粟了。但是诗人写诗不仅为了咏物，请看它下文的沉痛的句子：

三月方告饥，催租如雷动；
小熟三月收，足以供迎送。
八月又告饥，百谷青在垆；
大熟八月登，持此以不恐。
琼民百万家，菜色半贫病；
每到饥月来，此物司其命。
闾阎饱饼，上下足酒浆；
岂独济其暂，亦可瞻其常。

照这首诗看来，小大两熟，老百姓都不能自己享用哪怕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经常借以维持生命的，是鸭脚粟。

然而王佐还有一首五古《天南星》：

君有天南星，处处入本草；
夫何生南海，而能济饥饱。
八月风飏飏，闾阎菜色忧；
南星就根发，累累满筐收。

这就是说，“大熟八月登”以后，老百姓所得，尽被搜括以去，不但靠鸭脚粟过活，也还靠天南星。王佐在这首诗的结尾用了下列这样“含泪微笑”式的两句：

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不？

1963年5月13日。

回忆秋白烈士

二十五年前，在瞿秋白同志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纪念秋白同志，学习秋白同志》。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再拿起笔来写怀念秋白同志的文章，却是含着欣慰的眼泪，为了庆贺秋白同志的“再生”！十年的浩劫啊，对于长眠地下的秋白，也许只不过是一场冻雨，可是活着的人们却永远不会忘记这奇耻大辱！

我与秋白相识是在一九二二年，最初只是文字之交。我从他的文章，猜想他是一个博学，思想锐敏，健谈，有幽默感的白面书生。后来，在上海大学第一次见到了他，果然人如其文：高挑身材，苍白的脸，穿一件显得肥大的竹布长衫。那时，他是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兼课教员。他与郑振铎在北京就是老相识，通过振铎，我与秋白接近也多了，又渐渐觉得，他不只具有文人的气质，而且，主要是政治家。他经常深夜写文章，文思敏捷，但多半是很有煽动力的政论文，用于内部讲演，很少公开发表。间或他也翻译点文艺作品，写点文艺短评，因此，郑振铎就拉他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但那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他发挥文学的天才。

一九二四年冬，秋白与杨之华结了婚，搬到闸北顺泰里十二号，组织了小家庭，正好住在我家的隔壁（我住在十一号），我们的往来就更频繁了。当时我是商务印书馆的党支部书记，支部会议经常在我家开，秋白代表党中央常来出席。他常与我谈论政局和党内的问题。他很尊敬陈独秀，但不满陈的独断专行。他和我一样对彭述之不满，认为彭浅薄，作风不正，并对陈独秀的信任彭述之有意见。“五卅”惨案发生后，陈独秀主张以发动三罢（罢市、罢工、罢课）来动员群众，制造舆论，压迫帝国主义让步；瞿秋白则认为应该更积极一些。他同我谈话时主张动员大批工人、学生连续到南京路上示威，看英国巡捕敢不敢再开枪。如果竟敢开枪，那就如火上加油，将在全国范围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怒潮，也将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声援，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他说他这意见陈独秀不同意。

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我和秋白又有一段交往。我那时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总主编。这个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却全部在共产党员手中，社长是董老，总经理是毛泽民，编辑部的编辑除了一个人全部是共产党员。那时董老事忙，无暇顾及这个报的编辑方针，就由中央宣传部领导，当时秋白兼管宣传部，后来彭述之（他是宣传部长）到了武汉，又由彭领导。“四·一二”事变后，陈独秀和彭述之多次对我说：《民国日报》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要少登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消息。为此我请示董老，董老说不理他们。我也向秋白讲了，秋白想了想说：我们另办一张报！那时秋白的工作很忙，我除了有重大的消息要找他核实或请示，平时很少见到他。不过他对于党的喉舌——报纸，始终很关注。因为《汉口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所以国民党右派、左派都来干涉我的编辑事务，我时常向秋白诉说，因此，他早就有另办一张报纸的想法。他说：共产党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如把这个报纸交给国民党左派，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一张党报，堂堂正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主张新的党报仍由我任总编辑，另外由党中央的负责同志组成社论委员会，负责写社论。这件事，秋白很重视，积极筹备，但不久时局迅速逆转，办党报的事终于成了泡影。

一九三一年夏，秋白和之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听说我也从日本回来了，就要找我。他们用暗号代真名写信交开明书店转我收。秋白改姓何，之华改姓林，还有住址（现在记不起来了）。我和我妻（孔德沚）按地址去访问，才知道他们夫妻是住在一个普通的楼房里，楼上卧室兼书房，楼下算是客厅兼饭堂。我们到楼上闲谈，秋白问了我在日本的生活，又向我介绍了这几年国内的革命形势，他对于我以写小说为职业表示赞同。大约过了一年多，那时王明已经上台，我风闻秋白同志受到了打击，心情不好，就与德沚又去拜访他们。我见秋白瘦了，之华说他的肺病又发作了，但精神仍旧很好。秋白见了我们很高兴，问我在写什么，我说正在写《子夜》，他很有兴趣地问了故事的大概情节。这是一九三二年夏，我刚写了《子夜》的开头几章。我就说，下次把原稿带来再谈罢。过了几天，我带了写好的几章去，从下午一时，他边看边谈，直到六时。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农民暴动的一章，写工人的部分也谈了不少。因为《子夜》中写工人罢工有盲动主义的倾向，写农民暴动没有提到土地革命，秋白告诉我，党的政策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建议我据以修改《子夜》中写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的部分。（关于农民暴动，由于我当时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所以没有按秋白的意见修改，而只是保留了游离于全书之外的第四章。）我们话还没有完，晚饭摆上来了，打算吃过晚饭再谈。不料晚饭刚吃完，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遭到破坏，秋白夫妇必须马上转移的暗语。可是匆促间，他们往哪里去呢？我就带了他们到了我的家里。当时我住在愚园路树德里，二房东是一个宁波商人。这幢房子是三楼三底带厢房，我住在三楼，身份是教书的。秋白夫妇来后，我对二房东说是我的亲戚，来上海治病的，过几天就回家。之华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转移到别处去了，秋白则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在这些日子里，秋白继续同我谈《子夜》。秋白看书极为仔细。《子夜》中吴荪甫坐的轿车，我原来是“福特”牌，秋白说：“福特”轿车是普通轿车，吴荪甫那样的资本家该坐“雪铁龙”。又说：大资本家到愤怒极顶而又绝望时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这两点，我都照改，照加。后来我们还议论了当时文艺界的情形，他对当时尚存在的“左”倾文艺思潮也持批评的态度。秋白还表示，他也想搞文学，写点东西。他也问到鲁迅，原来他还没有和鲁迅见过面，我答应为他们俩介绍。有一天，忽然冯雪峰闯来了，原来他们俩人也不认识，我只好为之介绍。我就考虑，说不定还有什么人闯来，不如让秋白到鲁迅那里去住。鲁迅那时住在北四川路底的一座公寓楼房内，这个公寓住的全是外国人，其中有少数日本人，公寓斜对面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因此，一般闲人都不到那公寓里去，比我这里安全得多。我就托雪峰把秋白带到鲁迅家里去，介绍给鲁迅。秋白后来就在鲁迅寓中避难，直到之华探知原来住的地方没有出事，才搬了回去。秋白与鲁迅的交往与友谊从此开始。

这以后直到一九三三年底，秋白在上海与鲁迅一起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他热心地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他也用化名写了不少犀利的杂文直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我与他见面时常谈论文艺问题，有时我们也有争论，但多半我为他深湛的见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折服。但是，谈到他自己，他总是十分谦逊。记得那时他写给我和鲁迅的短信中有一次署名“犬耕”。我们不解其意。秋白说：我搞政治，好比使犬耕田，力不胜任的。他进而解释道：这并不是说我不做共产党员，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始终

如一的，我做个中央委员，也还可以，但要我担任党的总书记诸如此类的领导全党的工作，那么，就是使犬耕田了。他这番自知之明、自我解剖的话，使我们肃然起敬。

一九三三年末，秋白奉命去中央苏区。临行，向鲁迅辞行，也向我辞行。那次，他谈了很多话，但我总觉得他的心情有点郁悒；也许这是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战线又要走上新的征程。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秋白。一年以后，我们得悉秋白被叛徒出卖了；又隔不久，传来了噩耗，得到了秋白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的消息。那一年，秋白才三十七岁！

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领袖之一，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和秋白相识多年，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革命者，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个无私无畏的战士，一个能肝胆相照的挚友！秋白生前曾受过不公正的对待，他死后又遭到“四人帮”的诬陷。现在，被颠倒的一切终于又颠倒过来了，我真诚地祝愿秋白的灵魂得到安宁！

1980年1月30日。

跃进中的东北（节选）

延边——塞外江南

从图门站到延吉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车行二小时。我有四、五年不回家乡了，可是车行所见的“江南风光”，使我错疑已在故乡。啊，多么美丽呀！绿油油的水田。拉犁的牛多么壮健！它们不像我们家乡的水牛，可是和华北、西北惯见的黄牛，好像也不一样。延边耕田少用马，多用牛。自治州五个县，二十万垧耕地共有牛约十三万头（一九六二年计划增加到十六万头），而马呢，不过一万五千匹。

车行两小时，翻山越岭，但见两山之间的平地都是水田。延边现在有耕地二十万垧，其中水田是五万垧，也就是说，凡是可改为水田的平川之地都已经改为水田了；以后的问题是引水上山，开辟梯田，这是延边农业四化计划中的二化：水利化，梯田化。其余二化是机械化和电气化。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总路线光明照耀之下，延边人民雄心勃勃地要在一九六二年基本上完成四化。到那时候，水田总数将为十四万四千垧，占全州耕地总面积 70%，粮食（主要是大米）的产量将为五十二万三千吨。今年计划是三十四万吨，全区民食需用二十七万吨，那就有余了。

但是现在山坡上并不空闲，到处都是亚麻、黄烟和正开着小白花的豌豆。相隔几丈，有果木树，其中大部分是著名的苹果梨。

远处高山是森林，占全州面积 82% 强。森林里有宝贵的药材。首先是人参，还有黄芪、贝母。计划到一九六二年，要种植人参六十八万九千三百四十二平方公尺，其他药材三千垧。森林里还有珍贵皮毛的兽类，最著名的是貂，也在计划饲养，以广繁殖。养鹿已经开始了。这是农副业之一种。此外的农副业还有养蜂、养鱼、放养柞蚕。光是柞蚕，计划到一九六二年要放养一万把（柞蚕以“把”为计算单位，“把”者一把剪子一人一天所可能做到的工作量，每把约得茧二万余）。还有养蛤蟆，长久以来，这特种的蛤蟆驰名全国，蛤蟆油（即蛤蟆的内分泌腺，作块状）是珍贵的补品。

山区的资源是异常丰富的。现在已知的地质材料颇不完全，然而，可以断言，黄金和乌金（煤）几乎到处都有。延边五个县都产煤，而且质量很好。油母页岩也几乎到处都有，含油量 13.5%，取一小片用火柴引火，就会像蜡烛一样点燃起来。新办的炼油厂，今年生产五万吨，明年十万吨。此外，钼、锑、铅、锌、云母、水晶，都有发现，可还没探明白蕴藏有多少，新探得的一个大铜矿，据已知的蕴藏量，在国内是名列前茅，而且质量很好。

这样丰富的资源，从前是货弃于地。延边的工业是在解放以后开始建立的。车子驶近延吉市，你就看见延吉江的南面，吐着浓烟的许多高烟囱。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水泥、肥料、造纸、针织、农具制造、橡胶、炼油等等工厂，今后都将以飞跃的发展来加速延边的工业化，计划在明年，地方工业品产值可以超过农业。大跃进后，七个国营和地方国营厂矿已经创造三百零八件新纪录，其中三件是突破国际水平的。这标志了技术革命的浪潮在延边已经开始高涨了。

一九五六年秋季，延边已经普及了初等教育。全区 20% 的青壮年已经脱离文盲状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初中毕业生共三万二千二百二十三名，高中毕业生七千一百十七名，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一千零十五名。延边大学

在这五年内的毕业生是一千零九十九名。把这几项的数目字和全区的人口(八十万多)总数一比较,就显出延边的文化水平是很高的。农村中的初中毕业生人数之多,是延边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东盛乡(离延吉市三十里,翻过帽儿山就到了),有一个著名的黎明(金时龙)高级农业合作社,就是这个社在今年五一宣布了民办农业大学的正式成立。这个业余的农业大学是全国同类的民办大学的第一所。现有学生五十一人(其中女生九人),都是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经过三年至八年的劳动锻炼或基层工作锻炼的青年农民和乡干部。这第一批入学的学生都经过考试(政治、物理、化学、达尔文主义基础知识),他们现在所学的功课都是根据当地当时和未来发展的生产需要而订立的,共十一门。学生们每星期有两个半天上课,每天晚间两个小时的复习和讨论,因此,完全实现了学习和劳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东盛乡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就普及了小学教育,今年又普及了中等教育;全乡三千多青年中只有四名半文盲,60%的青年农民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大跃进中,全乡涌起了民办教育的干劲,新建的初中、高中七所,业余高小三十六所,业余初中十五所,业余高中十二所。把这些数字和全乡人口(三千三百多户,人口的数字我忘记了,假定五口一户就是一万六千五百多口,)一比较,就可以想见教育普及的情况。业余的农业大学现在只有五十一名学生,可是报名投考第二批的,已经有三、四百人。

金时龙合作社是东盛乡八个合作社中最大的一个,它拥有全乡耕地的三分之一,人口的一半多,因此,现在已经出现了必须再合并(把其余的七个新社和金社合并)然后在人力和资金等调配方面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形势。据说这件事不久就可实现。那时候,这个最早成立、命名为“黎明”的高级合作社,(金时龙是劳模,全国人大代表,黎明社的创办人,现社长,)大概在全国又将考上第一;你想,土地九千多垧,人口一万五、六千,有那样多的学校,几乎没有文盲,青年的60%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这不个出么?还不是全国第一么?

我因为时间不够,只在黎明社走马看花而已,可是,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你看,铁工厂正为新式农具、为技术革命而跃进,砖瓦厂正为改建社员的住宅而准备材料,卫生所、妇幼保健站多么整洁而且设备完全,供销合作社的书刊部分有四百多种的书籍。此外,还有群众图书室八个,田间读报组七十四个,社员订阅日报四、五种,三百多份,光是《红旗》,就订阅七十份(第三季度订阅《红旗》的,朝文版增至六十一份,汉文版增至二十七份),订阅其他刊物共五百多份。社员对我说:解放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他们连学习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都被剥夺,现在他们自己办学校,办业余大学,这真是天壤之别。这都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活生生的成绩。

这个社的文艺活动,单看下面的数字,也可以想见它的活跃。全社有八个俱乐部(每个生产队一个),一个中心俱乐部,业余演员四百五十人。俱乐部分四组:创作,表演,体育,宣传。去冬今春,水利建设紧张时,每晚都有千多人在野外工作,文艺队也是每晚在工地表演。我在参观这个社的时候,看出它的“画廊报”十分精采。“画廊报”在延边农村很普遍,每个合作社都有。这是贴在壁上的大幅宣传画,彩色,十几幅在一起,所以称为“画廊”;这些画经常更换,配合中心任务,所以是“报”。黎明社的画廊报中有一幅大画,标题是“叫高山低头,令河水让路”,一个巨人一手按住一个

山头，另一手托开一个山头，两山之间河水滚滚而过，画得生动有力。农民的业余画家们，有不少天才。

东盛乡黎明社的业余农业大学完全实现了学习和劳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上面已经说过的了；现在再来看正规的大、中、小学是怎样的。据我所见，劳动已经成为延边各级正规学校的正规课程了。

例如延吉市第二中心小学，学生二千多，学生年龄七——十五岁，没有超龄儿童。主要劳动是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有土地三十亩，有皮革制作（利用碎皮制手提袋，十分美观）、制蝇拍、针织等等车间。三十亩土地。主要种植大豆、土豆、蓖麻、向日葵、冬瓜等等。劳动时间：三、四年级学生每周二小时，五、六年级学生每周四小时；一、二年级学生不参加上述各项劳动，但每周有一小时的街头清洁劳动。高年级学生每周还有一次到农村活动——参观和劳动。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劳动。这个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学会了园艺、畜产、木工、制糖果等几种生产技能。去冬今春，学生共拣粪八百二十五万公斤，栽树八百二十一棵，种油料作物一千五百坪，拣废铁三千四百六十公斤、玻璃三千九百四十四公斤，打草袋一千八百八十三只，打绳六万三千一百七十二公斤。劳动改造了人。一个经常偷东西的五年级学生现在完全变了，劳动很积极，当了制蝇拍车间的主任，加入了少先队。

又如第二高中和第三高中，前者学生一千三百人，有实习土地八垧，农场八十多垧，还有铁工厂（制造简单农具）；后者学生七百多，实习土地（校园）五垧半，农场一百垧荒地，已开垦四十垧，实习工厂正在建立。过去，学生每周劳动两小时，现在规定一周二十四节课四天完成，其余二天时间完全劳动。这两个学校的学生劳动收入，都已经达到或者超过全校经费的二分之一。

延边大学是首先倡议把学生参加劳动作为正式课程的。该校的农学院基本上就是半工半读，农学院有农场二十多垧，果木园二百多垧。到田间教书，教员非有实际知识不可。教员种试验田，勤杂工完全取消，牛羊猪都是学生、教员喂养。农学院已经达到自给自足。

延大的师范学院（和农学院、医学院不在一处）分八个系，学生七百多人。走近这个学院，立刻就看到学生们劳动的果实了；围绕校舍的校园很大，到处都种了菜蔬和果树。这是实习工场以外的劳动教育。

学生家庭成分：中心小学 80%的学生是干部子弟，20%是农民子弟；第二高中 98%以上的学生是工农子弟。第三高中 85%以上是工农子弟；延大学生 95%是工农子弟。中心小学是在延吉市内的，所以学生多为干部子弟。从这里也反映出延边的小学教育早已普及到农村了。

延边艺术学校是一九五七年新建的，现在（指今年三月）只有三十六名男女学生，分音乐、舞蹈、美术三个系（美术系只成立了几个月），我看了学生们的音乐舞蹈表演，印象很深。在民族的优秀歌舞传统中生长起来的这些青年学生看来是有才能的，而且肯下功夫学习。舞蹈的主要课程是民族舞，也教国内兄弟民族的民间舞蹈和芭蕾舞基本训练。朝鲜舞已经跳得相当熟练。芭蕾舞基本训练呢，如果想到他们学的时间不过半年，也就觉得他们目前的水平是难能可贵的。吃亏的是体力差些。十几岁的五、六个女孩子表演了十多分钟，都有点气喘了。

这个青年的艺术学校的培养目标是群众文艺活动的骨干分子，舞蹈系的学生都要学编导。这个艺术学校下半年将招新生五十多名。

教学之外，艺术学校还办了两种训练班。一是文化馆、俱乐部的文艺骨干参加的“群众业余文艺训练班”，又一是“儿童业余文艺训练班”，参加者是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后者已经教出了可以上台表演的七、八岁的小艺术家（钢琴和小提琴）。有一次盛大的晚会，业余表演者的节目就有儿童的，也有老大爷和老大娘的。

延边歌舞团有歌剧和民间歌舞两个队，共九十多人，水平都很高。民间歌舞的有些节目，我在别处尚未见过，例如《丈夫离去的那天》。这是一个古典舞，男女两组，婀娜和刚健对称，充满了乐观气氛。故事大意是：丈夫们要出征了，妻子们在溪边取水送行，丈夫们表示了英勇杀敌的信心，妻子们在惜别而乐观的情绪中遥望丈夫们大踏步走了去的远影。我很喜欢这个舞。从内容到形式，这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歌剧团演出了大型歌剧《孔菊和潘姑》，看过这个戏的，特别是看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立歌剧院演出这个戏的人，一定会耽心延边的这个几十人的歌剧队（除了乐队，民间歌舞队和歌剧队合计也不过六、七十人，而民间歌舞队中有些演员还不能参加歌剧演出，因此实际人数是很少的），而且演出的舞台在宽、高、深三方面又都不合标准，如何能演好这个大型歌剧。可是他们演得很好。没有什么秘诀，除了演员们的艺术造诣，还靠有克服困难的干劲和集体主义的精神。他们没有专职的舞台工作人员，搭布景、摆道具，都是演员们大家动手；不少演员在演出时身兼数角，刚扮演过这个角色的，下场换了服装又上来演另一个角色了。没有后台，演员们挤在台下的一小块地方化妆。我看了在那样窄而浅的舞台上，搭出那样富丽堂皇的布景，就不能不赞美舞台美术设计者的本领。总而言之，这个剧团，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

我访问过这个歌舞团的团部。园子很大，房子不多，满园子种了蔬菜，这是团员们劳动的成果。他们还把园子里多年没有得到培修的大批果木树培修起来。不久的将来，这些果木树就会报答他们的辛勤的劳动。他们是艺术家，同时又是农业劳动者，我猜想他们将来还会办小工厂呢！

因为地理位置偏了一点，不但外国来的歌舞、剧团很少到延边演出，就是国内的歌舞、剧团的巡回演出，也不到那里。延边歌舞团的团员们迫切希望看到别人的表演，以资观摩，以广见闻。我认为这种愿望是合理的。有关方面，应当考虑他们的这种愿望，设法给予部分的满足。

我的回顾

一九二七年九月，我开始做小说，到现在已经整整五个年头了。五年来，除了生病（合算起来，这也占据了两年光景），我的精神时间，几乎完全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算是例外。那时并没生病，却也不做小说；那时，我写了些学术的（说来自己觉得惭愧）小本子，例如《中国神话研究》之类；那时候，有几位朋友劝我专心做小说，不要弄那些“杂著”，他们对我的期望，我很感激，可是天性喜欢东拉西扯的我并不能严守朋友的规劝，后来我又写过一些神话方面的杂著，甚至于大胆地论述两洋文学的源流变迁等等。

现在来算这五年工夫的总账，回头看看，我不免“汗流浃背”了。虽则朋友们对于我的期望是写小说，而我在五年来亦已胡乱写成了一百万字的小说，可是这些作品当真有点意思么？

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这是我五年来一贯的态度。至于我的观察究竟深刻到怎样，我的技术究竟有没有独创的地方，那我自己是一点也不敢自信！虽则我常常以“深刻”和“独创”自家勉励，我一面在做，一面在学，可是我很知道进步不多，我离开那真正的深刻和独创还是很远呀！现在已经不是把小说当作消遣品的时代了。因而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而社会对于我们的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会现象的正确而有为的反映！每每想到这一些，我异常兴奋，我又万分惶悚；我庆幸我能在这大时代当一名文艺的小卒，我又自感到我漫无社会科学的修养就居然执笔写小说，我真是大胆大了！

然而我还是继续在写。因为我知道我还没有老，我的脑神经还没有硬化，我还能够学习。每逢翻读自家的旧作，自己看出了毛病来的时候，我一方面万分惭愧，而同时另一方面却长出勇气来，因为居今日而知昨日之非，便是我的自我批评的工夫有了进展；我于是仔细地咀嚼我这失败的经验，我生气虎虎地再来动手做一篇新的。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现在总算写了一百万字了，其中有七十万字是长篇小说。我的创作才能毕竟如何，人家大概早已看了出来；但在我自己，却觉得我的创作活动还只不过开了一个头。人家问我：哪几篇是我自家得意的作品？我不能回答。虽则无论长篇短篇，我从构思到成篇，从来不敢草率，但是过后再看，没有一篇是自家得意的。所以我不能回答。但假使把我现在已经发表的作品全部当作我努力上进的“里程碑”来看时，那我倒有几句话可说。

我的第一次作品是长篇小说《幻灭》，接着又写了《动摇》和《追求》，也是长篇。第四次的作品《创造》方是短篇。这算是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尝试。那时候，我觉得所有自己熟悉的题材都是恰配做长篇，无从剪短似的。虽然知道短篇小说的作法和长篇不同，短篇小说应该是横截面的写法，因而同一的题材可以写成长篇，也可以写成短篇；但是那时候的我笨手笨脚，总嫌几千字的短篇里容纳不下复杂的题材。第一个短篇小说《创造》脱稿时，我觉得比做长篇还要吃力，我不会写短篇小说！

以后我又写了《自杀》等四五十短篇。在题材上和技术上，都和那《创造》同属一类，实在可说是浪费笔墨。一九二九年冬天病后，神经衰弱，常常失眠，已经写了三分之一的长篇小说《虹》也无力续完，（这是想把“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的时期作为背景的，但刚刚写到“五卅”运动爆发就因为生病而停顿了）于是我又再试试短篇。这结果就是那篇《陀螺》了。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见怎样，在我自己呢，却觉得《陀螺》和从前写的短篇有点不同，至少，从前那种“无从剪短似的”拘束局促，是摆脱了一些了。

但在题材方面，这《陀螺》还是和《创造》等篇没有什么两样。那时我离开剧烈斗争的中国社会很远，我过的是隐居似的生活。我没有新题材。并且最奇怪的是我那时候总没想到应用自家亲身经历过的“旧题材”。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几年里震动全世界、全中国的几次大事件，我都是熟悉的，而这些“历史的事件”都还没有鲜明力强的文艺上的表现；我在《幻灭》，《动摇》，以及那未完的《虹》里面，只作了部分的表现，我应该苦心地再处理那些题材。然而写著《陀螺》那时候的我却从没这样打算过。似乎因为自家不满意那几部旧作，就连带地撇开了那些旧题材。另外我还有一种不成理的意见：我以为那些“历史事件”须得装在十万字以上的长篇里这才能够抒写个淋漓透彻。而我那时的精神不许我写长篇。最后一个原因是我那时候对于那些“旧题材”的从新估定价值还没有把握。自家觉得写了出来时大概仍是“老调”，还不如不写。

但是想改换题材和描写方法的意志却很坚强。同时我又走向血肉斗争的大都市上海来了，这是一九三一年春天。而病又跟着来了。这次是更厉害的神经衰弱和胃病。小说再不能做，我的日常课程就变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看人家……然而这样“无事忙”的我，偶尔清早起来无可消遣，（这时候，人家都在第一个梦境里，我当然不能去看他们）便也动动笔，二百字，三百字，至多五百字。《豹子头林冲》和《大泽乡》等三篇就在那样的养病时期中写成了。这算是我第一回写得“短”。以前的短篇至少也有一万字光景。在题材方面，我算是改换了，我逃避现实。自然我不缺乏新题材，可是我从来不把一眼看见的题材“带热地”使用，我要多看些，多咀嚼一会儿，要等到消化了，这才拿出来应用。这是我的牢不可破的执拗。我想我这脾气也许并不算坏！

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我的身体方才好些。再开始做小说，又是长篇。那一年就写了《三人行》，《路》，以及《子夜》的一半。本年元旦，病又来了，以后是上海发生战事，我自己奔丧，长篇《子夜》搁起了，偶有时间就再做些短篇，《林家铺子》和《小巫》便是那时的作品。题材是又一次改换，我第一回描写到乡村小镇的人生。技术方面，也有不少变动；拿《创造》和《林家铺子》一对看，便很显然。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见怎样，在我自己，则颇以为我这几年来没有被自己最初铸定的形式所套住。我在第二短篇集《宿莽》的《弁言》里有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难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旁的作家怎样，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尝过此中味道的。

所以当作为我的短短五年的文学生涯的“里程碑”来看时，我就觉得《创造》，《陀螺》，《大泽乡》，《林家铺子》，《小巫》等篇对于我颇显得亲切了。《叩门》等三篇随笔因为也多少可以表示我的面目，想起来时也有亲切之感。而我也就以这几篇作为一个选集，应了朋友介绍的书坊的要求。

1932年12月。

关于“文学研究会”

—

虽则《现代》杂志社指明了要的是“文学研究会小吏”，可是我写不出来。我以为此项小史，如果请郑振铎先生或者别位先生来担任，那才是最适宜的。我曾经把这意思告诉施蛰存先生，也告诉了郑先生。施先生是同意的；并且《现代》杂志也久已渴望郑先生做文章，而今有这题目，正是“拉稿”的好机会了（自然我也帮着拉一下）。然而郑先生因为教课编书太忙，五月以前，简直抽不出工夫来，而《现代》杂志也因出版关系，三月底一定要稿，于是本来居间帮着拉的我，只好权代郑先生了此文债；“小史”不能写，我就记下一点感想罢！

不过写“小史”的责任还在郑先生肩上，读者诸君固然渴望，施蛰存先生也未必肯放松，请读者诸君耐心等一下，至迟六月。

二

文学研究会发起的时候，有“缘起”（可以说就是宣言），有“章程”，后来各地有“分会”，有机关报似的“定期刊”（各地分会也有定期刊），又曾印过一次“会员录”，——这种种，都叫人看了就会认定它是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而且像要“包办”文坛。事实上，也曾引起严重的误会，冤冤枉枉在地顶过“把持文坛”的罪名。究竟文学研究会是怎样的一个集团呢？好像还没有过详细的解释。

就我所知，文学研究会是一个非常散漫的文学集团。文学研究会发起诸人，什么“企图”，什么“野心”，都没有的；对于文艺的意见、大家也不一致——并且未尝求其一致；如果有所谓“一致”的话，那亦无非是“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一基本的态度。现在想起来，这一基本的态度，虽则好像平淡无奇，而在当时，却是文学研究会所以能成立的主要原因，并且也是成立以后就“锋芒毕露”地成立了几个地方分会，而地方分会又出版定期刊的主要原因。假使我们说文学研究会是应了“要校正那游戏的消遣的文学观”之客观的必要而产生的，光景也没有什么错误罢？假如我们再想到此所谓“游戏的消遣的文学观”在当时如何根深蒂固，光景也就可以了解文学研究会同人在上海、北京，以及其他各地出版定期刊物，也是为了客观的必要，绝非想要“包办”或“把持”。说一句好像吹牛的话：当时文学研究会同人在反对游戏的消遣的文艺观这一点上，颇有点战斗的精神！

而当时这种“战斗”的精神及其表现，也是自然发生的。文学研究会发起时的“缘起”上并没有显明地表示这种纲领。文学研究会既成立后，也没有任何“工作计划”一类的决议。外边人看见文学研究会除以《小说月报》作为代用机关报外，又有许多周刊旬刊附在各地日报内，而这些周刊旬刊又标明了某处文学研究会分会主编的字样，遂以为凡诸一切都是文学研究会总会在那里有计画地进行，——这样的猜想，并不一定是恶意，但事实上恰正相反。这一切都是文学研究会同人“各自的行动”，并没有什么总机关在那里有计划地布置。（当时各种刊物亦不过互相交换而已，文稿都是各地自己

负担，且亦未尝交互讨论过编辑方针。)这是“人自为战”！而所以有此“人自为战”的情形，当然不是想“包办”新文坛，而是要打破旧文学观念的包围。

我以为应该这样的去理解：为什么本身组织非常散漫的文学研究会却表现了那样很有组织似的对旧文学观念的斗争。

三

有过一个时候，文学研究会被目为提倡着“为人生的艺术”。特别是在创造社成立以后，许多人把创造社看作“艺术派”，和“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对立。创造社当时确曾提倡过“艺术至上主义”，而且是一种集团的活动。但文学研究会同人（依我所知）除了上述的那个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而外，并没有什么“集团”的主张。文学研究会会员中间有几位曾经热心地提倡了“为人生的艺术”，而且在文学研究会主编的刊物上（例如上海出版的《文学周报》）发表论文，这是事实；但这些论文，只是个人的主张，并非集团的。当时信仰“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会员从未在书面上或口头上表示那是集团的主张，反之，他们曾经因为当时反对者的论调太奇怪（离开了文学思潮上的讨论），而郑重声明过他们只以个人资格发表意见，并没有任何集团的名义，更无假借集团名义的意思，不过因为文学研究会主编的周刊或旬刊原来是公开的，而他们又是负责撰稿者，所以就在那些刊物上发表罢了。

但是外边人总把文学研究会看作“人生派”。一九二六年春间，我到广州去了一趟，那边的青年尚以此事为询，并且说：“现在文学研究会为什么不提倡人生派艺术？现在文学研究会主张什么？”我记得当时我的回答是这么几句：“文学研究会这团体并未主张过什么，但文学研究会会员个人却主张过很多，如果你要问我个人对于文学的意见，我是愿意说说的。”听了这样回答的青年就表示了有点不满意和惊讶；他们在一九二六年春间的广州环境中当然以为任何集团必得有个“主张”，没有集团主张的集团是他们所不了解的。“那么，文学研究会这团体是代表着什么呀？”他们中间有一位又问了。“代表了文学研究会丛书！”我这样回答。

现在看来，文学研究会这团体虽然任何“纲领”也没有，但文学研究会多数会员有一点“为人生的艺术”的倾向，却是事实。而文学研究会同人中没有“英雄”想给这集团立一种什么纲领，却也是事实。虽然所谓“为人生的艺术”本质上不是极坏的东西，但在一般人既把这顶帽子硬放在文学研究会的头上以后，说起文学研究会是“人生派”时便好像有点讪笑的意味了。这讪笑的意味在当时是这样的：文学研究会提倡“人生派”艺术，却并没做出成绩来呀！用一句上海俗语，便是“戳牌头”而已！一九二八年以后，仍旧把文学研究会当作“人生派”的文学集团的人们却又把那讪笑转换了方向了：这就是我们常听得的一句革命歌诀：“什么人生派艺术，无非是小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

我以为这两个态度都不免冤枉了文学研究会这集团。因为名为文艺集团的文学研究会除了反对“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这一基本的而且共同的态度以外，就没有任何主张呀！也许有人以为这是大大的缺点。可是我们也不妨说，正因为它没有什么纲领，所以在“五四”以后新文

学运动萌芽时期能够形成一个虽然很散漫但是很广大的组织，因而在反对游戏的和消遣的文学观这方面尽了微薄的贡献。

四

前些时偶然碰见了一位旧朋友（他不是文艺界中的人），倾箱倒篋他说完了阔别七八年的陈话以后，这位朋友突然又问道：“文学研究会这团体，究竟现在还存在不？”这位朋友是研究建筑学的，他知道七八年来建筑术已经有了多少变迁，可是他不知道文学界的风雨表曾经起过怎样的变化；所以他郑重其事的问起了“究竟现在还存在不？”这样老实的问题，青年人就不会提出来。我当时就觉得这位天天和水泥钢筋做伴的朋友实在连思想性情也变硬了——硬到无法“转变”。然而他的眼睛盯住了我的面孔，好像不得回答决不罢休，于是我只好说了三个字：“不存在”。哪里知道我这位朋友偏偏不肯相信，正像十年前有人决不肯相信文学研究会没有“包办文坛”的阴谋一般。我没有办法，只好再多说几句了：“那么，称它是存在罢！这个团体，自始就非常奇怪。说它只是一个空名目么？事实上不然。说它是有组织的集团么？却又不然。办杂志的人有两句经验之谈：起初是人办杂志，后来是杂志办人。文学研究会这团体也好像如此。起初是人办文学研究会，后来是文学研究会办人了！凡属文学研究会会员而住在上海的，都彼它办过。它是什么呢？文学研究会丛书是也！”我的朋友还是不能满意，但是我不让他再问了。

我说这位学建筑的朋友“顽固到不可救药”，就因为他听说文学研究会“不存在”就好像很可惜似的。虽则我说明了这团体在最近十年来早就是不死不活的“存在”，他还是不满足。他为什么有这种感情、我不知道，我也不向他打听。我总觉得他是“顽固”罢了。……假使今日而犹有十年前那样的文学研究会存在，并且只想抗拒文艺界中的游戏消遣态度而拿不出簇新的集团的主张，那当然是“不革命”的集团了。所以我敢断定文学研究会之有若无的存在未始非它本身之幸。除了那位学建筑的“顽固”朋友，试问现在急进革命的青年或半青年有几个还觉得文学研究会在今日能够对新文学运动尽一分力量呢？不过这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恕不絮絮。

《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这一个题目在《子夜》的后记上我已经说过了，诸位看了那篇后记，已可知道一个大概。不过诸位既然出下这题目，要我再谈谈，那就随便谈谈罢。

可以分做两方面来谈：第一是写作的动机，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住的不大方便，每天住在三层楼上有点气闷，我便到日本走了一趟，在日本约二年，一九三一年春又回到上海。这个时候正是汪精卫在北平筹备召开扩大会议、南北大战方酣的时候，同时也正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当时我眼病很厉害，医生嘱我，八个月甚至一年内，不要看书，不然则暂时好了，将来也不免复发。我遵医嘱静心养病，并且眼疾而外，又病神经衰弱，我便一意休养。每天没事，东跑西走，倒也很容易过去。我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本来是很复杂的。朋友中间有实际工作的革命党，也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间有企业家，有公务员，有商人，有银行家，那时我既有闲，便和他们常常来往。从他们那里，我听了很多。向来对社会现象，仅看到一个轮廓的我，现在看的更清楚一点了。当时我便打算用这些材料写一本小说。后来眼病好一点，也能看书了。看了当时一些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把我观察得的材料和他们的理论一对照，更增加了我写小说的兴趣。

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一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

一九三一年春世界经济恐慌波及到上海。中国民族资本家，在外资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威胁下，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更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增加工作时间，减低工资，大批开除工人。引起了工人的强烈的反抗。经济斗争爆发了，而每一经济斗争很快转变为政治的斗争，民众运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是很好的。

在我病好了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向转向新的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得激烈的时候，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我打算从这里下手，给以形象的表现。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加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因为一九三一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当时，他们的“出路”是两条：（一）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二）与封建势力妥协。他们终于走了这两条路。

实际上写这本书是在一九三一年暑假以前开始的。我向来的习惯：冬天夏天不大写作，夏天太热，冬天屋子内生着火炉有点闷人，一九三一年冬整理材料，写下详细大纲，列出人物表，男的、女的、资本家、工人。……他们各个人的性格，教养以及发展等等，都拟定了。第二步便是按故事一章一

章的写下大纲，然后才开始写。当时我的野心很大，打算一方面写农村，另一方面写都市。数年来农村经济的破产掀起了农民暴动的浪潮，因为农村的不安定，农村资金便向都市集中。论理这本来可以使都市的工业发展，然而实际并不是这样，农村经济的破产大大地减低了农民的购买力，因而缩小了商品的市场，同时流在都市中的资金不但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增添了市场的不安定性。流在都市的资金并未投入生产方面，而是投入投机市场。《子夜》的第三章便是描写这一事态的发端。我原来的计划是打算把这些事态发展下去，写一部农村与都市的“交响曲”。但是在写了前面的三四章以后，夏天便来了。天气特别热，一个多月的期间天天老是九十几度的天气。我的书房在三层楼上，尤其热不可耐，只得把工作暂时停顿。

直到“一二八”以后，才把这本小说写完。因为中间停顿了一下，兴趣减低了，勇气也就小了，并且写下的东西越看越不好，照原来的计划范围太大，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只写都市的而不写农村了。把都市方面（一）投机市场的情况；（二）民族资本家的情况；（三）工人阶级的情况，三方面交错起来写。因为当时检查的太厉害，假使把革命者方面的活动写得太明显或者是强调起来，就不能出版。为了使这本书能公开的出版，有些地方则不得不用暗示和侧面的衬托了。不过读者在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革命者的活动来。比如同黄色工会斗争等事实，黄色工会几个字是不能提的。

本书为什么要以丝厂老板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呢？这是受了实际材料的束缚，一来因为我对丝厂的情形比较熟习，二来丝厂可以联系农村与都市。一九二八——二九年丝价大跌，因之影响到茧价。都市与农村均遭受到经济的危机。

本书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格发展以及联带关系等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分章分段，使他们联接呼应。这种方法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抄袭旁人的。巴尔扎克，他起初并不想作什么小说家，他打算做一个书坊老板，翻印名著袖珍本，他同一个朋友讲好，两个人合办，后来赔了钱，巴尔扎克也得分担一半。但是他没有钱，只得写小说会还债。他和书店订下合同，限期交货。但是因为时间仓猝，经常来不及，他便想下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先写一个极简单的大纲，然后再在大纲上去填写补充，这样便能按期文稿，收到稿费。我不比巴尔扎克那样着急，不必完全依照他那样作。我有时一两万字一章的小说，常写一两千字的大纲。

《子夜》开头第一章，写吴老太爷从农村走到都市，患脑冲血而死。吴老太爷好像是“古老的僵尸”。一和太阳空气接触便风化了。这是一种双关的隐喻：诸位如果读过某一经济杰作的，便知道这是指什么。第二章是热闹场面。借了吴老太爷的丧事，把《子夜》里面的重要人物都露了面。这时把好几个线索的头，同时提出然后来交错地发展下去……在结构技巧上要竭力避免平淡，但是太巧了也便显得不自然了。

读《倪焕之》

—

即使是善忘的人们，想亦不会忘记了十年前的今日曾经掀发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谁也还能够想象出，或是清晰地回忆到，那时候的初觉醒的人心的热力！

现在是整整十年了！“五四”的壮潮所产生的一些“风云儿”，也早已历尽了多少变幻！沿着“五四”的潮流而起，又跟着“五四”的潮流而下的那一班人，固不用说；便是当时的卓然的“中坚”却也很令人兴感。病死的，殉难的，退休的，没落的，反动的，停滞的，形形色色，都在历史先生的跟前暴露了本相了。时代的轮子，毫无怜悯地碾毙了那些软脊骨的！只有脚力健者能够跟得上，然而大半还不是成了 Outcast ！

有一位朋友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许多人以为自‘五四’到现在是一线的继承，错的，它是不同的显明的两个时代。”他把“五卅”分为另一伟大的时代，而称现代为“第四期之前夜”。我承认这个观察是很对的。但是我们亦不能不承认，活跃于“五卅”前后的人物在精神上虽然迈过了“五四”而前进，却也未始不是“五四”产儿中的最勇敢的几个。没有了“五四”，未必会有“五卅”罢。同样地会未必有现在之所谓“第四期的前夜”罢。历史是这样命定了的！

二

现在代们回过头去看。高高地堆在那里的这个伟大的“五四”的骸骨是些什么呢？几本翻译的哲学书；几卷“新”字排行的杂志，其中并列着而且同样地热心鼓吹着各种冲突的“新思想”；几本翻译的法国俄国文学作品。新文学的提倡差不多成为“五四”的主要口号，然而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出来。当时最何惊人色彩的鲁迅的小说——后来收进《呐喊》里的，在攻击传统思想这一点上，不能不说是表现了“五四”的精神，然而并没反映出“五四”当时及以后的刻刻在转变着的人心。《呐喊》中间有封建社会崩坍的响声，有粘附着封建社会的老朽废物的迷惑失措和垂死的挣扎，也有那受不着新思潮的冲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老中国的暗陋的乡村，以及主活在这些暗陋的老中国的儿女们，但是没有都市，没有都市中青年们的心跳的跳动。有人据此批评《呐喊》，以为鲁迅并没表现了现代中国的人生，以为《呐喊》的主要情调是依恋感伤于封建思想的没落：这种看法，却不公允。我曾经做过一篇论文，对于这些见解，有所辩正；不料人家便说我是“捧鲁迅”。现在我还是坚持我从前的意见，我还是以为《呐喊》所表现者，确是现代中国的人生，不过只是躲在暗陋里的难得变动的中国乡村的人生；我还是以为《呐喊》的主要调子是攻击传统思想，不过用的手段是反面的嘲讽。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地考量一下，便会承认中国乡村的变色——所谓地下泉的活动，像有些批评家所确信的，只是最近两三年以来的事，而在《呐喊》的乡村描写发表的当时，中国的乡村恰正是鲁迅所写的那个样

子。再如果我们是冷静地正视现实的，我们也应该承认即在现今，中国境内也还存在着不少《呐喊》中的乡村和那些老中国的儿女们。王统照最近发表的短篇《搅天风雪梦牢骚》便是一九二八年山东的一部分乡村的写真，虽然我们不喜欢那中间的人物的回顾感伤的心情，可是事实总是事实，我们无法否认。从《呐喊》的自序中，可以看见作《呐喊》中数篇时的鲁迅颇带些悲观的心情；这也就说明了何以鲁迅要在“五四”的前后特拣那死水似的乡村来描写，给乐观太甚者一个深刻的反讽，同时也和那些被“五四”的怒潮所冲激的都市人生作一个辛辣的对照。我以为我们应该这样地去了解《呐喊》的内容，虽然同时亦不能不指出《呐喊》是很遗憾地没曾反映出弹奏着“五四”的基调的都市人生。

正像《呐喊》这题目的用意是在自叙中表白了一般，《彷徨》的意义也可以在题辞的引用了《离骚》语句中看出来。在《彷徨》中，有两篇都市人生的描写：《幸福的家庭》和《伤逝》。这两篇涂着恋爱色彩的作品，暗示的部分要比题面大得多。“五四”以后青年的苦闷，在这里有一个显明的告白。弹奏着“五四”的基调的都市的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描写，至少是找到了两个例了。然而也正像《呐喊》中的乡村描写只能代表了现代中国人生的一角，《彷徨》中这两篇也只能表现了“五四”时代青年生活的一角；因而也不能不使人犹感到不满足。

三

鲁迅而外的作家大都用现代青年生活作为描写的主题了。郁达夫的《沉沦》，许钦文的《赵先生的烦恼》，王统照的《春雨之夜》，周全平的《梦里的微笑》，张资平的《苔莉》等，都是卓越的例证。但是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人生还是极狭小的，局部的；我们不能从这些作品里看出“五四”以后的青年心灵的震幅。最近罗美给我的信中说：“我觉得在这一时期中，‘彷徨’的心理实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心理。其他的 Key—note 就是知识者物质生活的穷困；这在许多小说中表现得从来没有的 sharp”。（原信见《文学周报》第八卷第十号）这个论断是很对的，可是我犹以为这一时期中的作品实在还未能充分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青年的伤惶的心情。进一步说，这时期的作品并没表现出“彷徨”的广阔深入的背景，——比如思想界的混乱，社会基层的动摇，新旧势力之错综肉搏而无显著的进退，——而只描写了一些表面的苦闷。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此一时期的作品缺乏浓郁的社会性。《沉沦》描写青年的苦闷，可谓“惊才绝艳”的了，然而我们试分析主人公苦闷的背景，便要惊讶于所含的社会性何其太少！无怪《沉沦》的摹仿者便成为毫无可取的色情狂的恶札，连最小限度的时代的苦闷也不能表现了。

同样地，张资平；许钦文，周全平的描写恋爱心理的作品，都不能很有力地表现出这是“五四”时代的彷徨苦闷青年的恋爱心理！在这点上，《赵先生的烦恼》和《苔莉》两者纵使写得好，却可惜的是并没带上时代的烙印；我们分析赵先生的恋爱的烦恼，便觉得赵先生的精神世界里只有恋爱以及由恋爱而来的疑和妒。苔莉也是相同的一个女子。纯从恋爱描写这一点而言，

Key—note 英语。意即主调。

sharp 英语。意即尖锐。

这样的作品也不能说不是成功，然而在寻求代表“五四”的时代性的条件下，便不能认为满意。

《春雨之夜》的内容，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但总的印象是并没感到透彻的时代性。王统照比较的是有意识地想描写“五四”对于青年思想的影响，可是他并没抓到了“五四”的基调来描写，也是不必讳言的。

自然不是说上列的几位作家就可以代表“五四”时代的全般文艺；客中没有带书，仅凭记忆所及，聊作如是云，但敢信大体，适如鄙论。

四

为什么伟大的“五四”不能产生表现时代的文学作品呢？如果以为这是因为“新文学”的初期尚未宜于产生成熟的作品，那就不是确论。单就作品之成熟与否而言，则上述诸作家何尝没有成熟的作品！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在当时的文坛议论庞杂，散乱了作家的注意。更切实他说，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文坛上发生了一派忽视文艺的时代性，反对文艺的社会化，而高唱“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这样的入了歧途！

在这里，应该略略提起当时的一番事情。

现在讲到文艺的时代性，社会化，等等话头，所谓革命的文学批评家便要作色而起，大呼是“太旧，太灰色”了；但想来大家也不曾忘记今日之革命的文学批评家在五六年前却就是出死力反对过文学的时代性和社会化的“要人”。这就是当时的创造社诸君。即使人们善忘，总还记得当时创造社诸君的中坚郭沫若和成仿吾曾经力诋和他们反对的被第三者称为“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的一部分人的文学须有时代性和社会化的主张为功利主义，在当时，创造社的主张是“为艺术的艺术”；说过“毒蕈虽有有毒而美，诗人只赏鉴其美，俗人才记得有毒”这一类的话。感情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调子，充满在他们那时候的作品。去年成仿吾所痛骂的一切，差不多全是当初他自己的过犯，是一种很有意味的新式的忏悔。当时创造社的主张颇有些从者。何以故？因为那时期正是“彷徨苦闷”的时期、因为那时候“五卅”的时代尚未到临，因为那时期创造社诸君是住在象牙塔里！因为“彷徨苦闷”的青年的变态心理是需要一些感情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唯美主义，权当一醉。“五卅”时代的尚未到临，创造社诸君之尚住在象牙塔里，也说明了当时宣传着感情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唯美主义的创造社诸君实在也是分有了当时的普遍的“彷徨苦闷”的心情。而当时他们的遁路却是拾起了他们今日所自咒诅的资产阶级文学的玩意儿以自娱，不但自娱，且企图在人海中拱出一个角儿。可是就在那时候，近在中国，则“五卅”的时代已在酝酿，远在西欧，则新兴的无产文艺已经成为国际文坛注目的焦点。（不过日本的无产文艺运动还是寂然）假使当时成郭诸君跑出他们的霞飞路的“蜗居”，试参加那时的实际运动和地下工作，那么，他们或者不至于还拾起“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来自娱罢。再说得显明些，并且借用去年成仿吾的话语，如果那时候他们不要那么“不革命”，不要那么“小资产阶级性”，那或者成仿吾去年的雄赳赳的论调会早产生了几年罢。谁知道此中的机缘呢？怕只有“时代先生”罢哩！

我这一番话，并非是翻旧账簿，不过借此说明了时代对于人心的影响是如何之大，从而也指出了何以六年前板着脸孔把守了“艺术的艺术之宫”的

成仿吾会在六年后同样地板起了面孔来把守“革命的艺术之宫”，正自有其必然律，未必像有些人的不客气的猜度所说的竟是投机，是出风头。并且借此也说明了当时他们因为曾参加实际运动和地下工作而错误地拾起了“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以自娱的影响，竟造成了“引入到迷途”，像他们今日所切齿诅咒别人的。所以“五四”期的没有反映时代——自然更说不到指导时代——的文学作品，决不是偶然的事。

试看当时“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把文坛推进了一个怎样的局面。想来大家还记得，感情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唯美主义的“即兴小说”，充满了出版界；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只是个人的极狭小的环境，官能的刺戟，浮动的感情。而“非集团主义”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也成为彷徨苦闷的青年的玩意儿，麻醉剂。在这灰色的迷雾中，文艺没有时代性，更谈不到社会化。

直到地下工作的第一次果实的“五卅”运动爆发时，这种迷雾还是使人窒息。但是时代的前进的轮子这一次却推动了象牙塔里的唯美主义者。大概是一年以后罢，创造社有了改变方向的宣言。记得去年春初，《太阳月刊》和《文化批判》（创造社的）还有些互相攻讦的文字，很不能讳饰地在互争“革命文学”的正统，或是“发见权”。健忘的成仿吾不但忘记了五年前的自己的艺术派时代的主张（自然这个健忘是应该恭贺的），却也忘记了昨天刚学得的辩证法的 A.B.C，正是人的思想乃受社会环境所支配，而社会环境乃受经济条件所支配，因而“正统”或“发见权”之争，实在是无聊的。不用说，创造社的改变态度的宣言，并没忏悔以往的表示，而是一种“先驱”的，“灼见”的态度；这使得不健忘的人们颇觉忍俊不禁。但是我们也可以了解于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唯心主义转变到集团主义、唯物主义，原来不是一翻身之易，所以觉得他们宣言中留着一些旧渣滓的气味，也是不足深责的。

五

上面说了那些话，并不是想揭穿人家的“旧创疤”；不过借此证明了时代对于人心的势力之伟大，便是创造社也不是例外。在表面上看来，他们终究觉悟了而且丢去了出死力拥护过的“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而跟着“五卅”时代向前走了。他们是一个手头的现成的例。但是并没结会立社，只单身地跟着一个一个时代的潮流往前走的无名氏，正不知有多少呢！这些无名氏便凑合成了时代的社会的活力。描写这些活力，即使并没指出什么显明的将来的路，至少也是不背于集团主义的作品。我常常想，“五四”时代是并没留下一些表现这时代的文学作品而过去了，现在如果来描写“五四”对于一个人有怎样的影响，并且他又怎样经过了“五卅”而到现在这所谓“第四期的前夜”，粗如上文所说创造社诸君的经历，那亦未必竟是无意义的作品罢。我这意见，最近在叶绍钧所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找得了同感了。

《倪焕之》曾以“教育文艺”的名目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就全书的故事而言，这个“教育文艺”的称呼，却也名副其实。到第十九章止，差不多占了全书的大半，主人公倪焕之的事业是小学教员。他和同志的小学校长蒋冰如很艰辛地在死水似的乡村里试验新的教育。他们得不到社会的同情，也得不到同事的谅解和热心赞助；但是倪焕之很有兴趣地于着。这时候，教

育是他的终身事业；他又把教育的力量看得很大，“一切的希望悬于教育”。但是“五四”来了，乡村中的倪焕之也被这怒潮冲动，思想上渐渐起了变化；同时他又感到了几重幻灭，在他所从事的教育方面，在新家庭的憧憬方面，在结婚的理想方面。他感到了寂寞了。他要找求新的生活意义，新的奋斗方式，从乡村到了都市的上海。接着便是“五卅”来了。“五卅”的怒潮把倪焕之冲得更远些；虽然他还是在做什么女子中学的教员，但一面也参加了实际运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高潮时，他也是社会的活力中的一滴。然后，在局面陡然转变了时，他的心碎了，他幻灭，他悲哀，他愤慨；肠窒扶斯来结束了他的生活的旅程，在弥留的谵呓中，他这样说：“三十五不到的年纪，一点事业没成功，这就可以死么？唉，死吧，死吧！脆弱的能力，浮动的感情，不中用，完全不中用！……成功，不是我们配得的奖品；将来自有与我们全然两样的人，让他们得去吧！”

在近十年中，像“倪焕之”那样的人，大概很不少罢。也许有人要说倪焕之这个人物不是个大勇的革命者；那当然不错。只看他目击大变之后，只是借酒浇愁，痛哭流涕，便可明白。在临死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能力脆弱，感情浮动，完全不中用了。但是他的求善的热望，也该是值得同情的。

叶绍钧以前有过《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等五个短篇集；《倪焕之》是他的第一个长篇，也是第一次描写了广阔的世间。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在这两点上，《倪焕之》是值得赞美的。上文我所以说“五四”时代虽则已经草草地过去，而叙述这个时代对于人心的影响的回忆气氛的小说却也是需要，这一说，从《倪焕之》便有个实例了。上文我又说起“五四”以后的文坛上充满了信手拈来的“即兴小说”，许多作者视小说为天才的火花之爆发时的一闪，只可于刹那间偶然得之，而无须乎修炼——锐利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缜密的构思。他们只在抓掇片段的印象，只在空荡荡的脑子里搜求所谓“灵感”；很少人是有意地要表现一种时代现象，社会生活。这种风气，似乎到现在还没改变过来。所以我更觉得像《倪焕之》那样“有意力之”的小说在今日又是很值得赞美的。

但或者《教育杂志》当初是要求叶绍钧做一篇和教育有关的“教育文艺”，所以《倪焕之》的前半部全是描写乡村教育，在全体上发生了头重脚轻的毛病。这在艺术的意味，不能不说是结构上的缺憾。并且也许有人因此而误会此书是专谈教育的。

“五卅”运动在本书中有一段正面的明显的描写。第二十二章的前半段写得颇有气色。倪焕之在此时是一个活动的角色了。但是接下的一章——二十三章，却用了倪焕之个人的感念来烘托出当时的情形，而不用正面的直接描写，在艺术上也不能讳言地是一个缺点。这使得文气松懈，很不合宜于当时那种紧张的场面。并且二十二章后半段的回叙，倒接在火刺刺地的正面描写下，也很能够妨碍了前半的气势。在此时的倪焕之，大概已经参加了什么政治的集团了罢。可是二十二章以后写倪焕之的行动都不曾很显明地反映出集团的背景，因而不免流于空浮的个人的活动，这也使得这篇小说的基调受了不小的损害。作者忙于职业的谋生，小说是偷闲写的，大概一章一章是间

歇地作成的，因而在全般的结构上虽然还保持着一贯，而在局部的穿插上便不免有了罅隙。

最后一章写倪焕之死后的倪夫人金佩璋突然勇敢起来；这是作者信赖着“将来”的意识使他有这转笔，然而和第二十四章开头所描写的倪焕之感念中的金佩璋比照起来，便觉得结尾的金佩璋的忽变是稍稍突兀些了。从第二十四章到最后一章，中间相隔一年多，而又是极变幻的一年多，所以金佩璋思想的转变是可能的，但是作者并没在第二十四章以后说起金佩璋的动静，却在结尾蓦地一转，好像一个人思想的转变是“奇迹”似的骤然可以降临的，也就失之于太匆忙了。

所以就故事的发展而言，就人物的性格的发展而言，《倪焕之》的前半部都比后半部写得精密。在前半部，我们看见倪焕之是在定型的环境中活动；在后半部，我们便觉得倪焕之只在一张彩色的布景前移动，常常要起空浮的不很实在的印象。又在人物描写上，前半部的倪焕之，蒋冰如。金佩璋，都是立体的人物，可是到了后半部，便连主人公倪焕之也成为平面的纸片一样的人物，匆匆地在布景前移动罢了。因此后半部的故事的性质虽然紧张得多，但反不及前半部那样能够给我们以深厚的印象。大概那时作者是急于要完篇，下笔时已经没有写前半部时那样周详审度踌躇满志的心情；而《教育杂志》一年十二期的结束也已逼近，事实上不能容许作者慢慢地推敲，怕也是一个原因罢。

六

我以为批评一篇小说是不应该枝枝节节地用自己的尺度去任意衡量。一篇小说的艺术上的功夫，最好让每个读者自己去领受。所以上文云云，至多不过是我读后的印象——关于《倪焕之》的艺术上的印象，我的注意点并不在此。我的注意点，除了上文已经说过“有意识地描写‘五四’对于某个人有怎样的影响。并且他又怎样地经过了‘五卅’而到现在这所谓‘第四期的前夜’”这一点而外，还有该小说的“时代性”。现在请就此一端再说几句话。

一篇小说之有无时代性，并不能仅仅以是否描写到时代空气为满足；连时代空气都表现不出的作品，即使写得很美丽，只不过成为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所谓时代性，我以为，在表现了时代空气而外，还应该有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与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换言之，即是怎样地催促历史进入了必然的新时代，再换一句说，即是怎样地由于人们的集团的活动而及早实现了历史的必然。在这样的意义下，方是现代的新写实派文学所要表现的时代性！

我们现在再看《倪焕之》这部小说是否具有这样意义的时代性。

时代的空气，不用说是已经表现的了。虽然主人公在小学教员时代是确信着“一切希望悬于教育”，但“五四”以后他对于专谈教育的怀疑以及所感到的寂寞，也差不多近于我在上文所说的“五四”以后弥漫在知识界中间的彷徨苦闷了。其次，时代给与人们的影响，在倪焕之身上也有了鲜明的表现。谁也不能否认倪焕之是受了时代潮流的激荡而始从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的。但是倪焕之究竟是脆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代推动他前进，他却并不能很坚实地成为推进时代的社会活力的一点滴。

他虽然说“我们应该把历史的轮子推动，让它转得较平常为快”；可是他实在对于历史的轮子以及如何推动这历史的轮子使它更快，而者都没有明了的观念。所以他在那革命局面极紧张的时期所鳃鳃过虑者是“学生们停下了课，也不打算几时让他们开学”，而且因此竟感到了幻灭。所以他在局面突变以后，便回复到十几年前自个儿上酒店买一痛醉的现象了。所以他在临终的昏迷中看见了运动铁椎穿青布衫露胸的人终于被压在乱石底下，像一堆烧残的枯炭，而他对于此的解答是“这时没有你的分！”所以他即使有迷惘中的将来的希望，也只是看见了妻和子，并没看见群众。

不但倪焕之，便是那更了解革命意义的王乐山，也并没表现出他做了怎样推进时代的工作。关于王乐山的描写，用的都是侧笔；我们隐约可以推求他的活动，只是不能得到正面的更深切的印象。

七

这便是我所见的《倪焕之》的时代性的分析。我猜想来，大概有许多人因此而不满意这部小说。但在目前这样的时代，在落后的东方，我们便盼望有怎样了不得的伟大作品，岂不是等于“见卵而求时夜”？在目前许多作者还是仅仅根据了一点耳食的社会科学常识或是辩证法，便自负不凡地写他们所谓富有革命情绪的“即兴小说”的时候，像《倪焕之》那样的“扛鼎”的工作，即使有多少缺点，该也是值得赞美的罢！

“五卅”时代以后，或是“第四期的前夜”的新文学，而要有灿烂的成绩，必然地须先求内容与外形——即思想与技巧，两方面之均衡的发展与成熟。作家们应该觉悟到一点点耳食来的社会科学常识是不够的，也应该觉悟到仅仅用群众大会时煽动的热情的口吻来做小说是不行的。准备献身于新文艺的人须先准备好一个有组织力，判断力，能够观察分析的头脑，而不是仅仅准备好一个被动的传声的喇叭；他须先的确能够自己去分析群众的噪音，静聆地下泉的滴响，然后组织成小说中人物的意识；他应该刻苦地磨练他的技术，应该拣自己最熟习的事来描写。去年我做了一篇随笔《从牯岭到东京》，曾经指摘着当时（一九二八年春初）文坛上的“空肚子顶石板”的怪现象，——我以为那是既然顶不起石板，而又压坏了肚子的勾当，我劝那些有志者还不如拣他们自己最熟习的环境而又合于广大的读者对象之小资产阶级来描写，我简直不赞成那时他们热心的无产文艺——既不能表现无产阶级的意识，也不能让无产阶级看得懂，只是“卖膏药式”的十八句江湖口诀那样的标语口号式或广告式的无产文艺。然而结果是招来了许多恶骂。在这黑白不明，是非不明的中国。恶骂原来不算什么一回事。使我吃惊的是，在我所看到的《创造月刊》上克兴君的一篇和《认识》上潘梓年君的一篇，都居然也承认我的那篇随笔中提出了不少的“革命文学”上的具体问题，可是他们都避开了这些问题不讨论，专注于痛骂。我应该追悔我那篇随笔《从牯岭到东京》写得大随便，有许多话都没说完全。以至很能引起人们的误解，或是恶意的曲解。但是看到克兴君说：“至于他的《动摇》呢，据他自己说，‘《动摇》所描写的就是动摇，革命斗争剧烈时从事革命工作者的动摇。’怎么是动摇呢，据茅先生的解释是，‘由左倾以至于发生左稚病，由救济左稚病以至右倾思想的渐抬头，至于大反动。’这种解释从首至尾可是茅盾先生的解释，去年十一二月的客观却完全不然。这时候（去年十一二月）的客观情形

却不是因救济左稚病以至于右倾思想的抬头，终至于大反动，而是旧的高潮发展到一个最高点，封建地主等串通民族资产阶级为保全自己的利益，大施其恐怖政策，小资产阶级虽然在资产阶级底压迫底下，但是一则因革命的高潮同他们本身冲突，二则为恐怖政策所威吓，所以不得不动摇。”我不知道克兴君有没有读过我的《动摇》？如果他是读过的，他总该看出来，《动摇》所描写的时代是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五月，是湖北省长江上游的一个县内的事；这是写得极明白的，然而克兴君却认为是一九二六年的十一二月，徒然的放矢地大骂起来，岂不是大大的笑话！（克兴君该文作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所以他文中的“去年十一二月”，即指一九二七年十一二月）从这一点。可知现在的“批评家”竟也捏造事实，随便改动别人作品的内容以便利攻击，那样的事，也悍然做了，何况把别人的含蓄的文句来一个恶意的曲解呢！在这一点，我就觉得对于恶骂者的辩驳、真是徒费笔墨，所以直到现在，不曾有一句的回答。

至于他们所自负的“革命理论”，——在这方面，克兴君较胜于潘梓年君，——却使我想起我的《幻灭》中所写的“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委员会”中的人物来了。失敬得很，当时的“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委员会”中的人物早已被教会了说这一套话！

八

《从牯岭到东京》这篇随笔里，我表示了应该以小资产阶级生活为描写的对象那样的意见。这句话平常得很，无非就是上文所说一个作者“应该拣自己最熟习的事来描写”的同样的意义。再详细说，就是要使此后的文艺能够在尚能跟上时代的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间有一些儿作用。我并没说过要创造小资产阶级文艺。我虽然不喜欢在嘴上搬弄“革命文学家”所夸炫的一点点社会科学常识或是辩证法，然而我将他们的谈论看来看去，总不曾发见有什么理论是出了我所有的关于那一方面的书籍的范围以外；再说得不客气些，他们的议论并不能比我从前教学生的讲义要多一些什么。所以想拿那一点点辩证法来“克服”我，实在不能领情。因而，从武断我是主张创造小资产阶级文学，又发见了新大陆似的说明小资产阶级文学不能成立，那样的他们的议论，在我是只觉得又听得了卖膏药式的喇叭。

实在当他们忿忿地痛骂我以前，他们对于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文艺已经抱着一种极下应该有的成见。他们对于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作品往往不问内容很武断地斥力“落伍”。自然，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小说中间一定很有些“落伍”的人物，但这是书中人物的“落伍”，而不是该著作的“落伍”。如果把书中人物的“落伍”就认作是著作的“落伍”，或竟是作者的“落伍”，那么，描写强盗的小说作家就是强盗了么？然而不幸这样地幼稚不通的批评居然会见世面！像这样的武断不通的“批评”会引幼稚的中国文坛到一条什么四不像的路，我们很可以拿一九二八年春初的所谓“革命文学”作品来借镜。

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来考量，我们便会承认，即使是无例外地只描写了些“落伍”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品，也有它反面的积极性。这一类的黑暗描写，在感人——或是指导，这一点上，恐怕要比那些超过真实的空想的乐观描写，要深刻得多罢！在读者的判断力还是普遍地很薄弱的现代中国，反

讽的作品常常要被误解，所以黑暗的描写或者也有流弊，但是批评家的任务却就在指出那些黑暗描写的潜伏的意义，而不是成见根深地斥为“落伍”，更无论连原作还看不清楚就大肆谩骂那样的狂妄举动了。譬如克兴君说：“至于《追求》呢，更无容讲是暴露他自己的缠绵幽怨激昂奋发的狂乱的混合物，其余更谈不上”；那便是克兴君连原作还没看清楚就谩骂的狂妄的举动！《追求》所表现的是什么呢，仔细地看过这部小说的人们当会有一个判断；钱杏邨有过一段批评的话：“书中每一个主人公，都有一个憧憬，‘一个追逐一个的在淡黄油漆的四壁内磕撞’，但是，在结果，‘就是到得了手的，却在到手的一刹那间改变了面目’，全部的陷于失望了。”钱杏邨是主张“力的文学”，主张文学须有创造生活的意义的，所以他不满意于《追求》之每个人物都陷于失望，他说：“在全书里是到处表现了病态，病态的人物，病态的思想，病态的行动，一切都是病态，一切都是不健全。作者在客观方面所表现的思想，也仍旧的不外乎悲哀与动摇。所以，这部小说的立场是错误的。”我应该承认钱杏邨的观察是不错的；《追求》是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但是钱杏邨说“这部小说的立场是错误的”这个结论，我却不能赞成。我觉得应该在此地有个小小的说明。《追求》下笔以前，是很费了些工夫来考虑的，最后的决定是差不多这样：我要描写在幻灭动摇以后的一般知识分子是怎样还想追求，然而因为他们的阶级的背景，他们都不曾在正当的道路上追求，所以他们的努力是全部失望。根据了这样的决定，我把书中人物全数支配为徒有情热而不很明了革命意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他们所追求者，都是歧途。像这样的人物不该给他们一个全部失望么？如果在他们中间插进一位认识正路的人，在病态中泄露一线生机，那或者钱杏邨要满意些罢。我应该尚能见到这一点，可是我并不做；因为我相信《追求》中人物如果是真正的革命者，不会在一九二八年春初还要追求什么，他们该是早已决定了道路了。这就说明了《追求》何以全是黑暗的理由。

九

话再回到《倪焕之》罢。

因为也是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所以我觉得《倪焕之》中间没有一个人鼓舞的革命者，是不足病的。再显明他说，主人公的倪焕之虽然“不中用”，然而正可以表示转换期中的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这样有目的，有计划的小说在现今这混沌的文坛上出现，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有意义的事。这样“扛鼎”似的工作，如果有意识地继续做下去，将来我们大概可以说一声：“五卅”以后的文坛倒不至于像“五四”时代那样没有代表时代的作品了。当代的批评多半是盲目的，作家要有自信的精神，要毫不摇惑地冷静地埋着头干！

十

正和先前那篇《从牯岭到东京》一样，这篇随笔也是随便地谈谈，也是有了不少的半句话，可以给人曲解，给人攻击的。受攻击，早已是家常便饭，不过总希望攻击者先看清了文章再下笔，免得我无从作答。我是素来不护短，

也是素来不轻易改变主张的。

又或者这篇随笔里也“提出了许多现实的具体的问题”罢，那么，我更希望“革命的批评家”们不要尽管翻弄卖膏药式的江湖口诀，却来把这些具体问题“从各方面去批评分析”。

直到现在，我还是等待着《从牯岭到东京》中间的“现实的具体的问题”有什么革命的批评家稍稍按捺下骂人的情热而给与一些从各方面的批评和分析！

1929年5月4日。

徐志摩论

—

故诗人徐志摩有一首诗，起句是：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新月》“志摩纪念号”内胡适之的《追悼志摩》一文，谓志摩在时常说这两句。光景徐志摩自己很喜欢这首诗。我们现在就拿来研究研究。这首诗共六章，章四句，而每章首三句都是一样的“章法”，所以全诗实在只有六句。原诗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甜美是梦里的光辉。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负心，我的伤悲。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我们读一遍，再读一遍；我们能够指出这首诗形式上的美丽：章法很整饬，音调是铿锵的。但是这位诗人告诉了我们什么呢？这就只有很少很少一点儿。我们可以说，首章的末句“在梦的轻波里依洄”，差不多就包括了说明了这首诗的全体。诗人所咏叹的，就只是这么一点“回肠荡气”的伤感的情绪；我们所能感染的，也只有那么一点微波似的轻烟似的情绪。然而这是一种“体”，——或一“派”，是我们这错综动乱的社会内某一部分人的生活和意识在文艺上的反映。不是徐志摩，做不出这首诗！如果说志摩是代表的布尔乔亚诗人，大概没有人反对罢？但是我们应该加一点说明：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猛虎集》是志摩的“中坚作品”，是技巧上最成熟的作品；圆熟的外地，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唱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志摩以后的继起者未见有能并驾齐驱，我称他为“末代的诗人”，就是指这一点而说的。

二

比《猛虎集》早了十年光景的《志摩的诗》是志摩的“第一期”作品；志摩在《猛虎集》的序文中自述他这第一诗集“是十一年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减，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是诗人的很忠实的“自我批评”。现在我们再拿这《志摩的诗》来研究，看看志摩的第一期作品和他的成熟期作品（《猛虎集》）除了“诗的艺术或技巧”外，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没有。

我拣取了《婴儿》这一首来做例子。这首诗，据志摩在《自剖》集的第一篇《自剖》中说，那是他在“奉直战争时”，“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那样的时候写成的。（《自剖》集页八）在《落叶》集里第一篇文章《落叶》（这是志摩的讲演稿），志摩又引用了这首诗。光景这首诗也是志摩不能随便忘记的作品，不是随便写写玩儿的。原诗是这样——

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你看她那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她那少妇的安详，柔和，端丽，现在在剧烈的阵痛里变形成不可信的丑恶：你看她那遍体的筋络都在她薄嫩的皮肤底里暴涨着，可怕的青色和紫色，像受惊的水青蛇在田沟里急洄似的，汗珠站在她的前额上像一颗颗的黄豆，她的四肢与身体猛烈的抽搐着，畸屈着，奋挺着，纠旋着，仿佛她垫着的席子是用针尖编成的，仿佛她的帐围是用火焰织成的；

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阵痛的惨酷里变形成魔鬼似的可怖，她的眼，一时紧紧的阖着，一时巨大的睁着，她那眼，原来像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像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她灵魂最后的奋斗，她的原来红色的口唇，现在像是炉底的冷炭，她的口颤着，撇着，扭着，死神的热烈的亲吻不容许她一息的平安，她的发是散披着，横在口边，漫在胸前，像揪乱的麻丝，她的手指间紧抓着几穗拧下来的乱发；

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但她还不曾绝望，她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微，在危崖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死神的逼迫；

她还不曾放手，因为她知道（她的灵魂知道！）这苦痛不是无因的，因为她知道她的胎宫里孕育着一点比她自己更伟大的生命的种子，包涵着一个比一切更永久的婴儿；

因为她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时机；

因为她知道这忍耐是有结果的，在她剧痛的昏瞶中她仿佛听着上帝准许人间祈祷的声音，她仿佛听着天使们赞美未来的光明的声音；

因此她忍耐着，抵抗着，奋斗着……她抵拚绷断她统体的纤微，她要赎出在她那胎宫里动荡着的生命，在她一个完全美丽的婴儿出世的盼望中，最锐利最沉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锐利最沉酣的快感……

这首《婴儿》里的感情和思想，显然不是志摩以后的诗集，——《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内所找得出来的。这是“在怨毒，猜忌，残杀的气氛中，……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自剖》页八）的时候的产物，而且是诗人对于他的“理想”——“婴儿”的出世，尚未绝望时的产物。在技术上，这首《婴儿》是幼稚的，然而在内容，却是“言之有物”，而且没有感伤的色调。

那么，这“婴儿的出世”究竟象征着什么呢？我们先听听志摩自己的解释。在《落叶》第十八页，志摩引用了这首诗后（同时还引用了他的《毒药》和《白旗》），就紧接着说：

这也许是无聊的希冀，但是谁不愿意活命，就使到了绝望最后的边沿，我们也还要妄想希望的手臂从黑暗里伸出来挽着我们。我们不能不想望这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的肥胖的活泼的婴儿出世！

志摩这自注，已经很显明了，可是我们不妨再加以申说：他所谓“苦痛的现在”就指直奉军阀的混战以及国内从民元以来的生民涂炭，因而他所盼望的“洁白的肥胖的活泼的婴儿出世”，就暗指新的政治，新的人生。在讲演《落叶》后两年，志摩对上海光华大学学生讲演《秋》（今有单行本，良友《一角丛书》第十三种），则更有明显的说明：“在我那时带有预言性的想象中，我想象着一个伟大的革命。”就是这样一种盼望使他那时相信“这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

可是志摩在《婴儿》中只描写了“产妇”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只宣言了“这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而对于那“婴儿”却除了一两句抽象的赞颂，例如“比一切更永久”，“未来的光明”，“完全美丽”等等而外，更没有详细的描写。这是一个重要点。究竟志摩所抽象地赞颂的“未来的婴儿”是怎样一个面目呢？在“生产的床上受罪”的产妇——中华民族，那时正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双重的压迫下，中国是封建的并且殖民地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因而这“产妇”所能诞生的婴孩可以假定它或者是资产阶级的德漠克拉西，或者是工农的民主政权；究竟志摩所谓“婴儿”是指的前者呢，或后者？志摩没有明说。然而我们读了志摩的全部作品就知道他所谓“婴儿”是指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德漠克拉西，他见了工农的民主政权是连影子都怕的。

然而年复一年，徐志摩盼望中的“婴儿”竟没有产生下来，“产妇”的受罪却年复一年厉害；有一次好像要“产生”了，却不料是“小产”甚至连“人样”都不像。志摩虽则不是政治经济学者，却也看到中国的资产阶级终于不能从买办资产阶级的原形中蜕化出来成为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因而志摩盼望中的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这“婴儿”，不用说“生产不出来”，并且还没有怀孕，——永远不会怀孕的了！于是志摩也不得不失望了！

他这“失望”的证据就是《志摩的诗》以后的作品：《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

三

《志摩的诗》共计四十一首，长短都有；除了上引的《婴儿》，其余大部分是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的泛滥”。虽然也有些“悲观”的作品，例如《消息》和《谁知道》等篇。但大部分是充满了诗人的“理想主义”和乐观。在《落叶》内，志摩自己说：

“说也奇怪，这几千年历史的传统精神非但不曾供给我们社会一个巩固的基础，我们现在到了再不容隐讳的时候，谁知道发现我们的桩子只是在黄河里造桥，打在流沙里的！难怪悲观主义变成了流行的时髦！但我们年轻人，我们的身体里还有生命跳动，脉管里多少还有鲜血的年轻人，却不应当沾染这最致命的时髦，不应当学那随地躺得下去的猪，不应当学那苟且专家的耗子，（志摩在这篇文章里曾经解释那苟且专家的耗子道：它的天才只是害怕，它的伎俩只是小偷。——盾注）现在时候逼迫了，再不容我们霎那的含糊。……”（《落叶》页三二）

说这样话的徐志摩和《毒药》、《婴儿》等诗是非常调和的。那时，他是中国“布尔乔亚政权”的预言的乐观的诗人。然而他那时的思想也不免太“杂”，——他的一个朋友给他的评语中的所谓“杂”。（见《翡冷翠的一夜》的代序）我们可以举出一个显明的例子来，就是《落叶》里的几句话：

“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在那旗子抖动的声响里我不仅仿佛听出了这近十年来那斯拉夫民族失败与胜利的呼声，我也想象到百数十年前法国革命时的狂热，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那天巴黎市民攻破巴士梯亚牢狱时的疯癫。……自由，平等。友爱！友爱，平等，自由！法国人在百几十年前猖狂的叫着。这叫声还在人类的性灵里荡着。我们不好像听见吗，虽则隔着百几十年前光阴的旷野。如今凶恶的巴士梯亚又在我们的面前堵着；我们如其再不发疯。他那牢门上的铁钉，一个个都快刺透我们的心胸了！”（《落叶》页一九——二）

在这里，志摩不但赞美法国的七月革命，（这是一个可怕的革命，紧接着是皇帝皇后上了断头台，而且有恐怖时代）又赞美苏俄的革命是“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了。无怪志摩的一个朋友要批评他“思想之杂”和“感情之浮”了！而且这“浮”这“杂”，又是多么可怕呀！但这是反映“一个异常的心境”罢了。（语见《落叶》的志摩自序）以后他就没有那么“杂”。他说“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情，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见《列宁忌日——谈革命》；《落叶》页一二六）此外在《自剖》集，在《巴黎的鳞

爪》，还有许多同样的话。这是不足为奇的。可是一方面志摩感情和思想的“浮”和“杂”好些了，一方面他的诗便也失却了勇敢乐观犷悍的色调。自然这两者中间说不上什么因果关系，但有一点却不能忽视，这就是悲痛地认明了自己一阶级的运命的诗人的心一方面忍俊不住在诗篇里流露了颓唐和悲观，一方面，却也更胆小地见着革命的“影子”就怕起来：这是一个心情的两面。也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志摩的作品是中国布尔乔亚心境最忠实的反映！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志摩的作品罢，我们来看《翡冷翠的一夜》，志摩的第二诗集。这和他的第一诗集多么不同呀！这里几乎完全是颓唐失望的叹息。我们举一个例，《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

令夜困守在大沽口外：
绝海里的俘虏，
对着忧愁申诉；
桅上的孤灯在风前摇摆：
天昏昏有层云裹，
那掣电是探海火！

你说不自由是这变乱的时光？
但变乱还有时罢休，
谁敢说人生有自由？
今天的希望变作明天的怅惘；
星光在天外冷眼瞅。
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

我此时在凄冷的甲板上徘徊。
听海涛迟迟的吐沫。
心空如不波的湖水；
只一丝云影在这湖心里晃动——
不曾参透的一个迷梦，
不忍参透的一个迷梦！

这首诗就写出了“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猛虎集》志摩自序）。然而这不过是开端罢了，这《翡冷翠的一夜》中也还有些不很“灰色”的诗，例如那第一首《翡冷翠的一夜》。但这一首太长了，我们另举一首短短的更把诗人的“希望”表现得明显些的《望月》：

月：我隔着窗纱，在黑暗中。
望她从巉岩的山肩挣起——
一轮惺松的不整的光华：
像一个处女，怀抱着贞洁，
惊惶的，挣出强暴的爪牙；

这使我想起你，我爱，当初

也曾在恶运的利齿问捱！
但如今，正如蓝天里明月，
你已升起在幸福的前峰。
洒光辉照亮地面的坎坷！

只有在《猛虎集》中，我们简直找不出什么带些“光明”的诗句来。“怀疑的颓废”到这时完全成熟，正和那些诗的技巧上“成熟”下一样。同是以月亮为题材的《秋月》和《两个月亮》，比之那《望月》是很不同了。在《秋月》这首诗里，志摩描写了秋月的光“展开在道路上”。“飘闪在水面上”，……都是悲哀的颓废的描写；而结尾却又转入了神秘的出世的聊自慰安。那结尾几句是这样的：

听那四野的吟声——
永恒的卑微的谐和，
悲哀揉和着欢畅，
怨仇与恩爱，
晦冥交抱着火电，
在这亘绝的秋夜与秋野的
苍茫中，
“解化”的伟大
在一切纤微的深处
展开了
婴儿的微笑！

《两个月亮》这首诗和那《望月》比着读，就更有意义了。两首诗的章法是相似的，两边都是整整齐齐的两章；两首诗的结构也是相似的，第一章都是描写真实的月亮，第二章却写象征的月亮。但是两首诗里所流露的诗人的“哲理”却是多么不同呀！我们把这首《两个月亮》也抄出来看一看：

我望见两个月亮：
一般的样，不同的相。
一个这时正在天上。
披敞着雀毛的衣裳；
她不吝惜她的恩情，
满地全是她的金银。
她不忘故宫的琉璃，
三海间有她的清丽。
她跳出云头，跳上树，
又躲进新绿的藤萝。
她那样玲珑，那样美，
水底的鱼儿也得醉！
但她有一点子不好，
她老爱向瘦小里耗；
有时满天只见星点，

没了那迷人的圆脸，
虽则到时候照样回来。
但这份相思有些难挨！

还有那个你看不见，
虽则不提有多么艳！
她也有她醉涡的笑，
还有转动时的灵妙；
说慷慨她也从不让人。
可惜你望不到我的园林！
可贵是她无边的法力，
常把我灵波向高里提：
我最爱那银涛的汹涌，
浪花里有音乐的银钟；
就那些马尾似的白沫。
也比得珠宝经过雕琢。
一轮完美的明月，
又况是永不残缺！
只要我闭上这一双眼，
她就婷婷的升上了天！

我们把这首《两个月亮》和那首《望月》比着读，第一使我们感到的是诗人的感情一冷一热，相差很远；第二，在《望月》中，诗人借月亮来宣言“奋斗”的不是徒劳，诗人对于“现实”还有热烈的希望，但在《两个月亮》中，诗人却只表示了这样无力的哲理：“真实”永远有缺陷，“理想”方有“无边的法力”；而他这“理想”却又表现得异常虚无缥缈，我们读了《两个月亮》这首诗的第二章把握不到明快切实的印象。这是蒙了神秘的纱的“理想”！

最后，我们再举一首“暗惨到可怕”的诗来代表《猛虎集》罢。这诗题为《生活》：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扞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四

所以从《翡冷翠的一夜》以后，志摩的诗一步一步走入怀疑悲观颓唐的

“粘潮的冷壁”的甬道里去了。这是大家有眼共见的。志摩的好朋友胡适之也这么承认。但同时还有一个很可注意的现象：志摩作品的数量也跟着减少了。志摩在《猛虎集》自序中说：

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我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这是一个教训。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减，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要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群朋友在《晨报副刊》携行《诗刊》时方才开始讨论到。……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这任何细密的工夫。……。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认识了梦家和玮德两个年青的诗人，他们对于诗的热情在无形中又鼓动了我的诗心，第二次又印《诗刊》，我对于诗的兴味，我信，竟可以消沉到几乎没有。……

这一段话是志摩十年创作生涯的小史，很有价值的自白。《翡冷翠的一夜》（诗集）印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志摩有一篇“代序”，也说“狂妄的虚潮早经消退，余剩的只一片粗劣的不生产的砂田，在海天的荒凉中自艾。……我如其曾经有过一星星诗的本能，这几年都市的生活早就把它压死。这一年我只淘成了一首诗，前途更是渺茫”！依这两段话来推算，志摩诗情横溢的时期就只民国十一到十二年这两年的工夫；以后就逐渐“枯窘”了。他自己把这“枯窘”的原因归之于“生活的平凡”；归之于敛才就范的“讲究诗的艺术和技巧”——就是不肯乱做；然而这是真正的原因么？我以为不是的。对于这种“唯心的”解释，我们不能满足。

我们先看“生活的平凡”是否志摩诗情枯窘的原因。

诗，和其他艺术作品一样，是生活的产物；所以“生活的平凡”会影响到诗情而终于“向瘦小里耗”，这话原也相对的正确。但是“生活”这一词的意义，决不是仅指作家个人的私生活，也包括了社会生活在内。诗这东西，也不仅是作家个人情感的抒写，而是社会生活通过了作家的感情意识之综合的表现。所以一位诗人假使不是独居荒岛而尚与复杂万变的的社会生活相接触，那么，虽然他个人生活中没有大波浪，他理应有题材而不会感到诗情的枯窘。志摩近年来并没躲在荒岛上过隐士的生活，而他所在的社会却又掀起了惊天动地的大风浪，生活实在供给了志摩很多的诗料。然而志摩却以诗情枯窘自悲了！难道是志摩“才尽”，所以不能从生活中摄取诗材了么？当然不是的。我以为志摩诗情的枯窘和生活有关系，但决不是因为生活平凡而是因为他对于眼前的大变动不能了解且不愿意去了解！他只认到自己从前想望中的“婴儿”永远不会出世的了，可是他却不能且不愿承认另一个“婴儿”已经呱呱堕地了。于是他怀疑颓废了！他自己说“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就是最好的自白。因为他对于社会的大变动抱着不可解

的怀疑，而又因为他是时时刻刻不肯让绝望的重量压住他的呼吸，他要和悲观和怀疑挣扎（看他的《自剖》集页五一，及《猛虎集》自序最后一段），而且他又再不肯像最早写诗那时候把半成熟未成熟的意念都“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于是他就只有“沉默”的一道了！这是一位作家和社会生活不调和的时候常有的现象。

可是志摩的“单纯信仰”又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一点，有过胡适之的解释了。胡适之先生在《追忆志摩》中说：“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正如易卜生的诗剧 Brand 里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间处处碰钉子，碰的焦头烂额，失败而死。”（《新月》四卷一期《志摩纪念号》）胡先生这解释我不能同意。我以为志摩的单纯信仰是他在作品里（诗集《志摩的诗》和散文《落叶》，《自剖》等）屡次说过的一句抽象的话：“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这就是他“曾经有过的”单纯信仰！他的第一期作品就以这单纯信仰作酵母。我以为志摩的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把它当作单纯的情诗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一旦人生的转变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且超过了 he 期待的耐心，于是他的曾经有过的单纯信仰发生动摇，于是他流入于怀疑的颓废了！他并不像 Brand 那样至死不怀疑于自己的理想。（一九二八年元旦的《申报》纪念文中有他的一篇文章，怀疑的色彩很浓；“把理想砍成小块，放在希望的火上慢慢地煨”，——有那样意思的话）

并且志摩的怀疑，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近年来的布尔乔亚学者谁不被怀疑的毒蛇咬着心呀？只不过志摩是坦白的天真的热情的，所以肯放声大叫罢了！不但是中国的布尔乔亚学者。西欧的布尔乔亚学者不是也怀疑了他们的文化生活社会组织么？虽然他们死不肯转换方向看一看，但是他们的怀疑却忍俊不住了！即使是意大利的法西斯蒂的“哲学家”Senator Giovanni Gentile 也不能不苦痛地自白“精神破产”了。

心目中的“婴儿”既已绝望，“光荣的将来”又愈看愈远，于是徐志摩由单纯信仰而流入了怀疑的颓废，于是他的诗的产量“向瘦小里耗”，于是即使呕心血吐出几句来也无非是悲观失望，暗惨得可怕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躲一下：艺术至上主义！这里，我们就要讨论到“诗的艺术或技巧”的研求是否成为志摩作品稀少的一个原因了。

这显然不是的。向技巧的完美方面研求，并不影响到诗情因而至于枯窘：这有古今中外许多诗人的创作经验可以为例证。所以这是不成理由的。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诗人和社会生活不调和的时候，往往遁入艺术至上主义的“宝岛”。志摩虽也一度进去，可是他自己说他“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他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换一句话说，他虽然时时感到“不能抵抗，再没有力量”（见志摩的讲演稿《秋》），他还不肯一头逃到那“宝岛”死

Brand 即《布朗德》。

senator Giovanni Gentile 英译名秦梯利（1875—1940），又译金蒂雷。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编辑。

不出来，他在那里徘徊，直到死。

五

我觉得新诗人中间的志摩最可以注意。因为他的作品最足供我们研究。他是布尔乔亚的代表诗人。他最初唱布尔乔亚政权的预言诗，可是最后他的作品却成为布尔乔亚的“Swan-Song”！他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的政治意识非常浓烈。我们再看他在一九二九年（？）的一篇讲演《秋》（良友《一角丛书》第十三种，在志摩死后出版的），那中间有几句：

我借这一首不成形的咒诅的诗（指《毒药》——盾注），发泄了我一腔的闷气，但我却并不绝望，并不悲观，在极深刻的沉闷的底里，我那时还摸着了希望。所以我在《婴儿》——那首不成形诗的最后一节——那诗的后段，在描写一个产妇在她生产的受罪中，还能含有希望的句子。

在我那时带有预言性的想象中，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因此我在那篇《落叶》的末尾，我还有勇气来对付人生的挑战，郑重的宣告一个态度，高声的喊一声：

“Everlasting Year！”……

一年，一年，又过去了两年。这两年间我那时的想望有实现了没有？那伟大的“婴儿”有出世了没有？我们的受罪取得了认识与价值没有？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的还只是那一大堆丑陋的蛮肿的沉闷，压得瘁人的沉闷，笼盖着我的思想，我的生命。它在我的经络里，在我的血液里。我不能抵抗，我再没有力量。

看了这样的话，能够不对于徐志摩的“沉闷”同情么？不差！许多人同情他。但是我们却觉得同情是无聊的，我们要指出来：徐志摩的生活所产生的思想意识，必不可免地要使他感得这沉闷，而且不能抵抗，再没有力量！并且他的生活，他的阶级背景，——他的思想意识又不容许他看见那沉闷已破了一角，已经耀出万丈的光芒！

最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徐志摩在《猛虎集》的自序中又告白了他的“复活的机会”。他说：“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错走了路。”

然而他就不幸死了。我们没有看见“复活”后的他走了怎样的路。这是一个谜，我们不便乱猜。只是我却联带想起德国的法西斯蒂“学者”Otto Bauor 在《世界的精神危机》一文中很痛苦地表白了资本主义文化已经死灭、不能再开花；而墨索里尼虽然努力打算培植出“他”的文学，可是在意大利文坛上占势力的却还是外国的作品，并不是墨索里尼的文学！这真是一件扫兴的事呀！

“Swan-Song”英语。意即最后的一部。

“Everlasting Year”英语。意即长存的一年。

Otto Bauor 英译名鲍尔（1881—1938），又译鲍维尔，奥地利议员，社会民主党主要理论家。

百年来的布尔乔亚文学已经发展到最后一阶段，除了光滑的外形和神秘缥缈的内容而外，不能再开出新的花来了！这悲哀不是志摩一个人的！

1932年12月25日。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时候，还没有“新文学”的创作小说出现。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出现的时候，也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其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一月，《新潮》杂志发刊以后，小说创作的“尝试者”渐渐多了，然而亦不过汪敬熙等三数人，也还没有说得上成功的作品；然而“创作”的空气是渐渐浓厚了。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一月，《小说月报》也革新了，特设“创作”一栏，“以俟佳篇”；然而那时候作者不过十数人，《小说月报》（十二卷）每期所登的创作，连散文在内，多亦不过六七篇，少则仅得三四篇。而且那时候常有作品发表的作家亦不过冰心，叶绍钧，落华生，王统照等五六人。

那时候（民国十年春），《小说月报》每月收到的创作小说投稿，——想在“新文学”的小说部门“尝试”的青年们的作品，至多不过十来篇，而且大多数很幼稚，不能发表。

然而年青的“尝试者”在一天一天加多，却是可以断言的！

那时候，除《小说月报》以外，各杂志及各日报副刊上发表的创作小说，似乎也下很多。据民国十年四月《小说月报》所载的不完全的统计（郎损《春季创作坛漫评》，《小说月报》十二卷四号），那年的一月到三月，发表了的创作短篇小说约计七十篇；其中有不少恐怕只能算是“散文”。到了那年的七月，《小说月报》又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郎损《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十二卷八号），则四月到六月的期间，短篇小说的创作已有一百二十多篇，比春季增加了一倍光景。这一点不完全的统计，就证明了那时候“创作”在一天一天热闹起来。

自然，那时候发表了的创作小说有些是比现在各刊物编辑部积存的废稿还要幼稚得多呢，然而在那时候有那么些作品发表，已经很难得。现在我们这“文坛”，比起十多年前，可以说是“进步”得多了罢？现在我们差不多每个月看得见有希望的新作家出现，现在我们所见一个月里的在水平线以上的作品有从前一年的总数那么多；我们觉得现在这点儿“成绩”还是贫弱，我们要求更多的表现生活各方面的作品，我们要求“伟大的作品”，然而回顾十多年前的“文坛”，我们不能不承认十多年来我们这“文坛”是有了进步的。

而这进步的过程是很长很长一条路。从“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看，这条“路”的起点，——一些早起者所留下的足迹，是值得保留，研究、而且来一次十年的总结。

民国六七年的时候，好像还没有纯然文艺性质的社团。那时的《新青年》杂志自然是鼓吹“新文学”的大本营，然而从全体上看来，《新青年》到底

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他们对于文学的议论。他们的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他们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的作物——旧文艺。

这是“五四”文学运动初期的一个主要的特性，也是一条正确的路径。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十一月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这是最早的一个纯文艺的社团，然而这一个团体发起的宗旨也和外国各时代文学上新运动初期的文学团体的创立很不相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并不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学理论要宣传鼓吹。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宣言中说“有三种意思，要请大家注意”：

第一，是“联络感情”。“中国向来有文人相轻的风气，因此现在不但新旧两派不能协和，便是治新文学的人里面，也恐因了国别派别的主张，难免将来不生界限。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

第二，是“增进智识”。

第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一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这虽然是将来的事，但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希望。”

这个宣言，是公推周作人起草的。宣言发表的时候，有十二个人署名，就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在这一个宣言里，只有第三项略略表明了文学研究会对于文学的态度，这态度在今日看来，自然觉得平淡了，但在那时候这正是新文学运动的纲要之一，并且和那时候一般的文化批判的态度相应和。

“五四”时代初期的反封建的色彩，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反”

了以后应当建设怎样一种新的文化呢？这问题在当时并没有确定的回答。不是没有人试作回答，而是没有人的提案能得普遍一致的拥护。那时候，参加“反封建”运动的人们并不是属于同一的社会阶层，因而到了问题是“将来如何”的时候，意见就很分歧了。然而也不是没有比较最有势力的一种意见，这就是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这是对于“将来如何”一问题的一种态度，——或者也可以说是躲避正面答复的一种态度。这不是答案。然而这样的态度的产生有它社会的根据，这是代表了最大多数的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的智识者的意识的。同时这种意识当然也会反映到文艺的领域。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所表示的对于文学的态度就是当时普遍现象的一角。

所以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自始即不曾提出集团的主张，后来也永远不曾有过。它不像外国各时代文学上新运动初期的一些具有确定的纲领的文学会，它实在正像它宣言所“希望”似的，是一个“著作同业公会”。

因为只是“著作同业公会”的性质，所以文学研究会的简章第九条虽有“本会会址设于北京，其京外各地有会员五人以上者，得设一分会”之规定，而且事实上后来也有几个分会；而且分会也发刊了机关报，然而这决不是“包办”或“垄断”文坛，像当时有些人所想像。

同时也因为只是“著作同业公会”的性质，所以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从来不曾有过对于某种文学理论的团体的行动，而且文学研究会对于它的会员也从来不加以团体的约束；会员个人发表过许多不同的对于文学的意见，然而“团体”只说过一句话，就是宣言里的“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这一句话，不妨说是文学研究会集团名下有关系的人们的共通的基本的态度。这一个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这个态度，在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落华生，以及其他许多被目为文学研究会派的作家的作品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

三

现在我们回顾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这五年的期间（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总会觉得那时的创作界很寂寞似的。作者固然不多，发表的机关也寥寥可数。然而我们再看看那时期的后半的五年（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六），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从民国十一年起（一九二二），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来到！

因为材料的缺乏，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把那时候全国的文艺的活动绘一幅比较详备的“鸟瞰图”；可是我们仅仅从那时候《小说月报》（十四卷到十六卷）的《国内文坛消息》栏的记载，已经可见当时的盛况。

这一时期，是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蓬勃滋生的时代。从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到十四年（一九二五），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余——

在北京，有曦社（民国十一年），发刊了不定期刊《燭火》；有浅草社（民国十二年春），出版《浅草季刊》；有春光社（民国十二年春）；有星星文学社，出版《文学周报》（十二年八月）；有婴孩社（十二年十月），出版了二月刊《婴孩的》，和《星花》半月刊（均在十三年春）；有鬻策社（平民大学学生的组织，十二年冬），定期刊《鬻策》；有雪花社及《雪花》不定期刊（十三年十月）；有以“研究现实的人生，挽救浪漫文艺的堕落”的劳动文艺研究会（十三年九月），出版《火球》旬刊；有北京大学学生及上海南方大学学生共同组织的八月文学社（十三年八月）；有蔷薇社（约在十二年）；有《疏星》半月刊（十四年六月）；《微波》旬刊（时间同上）；有中法大学西山学院学生组织的百山文社（十四年一月）；而上举之浅草社除已出版《浅草季刊》及《文艺旬刊》外，在十四年春又改出了《沉钟》周刊。

在天津以及河北省其他各地，有绿波社（十二年五月，天津），先出了不定期刊《诗坛》，随后（同年八月）又出版了《绿波旬刊》和《小说》两种；有第六师范（冀县）的文学研究会，出版《微笑周刊》（十二年十一月）；有南开学校（天津）的文学会，出版《文学》半月刊（十三年五月）；又陕西榆林中学学生（？）所办的《姊妹》旬刊和《榆林》旬刊也都附在天津《民意报》，作为副刊之一种。

在江苏省，有南京的玫瑰社（十二年春），季刊《心潮》（由上海民智书局发行）；无名作家社（南京第四师范，十二年秋）；诗学研究社（东南

大学学生，十二年十一月），出版了《诗学》半月刊；又有南通的文艺共进社（十二年春），刊物名《嫩芽》（同年四月）；月潮社（南通代用师范附小，十三年秋），出版《月潮》半月刊；有苏州的晓光社（十一年十月，第一师范），季刊《晓光》及半月刊《酸果》；松江的弥洒社（十二年春），出版有《弥洒》月刊；文艺社出版了《文刊》（十三年八月）。此外在无锡有湖波社（十二年），曾刊行《湖波杂志》；在扬州有第五师范学生组织的梅花社，出版了《冰花》（十二年十一月），及《文艺》（第五师范学艺部与梅花社的联合刊物，十三年三月）；在徐州有春社（徐东中学，十三年春），出版了《春的花》。

至于上海呢，除了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的《文学旬刊》（先附在《时事新报》内，后改周刊，独立发行），创造社先后办过《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及《创造日》。十三年初田汉个人办了南国社，发刊了《南国》（半月刊）。这是大家比较知道的。此外，尚有北京浅草社的上海社员办过《文艺旬刊》（十二年八月，附上海《民国日报》发行）；神州文学社出版过《文学季刊》（十二年九月）；东风社（十三年春）出版过《东风季刊》；青凤文学社及湖波文艺社（都是上海大学学生的组织，十三年春）；爱美文学社（国立自治学院学生组织，十三年七月）；济美社的《济美》（十三年四月）；飞鸟社的《飞鸟》月刊等等。

浙江方面，宁波最为热闹；十一年秋就有了春风周报社的《春风周报》，内分青年与儿童两部，后来有《文学》周刊（附《四明日报》内，十三年秋），有日月文学社的《日月旬刊》（时间同上），有第四中学学生组织的《曦社》（时间同上）；有春风学社（十三年七月），飞蛾社（亦为四中学生组织），有定期刊《飞蛾》（十三年五月）。在杭州有片月诗社（十三年六月），悟社（之江大学学生组织，以提倡革命文学为宗旨，十三年四月），以及赤社之不定期刊《赤报》。在嘉兴有秀州文学会（秀州中学）的定期刊《碧漾》（十二年六月），在台州有第六中学知社的半月刊《知》（十三年七月），在绍兴有爱美文艺社的月刊《爱美》（十三年九月），又有第五中学师范部的半月刊《微光》（十四年秋）。

在广东，广州有文学研究会分会及刊物《文学旬刊》（十二年八月）；潮汕方面有火焰文学社的周刊《火焰》（十二年八月），有晨光文学社（潮州，金山中学，十二年九月），其后（十三年十一月）火焰文学社又有刊物《心声》；在海丰有萤光社（十三年春）；在汕头又有彩虹文学社的《彩虹》周刊（十二年十一月）；潮州有伏虎学社（亦在金山中学），定期刊为《谷风》（十四年一月）。

在湖南，长沙是中心，团体及出版物有《微光》（十二年九月），嶽云文艺社的《文艺》（十二年），鸡鸣社（长沙一中）的《鸡鸣》（十三年七月），湖光文学社的《湖光》（十三年春），《晨曦周报》（湖南旅鄂中学学生的刊物，附长沙的《湘报》发行，十三年三月），旭光社的《旭光》半月刊（十三年二月），晨社的《晨光》（十三年二月），教会学校学生所办的《麦华》（十三年二月）半月刊，还有嶽云中学文学研究会编辑而附在天津《民意报》出版的《卿云》（十四年末），心花社（华中美术学校）的不定期刊《心花》（十四年五月），长沙绿波社社员的《潇湘绿波》（十四年一月），攸宁学会的《攸宁》（十四年二月）。此外只有湘潭有一个绿野社，出版了《绿野》（十三年十二月）。

四川最早的文学团体好像是草堂文学研究会（成都，十二年春），有月刊《草堂》，出至四期后便停顿了，次年一月又出版了《草堂》的后身《浣花》。又有定期刊《小露》（十二年），似非同人杂志。成都以外，泸县（川南师范）有星星文艺社，定期刊为《星星》（十三年），又有零星社的《零星》（十二年）；重庆有《南鸿周刊》（十四年二月）。

云南当十二年四月间就有周刊《翠湖之友》。其后又有云波社的《云波旬刊》（昆明，十三年五月），联合中学学生办的《孤星周刊》（十三年五月），一中学生办的《滇潮》（非纯文艺），以及好像是教员们办的《心华》（十三年一月，成德中学）。又有《澎湃》（十三年）好像也不是青年学生作的主体。

河南及湖北两省，似乎差些。十三年八月有《中州文艺》出世，但好像是旅外的河南人所办，编辑在天津。此外，中州大学的文艺研究会有《文艺》（十四年九月），开封二中的微实学社有《荆野》（十四年尾），临颖的飞霞文学社有《飞霞》（十四年三月）。湖北是武昌作为中心，有星野社的《星野》（《江声日报》副刊，十三年九月），鞞声文艺社的小型月刊（仅一单张）《鞞声》（十四年四月），以及武昌大学艺林社的《艺林旬刊》（十四年一月）。

此外，在东北有很早成立的白杨社（吉林，十二年九月成立，穆木天等三人主持；以“发表文艺的创作，促进吉林新文坛”为宗旨），到了次年二月刊物《白杨文坛》出世，由天津《新民意报》附送。同时奉天方面亦成立了东光社，以“研究国故，提倡东三省新文学”为宗旨，出版了《东光周刊》，继续至廿一期。东光社的基地似在新民的文会中学。十三年五月，吉图县又有绿意诗社，有定期刊《绿意》。又有启明社之《启明》（十三年四月，《新民意报》副刊）。奉天的基督教青年会也办了半文艺的《奉天学生》（十三年四月）。在江西省，有乐平星社的《洎声》（十二年），南昌心弦社的《心弦》（十三年），又有非卖品的《呐喊》（南昌，十四年五月）。在安徽黔县，有芙蓉社的定期刊《芙蓉》（十二年三月）。在山西有国立山西大学曙社的半月刊《醒狮》（十四年一月），太原有红光文学社的《红光》。又在青岛，出版过《青痕》。

上面这些材料，根据了《小说月报》各期的《国内文坛消息》，而当时《小说月报》则只据收到的刊物或通讯，未尝有意地去搜集，因此实际上从民国十一年到十五年这时期内全国各地新生的文学团体和刊物也许还要多上一倍。然而即就此不完全的材料看来，已经见得当时整个中国到处有新文学活动的踪迹。

这一大活动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以及职业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团体和刊物也许产生了以后旋又消灭（据《星海》上册的附录，则在民国十三年上半季全国的文艺刊物尚有周刊十五种，旬刊十种，半月刊二种，月刊三种，季刊十种，不定期刊十三种，共五十三种，自然这统计也不完全，只据了《星海》编者所见到的而已），然而他们对于新文学发展的意义却是很大的。这几年的杂乱而且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

四

民国十年八月的《小说月报》有一篇文章分析那时候大多数的创作小说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生活（《小说月报》十二卷八号，郎损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自然，这篇文章所根据的材料只是那一年的四五六三个月，而且在此三个月的范围内也一定有不少作品未为郎损所及见；然而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期恰恰正当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与后半期的交点，所以我们不妨把它的分析，作为前半期的研究的基础，从而更与后半期的创作比较一下。

这一篇文章根据了那时候三个月中间已发表的小说一百二十余篇来研究它们的题材，思想与技术。作者所用的方法是“类别这三个月里的创作，显出它们各所描写的社会背景的一角，然后再考察同属于一类的创作有什么共同色彩与中心思想、描写的技术可有几个不同的格式”。于是第一，他告诉我们的，是一百二十几篇小说在题材的分野上——

属于男女恋爱关系的，最多，共得七十余篇；

农村生活的，只有八篇；

城市劳动者生活的，更少了，只得三篇；

家庭生活的，也不过九篇；

学校生活的，五篇；

一般社会生活的（小市民生活），约计二十篇。

但是，写到一般社会生活的二十篇，实际上大多数还是把恋爱作为中心，而“描写家庭生活的九篇，实在仍是描写了男女关系”——恋爱，所以“竟可说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全数百分之九十八”了。因而作者的结论是；大多数创作家对于农村和城市劳动者的生活很疏远，对于全般的社会现象不注意，他们最感兴味还是恋爱，而且个人主义的享乐的倾向也很显然。

那么，占了总数百分之九十八的恋爱小说写得怎样呢？

作者告诉我们：那时候最多的恋爱小说不是写婚姻不自由，便是写没有办法解决的多角恋爱。然而两者有一个共同的毛病，观念化。“人物都是一个面目的，那些人物的思想是一个样的，举动是一个样的，到何种地步说何等话，也是一个样的”。这些恋爱小说内的主角大抵不是作家自己就是他的最熟悉的伴侣，可是一搬上纸面尚不免观念化，无怪那极少数的描写农村生活和城市劳动者生活的作品更其观念化得厉害！

郎损这批评，也许是太苛刻了一点。我们知道第一个“十年”前半期的创作很有一些是在他的批评的例外的。就拿那些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作品来看罢，落华生的几篇（《命命鸟》，十二卷一号；《商人妇》，十二卷四号；《换巢鸾凤》，十二卷五号）。都是穿了恋爱的外衣而表示了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冰心女上和叶绍钧的作品企图解答人生是什么。不过郎损的批评在指出那时候创作方面最普遍的现象这一点上，是值得注意的。他这不完全的“考察”至少已经触到了那时候（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创作界的两个很重大的缺点了。这两个缺点，第一是几乎看不到全般的社会现象而只有个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第二是观念化。

这两个缺点，当时有许多人注意。怎样克服这些缺点呢？许多人的见解并不一样。从当时的青年群内（包括了青年的作者和读者）发出来的最普遍的呼声只是很干脆的一句话：让它自由发展就好了！（《小说月报》十三卷

各期的通讯栏内就记录着一部分这样的现象。)但是空空洞洞一句“让它自由发展”显然不是当时实际所需要。十二卷七号的《小说月报》有特别的一栏——“创作讨论”，企图把这问题更具体的研究一下。参加这讨论的，共有九位，在现今看来，其中有一位署名说难的《我对于创作家的希望》最为切实了(这位说难，记起来好像就是胡愈之)。他这篇文章指出了作家们除“感情的锻炼修正和艺术力的涵养之外，实际社会是不能不投身考察的。文学(广义)中之文法语法方面，是不能不分心研究的。旧来之语体小说，是不能不参考的。新闻纸第三面的纪事，是不能不多看的。而且街谈巷议和许多外行人的议论，也是不能不虚心听受的。”可是当时青年的创作家或有志于创作的青年却不耐烦下那样的水磨工夫，当时一般的风气是灵感一动振笔直书，而且认为既是灵感的产物就一定不会不好。

当时评坛方面没有继续不断地指出这种刻苦的“水磨工夫”的必要，自然也是个很大的错误。然而创作界的贫弱单调在当时也还另有原因。在客观上，当时一则西洋文学名著被翻译介绍过来的，少到几乎等于零，因而所谓“学习技巧”云者，除了能读原文，就简直谈不到；二则.普遍于全国的新文学大活动还没起来，广大的青年群众内的文艺才能尚未觉醒。在主观上，当时的青年作家大多数是生活单调的学生，生活以及由生活产生的他们的意识，一方面既限制了他们的题材，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他们的觅取题材的眼光。第一个“十年”前半期的创作界之所以寂寞而单调，不外是这一些原因。

倘使我们将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当作一条界线，那么，即使在《小说月报》的范围内，我们也就看见了那“界线”之后(民国十一年，《小说月报》十三卷)，已经有些新的东西。

我们看见了描写学徒生活的《三天劳工底自述》(利民，《小说月报》十三卷六号)，我们又看见了描写年青而好胜的农村木匠阿贵的悲哀的《乡心》(潘训，《小说月报》十三卷七号)，我们又看见了很细腻地表现了卖儿女的贫农在骨肉之爱和饥饿的威胁两者之间挣扎的心理的《偏枯》(王思玷，《小说月报》十三卷十一号)，我们又看见了巧妙地暴露世俗所谓“孝道”的虚伪的《两孝子》(朴园，见同上)。这几篇，不但在题材上是新的东西，就是在技巧上也完全摆脱了章回体旧小说的影响，它们用活人的口语。用“再现”的手法，给我们看一页真切的活的人生图画。这几篇小说的作者像彗星似的一现就不见了(利民和朴园各人只有一篇，王思玷写过七八篇，最早的一篇是发表在《小说月报》十二卷十二号征文栏的《风雨之下》，到一九二四年以后就不见他了，潘训总共只做了九篇，都收在《雨点集》内，一九二五年以后也就不见他再作)，他们留给我们的，很少，可是单单这少数的几篇也就值得我们再来提起了。

许多面目不同的青年作家在两三年中把“文坛”装点得颇为热闹了。自然，这所谓“热闹”，比起最近五年来(比方说，一九三〇到三四年罢)，是远不及的，但比起一九二二以前的五年来，正犹最近的五年(说是新文学史上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期罢)，比那时(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要热闹得多一般。那时有满身泥土气的从乡村来的人写着匪祸兵灾的剪影(如同徐玉诺)，也有都市的流浪者声诉他“孤雁”似的悲哀(如同王以仁)，也有渴慕“海”的自由者“疯人”似的说教(如同孙俚工)。也有以憎恶的然而同情的心描写了农村的原始性的丑恶(如同许杰)。创作是在向多方面发展了。题材的范围是扩大得多了。作家的视线从狭小的学校生后以及私生

活的小小的波浪移转到广大的社会的动态。“新文学”渐渐从青年学生的书房走到十字街头了。然而是在十字街头徘徊。

这一时期，两种不同的对于“人生”问题的态度，是颇显著的。这时期以前——“五四”初期的追求“人生观”的热烈的气氛，一方面从感情的到理智的，从抽象的到具体的，于是向一定的“药方”在潜行深入，另一方面则从感情的到感觉的，从抽象的到物质的，于是苦闷彷徨与要求刺激成了循环。然而前者在文学上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只成了冷观的虚弱的写实主义的倾向；后者却热狂地风靡了大多数的青年。到“五卅”的前夜为止，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即使外形上有冷观苦笑与要求享乐和麻醉的分别，但内心是同一苦闷彷徨。走向十字街头的当时的文坛只在十字街头徘徊。

现在，我们回顾第一个“十年”的成果，也许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新文学运动”的初期跟外国的有点不同？在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开过浪漫主义的花，也没有结写实主义的实；我们的初期的作品很少有反映着那时候全般的社会机构的；虽然后半期比前半期要“热闹”得多，但是“五卅”前夜主要的社会动态仍旧不能在文学里找见。

这一个问题，大概要分做两半截来看。第一，假使承认“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运动，则此一运动弄得虎头蛇尾。第二，“五卅”虽然激动了大部分的青年作家，但他们和那造成“五卅”的社会力是一向疏远的，——连圈子外的看客都不是。“生活”的偏枯，结果是文学的偏枯：目前我们大概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了。

五

本书选载的作品，就限于上面所说的第一个“十年”里发表过的。而且按照出版家的计划，本书的材料主要的是文学研究会各位作家的作品。

也有并没加入过文学研究会，可是亦未必属于别的文学团体，而且除在一九二六以前的《小说月报》或《文学周报》发表了几篇作品以后，近来久已不见，而这些散见的作品亦未有单行的结集，——现在也选在这本书里。这就是利民的《三天劳工底自述》，王思玷的《偏枯》等三篇，朴园的《两孝子》，张维祺的《赌博》，以及李渺世的《搬后》等两篇。

也有的是他本人已有单行本的短篇集，早先也是什么文学团体的分子（照出版家的计划，这就应当归入本丛书的《小说二集》），但是一则因为分别搜集的缘故，二则作风上和本书全体是调和的，于是也就选进了。这就是王任叔的《疲惫者》，李劫人的《编辑室的风波》，许志行的《师弟》，以及其他。

材料范围已经交代清楚，现在再说几句编选后的感想罢。

首先，是四位久已不见了的作家：利民，王思玷，朴园，李渺世。这四位，很早就写小说，而且恐怕只有《小说月报》发表过他们的作品（或者说，他们发表了的作品，只有《小说月报》上那几篇）。他们在那时候，自然是所谓“无名作家”。他们的身世，我们不大了了，只知道利民和朴园那时住

作者原注：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我，王鲁彦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我把他漏掉了。于是想到记错或漏掉的，一定还有。至于王鲁彦，则本丛书的《小说二集》已经有，省点事，我不去要求“移交”了。因为我这里也侵犯着《小说二集》的管辖权呵！

在北京（我记得他们的稿子是从北京寄的），王思玷大概是山东人（我记得他的稿子都从枣庄寄的），而李渺世则在陇海路的观音堂车站（？）做事。后面两位投到《小说月报》社的稿子，大概还不只那已发表的几篇，就拿已发表的来说，有的写得并不好，有的却实在不坏。他们的作品在当时一般的作品中间，我以为有值得注意的两点，就是题材方面不是单调的学校生活和恋爱，技巧方面也有自己创造的地方。

《三天劳工底自述》（利民）那样的作品放在今日的文坛也许并不出奇，但在十一年（一九二二）上半年，它是“奇货”；因为它并不发议论（在作品中间装进一套新思想的议论是那时的流行风气），然而旧式作坊里学徒生活的黑暗，旧式作坊掌柜对于“念过书的孩子”的不欢迎，——一般手艺人对于“念书”这事的特别观念，都表现得很亲切，很生动，而且它的文字也不是“文中之白”（这又是那时的流行品），而是道地的“口语”，它的对话是活人嘴巴里的后，很切合篇中“人物”的身份。在这短短的一篇里，至少有三十“人物”写得不算不成功，就是管帐的陈先生，“小师叔”和“师哥定儿”。定儿写得尤其好。他这个被损害了的孩子，手艺还没学得半点，却已接受了掌柜的以下直到“小师叔”这般人的“意识的衣钵”。我们同时觉得这定儿有点讨厌，却又对他十二分同情。而这一切，作者都从琐细然而真切生动的“人物”的动作中表现了出来，并没用过半句的抽象的“议论”。作者大概并没发心思做“文学家”，他写了这一篇，以后不再写了；这一篇发表是发表了，但并没引起注意。因为那时大家正热中于“人生观”，——觉得一篇作品非有个簇新的中心思想不可，像《三天劳工底自述》那样的作品，自然会被轻轻滑过。当时此种“注重思想”的倾向，压力是很大的；我虽然把这篇《三天劳工底自述》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却并没替它“鼓吹”。那时我也是“问题小说”的热心人。

同样以个人自身的经验为题材，而且这题材也是跨过了学校生活和恋爱关系这狭小而被用滥了的范围的，在《小说月报》十三卷三号（民国十一年三月）上还有李开先作的一篇《埂子上的一夜》。这是描写四川的“棒老二”绑人勒索。这用进了不少的“黑话”。这是努力想表现“异样情调”的。作者李开先大概是“研究文学”的入罢（他那时是北大学生），他有翻译，他这篇《埂子上的一夜》也用了吻合“人物”身份的活生生的对话，——这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不过他写那几个绑匪写得并不好，那个“满脸煤灰的老二”也不能在我们脑筋上留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象。他这小说中唯一的主角是被绑的“我”，他也企图描写这个“我”的心理，可是不大成功。他又颇有说明那产生“棒老二”的四川的特殊社会背景的企图（这一点是重要的），然而他只观念的地从那个“我”的“胡思乱想”中点逗了几句，显然太不够了。这一篇，我没有选取；但是我这里特地说到它，想借它来指出那时候曾有不少的青年作家在找取广大的社会现象来描写，然而太不注意到他那题材中所包含的“问题”，结果便也和太热心于“提出问题”犯了同样的失败。

所以要点不在一位作家是不是应该在他的作品中“提出问题”，而在他是不是能够把他的“问题”来艺术形象化。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朴园的《两孝子》是那时候比较成功的作品。《两孝子》的题材是当时流行的问题之一——“形式的虚伪的孝”。作者用了很轻灵的笔触写出社会所认为“孝”的儿子只是“形式的虚伪的”，而社会所认为“不孝”的儿子却实在真懂得怎样去“孝”。这一篇作品，很有巴尔干那些小国的作品的风味：轻灵嫵娜，

有野花似的香气。它那完全是口语的很美丽很自然的文字，那独特的创造的技巧，似乎即在今日也还是难得的。

王思玷最早的作品是《风雨之下》（《小说月报》十二卷九号）。这是应征文。小说月报社在十二卷五号用“风雨之夜”的题目征求短篇小说或长诗。王思玷的一篇就是入选的五六篇中之一，是用一个老农的自述描写农民在自然界的两个死对头——风和雨。作者对于农民生活的熟悉，在这里已露端倪。他后来在《小说月报》上又发表过六篇小说，《偏枯》（十三卷十一号），《刘并》（十四卷二号），《归来》（十四卷五号），《瘟疫》（十四卷十二号），《一粒子弹》（十五卷七号），《几封用S署名的信》（十五卷八号）。这六篇里头前四篇全是农村描写，后二篇却是所谓“非战文学”。本书选了《偏枯》等三篇。是打算在他那极少数的作品中选出了能够表示他的全面的東西。三篇之中，《偏枯》在技巧上最为完美。他用了很细腻的手法描写一对贫农夫妇在卖儿卖女那一瞬间的悲痛的心理。他的文字也许稍嫌生涩些，然而并不艰晦；他那错综地将故事展开的手法，在当时也难得的。他描写了站在“母性爱”与“饿死”的交点上进退两难的可怜女人的心情。他又描写了那几个不知道大祸已在门边的小儿女的天真。他又描写了那大一点的阿大对于未来的命运的敏感。他又描写了那个丈夫（患着偏枯症的）是比较“理知些”，咬紧牙关下的决心。他又描写了中间人的张奶奶（没儿没女的老婆子）滴着同情的而且也是母性爱流露的眼泪。这是三千字左右的短篇，然而登场人物有六个，而这六个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活生生，——连那还在吃奶的三儿也是个要角，不是随手抓来的点缀品。而在六个登场人物以外，还有一个不登场的人物，买了那阿大去的和尚，却也是时时要从纸背跃出来似的。

在《偏枯》中，作者对于他所表现的“人生”取了冷观的态度。他这冷观，在《瘟疫》中他试要摆脱而变为“幽默”。《瘟疫》的题旨是老百姓怎样怕兵。军阀铁蹄下的山东人的作者对于兵感想不会好的，他用了“幽默”的笔调写一个小村上的居民怎样想用消极的手段来挡那些丘八太爷的驾。然而也因为是“幽默”。他不免太夸张，结果他这篇《瘟疫》就有点像一幅不大近人情的“谑画”。《几封用S署名的信》是作者最后的作品（就《小说月报》所登载的说，这是最后的），他终于抛弃了最初的纯客观的态度，热情地诅咒“内战”的罪恶。他用了书信体，他不写战地的情形，不写士兵，他描写一个下级军官怎样由“升官发财”的梦跌在现实的泥淖里，终于觉悟了他在那无名目的混战中的真实的地位。我们猜想来，作者大概未尝有战争的亲身经验，他很知道怎样回避他所不熟悉的事物，所以用了书信体，而且注重在心理描写。这要跟我们近几年来战争文学一比；他这篇自然不能往成功的淘里算，可是在十三年（一九二四）的非战文学中（他这篇发表在那时《小说月报》的非战文学专号），已经是很好的了。同时他还有一篇《一粒子弹》（《小说月报》十五卷七号），那是他企图从正面描写战争的，那就更差。在《几封用S署名的信》中，至少那下级军官心理的分析是成功的。而且像他所指出来的下级军官在战争中的真正地位，那时候的许多非战小说也都没有写到。

企图从特殊的社会生活的一角里找出题材来的，在那时候还有李渺世。他是铁路上的职员，而他所在的地方又有矿工场。他有意地想描写“近代机器文明”的黑暗面。但是他并不能抓住了中心点。他给我们看的，只是浮面

的，片段的，而且他自己的态度根本也只是个站在圈子外的“人道主义”的旁观者的（例如他的《这里的世界》，见《小说月报》十五卷十二号）。他对于这个特殊的社会生活的知识，也许并不怎样贫乏，然而他缺少真正的透视和理解，他不能把他的材料好好地分析组织，试来一个大规模的全面的表现。他只拾取了零碎的触不到核心的片段，印象的地写了出来。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作品，一共有七篇，都犯了同样的毛病：印象的片段。《买死的》（选在这里了）是他最好的一篇，但是他的缺点也很明显地留在那里。一个不幸的人在鬼眼似的灯光下，在交缠的毒蛇似的铁轨上，躺着断气的时候，一群冷酷的“幸福的人”却将死者的“命运”作为谈笑的资料。并且掠夺了他仅有的数十块钱，——这一幅鬼戏图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但是从那位死者的“不幸”的遭遇上，作者并没有指陈什么更深切的原因，反而给我们一个“人生无常之感”。在题名叫做《伤痕》的一篇里，（《小说月报》十五卷五号），作者用了陀思妥也夫斯基式的眼光在“龌龊的湿漉漉的抹布的绉褶里找出灵光”来，但是也像《罪与罚》的作者一样，我们这位作家既已“找得”了，便满足在自己创造的美妙的幻象中了。他憎恨丑恶的现实，他在丑恶中感到窒息似的苦闷，他曾经试想逃避；表现了这样心情的，是他的《搬后》（原见《小说月报》十四卷二号，也选在这里了）。可是搬到“屋前是高山岗，遮断了山外的天。……屋后也是高山，……除了几只飞倦了的鹰上去休息外，简直没有人在那里发现”，这么一个所在，他还是逃避不开现实的丑恶。有人的地方就有丑恶。这是作者在《搬后》中的沉痛的认识。逃是逃不了的。那怎么办呢？于是作者的第二步“发展”就是在龌龊的“抹布”绉褶里找出“灵光”来给自己陶醉。《伤痕》中有这么一小段：“我坐在炉边，虽然觉得今夜的灯光比较往时特别温柔和皎洁，但隔壁客人的房里，时时透出一阵阵的鸦片烟气，和一股浊烈的上等白丸的玫瑰香味，使人闻着难受，而仿佛像要呕吐似的，胸中十分郁塞，颇想开开窗户，放入些清冷的空气来。继念窗外正有岗丁站着，开开窗未免使他局促，而且雪下得那么大，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重想出一种抵抗的方法：立即把门关上。

抽开木盒点起一枝雪茄。动作上虽做得这样完备，心感上却仍是觉着不快，似乎连安坐都反了胃口似的，立起身来，低着头在屋中来回的盘旋，……”这是他在龌龊的“抹布”绉褶中发见“灵光”以前的心情，跟《搬后》的，相差不远。从《搬后》的“逃避”到《伤痕》的“找出灵光来”，相隔不过一年，然而在他心灵上的旅程，这是长长的一段。而且这两种态度常常迂回再现。而介于这两者之间，在他全体的作品上投了浓厚的色彩的，是旁观者的“人道主义”。

李渺世的作品虽然很少，而且每篇又都很短，几乎可说是“随笔”，不是小说，又他在表现特殊的社会生活这一点上，虽然是失败的（像我在上面所说），然而他反映了那时候多数知识者对于现实的丑恶那种又憎恨又没有办法的心情——这一点，却是成功的！他不自觉地得到了反面的成功。如果就这方面看来，我以为他的作品比利民，朴园，王思玷他们三位的作品实在是更深刻，更复杂，而且更多些历史的社会的意义！即如在技巧上，他也并没逊于那三位。不，他还有那三位所没有的深密的心理描写。

当时文学研究会被称为文艺上的“人生派”。文学研究会这集团并未有过这样的主张。但文学研究会名下的许多作家——在当时文坛上颇有力的作家，大部有这倾向，却也是事实。

冰心最初的作品例如选在这里的《斯人独憔悴》，是“问题小说”。《冰心小说集》共收二十八篇，大部分作于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年，而且大部分即使不是很显明的“问题小说”，也是把“人生究竟是什么”在研究探索的。

《超人》发表于一九二一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摹仿（刘纲的《冷冰冰的心》，见《小说月报》十三卷三号），并不是偶然的事。因为“人生研究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青年的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冰心在《超人》中间的回答是：世界上人“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她把小说题名了“超人”，但是主人公的何彬实在并不是“超人”。冰心她不相信世上有“超人”。隔了一年多，冰心又发表了《超人》的姊妹篇或补充——《悟》。在这一篇里，冰心更进一层，说：“地层如何生成，星辰如何运转，霜露如何凝结，植物如何开花，如何结果……这一切，只为着‘爱’！”然而《悟》发表的当时，对于青年方面的影响，或者说，青年方面来的反应，却反不及《超人》那样多。这原因。倘从《悟》的本身上去找，是找不到的。这是因为《悟》与《超人》中间虽然只隔开一年多，然而中国青年对于“人生问题”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的青年已经不愿再拿这个问题来自苦，而另一部分的青年则已认明了这问题的解答靠了抽象的“爱”或“憎”到底不成。

在庐隐的作品中，我们也看见了同样的对于“人生问题”的苦索。不过她是穿了恋爱的衣裳。最好的例就是她的《海滨故人》。

庐隐最早的作品也是“问题小说”。例如《一信封》写农家女的悲剧（《海滨故人》集页二），《两个小学生》写请愿运动（同上书页二二），《灵魂可以卖么》，写纱厂女工生活（同上书页三二）。然而从《或人的悲哀》（《小说月报》十三卷十二号，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到《丽石的日记》，“人生是什么”的焦灼而苦闷的呼问在她的作品中就成了主调。她和冰心差不多同时发问。然而冰心的生活环境使冰心回答道：是“爱”不是“憎”，庐隐的生活环境却使得庐隐的回答全然两样。在《海滨故人》这四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里，我们看见所有的“人物”几乎全是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在那里苦闷徘徊，或是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在狂叫着“自我发展”，然而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这些“人物”中间的一个说：“我心彷徨得很呵！往那条路上去呢？……，我还是游戏人间罢！”

（《或人的悲哀》）这是那时候（一九二一年顷）苦闷彷徨的青年人心中有的话语！那时他们只在心里想着，后来不久就见于行动。所以，在反映了当时苦闷彷徨的站在享乐主义的边缘上的青年心理这一点看来，《海滨故人》及其姊妹篇（《或人的悲哀》和《丽石的日记》）是应该给与较高的评价的。

作者原注：冰心的小说有北新出版的《冰心全集》中的《冰心小说集》一册。内除最后的三四篇以外，全是一九二六年以前的作品。

作者原注：庐隐的作品有《海滨故人》（短篇集，商务），《曼丽》（短篇集），《灵海潮汐》（短篇集，开明），《玫瑰的刺》（中华），《女人的心》（长篇，四社），《象牙戒》（长篇，商务）；

同样的心情，我们在孙俚工的《前途》里也看到了。这一篇借火车开行前旅客们的忙乱，焦灼，拥挤，以及火车开行后旅客们的“到了么？”“几时才到？”“能不能平安无事的到？”——种种期望的心情，来说明“人生的旅路”上那渺茫不可知的“前途”。在《前途》的篇首，作者引了《庄子·天运》篇的几句话：“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纲维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耶？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耶？……敢问何故？”作者已经把自己的题旨说得非常明白。

然而跟庐隐不同的，孙俚工抑住了主观的热情的呼号，努力想用理知的光来探索宇宙人生的“何故”。倘使我们说他的《命运》（《小说月报》十三卷十二号，民国十一年十二月）表示了他的探索的半途，那么，他的《海的渴慕者》（《小说月报》十四卷三号）就表示了他的探索的终点了。不过这“终点”并不是“前途”中提出的“何故”的答复，而是跨过了“何故”这一关的一种对于人生问题的主张——“我们应当怎样做”！

这就是他的“安那其思想”。这在《几篇不重要的演说词》（《小说月报》十三卷十号）已经露了端倪，可是到了《海的渴慕者》（这两篇的时间前后相差半年光景），他以“安那其思想”的说教者的姿态出现了。在《几篇不重要的演说词》内，他借了几个青年的嘴巴分析了当时青年们思想上的分野，他也企图说明这些“分野”所以形成的原因（他这说明并不十分成功），他把一个代表他的正面思想的“重要的人物庞人俊”藏在“幕后”不使上场，直到篇末，这才为“补足这个缺陷的缘故，把他底三则日记抄在这里，作为……结论”。而这“重要的人物庞人俊”就被作为“安那其思想”的代表。然而虽则如此，他还有点动摇不定，《命运》这一篇（比《几篇不重要的演说词》后两个月发表）就表示了他在“半途”时——动摇不定时无心流露的悲哀的叹息。这一篇写觉悟的女性之终于成为“家庭的奴隶”，最后只能承认了“不可幸免的命运”，而且说“隐忍着苦痛挨过这无聊的生命罢”！作者在《命运》中也企图分析那终于要把女子造成“家庭的奴隶”之根本的原因，但是他的唯心论的眼光使他得不到真实的根本原因，于是在自己的不正确的观照下他茫然自失，发了悲哀的结论。

可是作者并不是安于半途的人，虽然他缺乏透视的目光和全般地对于人生的理解，他对于人生的态度是严肃的，他有倔强的专注一面的个性。所以他不久就完全跳过了“敢问何故”这一阶段，他就直捷痛快地选取了他认为合理的“我们应该怎样做”。

《海的渴慕者》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人。这第三人称的“他”虽然有时近于虚无主义者，但大体上还没有走到“虚无主义”而是一个“安那其”。“他”不满于世间的诈伪，卑劣，和不平等，“他”到处看见了诈伪，卑劣，不平等，“他”愤激到发狂，然而他并没有终止那一切诈伪，卑劣，以及不平等的方案，他也不信有任何完善的方案，更不信有任何人可以被委托去执行。那么“他”没有憧憬的对象么？倒也不然。“他”有的。那就是“海”。

“海”代表了他理想中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海”是茫茫然阔大无边的，这固然说明了“他”所寻求的是至广至大自由的“人生”，但也说明了“他”所寻求者只是像“海”那样茫茫阔大而没有分明界说的“自由”。“海”的渴慕者的“他”狂热地叫着什么都不要了，只要“海”，然而如何

使他主观地“不要”的东西客观上成为没有，他却是想也没有想到的。

这一种“安那其思想”的痕迹，在孙俚工后期的作品里又渐渐淡了起来。他渐渐从“一切都要不得”变到“人道主义”了。在《隔绝的世界》（《小说月报》十四卷五号），他慨叹于梦想“美”的艺术家不知道“灵”的风景的背后有一幕悲剧；在《家风》（《小说月报》十六卷九号）里，他用了感伤的调子写那老年的节妇的心灵上的寂寞；而在《归家》（《小说月报》十四卷十号十一号）这中篇内，他对于当前的社会变动也不深求其光明面与黑暗面的所以然，而“为人类的前途忧虑着战栗着”了。

一九二六年以后，他似乎已经绝念于创作。

七

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的地，写实的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的，是叶绍钧。他的初期的作品（小说集《隔膜》）大都有点“问题小说”的倾向，例如《一个朋友》，《苦菜》，和《隔膜》。可是当他的技巧更加圆熟了时，他那客观的写实的色彩便更加浓厚。

短篇集《线下》和《城中》（一九二三到二六年上半年的作品）是这一方面的代表。

要是有人问道：第一个“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智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是叶绍钧！

他的“人物”写得最好的，是小镇里的醉生梦死的灰色人，如《晨》内的赵太爷和黄老太这一伙（短篇集《城中》页九七）；是一些心脏麻木的然而却又张皇敏感的怯弱者，如《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以及他的同事（短篇集《线下》页一九五），他们在虚惊来了时最先张皇失措，而在略感得安全的时候他们又是最先哈哈地笑的；是一些没有勇气和环境抗争，揉揉肚子就把他的“理想”折扣成为零的妥协者，如《校长》中的小学校长叔雅本想换掉三个坏教员，但结果因为鬼述似的面允了三个中间的一个仍旧“蝉联”，于是索性把三个一齐都留任下去了（《线下》页八一），又如《祖父的心》中的西医杜明辉夫妇（短篇集《火灾》页一三一），没有勇气违反“祖母”，却也没有勇气完全丢开自己的“理想”，结果只能悲哀地望着自己的“理想”出神；是圆滑到几乎连自己都没有，然而又颇喜欢出风头的所谓“学者”，如《演讲》中的主人公“他”（《城中》页四一），是神经衰弱的很会幻想的，然而在失恋后连哭一场的热情都没有的惫懒人，如《一个青年》中的连山（《线下》页一二一）。

然而在最初期（说是《隔膜》的时期罢，民国八年到十年的作品），叶绍钧对于人生是抱着一个“理想”的，——他不是那么“客观”的。他在那时期，虽然也写了“灰色的人生”，例如《一个朋友》（短篇集《隔膜》页三九），可是最多的却是在“灰色”上点缀着一两点“光明”的理想的作品。

作者原注：孙俚工的作品有短篇集《海的渴慕者》和《生命的伤痕》（皆民智书局出版）；前者包含小说十八篇，后者包含小说三篇，剧本二篇。这些都是一九二六年以前的作品。

作者原注：叶绍钧的作品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发表的，有短篇小说集四本：《隔膜》（商务，民国十一年），《火灾》（商务，民国十二年），《线下》（商务，民国十四年），《城中》（开明，民国十五年）；又有《未厌集》（商务，民国十七年），其中共十篇，前五篇也是一九二六年的作品。

他以为“美”（自然）和“爱”（心和心相印的了解）是人生的最大的意义，而且是“灰色”的人生转化为“光明”的必要条件。“美”和“爱”就是他的对于生活的理想。这是唯心的地去看人生时必然会达到的结论。

在“发展”的过程上跟叶绍钧很相近的，是王统照。他的初期的作品比叶绍钧更加强调着“美”和“爱”。但是他所说“爱”和“美”又是一件东西的两面。他的“美”和“爱”的观念也跟叶绍钧的稍稍不同。他以为高超的纯洁的“爱”（包括性爱在内）便是“美”；而且由于此两者的“交相融而交相成”，然后“普遍于地球”的“烦闷混扰”的人类能够“乐其生”而“得正当之归宿”。《沉思》是从反面来说明这个“理想”的（短篇集《春雨之夜》页八）。画家韩叔云自然和那个“五十多岁的官吏”完全是两种人，然而韩叔云之不懂得“美”与“爱”的真谛，实在和那蠢俗的“五十多岁的官吏”差不多。做模特儿的女子琼逸是作者理想的“美”与“爱”的象征，她本来是通过艺术的媒介给人生快乐光明的，但是因为摧残“美”与“爱”的“五十多岁的官吏”——他是“功利”，“权势”等等的化身，既然只知道自私的占有，而那个自命为能形象的地创造了“爱”与“美”的画家韩叔云也对她不了解，于是结果她只好“怎么也不到韩叔云画室里去作裸体模型了，也不到戏院里去扮演了，在春日的黄昏，一个人儿跑出城外，在暖雾幕住的亭子里，独自沉思！”（短篇集《春雨之夜》页一六）

王统照又从正面写了“爱”与“美”之伟大的力量；这就是《微笑》（《春雨之夜》页一一九）。一个青年的小偷，被捕后关在牢房里，有一会却因无意中得到了一个女犯人的微笑，就胡思乱想起来；后来他由同监的老犯人嘴里知道了那女犯人的身世，并且悟得她那温和的微笑不是“留恋的，不是爱慕的，……更不是如情人第一次具有深重感动的诱引的笑容”，而是广博的爱人类爱一切的慈样的微笑，于是这年青的犯人便得了“深沉与自己不可分解的感触，仿佛诗人在第一次觅得诗趣，却说不出是甚么来一样。”终于他被这“微笑”超度了，在一年刑期满后出狱便成为一个勤苦的工人。“神秘的不可理解的微笑，或者果然是有魔力的，自那个微笑在他脑中留下了印象之后，他也有些变幻了。直到出了那个可怕的，如张开妖怪之口的铁门以后，他到了现在，居然成了个有些智识的工人”（《春雨之夜》页一四四）：这是他工作中自觉的意识。但是超度了他的那“微笑”的本身却是“终身监禁”，在这里，作者又象征的地说明了因为“爱”与“灵”的化身尚未有“自由”，所以人生的真善的境地，还不能实现。

《春雨之夜》（王统照的第一短篇集，民国十年到十二年的作品）所收的二十个短篇就有这样一种“理想的”基础。从这理想的诗的境界走到《山雨》那样的现实人生的认识，当然是长长的一条路。这路中间的里程碑就是这里所选录的《车中》以及稍后的《搅天风雪梦牢骚》（曾见《小说月报》不记何卷何号）等等，数量并不多。他的长篇《一叶》和《黄昏》大体上也是属于他这“路”的中段。然而也正像他的初期的作品比叶绍钧的更“理想”，他的第二期的“客观”的作品也没有叶作的那样冷冷地静观。诗人气质的王统照始终有他的热情！

和叶王二人同时在民国十年到十二年的文坛上尽了很大的贡献的，还有落华生。

他的作品从《命命鸟》到《枯杨生花》，在“人生观”这一点上说来，是那时候独树一帜的（他的题材也是独树一帜的）。他不像冰心，叶绍钧，

王统照他们似的憧憬着“美”和“爱”的理想的和谐的天国，更不像庐隐那样苦闷彷徨焦灼，他是脚踏实地的。他在他的每一篇作品里，都试要放进一个他所认为合理的人生观。他并不建造了什么理想的象牙塔。他有点怀疑于人生的终极的意义（《空山灵雨》页一七，《蜜蜂和农人》），然而他不悲观，他也不赞成空想；他在《缀网劳蛛》里写了一个“不信自己这样的命运不甚好，也不信史夫人用定命论的解释来安慰她，就可以使她满足”的女子尚洁，然而这尚洁并不麻木的，她有她的人生观，她说：“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他第一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到多么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他的网便成了。他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一旦破了，他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人和他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短篇集《缀网劳蛛》页一三五）。同样的思想，在《商人妇》里也很力强地表现着（《缀网劳蛛》页四七）。

这便是落华生的人生观。他这人生观是二重性的。一方面是积极的昂扬意识的表征（这是“五四”初期的），另一方面却又是消极的退婴的意识（这是他创作当时普遍于知识界的）、所以尚洁并没确定的生活目的，《商人妇》里的惜官也没有；作者在他的一篇“散记”里更加明白地说：“在一切的海里，遇着这样的光景，谁也没有带着主意下来，谁也脱不了在上面泛来泛去，我们尽管划罢。”（《空山灵雨》页三五）

落华生是反映了当时第三种对于人生的态度的。

在作品形式方面，落华生的，也多少有点二重性。他的《命命鸟》，《商人妇》，《换巢鸾凤》，《缀网劳蛛》，乃至《醍醐天女》与《枯杨生花》，都有浓厚的“异域情调”，这是浪漫主义的；然而同时我们在加陵和敏明的情死中（《命命鸟》），在尚洁或惜官的颠沛生活中，在和莺和祖凤的恋爱中（《换巢鸾凤》），我们觉得这些又是写实主义的。他这形式上的二重性，也可以跟他“思想上的二重性”一同来解答。浪漫主义的成分是昂扬的积极的“五四”初期的市民意识的产物，而写实主义的成分则是“五四”的风暴过后觉得依然满眼是平凡灰色的迷惘心理的产物。

八

这一时期，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家有徐玉诺，潘训，彭家煌，许杰。

徐玉诺是一个有才能的作者，然而他在尚未充分发展之前，就从文坛上退隐了。他在一九二三——二四年顷，创作力颇旺，一九二六年起，就没有看见他（我不知道他是否尚在人间）。这一位《将来之花园》（诗集）的作者正像叶绍钧在短篇小说《火灾》内所写，一方面是热情的，带点原始性的粗犷的，另一方面却是个 Diana 型的梦想者（《火灾》内的言信君就是徐玉诺）；前者的表现是他的小说，后者的是他的诗。不过在诗一方面他的成就比在小说方面似乎要高些。他留给我们的小说只有很少的几篇，而且处处表示了他只是刚刚在开步。

作者原注：落华生在一九二六年以前的作品收在短篇集《缀网劳蛛》和散文集《空山灵雨》（商务）。Diana 英语。罗马神话里的月亮和狩猎女神狄安娜。此处意指“月神”。

然而从这少数的篇幅中我们看见他有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基本的美质。这在《一只破鞋》和《祖父的故事》中很觉明显。第一，他的对话是活生生的口语；第二，他的人物描写全没有观念的抽象的毛病；第三，他写“动作”是紧张的，但亦自然，并且他也不是不能够描写心灵上的轻淡的可是发自深处的波动（例如《祖父的故事》）。

不过在这一切优点之外，他的小说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组织。诗人气氛很浓厚的他提起写小说的笔时，只是将他所有的印象单纯地再现，没有经过组织分解，抽出“典型的”什么来。不然，照他那样丰富热烈的生活（他是河南人，他的故乡的特殊生活他是一个实际参加者，叶绍钧的《火灾》内有一部分描写），他应当给我们更多些。

潘训的《乡心》在《小说月报》十三卷七号（十一年七月）发表的时候，他大概还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那时候，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还是很少，《乡心》的出现，是应得特书的。

这一篇小说虽然并没写到正面的农村生活，可是它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悲叹。主人公阿贵是抱着“黄金的梦”从农村跑到都市去的第一批的代表。阿贵是好胜的青年木匠，他的离开农村到都市，虽然一方面由于“好胜”，但他和“千里做官只为钱”的“投机者”的心理是不同的；隐藏在他“好胜心”背后的，是债务的压迫。这一点，《乡心》里写得很明白。然而到了都市的阿贵也仅仅能够生活；“出乡来，也总如此往往，究竟有什么好呢？”倔强好胜的阿贵也终于这样悲叹。我们从这青年农村木匠的故事看到了近年来农民从农村破产下逃到都市而仍不免于饿肚子的大悲剧的前奏曲。

作者后来在他的小说集的自序里说：“《晚上》等四篇，都以作者故乡的农人为题材。我的故乡的生活，是一味朴素的生活。在物质的生活的鞭迫下，被‘命生定的’一句格言所卖、单独地艰苦地挣扎着。这四篇小说中，便都是这种人物。”

这一段作者自己的话，在《人间》（《小说月报》十四卷八号），《牧生和他的笛》（十五卷十号），以及《晚上》各篇内，也许恰合（尤其是《人间》内的主人公火吒司是“命生定”论者的代表）。但是在《乡心》中，阿贵这倔强者正是对“生定”的“命”在抗争，虽然好像终于要失败。《乡心》之所以比《人间》等三篇更为杰出，就为的《乡心》写了农村人物的两种典型：“命生定”论者的阿贵的父母，以及对“生定”的“命”挣扎的阿贵。然而阿贵的挣扎也还是盲目的。因此他的本性的倔强虽然使他不肯屈伏（回到他家乡去），但他掩不了心中的悲哀。在我们面前的阿贵的姿态，不是坚定的，挺起胸膛朝前面看的，而是盲目的，悲哀的，低头着，忍住了眼泪苦笑。

在这里，我们应当连带讲一讲王任叔的《疲惫者》（已经选在本书里了，原见《小说月报》十六卷十一号）。这一篇的主人公运秧驼背也是个倔强汉，

作者原注：徐玉诺的小说并没有单行本。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有《在摇篮里》二篇（十四卷五号及六号），《一只破鞋》，《寂寞》，《灰色人》（后二者只可算是速写，皆见十四卷六号），《到何处去》（十四卷八号），《祖父的故事》（十四卷十二号），《往事一闪》（十五卷一号）。诗集《将来的花园》，商务出版。

作者原注：潘训在一九二五年以后没有创作。他虽然开始创作很早，可是他写得不多；他好像只有收在《雨点集》内的九篇，这集子用了田言的笔名。民国十八年亚东出版。

也曾离开了他的故乡到“下三府”(指旧时的杭,嘉,湖三府)去想“发财”,然而五十多岁回来时,他毫无所得,只留下个本性的倔强。少年的梦已经过去了,他变成一个“闲汉”。他不再想和“生定”的“命”挣扎了,可是他在“命”前低头的时候,还是要说几句强话的。我们在这运秧驼背身上看见了盲目挣扎者的后半世的下场。他已经没有悲哀,他有的是冷笑,有的是对于阿三那种趋炎附势者的憎恨和蔑视。他虽然时时几天没有饭吃,然而他不肯偷,不肯拍马屁,他是保持着高贵的胜利者的姿态的。

用了更繁杂的人物和动作把农村生活的另一面给我们看的,是彭家煌和许杰。这两位的首期的作品(他们开始创作差不多是同时的)有一些共同点:两个都是纯客观的态度,两个都着眼在“地方色彩”,两个都写了农民的无知,被播弄(不过在彭家煌的悲喜剧的《怂恿》内,播弄的主动者是“人”,而在许杰的悲剧的《惨雾》内却是农民们自己的原始性的强悍和传统的恶劣的风俗)。

彭家煌的独特的作风在《怂恿》里就已经很圆熟。这时候他的态度是纯客观的(他不久就抛弃了这纯客观的观点)。在这几乎称得是中篇的《怂恿》内,他写出朴质善良而无知的一对夫妇夹在“土财主”和“破靴党”之间,怎样被播弄而串了一出悲喜剧。浓厚的“地方色彩”,活泼的带着土音的“对话”,紧张的“动作”,多样的“人物”,错综的故事的发展,——都使得这一篇小说成为那时期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

和《怂恿》同样富有“地方色彩”的,是《活鬼》(短篇集《怂恿》页八三)。在这一篇的诙谐的表面下,有作者对于宗法社会的不良习俗的讽刺。富农某,因为财旺丁不旺,就放任他的寡媳和女儿去偷汉,可是“她们没有成绩报销出来,老农可不能不预备身后了”,他赶紧给他的十三四岁的孙儿荷生娶了个年龄只比荷生大十来岁的老婆,这才一无牵挂的溘然长逝。这个孩子新郎的大新娘自然会接受她婆婆的衣钵的。过不了一年,荷生的家里就常常闹鬼了。荷生不知道他所怕的“鬼”正是他的大了十多岁的老婆所招来而且欢迎的。他去请了他在小学校读书时的好朋友——校里的厨子,是出名的有家传驱鬼符的,——到他家里住宿,帮同赶鬼。这个“赶鬼人”就宿在荷生的房里,跟荷生一床,荷生的老婆睡了同房的另一床。第一二夜,的确还有鬼响,但是被“赶鬼人”一声嚷骂,就没有了。后来半个月里简直再没有鬼在窗外闹响了,“赶鬼人”也只好自回他当差的学校里。然而“赶鬼人”一去,“鬼”又来了。这一夜没有月光,荷生一听得石子在屋顶上响,就抖抖地起来拿了猎枪朝窗外放了一枪。枪声过后,窗外起了一阵脚步声,跑入竹林去了。荷生第二天到小学校里找他的好朋友“赶鬼人”,那知不在。后来这“赶鬼人”就从此不见。

彭家煌早期的都市生活的描写,收在短篇集《怂恿》内的,例如这里选录的《Dismeryer先生》以及另外的几篇(《到游艺园去》,《军事》,《势力范围》),也还多少有点纯客观的态度,至少是他对于当面的现实还没有确定的见解。这是他前期的作品和后期的不同的地方。

他不幸无寿,所以他留给我们的作品也不很多。

许杰却是个生产丰富的作家。他写了很多的农村小说,而且大部分是一九二四——二六这三年中的作品。最近四五年来,他几乎没有什么新作。

许杰开始创作大概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他最初的两年光景，一气里给了我们十多篇农村生活的小说，其中长的如《惨雾》，有三万多字，短的亦常在一万字以上。在那时候，他是成绩最多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家。他是浙江台州人，他的题材多取自他的故乡。一九二五年起，他转了方向，写都市中流浪的青年群的生活了；《火山口》内十个短篇全是这一类的作品。但在一九二四年他专注于农村生活的时候，他亦有过一篇流浪青年的描写，就是收在短篇集《惨雾》内的《醉人的湖风》。

正像他的题材是两方面的，他的作风也有两个面目。他的农村生活的作品几乎全是客观的写实主义的，而他的都市中流浪青年生活的作品却是热情的感伤的，多少还有点颓废的倾向。这，他在短篇集《火山口》的自序内有一段诚恳的自白。

他的农村生活的小说是一幅广大的背景，浓密地点缀着特殊的野蛮的习俗（如《惨雾》中的械斗，《赌徒吉顺》中的典妻），拥挤着许多农村中的典型的人物。他常常能够提出典型的人物来，可是他不能够常常写得好。他只有一两个是写得相当成功的，例如《赌徒吉顺》中的主人公吉顺，《大白纸》中的大白纸；但这些都是畸形的人物，他们在转形期的社会中是一些被生活的飞轮抛出来的渣滓，我们只有从反面去看时，这才能够在他们身上认出社会的意义。自然，我们这位作家也写另一方面的人物，——在生活河里冲波激浪的人儿，例如《隐匿》中的善金，可是写到这一类人物的时候，作者就常常失败。就拿《隐匿》来说，居于主人公地位的善金，我们只看见一个侧影，而且这侧影在小说中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是生活中的败将，也快要成为生活的飞轮抛出来的渣滓了。

但是除开这一些不讲，那么，最长的《惨雾》是那时候一篇杰出的作品。这一篇里，人物描写并不见得成功，但结构很整密。也有些地方不简洁，但全篇的气魄是雄壮的。

《赌徒吉顺》（在短篇集《惨雾》中，页二五九）是颇为细腻的心理描写。吉顺的落在赌的魔手中，一方面固然由于都市的罪恶伸展到农村，而另一方面也由于农村的衰败和不安引起了人心的迷惘苦闷，于是要求刺激，梦想发财的捷径了。在堕落中的吉顺，只奉一个上帝，就是金钱。他第一次拒绝了典妻，就因为他刚刚赢了钱；第二次他在“名誉”和“金钱”二者之间挣扎了片刻，终于还是金钱得胜，他决定要典妻了。然而因为代价不像他所希望的那么多，于是在“名誉”的辩解下，他觉得典妻这事到底不好。这辩解是他失败（典妻不成）后的自欺。主宰他的，到底还是金钱、不是什么抽象的名誉。

假使我们说《惨雾》所表现的是一个原始性的宗法的农村（在这里，个人主义是被宗法思想压住的），那么，《赌徒吉顺》所表现的就是一个经济实力超于封建思想以上的变形期的乡镇，而这经济力却不是生产的，是消费的，破坏的。

九

因为这一篇“导言”的目的，只想说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里创作小说发展的概况，以及这一时期文学上几个主要的倾向，所以我不打算再噜苏地把上面不曾讲到过的作家一一讲几句了。这几位没有讲到的作家，虽然或者是所作不多，或者是他在新文学小说以外的部门贡献得更大，或者是应当放在第二个“十年”里，但是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贡献有它的历史的价值，并且给当时的青年作者以很多技术上的榜样。为要指出过去这十年中曾经有多少作家从各方面把我们这小说一部门装点得花团锦簇，我们这本书里一定不能缺少了他们的作品，然而我请读者自己去欣赏罢，我不再噜苏地讲我的感想了。

但在结束本文以前，我要再请读者注意，因为本书的范围限于文学研究会的各位小说作家，所以这篇“导言”的论述也不得以此为范围。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上的重要倾向中，我没有讲到创造社以及其他文学团体。不用说，创造社以及其他文学团体是代表了这一时期整个文坛上的几个最大的倾向的，但是我这里却包括不进去，这要请读者去读本丛书的《小说二集》和三集。还有文艺理论，诗，戏曲，散文等专辑。

三月十日，一九三五。

作者原注：这里介绍他们已经出版的单行本：郑振铎，《家庭的故事》（开明，大多数是一九二六年以后的作品）。罗黑芷，《醉里》（商务），《春日》（开明，有一九二六年的作品）。黎烈文，《舟中》（泰东）。赵景深《栀子花球》（北新）。敬隐渔，《玛丽》（商务）。许志行，《孤坟》（亚东）。李劫人，《同情》（中华）。徐志摩《轮盘》（中华）。王任叔，《殉》（泰东），《监狱》，《阿贵流浪记》，《在没落中》（乐华），《破屋》（新学）。

